

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Interviews with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王來棣 採訪、編輯
李锐序

目 錄

序.....	李 銳 iii
前言.....	編 者 1
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	林伯渠 5
我所知道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陳望道 24
籌建中共上海發起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經過.....	施復亮 34
中共上海小組的建立和它的幾個據點.....	沈雁冰 44
回憶上海建黨和知識界的情況.....	邵力子 57
關於“一大”前黨組織的名稱問題.....	李 達 67
關於上海建黨、上海大學、蕭山“農村學校”等情況的回憶.....	楊之華 71
建黨時期女學生的遭遇和“平民女學”.....	丁 玲 82
17 歲少女投身革命的故事.....	王一知 98
黨成立時期的工農運動.....	徐行之 103
建黨初期上海的工人運動.....	董鋤平 112
中共成立前後在北京工作的回憶.....	朱務善 115
關於北京建黨和中共“一大”等情況的回憶.....	劉仁靜 139
介紹李大釗、周恩來等人的一些情況.....	于樹德 144
回憶天津“覺悟社”.....	鄧穎超 155
關於天津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和旅歐支部的回憶.....	劉清揚 161

山東建黨的情況.....	賈石亭 172
我在濟南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馬馥塘 176
我的父親和山東建黨、建團活動.....	黃秀珍 180
武漢建黨前後的情況.....	吳德峰 186
武漢黨組織對青年學生的影響.....	夏之栩 193
憶“新民學會”、留法勤工儉學和旅歐“少年共產黨”.....	蕭 三 197
關於上海建黨和旅歐勤工儉學的回憶.....	陳公培 203
回憶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和四川建黨經過.....	吳玉章 220
1922-1925 年海南島的革命運動.....	馮白駒 230
回憶湖南衡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情況.....	曾希聖 238
後記——關於“走俄國人的路”的思考.....	編 者 242
附錄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 年版原文).....	毛澤東 251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	王來棣 260

序

李銳

交給我的這部書稿《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經擱置了整整半個世紀。採訪者、整理者、編輯者是同一個人，近現代史專家王來棣先生，她讓我寫篇序言，樂意為之，是自己也可增長見識。

上個世紀 50 年代起，來棣先生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事現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時期的歷史。由於文獻資料極少，研究困難很多，她從口授資料的搜集入手。那時，經歷過中共初創時期歷史的當事人，還有不少健在。1956 年中共八大召開時，來棣先生請求所長、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介紹她採訪有關的外地代表。范老熱情相助，介紹她採訪了李達、馮白駒、曾希聖，以後又介紹她採訪了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到 1957 年，她先後採訪了三十多人，還包括陳望道、施復亮、沈雁冰、邵力子、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鋤平、朱務善、劉仁靜、于樹德、鄧穎超、劉清揚、賈石亭、馬馥塘、黃秀珍、吳德峰、夏之栩、蕭三、陳公培等。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稿，受訪者大都作了仔細修改、補充和訂正。她還搜集了不少文獻資料。

研究剛剛有些進展，來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場“橫禍”：1957 年那個“急風暴雨”的夏天，夫君許良英先生因仗義執言，被打成“極右

分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牽連，被開除黨籍，研究中共歷史的資格也被取消。訪談計劃不得不中止，採訪記錄連同搜集的文獻資料全部交公。後來所裏倒是將資料退給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一來，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她不得不忍痛將可能引起麻煩的資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訪問的原始記錄保留了下來，這才有了這部書稿。

時間過去幾十年，有關中共初創的歷史資料，如今有了較過去遠為豐富的發掘。但是再豐富的發掘，像來棣先生這樣的訪談，肯定是不會再有了。當年訪談的對象都已作古，無一在世。當年受訪者為尊者諱，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刪節，或叮囑採訪者刪節，隱去不少史實；此次編書，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歷史敘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局限和恐懼。唯其如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我有過與來棣先生類似的經歷。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曾費力搜集過毛澤東早年的生平資料，同毛澤東早年的師友親屬周士釗、李達、毛宇居、易禮容、陳書農、蔣竹如、田士清、薛世倫、王季范、張幹、羅元鯤、楊開智、李醒安等人作過交談或托人收集過資料，向當時被關押的相關當事人彭國鈞、熊夢飛做過瞭解；還在圖書館積滿灰塵的舊報刊中、在準備送造紙廠化紙漿的廢紙堆中，翻找出不少難得的史料。經過整理，編成了一部《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50本。但招來嚴厲指責：“有害無益”，並要求全部上交。我當年三十多歲，血氣方剛，索性發憤著書，寫出一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90年代再版時改名《早年毛澤東》）。書正是來棣先生罹禍的1957年出版的，其時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轉行水電、投筆從

工了。兩年後，我也遭遇“橫禍”，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追隨者”，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關進秦城監獄，二度坐牢（延安“搶救運動”時曾關過保安處），直至 1975 年出獄，“文革”結束後才平反復職。

來棣先生的書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創時期的歷史。近些年來，我一直主張要搞清楚三個問題：黨、理論、歷史。因為這個黨、這個黨所奉行的理論，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乃至今天的中國現實，已經發生、仍在發生或許還將發生至深且巨的影響。這部書稿正是探究這三者的源頭，一如作者在後記裏所說：“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

中國人學習十月革命、“走俄國人的路”、建立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來年的事情。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處在一個思想激蕩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後一個皇權，卻沒有搖動專制主義的基礎；建立了中華民國，卻遠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先是帝制復辟，後有軍閥混戰，一片亂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識界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濟民的良方。一時間，黨派林立，異說雜陳。各種學說、主義中，“社會主義”成為最時髦、最新潮的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其實包含了諸多流派。瞿秋白說過一段為研究者廣為援引的話：“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創始人原來大多信奉無政府主義，在“紛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中，最終選定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

促使中共早期創始人做出這個選擇的，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最熟悉的說法，就是毛澤東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中國人知道馬克思而言，毛澤東所說並不準

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俄國十月革命前，中國就有人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譯文馬恩著作。就對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澤東又沒有說錯。中共早期創始人幾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不必說了，來棣先生訪談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鄧穎超、劉清揚、夏之栩、陳公培等人都回憶了十月革命對自己的影響。十月革命到底什麼地方吸引了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呢？從他們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十月革命後，俄國蘇維埃政府宣佈放棄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二，十月革命從制度上解決了俄國的問題；第三，十月革命採用了動員群眾、組織軍隊、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被描繪成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憑着對十月革命的這些傳說，他們心中的天平開始傾向蘇俄，選擇了“走俄國人的路”；又在共產國際來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

對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創始人終究還是“隔着紗窗看曉霧”，並“不十分清晰的”。參與籌建上海中共早期組織的陳公培在訪談錄裏就坦陳：“當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糊的”。豈止“模糊”，今天看來，應該說是蒙蔽。單說所謂放棄不平等條約，蘇俄除了一紙空文並無任何實際行動外，甚至連“放棄”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務方面同蘇俄合作”；還要求中國政府通過與蘇俄的談判，使它在外蒙駐軍“合法化”。無怪乎今天有學者指出，這是在宣佈“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同時，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條約。（朱正：《解讀一篇宣言》）可是當年的中國人卻被蒙在鼓裏，還“無任歡喜”。

重要的還在於十月革命本身。有學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那場被稱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佔冬宮起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只是發射了一顆信號彈，用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當天通告的

說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所謂“震撼”，無從談起，即便起義發起者也相當低調。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其實是十月革命只響了一炮。倒是兩個月後，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府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強令解散立憲會議，要求將權力交給蘇維埃，這個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國，引起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不滿甚至憤怒。連左翼作家高爾基都悲憤地說，布爾什維克用“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美夢”！這場所謂第一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毀壞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斷了“二月革命”開啟的由專制傳統轉向憲政民主的進程，革了“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後果》）對此，當年中國人竟有“酷愛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讚譽。十月革命事實的真相從一開始就被掩蓋了，連後人都是今天才知曉，遑論當年的知識分子。

更重要的是，從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化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後來還加上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那句名言，說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耐人尋味的。列寧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典有許多相異和相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變種。比方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容納不了生產力時，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恩格斯明確說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而列寧偏偏要在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封建帝國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說一個國家也能建成社會主義。還比方說，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就把它變成共產黨專政；斯大林則將黨專政乾脆簡化為領袖專政，實際上轉化為他個人專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個人專政。於

是，中國人接受蘇俄的觀念，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和俄化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被神化了。中共黨人不僅對它的動員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獨鍾，而且對它後來建立的專制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嚴酷和鐵腕的黨制無比嚮往。過去不是有一句話嗎：“我們就是一邊倒”，還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無論是蘇俄革命的經驗，還是蘇聯的專制制度，無論是列寧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是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背離。十月革命 74 年後，蘇共下臺、蘇聯解體。事實證明，背離人類普世價值自由、民主、科學和法治，脫離人類文明依靠科學知識即智能發展的規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都只能為自己敲響喪鐘。這個結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國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

但是，中國人選擇“走俄國人的路”，並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兩國國情相近，產業落後，基本上是農業國度，農民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比較起來，中國更加落後，更加缺乏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兩國都有長久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又沒有經歷像西歐那樣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樣，比較起來，中國三綱傳統的專制主義歷時更長，國民處於蒙昧狀態，普遍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根本不具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國與俄國又有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受外國入侵，是在被動的條件下開始發展產業，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這種社會轉型不僅費時（到現在也沒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國資本的驅動，也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付出的社會代價極高而鮮見成效。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先進的中國人步履維艱。因此，中國知識分子中滋生出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毛澤東 1921 年元旦說的一段話，極有代表性：

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幾種：

1. 社會政策；
2. 社會民主主義；
3. 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 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 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文集》第一冊）

在毛澤東看來，議會、自由等等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只有列寧的“激烈共產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

上述這些，說明中國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適宜土壤和氣候。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民智未開的蒙昧狀態，奴隸主義的國民人格，加上烏托邦式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大同”想像、激進主義的心態，使得蘇俄革命和蘇聯模式很快就在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中產生共鳴，並且浸潤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其結果是，具有啟蒙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曇花一現，轉瞬即逝。五四時期高揚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倡導人權、自由、公正、憲政，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而拋棄，尤厭惡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在價值

取向上，中共早期創始人轉向崇尚革命而鄙視改良，崇尚突變而鄙視漸變，崇尚暴力而鄙視和平，崇尚對立而鄙視妥協，崇尚群體而鄙視個體，崇尚黨性而鄙視人性。剛剛朝人類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國，再次脫離人類文明主流的軌道，並且漸行漸遠，完全背道而馳。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執政以後，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照蘇聯斯大林模式，建立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意識形態上輿論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要把中國建成國際共運的新樣板，不僅把“蘇聯的今天”變成了“中國的今天”，而且使“中國的今天”大大超過了“蘇聯的今天”。從鎮反、肅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已，生靈塗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遲滯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走向市場經濟道路，舉世公認，物質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依舊禁錮重重，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鉗制異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得不到真正維護，而且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而至於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們應該感謝來棣先生。她的書稿，提供了回顧歷史的資料，有助於人們反思。經過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產革命歷史，特別是經過五十多年劫難相繼的當代歷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會再是“隔着紗窗

看曉霧”了吧。

2007 年 12 月 9 日

前 言

這是 26 位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黨員的口述歷史，是我 1956 年 4 月至 1957 年 5 月間所作的採訪記錄。當時我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現代史研究組工作。組裏指定我研究中共建立時期的歷史（附帶搞清楚無政府主義對建黨的影響）。因為有關這段歷史的文字資料很少，工作很難深入。1956 年 5 月，我開始進行採訪工作。同年 9 至 10 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我請求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同志（以下稱“范老”）介紹我採訪幾位從外地來的代表。范老立即介紹我去拜訪李達、馮白駒和曾希聖同志，後來又讓我去拜見林伯渠、徐特立和吳玉章同志。在 1956~1957 年整整一年內，我共採訪了三十多位。在當時，就我所知，還沒有其他同行為這段歷史採訪過這麼多人。因為有研究所和范老的介紹，我的採訪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令人感動的是，受訪者當時大都公務繁忙，每次採訪往往只能安排一個小時，一次談不完，還主動約我第二次再談。更難得的是他們對採訪記錄的認真態度，如馮白駒同志在百忙中親自向當事人的親屬核對事實；林伯渠同志和吳玉章同志都親自對記錄稿進行修改；朱務善同志和劉清揚同志根據記錄稿重新撰寫了回憶錄。

1957 年反右運動時，我的丈夫許良英因反對反右運動，被錯劃為“極右分子”；我受牽連，被開除黨籍，取消研究黨史的資格，採訪工作因此中斷。部分記錄稿來不及送受訪者審閱、修改；原準備 1957 年

下半年採訪的董必武、李維漢、李富春、譚平山等同志的計劃不得不停止。我所做的採訪記錄和收集的文字資料全部交公。不久，因發現研究組內資料失竊，又把它們歸還給我。此後，所內外同行不斷向我借用這些資料。有的人借走至今不還。

“文革”時，浙江大學地下黨受誣陷，許良英在解放前曾經領導過浙大黨組織，成為重點審查對象。我也是浙大地下黨員，同樣被視為“敵對分子”。浙大的造反派如虎似狼，威脅我交出有關浙大地下黨的資料。我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為應付抄家，把可能引起麻煩的文字，包括黨史資料，付之一炬。

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同志告訴我，他領導的現代史研究室準備編輯出版《“一大”前後》，讓我把50年代所做的訪問記錄交給他。我當即把自己保存的全部記錄稿交給他。過了幾個月，他把稿子還給我（有少數底稿未還）。後來我從他贈送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書中發現他們採用了我提供的訪問記錄17篇。我對自己的採訪記錄有機會公諸於世而感到欣慰，特別是我的部分記錄稿當時來不及送受訪者審閱，《“一大”前後》的編者于1980年補做了5篇稿子的送審工作，增加了訪問記錄的準確性，我是很感謝的。遺憾的是，《“一大”前後》的編者對記錄稿作了過多的剪裁（如把林伯渠同志的訪問記錄上半部全部刪去），有的稿子做了修改。

經過50年的風風雨雨，我前後丟失和燒毀的黨史資料，現在記得起來的有：李達、徐特立、易禮容、羅章龍、何長工、張申府、包惠僧、劉仁靜（部分記錄）、邵力子（部分記錄）等老同志、老先生的訪談錄；黨史文獻方面有：中共“一大”文件、《新民學會會員通訊集》1~3集、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青年》1926年3月廣州

出版)。(以上資料是我借原件手抄的)。此外，關於張國燾、周佛海、陳公博等人的資料、無政府主義的資料以及我自己寫的文章，是我在“文革”時燒的。使我最感到不安的是燒掉了巴金給我的兩封親筆長信（當時巴金因信仰過無政府主義而被批鬥）。

80 年代以來，史學界已發表了不少有關“一大”前後的史料與論著，我的部分訪談錄已被刪改後發表，加上我從 1957 年 6 月起已停止黨史研究工作。從個人興趣來說，我不想再在這方面消耗時間。但考慮到當年老同志們所以熱情地接受我的採訪，就是因為我是范老領導下的歷史研究人員，相信我能忠實地把他們的心聲傳達給讀者。現在他們都已去世，50 年前的訪談錄已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把他們原原本本地奉獻給讀者。

有幾點需要向讀者說明：

一是當年進行採訪時，並沒有單獨出版訪談錄的打算。採訪的目的是為了補充已有文獻資料的不足，搞清楚某些問題。有的地區的文字資料比較多，如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利群書社等，我的採訪資料就比較少。由於沒有經費，我只能在北京活動，有關廣東黨小組的情況，在北京就沒有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因此，這本訪談錄存在採訪範圍不夠廣泛、涉及面不均衡的缺陷。經過 50 年的磨難，我現在只剩下殘缺不全的 26 份訪談記錄。這些訪談錄除記載各地區建黨的經過、活動以及參加人員等情況外，許多受訪者比較詳細地敘述他們自己當時的處境和思想情況，為什麼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對這條道路的認識，以及無政府主義對早期共產黨人的影響等。後者可能是別的黨史資料沒有注意到的，我卻認為這些正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問題。

第二，在受訪的 26 人中，有的入黨時間稍晚，並非黨的創建者。當年採訪他們，目的是通過他們瞭解建黨的歷史背景，以及“一大”前

後黨的影響和活動情況。又如馮白駒同志是海南島共產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曾希聖同志敘述當年青年團的情況，都很有史料價值。所以把他們的訪談錄一併收入本書。

第三，大部分訪談錄都經過受訪者的審閱、修改。其中有的稿子修改得很多。按常情，凡是刪改過的地方，不應收入正式出版物與讀者見面。但仔細觀察刪改的內容，有的是忌諱觸犯毛澤東的權威，不便實話實說。記得當年採訪時，受訪者往往把我當作自己的晚輩，象在家裏聊家常似地輕鬆自如，坦誠地訴述自己的真實感受。但當見到將公開發表的訪談記錄時，難免產生顧慮，為避免惹出麻煩，乾脆刪去。考慮到這些被刪去的部分很有史料價值；而且經過 50 個春秋，國內雖然仍舊沒有言論自由，但畢竟有所鬆動，毛澤東的權威性早已動搖，因此有必要也有條件把原始記錄同修改過的記錄一同發表。兩者對照着閱讀，會解讀出新意。

第四，修改過的訪談錄，一般以原始記錄為底稿，刪去的文字用虛線框 () 表示，增添的文字用下劃線 () 表示 (如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改作中共“一大”)；字跡模糊，無法辨認的，用□□□表示。

第五，訪談錄的標題，除朱務善和馮白駒兩位自己定的以外，其餘都是編者加的。

第六，本書的採訪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首先是由於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同志的支持；現代史組同事單斌和劉明達二位同志幫助我作記錄；北京大學歷史系王思葳同志在收集、整理受訪者個人簡介資料和把訪談記錄輸入電腦等方面給了我很多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特別需要感謝的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史非常熟悉和透徹瞭解的 91 高齡的李銳同志，為本書寫了高瞻遠矚，對現實有巨大衝擊力的，長

達六千多字的序言。

由於我接觸資料有限，沒有編輯工作經驗，本書不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編者

2008 年 1 月

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

林伯渠



林伯渠（1886 - 1960）湖南省安福（今臨澧）縣人。1904 年到日本留學，1905 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從事反清活動。辛亥革命後，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之役和反對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的護法運動。但多年奮鬥一再受挫，未見成效。思想產生疑惑。後經李大釗等友人啟發，接受馬克思主義，並於 1920 年 12 月在上海加入共產黨發起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2

年他以中共黨員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協助孫中山改組該黨。中共通過他安排共產國際代表和蘇俄特使同孫中山會晤，1922 年下半年他還同李大釗一起參加孫中山同蘇俄代表越飛的會談。1924 年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進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1926 年北伐期間，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赴蘇聯學習。1932 年回國後，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歷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等職。長征時任紅軍供給部長。1937 - 1948 年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是中共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七名參政員之一，曾

代表中共在參政會提出：廢止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重要主張。1945 年和 1956 年當選為中共第七屆、第八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秘書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60 年病逝。

【編者按】

編者于 1956 年 10 月底經范文瀾同志介紹，拜訪林伯渠同志。林老很健談，講了當年護國、護法戰爭，他自己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國共合作以及北伐戰爭等情況，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可惜編者沒有完全聽懂他的湖南口音，沒能把他的話全部記錄下來。11 月初編者把整理好的記錄寄給林老，請他審查、修改，同時提了 5 個問題，向他請教。11 月 28 日，馮玉章同志（大概是林老的秘書）按照林老的意見給編者回信，並寄回修改過的記錄稿。林老非常認真，對記錄稿作了很大修改，刪去 2/3 篇幅，保留的 1/3 也有很大的改動。他刪去的部分，主要包括：

（1）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背景。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在中國固有的民主主義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般史書上只是談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太簡單化了一些！”。看來他對這段話的刪改是經過一番斟酌的。他先在這句話上用毛筆打了括弧，後來索性把有關段落全部刪去。那麼，他為什麼要刪去這段話呢？編者現在把原始記錄和修改過的記錄一起發表出來，請讀者自己解讀。

（2）有關林老個人的革命經歷。這些內容為什麼刪去？可能是由於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曾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規定“防止對個人的歌功頌德”。從此，全黨、全國只允許歌頌毛澤東一個人；

其他革命領導人實事求是地敘述自己的革命經歷，恐怕也是犯忌的。

(3) 刪去他對建黨初期的活動和對黨內某些人的評價。

這些刪去的內容，顯然都是很有價值的。

馮玉章同志來信說：林老準備在出京視察回來後，把刪去部分涉及的歷史事件，歸入所提問題給編者回答。後來林老再也沒有同編者聯繫，編者也因故無法再去打擾他。

訪談原始記錄

(1956年10月)

我們黨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才50多個黨員，至1922年“二大”時，黨員發展至100餘人，1923年“三大”時，有400餘人，1925年“四大”時900餘人，1927年在武漢開“五大”，發展至5萬多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許多同志犧牲了，有的黨員在白色恐怖下退出了黨，至1928年在莫斯科開“六大”時，只有1萬多黨員。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中已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傳統。如明末清初黃黎洲、王夫之、戴東原等，有民族革命思想並有唯物主義的萌芽。在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中，有哥老會組織，進行反清鬥爭，至光緒初年，哥老會有很大勢力。義和團和會黨組織，都有民族主義思想。清代開博學鴻詞科，起初好多明朝遺老都不去，在《桃花扇》中，也反映了明朝遺老對亡國的傷感。清初，民族民主主義的思想，由於清政府的箝制壓迫，愈來愈強烈。康梁主張君主立憲，之後，孫中山又主張民主共和。孫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在開始時也不很明確，後來逐漸發展成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這時達到了登峰造極，《新民叢報》的銷路，達到了3萬多份。唐常才當時政治上也主張

君主立憲，是衝破羅網的人，孫中山和康梁在政治主張上曾有過激烈的鬥爭。

章太炎等組織的光復會，有明末遺老思想，它和黃興等的華興會，孫中山等的興中會，聯合組成同盟會。我在日本時，和宋教仁、黃興很熟，有民族革命思想，曾請孫中山先生講演兩次。他談到民主共和國的道路，說自己在英國研究過鐵道史，英美法等國進步很快，好比鐵路，我們革命，就要搞鐵路，不要搞“雞公車”（編者注：一種手推的獨輪車）。我聽了覺得很對，就參加了同盟會。我在湖南常德西路師範讀書時，認為把教育搞好，就可以救國，後被選派日本留學。在日兩年，思想有了進步，知道要革命，有民族、民主思想。當時搞民族革命的人，還不懂得社會主義，只知道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我於 1914 年因反袁運動回國，1915 到 1916 參加護國之役，1917 到 1918 年，跟孫中山進行護法運動。在湖南聯絡一些革命力量，組織護法軍 2 萬多人。由程潛任護法軍總司令，佔領了郴州、衡陽，後來到了酃縣，成立政府，我任財政廳長。護法軍總工部（？）部長張輝瓚，是留德的，對士兵不好，我對他不滿；第一總隊師師長（？）林修梅，思想進步，在“五四”運動前，曾寫過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他的軍隊，對群眾很好。這個時候，農民幫助我們的軍隊，我開始覺得農民很好，軍隊中雖然有些人好，但有些人還是不好，只有人民群眾才是好的。我有了聯繫群眾的思想，也考慮到社會制度問題，開始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這以前，我從日本，從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品中，知道資產階級是不好的等社會主義的道理。）

中國人知道十月革命，是 1918 年 3、4 月間從日本得到的消息。在這以前同盟會的朱執信翻譯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有點經濟思想，無政府主義也宣傳“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已鬧得熱火朝天，在中國則知道得很少，談不上研究。

我在日本的時候，認識了李大釗同志，和他很熟，我回國後，和他通信。1918 年 3、4 月間，李大釗同志把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和有關宣傳品寄給我們看，我和林修梅等都很高興。自此，我有了依靠工人的思想。1920 年 11 月（或 12 月），李大釗同志寫信給我，叫我和陳獨秀聯繫，我於 1921 年 1 月去上海，找陳獨秀（陳當時住漁陽里二號），參加共產主義小組。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中國固有的民主主義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一般史書上只是談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太簡單化了一些！

對孫中山的估價，也不能太簡單化。孫中山在辛亥革命過程中，確是很辛苦的，前仆後繼，黃花崗之役死難的不只 72 人，其中很多是優秀的青年。做研究工作，應該多從當時的時代來看問題。武昌起義後，十七個省在兩個月之內起來響應，道理何在，是應該加以研究的。象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所作的深入分析歷史事件的作風，是值得學習的。

共產主義小組，大概是李大釗同志搞得最早。他在 1918 年就發表《庶民的勝利》、《布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他一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有鄧中夏、范鴻劼、羅章龍等 20 來人，于樹德也是北京小組的。北京小組大概成立於 1920 年 5、6 月間。其次，有毛主席等在長沙搞新民學會，後來出版《湘江評論》、組織文化書社等。和毛主席一起的，有何叔衡、夏曦（他是個好同志，有點教條主義，後死于教條主義）、易禮容（後脫黨）等。上海有陳獨秀、沈玄廬、李達等；山東有王燼美；武漢有董必武、陳潭秋、李漢俊（李曾參加過“一大”，主張講理論，不要行動）等；廣東有譚平山、陳公博等；東京有周佛海，參加過“一大”。此外，在法國勤工儉學生中，有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李富春、蔡暢等，在 1922 年組織共產黨

小組。

李達、李漢俊、陳公博等，在第一次黨代會時，就害怕了。“一大”在上海開，陳公博參加了。後大會改在嘉興南湖開，他就不敢去了。

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後，有時在上海，有時在廣州，在廣州時，就和譚平山、陳公博等一起，那時組織生活很簡單。陳獨秀在黨內，象家長，開會時他一個人講一通就完了，不讓別人發表意見。

1921 到 1922 年，我在國民黨總部工作，孫中山寫四大建設，就在此時。我幫他在長沙搞國民黨秘密支部（他知道我是共產黨員），毛主席和夏曦也幫助搞國民黨支部。

1920 年 1、2 月間，共產國際（列寧）派馬林到中國來，先和李大釗同志接頭。馬林到中國來的目的，是幫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搞民族解放運動。他到中國找民族領袖，這時北方正是吳佩孚得勢。李大釗同志托他的同學白堅武（吳佩孚的秘書），把馬林介紹給吳佩孚，馬林在北京住了兩三個月，同吳佩孚講了一些革命道理，後來發現吳佩孚不是民族領袖，便到南方去找孫中山。李大釗同志寫信給我，由我把馬林介紹給孫中山，馬林和孫中山會談了兩三個月，（從 1920 年 6、7 月至 9 月底），孫中山把自己的革命經歷告訴他，他認為孫中山不愧為革命領袖，建議孫中山團結各階層人民，聯繫工農，指出國民黨組織太鬆懈，會黨的組織也不能作為真正的依靠，馬林還把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情況告訴給孫中山，此外，還建議孫中山辦軍官學校。這時（1920 年 8 月）孫中山正準備出師桂林，要求馬林同去。1920 年 11、12 月，發生聯省自治事。孫中山又回到廣東，東征陳炯明，不久，孫中山被迫到上海。1921 年 11 月或 12 月，馬林回蘇聯。馬林在廣東時，還向社會主義青年團作了幾次演講。（過去歷史書上很少提到馬林，因為說他以後加入托派，現在知道並無其事）。1922 年，蘇聯又派越飛來中國，孫中山派廖仲愷和越飛商量國民黨改組事。1923 年 9

月，包羅廷來，幫助國共合作。

1923 年，我們黨給國民黨寫了封信，談國共合作事，由蔡和森送給孫中山，不知道這封信現在還在否？

1923 年，第三次代表大會，我們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確定和國民黨成立統一戰線。當時，陳獨秀不同意，主張國民革命由資產階級去搞，我們共產黨只是從旁幫助；張國燾則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能與它合作，“三大”反對了這兩種“左”右傾，決定和國民黨合作，這個方針是很正確的。孫中山這時也有和共產黨合作的要求。1924 年 1 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宣言是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搞的。1925 年 1 月 21 日，列寧逝世，孫中山發表演說，鼓勵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合作，內容很好。

1926、1927 年北伐，蘇聯幫助國民革命軍飛機五架，槍五萬多支，和□□□□□。孫中山很尊重他的顧問包羅廷的意見。陳獨秀不主張北伐，反對在軍隊中發展共產黨的力量。北伐時，我任第六軍黨代表，(我曾在軍中發展了 30 多個黨員)，李富春是第二軍黨代表，我們一起打南昌。在北伐軍中，政治部在發動群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北伐軍所到之處，受到群眾歡迎，老百姓不讓孫傳芳的部隊住，而讓我們住。出師四個月，佔領了武漢，我在武漢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和周總理隔一兩個禮拜會面一次，交換情報。

我們在打南昌時，就感到蔣介石不好，包羅廷曾經公開批評過蔣介石，蔣對包羅廷很不滿意，他們在軍事問題上有所爭執。蔣在“四·一二”前（3 月底 4 月初），就開始殺共產黨員。

陳獨秀到武漢後，制止湖南農民運動，毛主席和他談發動農民運動的必要，他不聽。

汪精衛在“四·一二”後，也由左到中立，而反動。武漢叛變前，國民黨開會，就不要共產黨員參加了。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宋慶齡、

何香凝等，不主張和共產黨分裂，但反動勢力很大，她們也無能為力。我們可惜的是在上海三次起義後，都沒有組織政府。

八七會議有蘇聯維經斯基參加。

國民革命軍二十軍軍長賀龍同志，那時不是黨員，出身農民，鄧小平同志在他的部隊裏做政治工作。馮玉祥和蔣介石舉行徐州會議後，就把共產黨員從部隊裏趕出來，當時賀龍同志對此很不滿。我們告訴他準備搞南昌起義，他也同意，任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後參加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在軍事策略和發動群眾方面都沒有搞好，我們跑向山頭，等待蘇聯的援助，沒有很好發動群眾。在山上，郭沫若、惲代英等還辦了報紙。後來我們被敵人三面包圍，賀龍、劉伯承、彭湃和我等七、八個人，在農民幫助下，改裝坐了十幾天漁船逃出來。賀龍本來有三十多個衛隊，不能帶走，分錢給他們，叫他們潛伏在山中。在這時，賀龍失去了軍隊，但毫不頹喪。後來黨派他、□□□和我三人去蘇聯學習，獨他不願意去，回家建立軍隊。

經林伯渠修改過的記錄稿

（1956年11月）

我們黨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才50多個黨員，至1922年“二大”時，黨員發展至100餘人，1923年“三大”時，有400餘人，1925年“四大”時900餘人，1927年在武漢開“五大”，發展至5萬多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許多同志犧牲了，有的黨員在白色恐怖下退出了黨。至1928年在莫斯科開“六大”時，只有1萬多黨員。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中早已有民族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傳統。如明末清初黃黎洲、王夫之、顧炎武等，在農民和

手工業工人中，組織哥老會，進行反清鬥爭。至嘉道時候，哥老會有很大勢力。信仰宗教迷信的白蓮教、義和團等會黨組織，都是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當時統治者想消滅會黨組織，首先就是要軟化會黨中的主持者知識分子，所以清代初期開博學鴻詞科，為的是網羅會黨中這些創始者。但明朝遺老老大都不去應徵，在《桃花扇》中，反映了明朝遺老對亡國的傷感，情願隱深山窮谷，也不去做清朝的官。孫中山曾自稱是繼承這些民族遺產的，他對太平天國革命特感興趣，其革命實行中也以大部分力量連絡會黨，他之稱民族英雄不是偶然的。

章太炎等組織的光復會，有明末遺老思想，它和黃興等的華興會，孫中山等的興中會，於 1905 年 8 月聯合組成同盟會。我那時正在日本，原和宋教仁、黃興很熟識，因之結識孫中山，同時聽過孫的講演，他談到國家的形式與內容時，說：君主立憲不如民主共和，並舉鐵路廠史為例，據說開始造成木頭有軌道的路，使馬拖着車子在路面上行走，以後發明了蒸汽機關車，牽引着長列車箱就能在鐵軌上行駛迅速，現在看來，還有誰準備先修木路，而不修鐵路呢？好比現在要建成一個于人民有益的國家，為什麼還要搞君主立憲，而不即刻就搞民主共和呢？我聽了覺得很對，就參加了同盟會。

1914—1918 年這四、五年間，同孫中山一起搞護國、護法鬥爭。當辛亥革命失敗時候，各帝國主義者都是支持袁世凱鎮壓南方革命力量的。袁死後，北洋軍閥勢力漸次分化為幾個集團，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革命勢力雖一例（律）反對，但對北洋各派軍閥則因其各自所便利而各自各個分別支持之。北洋軍閥內部多事，亦予當時中國革命力量以許多可乘之機。袁氏盜國，舉國憤恨。南方反袁力量不是統一的，也不是那樣純粹的。有雲貴的唐繼堯、兩廣的陸榮廷，我所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袁時的護國軍及反段祺瑞毀法的護法軍，大抵進出於廣東、湖南、湖北各省之間，有時佔領城市如郴州、衡州、長沙、岳州

等處，有時進駐農村，為時四年之久，有些時候感覺到出路在那裏呢？認識到廣大農民群眾、城市手工業者及小商小販（他們根據過去北洋軍閥統治時經驗）對南方軍隊打北洋軍閥是贊成的，並且以其實力支援，但我在許多地方知道南方軍隊，也不是那樣全好的，這樣就有一種心理上的矛盾，以為怎樣才使廣大農民過好日子，怎樣把軍隊組織得真能幫助人民，約在 1918 年 3、4 月連續接得李大釗同志幾次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並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如何聯繫群眾、如何組織軍隊，在實際生活中有些新的認識。次年的“五四”運動更使我認識群眾力量偉大，如何使自己確實站在群眾內活動，而不是其他。1920 年 12 月我到了上海會見陳獨秀，遂加入當時上海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林伯渠秘書馮玉章給王來棣的信

王來棣同志：

你 11 月 5 號給林老來信和談話記錄稿，他都看過了。他說：談話稿開頭一段，約全稿三分之一修改了一下，可暫備參考，其後三分之二應刪去不用。其中事件，擬歸入所提五個問題解答等等。

林老現出京視察工作，五個問題的頭一個他扼要說了，我已記下一點大意，茲連同原談話稿的修改稿子，一併送還，希查收。林老說其他四個問題，回京後再談。

敬禮

馮玉章

11 . 28

林伯渠書面答覆有關共產主義小組的幾個問題

就你處 11 月 5 號提出的五個問題現扼要解答如下：

第一個問題：就我所知道和參加的共產主義小組開始的情況。約在 1920 年 12 月 - 1921 年 1 月期間，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 4、5 次，頭兩次座談，就是我與陳獨秀、沈定一等三人，以後幾次鄧中夏、李漢俊也參加了，互相交談的依據系《共產黨宣言》和共產國際大會幾個決議文件。

同年 5、6 月我到了廣州，又同譚平山、陳公博、楊匏安等座談了兩次，那時小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經朋友介紹是研究俄羅斯問題和共產主義的，遇到就約個地方談談，沒有什麼章程，但是個人來往及通信聯繫也是有的。

在黨成立前，廣東就有 S.Y.組織的活動，記得當時是由阮嘯仙同志搞這項工作的。1921 年 7、8 月間共產國際代表馬爾寧到了廣州，曾由 S.Y.組織請他做了兩次關於十月革命和共產黨組織的報告。繼於 1922 年 1 月香港工人罷工，湖南省紡織廠工人罷工及軍閥趙恒惕槍殺紡織廠工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均以 S.Y.名義做了熱烈嚴肅的支援與抗議。因此香港華字及外字報和上海申、新報（《申報》、《新聞報》）及《字林西報》均十分注意登載此事，驚懼地惡意地說：不得了啊！布爾什維克過激黨在中國也搞起來了。

馮玉章筆錄

林伯渠同志訪談錄
(1956年10月)

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才五十多個黨員，至一九二二年二大時，黨員發展至一百餘人，一九二三年三大時，有四百餘人，一九二五年四大時九百餘人，一九二七年在武漢開五大，發展至五萬多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許多同志犧牲了，有的黨員在白色恐怖下退出了黨，至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開六大時，只有一萬多黨員。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中已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傳統。如明末清初黃梨洲、王夫之、顧炎武等，有民族革命思想，並有唯物主義的萌芽，在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中，有哥老會組織，進行反清鬥爭，主戰派初年，哥老會有很大勢力。當時統治者與清滅絕，首先

信和文和團和會黨組織，都有民族主義思想，清代開博學鴻詞科，也

初好多明朝遺老都不去，在桃花扇中，也反映了明朝遺老對亡國的憤

感，清初，民族民主主義的思想，由於清政府的專制壓迫，愈來愈烈。皇朝主權君主立憲，之後，孫中山

達立的他對太平天國革命深感興趣，其革命思想也主共和思想，在開始時也不很明確，後來逐漸發展成的，資產階級以大力宣傳革命，他主張民族革命，不主張政治的主思想，這時達到了登峰造極，新民以報國為志，達到三萬多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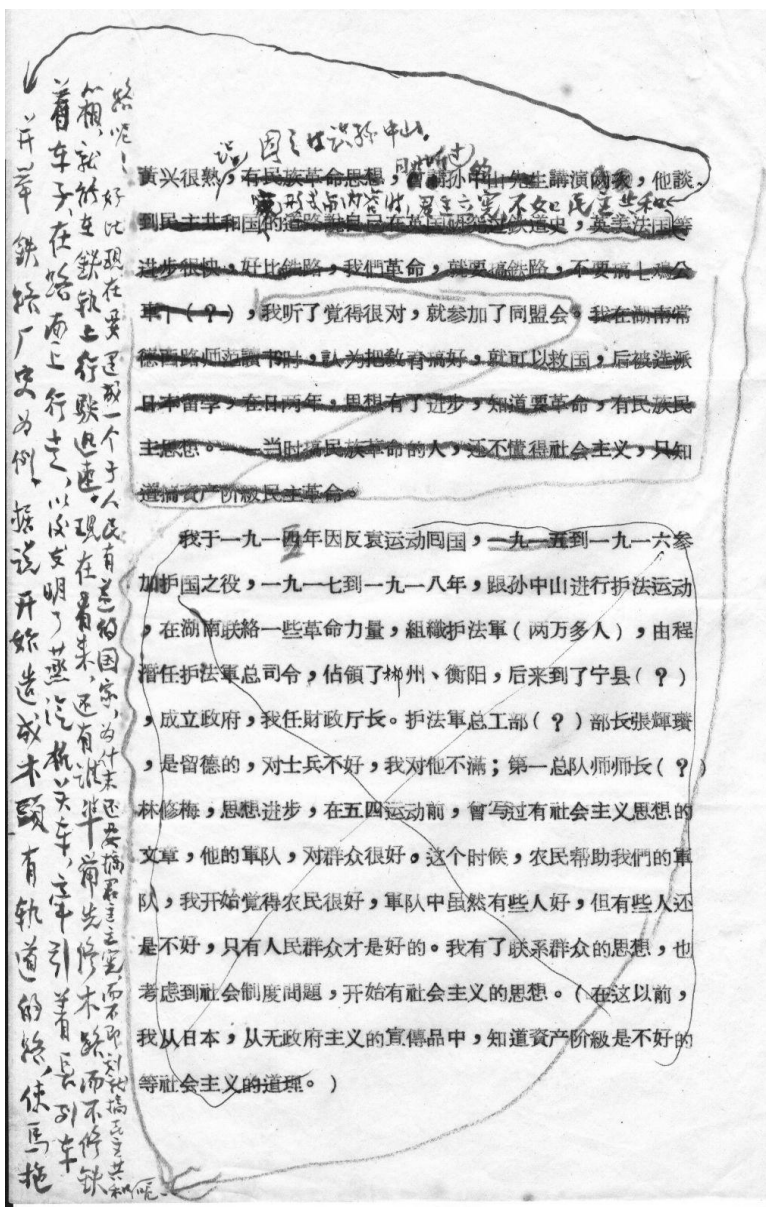
唐才常當時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是冲破異國網的人，孫中山和梁在政治主張上有過激烈的鬥爭。

章太炎等組織的光復會，有明末遺老思想，它和黃鵬興等的華興會，孫中山等的興中會，於1905年2月，那日也，聯合組成同盟會。我在日本時，和宋教仁、

主戰派時候

情也，不去做清朝的官

為的是個革命家，王持者，不，所以



一九一四——一八年這四年間，同孫中山一起
擁護護法爭。多辛亥革命失敗時候，帝國主義
者都是支持袁世凱鎮壓南方革命力量的，袁死後
北洋軍閥勢力漸次分化為幾個集團，帝國主義
者對中國革命勢力是一則反對，但對北洋各派軍閥
則因其各自可便利而各自各分別支持之，北洋軍
閥內部多事，弄平^掉中國革命力量，以許多可乘之機，
袁氏盜國，學國憤恨南方反袁力量不是統一的，
也不是那樣純粹的，有云貴的唐繼堯，兩廣
的陸榮廷，我同孫中山領導的反袁時期的國
軍及反段祺瑞親法的護法軍大抵進出於廣
東、湖南、湖北各省之間，有時佔領城市如郴州
衡州、長沙、岳州等處，有時進駐農村，為時四年之久，
有些時候感覺到出路在那里呢？認識到廣大

農民群眾，城市手工業者及小商小販（他仍根據過
去北洋軍閥統治時經驗）對南方軍隊打北洋軍
閥是贊成的，並且以實力支撐，但就在新農
地不知道南方軍隊也不是那樣全好的，這樣就
有一種心理上的矛盾，以為怎樣才使廣大農
民过好日子，怎樣把軍隊組織^成真正為農民，
約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陸續接得李大劍同志
幾次信，詳細給我介紹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
冊子、文件，並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可見
得到很大的啟發，如何運籌群眾，如何組織
軍隊，在實際生活中有些新的認識，次年即五
四運動更使我認識群眾力量偉大，如何使自
己確實站在群眾內活動而不是其他，一九二〇
年十二月飛到上海全見陳独秀，遂加入當
時上海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1956年10月

——以上訪談在軍閥時期

中国人知道革命，是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間从日本得到的消息，在这以前同盟会的朱执信翻譯过一些馬克思主义的書，有点經濟思想，无政府主义也宣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已鬧得热火朝天，在中国則知道得很少，談不上研究。

我在日本的时候，認識了李大釗同志，和他很熟，我回国后，和他通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間，李大釗同志把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有关宣傳品寄給我們看，我和林修梅等，都很高兴。自此，我有了依靠工人的思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李大釗同志写信給我，叫我和陈独秀联系，我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去上海，找陈独秀（陈当时住漁阳里二号），参加共产主义小組。

馬克思主义傳入中国，在中国固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一般史书上只是談到「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太簡單化了一些！）

对孙中山的估价，也不能太簡單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确是很辛苦的，前仆后继，黃花崗之役死难的不只七十二人，其中很多是优秀的青年。做研究工作，應該多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問題。武昌起义后，十七个省在两个月之内起来响应，道理何在，是應該加以研究的。象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变記」所作的

共产主义小組，大概是李大釗同志編得最早，他在一九一八年就发表「庶民的胜利」、「布什維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傳馬克思主义。和他一起組織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有邓中夏、范鴻劼、罗章龍等二十来人，于树德也是北京小組的。北京小組大概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間。其次，有毛主席等在长沙搞新民学会，后来出版湘江評論、組織文化书社等，和毛主席一起的，有何叔衡、夏曦（他是个好同志，有点教条主义，后死于教条主义）、易礼容（后脱党）等。上海有陈独秀、沈玄庐、李达等；山东有王烬美；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曾参加过一大，主張講理論，不要行动）等；广东有譚平山、陈公博等；东京有周佛海，参加过一大。此外，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有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李富春、蔡暢等，在一九二二年組織共产党小組。

李达、李汉俊、陈公博等，在第一次党代会时，就害怕了。一大在上海开，陈公博参加了，后大会改在嘉兴南湖开，他就不敢去了。

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組后，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广州，在广州时，就和譚平山、陈公博等一起，那时組織生活很简单。陈独秀在党内，象家长，开会时他一个人講一通就完了，不許別人发表意見。

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我在国民党总部工作，孙中山写國

大建設，就在此時。我幫他在長沙搞國民黨秘密支部（他知道我是共產黨員），毛主席和夏曦也幫助搞國民黨支部。

一九二〇年一、二月間，共產國際（列寧）派馬林到中國來，先和李大釗同志接頭，馬林到中國來的目的，是幫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搞民族解放運動，他到中國找民族領袖，這時北方正是吳佩孚得勢，李大釗同志托他的同學白堅學（吳佩孚的秘書），把馬林介紹給吳佩孚，馬林在北京住了兩三個月，同吳佩孚講了一些革命道理，後來發現吳佩孚不是民族領袖，便到南方去找孫中山。李大釗同志寫信給我，由我把馬林介紹給孫中山，馬林和孫中山會談了兩三個月，（從一九二〇年六、七月至九月底），孫中山把自己的革命經歷告訴他，他認為孫中山不愧為革命領袖，建議孫中山團結各階層人民，聯繫工农，指出國民黨組織太松懈，會黨的組織也不能作為真正的依靠，馬林还把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情況告訴給孫中山，此外，還建議孫中山辦軍官學校。這時（一九二〇年九月）孫中山正準備出師桂林，要求馬林同去。一九二〇年十一、十二月，發生陝省自治事，孫中山又回到廣東，東征陳炯明，不久，孫中山被迫到上海。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或十二月，馬林回蘇聯。馬林在廣東時，還向社會主義青年團作了几次演講。（過去歷史書上很少提到馬林，因為說他以後加入托派，現在知道並無其事）。一九二二年，蘇聯又派趙飛來

中国，孙中山派廖仲恺和越飞商量国民党改组事。一九二三年九月，包罗廷来，帮助国共合作。

一九二三年，我们党给国民党写了封信，谈国共合作事，由蔡和森送给孙中山，不知道这封信现在还在否？

一九二三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确定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当时，陈独秀不同意，主张国民革命由资产阶级去搞，我们共产党只是从旁帮助；张国焘则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能与它合作，三大反对了这两种[左]右倾，决定和国民党合作，这个方针是很正确的。孙中山这时也有和共产党合作的要求。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是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搞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一日，列宁逝世，孙中山发表演说，鼓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内容很好。

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苏联帮助国民革命军飞机五架，枪五万多支，和。孙中山很尊重他的顾问包罗廷的意见。陈独秀不主张北伐，反对在军队中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北伐时，我任第六军党代表，（我曾在军中发展了三十多个党员），李富春是第二军党代表，我们一起打南昌。在北伐军中，政治部在发动群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欢迎，老百姓不吐孙传芳的部队住，而让我们住。出师四个月，占领了武汉，我在武汉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和周总理隔一

两个礼拜会面一次，交换情报。

我們在打南昌时，就感到蒋介石不好，包罗廷曾經公开批評过蒋介石，蔣对包罗廷很不滿意，他們在軍事問題上有所爭執。蔣在「四、一二」前（三月底四月初），就开始杀共产党员。

陈独秀到武汉后，制止湖南农民运动，毛主席和他談发动农民运动的必要，他不听。

汪精衛在「四、一二」后，也由左到中立，而反动。武汉叛变前，国民党开会，就不要共产党员参加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員中宋庆龄、何香凝等，不主張和共产党分裂，但反动势力很大，她們也无能为力。我們可惜的是在上海三次起义后，都沒有組織政府。

八七會議有苏联維經斯基参加。

国民革命軍二〇軍々長賀龍同志，那时不是党员，出身农民，邓小平同志在他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馮玉祥和蒋介石举行徐州會議后，就把共产党员从部队里赶出来，当时賀龍同志对此很不滿，我們告訴他准备搞南昌起义，他也同意，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揮，后参加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在軍事策略和发动群众方面都沒有搞好，我們跑向山头，等待苏联的援助，沒有很好发动群众。在山上，郭沫若、譚代英等还办了报纸。后来我們被敌人三面包圍，賀龍、刘伯承、彭湃和我等七、八个人，在农民帮助下，改装坐了十几天漁船逃出来。賀龍本来有三十多个衛队，不能带走，分錢給他們，叫他們潜伏山中。在这时，賀龍失去了軍隊，但毫不頹喪。后来党

派他、和我三人去苏联学习，独他不愿意去，回家建立軍隊。

王素棟同志：

你十一月五號給林老來信和談話記錄稿，他都會看了。他說：談話稿開頭一段約全稿三分之一修改一下，可暫備參考，其後三分之二應刪去不用，其中三件，概歸入可提三個問題解答算：

林老現在京視察工作，五個問題的第一個他拒要說，我已記下，大意，亦連同原談話稿以修改稿，一併送還，希查收。林老說其他四個問題，回家后再談。

王永

楊日章
11.28.

林伯渠同志面答有關共產主義小組的九個問題
就你十一月五號提出的五個問題拒絕解答

如下：

第一個問題，就我所知道和參加的共產主義小組開辦的情況，約在1920年12月—1921年1月期間，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次，共兩次座談就是我和陳獨秀、沈定一、王三、以後幾次即仲夏、李漢俊也參加了，互相言談的依據係共產黨宣言和共產國際大會幾個決議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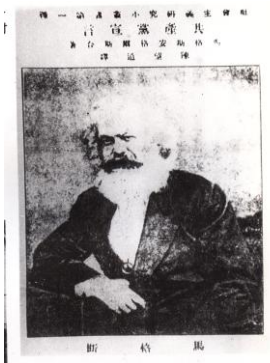
同年五、六月我到廣州，又同譚平山、陳心博、楊範生等座談三次，那時小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經朋友介紹是研究俄國新問題和共產主義的，遇到約定的地方談：

沒有什麼章程，但幾個人來往及通信聯繫也是有的。

在黨成立前，廣東就有S.小組的活動，記得當時是由阮嘯仙同志主持這項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代表馬志幹到廣州，曾由S.小組請他做了兩次關於十月革命和共產黨組織的報告，繼於1922年1月香港工人罷工，湖南省紡織工廠工人罷工及軍閥趙恒惕槍殺紡織工廠工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警、屠人銓，均以此為名義做了熱烈、嚴厲的支援和抗議，因此香港華僑及外僑報和上海申、新報區區材料西報均十分注意，登載此事，憤慨地惡意地說，不得了啊！布尔什維克連黨在中國也搞起來了。

我所知道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陳望道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 (1891 - 1977)，浙江省義烏縣人。1915 年初赴日留學，受日本著名進步學者、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19 年 6 月初，陳望道回國，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積極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1920 年 4 月應陳獨秀之邀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並與陳獨秀等共同發起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1920 年 8 月他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是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中共各地組織成員的必讀文獻，它為中共的建立和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中共“一大”召開時，陳望道被選為上海地區的代表，後因不滿陳獨秀個人專制，要求脫黨而未出席“一大”。1922 年陳望道脫離共產黨，但仍在為黨工作，直到 1957 年重新回到黨組織中來。1949 年 9 月，他作為特邀

代表出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同年 12 月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 年 4 月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文化部部長。他除了歷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並被選為上海市政協二、三、四屆副主席外，還在中國民主同盟內長期擔任領導職務。1952 年 9 月起任復旦大學校長。1977 年病逝。

(一) 第一次訪談

(1956 年 6 月 17 日)

“五四”後，除北京外，中等學校以長沙和杭州的知識界最活躍。

我於 1919 年的“五四”後回國，就在杭州第一師範教書。那時，新舊衝突很厲害。不到半年，浙江教育廳查辦一師的陳望道、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等四個國文教員，罪名是：“非孝、非孔、公妻、共產”。
(實際上，那時我們只宣傳文言文改革文學革命，至於社會改革問題，只是涉及一些而已。) 一師校長經亨頤不接受教育廳的命令，教育廳便撤去經的校長職務，另派校長到校。一師學生關起鐵門拒絕新校長，政府當局派軍警包圍一師，以刺刀威脅學生，甚至有學生被毆傷，引起全杭州的師生公憤。一師以外的學生，也帶了鋪蓋到一師，支援一師同學。這種反抗舊勢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沒有的。外人都以為學生內部有什麼組織，實際上當時杭州學生還沒有組織。

*

*

*

*

“五四”前，新文化內容很雜，凡是中國所沒有的，都受到歡迎，認為是“新”的。那時候，只問新舊，不管內容，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些國外來的思潮，同被列為新文化。後來，部分人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逐漸認識到：單講“新”是不夠的，應該學習從制度上看問題。同時認識到空談的無用，遂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建立經過：上海本來有一個《星期評論》，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辦起來的，負責人是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戴季陶那個時候也看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寫文章也引用一些馬克思主義。後來孫中山先生叫他到廣州去（那時候，孫中山先生意識到國民黨無力，要吸收新的力量），他們就叫我代替戴的位置，參加《星期評論》的編輯工作。我於1920年4、5月間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師趕出來，在家翻譯《共產黨宣言》，這書是《星期評論》約我翻的，原來準備在該刊發表。

同時，陳獨秀也從北京被趕到上海。我們幾個人，是被趕攏來的。此外，邵力子在復旦大學文學院任中文系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當時就稱負責人為“書記”）。不久陳到廣州去。1920年年底以後，要緊的事，由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等三、四個人討論（不是全體同志參加），組織仿蘇聯共產黨。那時候，我們時常在環龍路漁陽里開會（現在已改為紀念館），陳獨秀住在這裏，我後來也搬到這裏來住。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進行了下列幾項工作：

1. 辦了一個平民女校：那時一些覺悟的女子，為反對三從四德，為她們的家庭、學校趕出來，我們辦女校接收她們。丁玲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2. 辦了三個工會；印刷工會、郵電工會和紡織工會。

3. 辦了一個青年學校，當時叫 C. Y. (即：共產主義青年團)。

4. 宣傳工作方面：1921 年元旦，我們曾經用賀年片，在正面寫上“恭賀新禧”四個字，背後印上宣傳共產主義的口號（抄自《共產黨宣言》），到處分發。《新青年》自第八卷起，改為黨的機關報。改為機關報後有兩個特徵：（1）搬到上海出版；（2）辟“社會主義研究”欄。除《新青年》外，我們爭取在其他報紙的副刊上發表文章。當時曾經通過邵力子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發表文章，因此，《民國日報》的副刊比較進步。

當時，我們鬥爭的對象，主要是張東蓀等的《時事新報》和胡適的《努力》。胡適在《新青年》搬到上海後，曾寫信給我，說我們亂喊社會主義，似通非通。這時，無政府主義者只翻譯一些克魯泡特金的文章，沒有什麼活動。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內部，並未發生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間思想的分歧。那時，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可能有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我們認為青年總是好的，吸收團員時沒有嚴格的審查。

我黨對於教育事業，從來很重視，在上海，曾經做過下列幾項工作：1922 年辦“上海大學”，這是黨培養幹部的地方，在這學校裏，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員多數為黨員。學校分三系：中文、外文和社會科學，以社會科學系最大。茅盾、鄭振鐸、瞿秋白和我都是該校教員，丁玲、陳伯達、陽翰笙、匡亞明（現東北人大校長）等都是該校學生。“五卅”運動時，“上大”學生曾起了不少作用。“五卅”時，“上大”被封，

從租界搬到中國地區。此外，我們通過“中華藝術大學”，演話劇，自己演自己看，看的人很少，只有二、三十人。

“五四”以後宣傳工作一般通過報刊來進行。報刊影響很大，對青年有啟發、教育作用。我們一面寫文章，一面在許多地方組織書報販賣部，挨門推銷進步書報。通過推銷書報，找訂閱者談話，發展組織。書報販賣部這個方式，在學校裏很流行，販賣書刊的都是較先進的青年，杭州一師和長沙一師的販賣部較有名。施復亮就是杭州一師販賣部的負責人。（那時候，介紹朋友，只要說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政治工作和工運工作，都還是啟蒙性質的，我們邊學邊宣傳。

初期的工運，主要是啟發和培養工人的階級覺悟，支持他們搞經濟鬥爭。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第三國際有聯繫，重要的事情找他們商量。當時，杭州並沒有共產主義小組。

*

*

*

*

《星期評論》是受“五四”運動影響辦起來的，與《民國日報》沒有什麼關係。“五四”時期有 360 多種刊物，《星期評論》是比較好的，較有唯物觀點。

沈玄廬，“五四”時把自己的土地都送掉，在鄉下與群眾關係較好。後來聽說表現不好。他感情衝動，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理論上的認識，可能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但並不相信無政府主義。

戴季陶在大革命時非常反動，我們過去和他很熟。“四·一二”時，

他主張“不講感情”，主張大屠殺。和他同樣主張的，還有吳稚暉。

周作人在“五卅”後曾經諷刺我們為“五卅”烈士募捐是“吃烈士”，主張女子回到廚房去。

(記錄經陳望道審閱、修改)

(二)、第二次訪談(1956年7月3日)

一、1920年我到上海後，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評論》所在處，邵力子也在這裏。我們幾個人都是搞文化的，認識到要徹底改革舊文化，根本改革社會制度，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必要。

二、1920年4、5月間，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就是黨，並未改用別的名稱。

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負責人，一開始就叫“書記”，陳獨秀擔任此職。這“書記”的名稱，是從蘇聯來的(過去中國的習慣，“書記”就是抄寫員)。

四、“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問題的三、四個人，就是：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

五、那時，我們嚮往蘇聯，學蘇共，學一點做一點，開始時做得不夠嚴格。

六、黨的籌備工作是在環龍路漁陽里進行的，這屋子是陳獨秀租的，《新青年》社就在這裏。

七、平民女學的學生，都是被家庭或學校趕出來的女子。學校課程有語文和社會常識，而以前者為主，語文實際上是社會科學，注意

內容，不注意文詞。因為學生經濟上有困難，半工半讀。

八、青年團是黨派楊明齋負責的，在青年人中可能有俞秀松，那時張太雷、惲代英都未參加。

俞秀松主要負責應付流氓，為發展工會準備條件。那時上海流氓很多，很凶，受工部局指使，大流氓就在巡捕房做事。我們要做工會工作，一定要應付這批人。

九、施復亮說沈仲九是黨的發起人之一，是記錯了。沈仲九和沈玄廬、劉大白三人都是紹興人，沈仲九當時在浙江教育會，施復亮寫《非孝》一文，受到沈仲九的鼓勵。現在沈仲九在復旦大學，可通過他瞭解沈玄廬的情況。

十、黨的發起人，是“五四”時期各地的革命運動領導者。那時，我們在運動中相互支援，所以知道誰是真正革命的。

“五四”後杭州一師鬧學運，北大學生會來電支援，鼓勵一師：百折不撓，誓為後盾。其他各校之間也如此。

(記錄未經陳望道審閱)

陳望道先生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五四後，除北京外，以長沙和杭州的知識界最活躍。

我於一九一九年回國，在杭州第一師範教書，那時新舊衝突很厲害。
五四後，浙江教育廳查辦一師的陳望道、夏丏尊、劉大白、李之九等四個國文教員，罪名是：「非孝、非孔、公妻、共產」。（實際上，那時我們只宣傳學革命，至於社會改革問題，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一師校長經亨頤不接受教育廳的命令，教育廳便撤去經的校長職務，另派校長到校，一師學生關起鐵門拒絕新校長，政府當局派軍警包圍一師以刺刀威脅學生，甚至有學生被毆傷，引起師生公憤。一師以外的學生，也帶了舖蓋到一師，支援一師同學。這種反抗舊勢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沒有的。外界人都以為學生內部有什麼組織，實際上當時杭州學生還沒有組織。

×

×

×

五四前，「新文化」內容很雜，凡是中國所沒有的，都受到歡迎，認為是「新」的。那時候，只問新舊，不管內容，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些國外來的思潮，同被列為「新文化」，後來，部分人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逐漸認識到：單講「新」是不夠的，應該學習從制度上看問題。同時認識到空談的無用，遂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建立經過：上海本來有一個「星期評論」，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辦起來的，負責人是戴季陶、沈玄白、李漢俊。戴季陶那個時候，也看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寫文章也引用一些馬克

思主义。后来孫中山先生叫他到廣州去（那時候，孫中山先生意識到国民党无力，要吸收新的力量），他們就叫我代替戴的位置，参加「星期評論」的編輯工作。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在此¹⁶前，我被一師赶出來，在家翻譯「共产党宣言」，这書是「星期評論」約我翻的，原來準備在該刊发表。

同時，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們几个人，是被赶攏來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复的談，越談越觉得有組織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組織了「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改名研會）}这是一个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会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白^{（即沈雁冰）}等）先由陈独秀負責，不久陈到廣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邵力子、李漢俊、李達、楊明甫）}負責人為「書記」，要緊的事，由三、四个人討論，（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組織仿苏联共产党。那時候，我們時常在环龍路^{（即法租界）}开会（現在已改為紀念館），陈独秀住在这里，我后来也搬到这里來住。

「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了下列几項工作：

平民 1. 办了一个女校：那時一些觉悟的女子，為反对三从四德，為她們的家庭、学校赶出來，我們办女校接收她們，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即沈雁冰）}

2. 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郵電工会和紡織工会^{（即 S.Y.）}

3. 办了一个青年学校，當時^{（即 S.Y.）}總 O、Y、（共产主义青年团）^{（即 S.Y.）}員來源，学校內容，和先縣所述不一致。校名：俄大科特。校制：仿 1920 年蘇俄女青年團。校址：法租界。校址：法租界。校址：法租界。

在宣傳工作方面：一九二一年元旦，我們曾經用賀年片，在正面寫上「恭賀新禧」四個字，背後印上宣傳共產主義的口號（抄自共產黨宣言），到處分發。「新青年」自第八卷後，改為黨的機關報。改為機關報後有兩個特征：（1）搬到上海出版；（2）辟社會主義研究欄。除新青年外，我們爭取在其他報紙的付刊上發表文章，當時曾經通過邵力子，在民國日報的付刊覺悟上發表文章，因此，民國日報的付刊較正張進步。

當時我們鬥爭的對象，主要是張東蓀等的「時事新報」、和胡適的「努力」。胡適在「新青年」搬到上海後，很反對，曾寫信給我，說我們亂喊社會主義，似通非通。這時，無政府主義者只翻譯一些克魯泡特金的文章，沒有什麼活動。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內部，並未發生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間思想的分歧。那時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可能有无政府主義者，因為我們認為青年總是好的，吸收團員時沒有嚴格的審查。

我黨對於教育事業，從來很重視，在上海，曾經做過下列幾項工作：一九二二年辦「上海大學」，這是黨培養幹部的地方，在這學校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員多數為黨員。學校分三系：中文、外文、和社會科學，以社會科學系最大。茅盾、鄭振鐸、瞿秋白和我都是該校教員，丁玲、陳伯達、^{陽翰笙}楊安生、匡亞明（現東北人大校長）等都是該校學生。五卅運動時，上大學生曾經起了不少作用。五卅時上大被封，從租界搬到中國地區。此外，我們通過「中華藝術大學」，演話劇，自己演自己看，看的人很少，只有二、三十人。

五四時期宣傳工作主要通過報刊來進行。報刊影響很大，對青年有啓發、教育作用。我們一面寫文章，一面在許多地方組織書報販賣部，挨門推銷進步書報，通過推銷書報，找訂閱者談話，發展組織。書報販賣部這個方式，在學校里很流行，販賣書刊的都是較先進的青年，杭州一師和長沙一師的販賣部較有名。施復亮就是杭州一師的販賣部的負責人。（那時時候，介紹朋友，只要說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政治工作和工運工作，都還是啓蒙性質的，我們邊學邊宣傳。

初期的工運，主要是啓發和培養工人的階級覺悟，支持他們搞經濟鬥爭。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第三國際有聯系，重要的事情找他們商量。當時杭州並沒有共產主義小組。

× × ×

星期評論是受五四影響辦起來的，與民國日報沒有什麼關係。五四時期有三六〇多種刊物，星期評論是比較好的，較有唯物觀點。

沈玄白：五四時把自己的土地都送掉，在鄉下群眾關係較好，後來聽說表現不好。他感情沖動，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理論上的認識，可能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並不相信無政府主義。

戴季陶在大革命時非常反動，我們過去和他很熟，四一二時，他主張「不講感情」，主張大屠殺。和他同樣主張的，還有吳稚暉。

周作人在五卅後，曾經諷刺我們為五卅烈士募捐是「吃烈士」，主張女子回到廚房去。

——以上經陳望道先生宿內修改

王稼祥整理

籌建中共上海發起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經過

施復亮



施復亮主編的團刊《先驅》

施復亮 (1899 - 1970) , 原名施存統 , 浙江省金華縣人。1919 年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 , 因發表《非孝》一文 , 遭封建頑固勢力打擊 , 被迫離開杭州 , 引起文化界轟動。1920 年 5 月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 並參與籌建共產黨發起組的工作 , 是中

國共產黨最早的成員之一。6 月去日本學習經濟學，並籌建旅日中共小組。1921 年 12 月因從事革命活動遭拘捕，並被驅逐回國。1922 年初，陳獨秀派他負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擔任團的機關刊物《先驅》的主編。1922 年 5 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書記。1923 年後歷任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上海大學教授，團上海市委書記等職。1926 年在中山大學、黃埔軍校任教。1927 年，在武漢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等職。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施復亮作為跨黨黨員開始在黨派觀念上向國民黨靠攏。大革命失敗後脫離共產黨，以國民黨黨員身份研究三民主義和改組國民黨等問題，形成“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1929 - 1936 年，從事譯著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他主張“全民抗戰”、“民主抗戰”。解放戰爭時期，抨擊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主張和平、民主，鼓吹“中間路線”。1945 年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當選為該會常務理事。1948 年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1949 年 10 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勞動部副部長，歷任第一、二、三、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1970 年病逝。

第一次訪問記錄 (1956 年 5 月)

“五四”消息傳到杭州，杭州的學生就動起來了，紛紛組織學生會。
 校方教育廳為分散學生，下令提前放假，有的學生不願回家，繼續留學（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當時杭州的學生主要做些宣傳工作，學生中閱讀《救國日報》的很多。第一師範是當時浙江文化中心，全校共 400 多人，訂閱《新青年》100 多份，《星期評論》400 來份，其他還有《每週評論》等。

“五四”後，陳望道到一師教書，我是一師的學生，我們和杭州工業學校的夏衍、第一中學的阮毅成等，一起搞《浙江新潮》。這個刊物由第一師範（五、六個人）、第一中學和工業學校中的幾個人輪流編輯。出了兩期，因我發表《非孝》一文，刊物被停辦查禁，第三期由上海印刷。以上情況可對照《民國日報》1920 年 9 月副刊《覺悟》所載《回頭看二十二年來的我》。

1920 年 5 月 1 日，上海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澄衷中學開會。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共同發起紀念“五一”。上海參加“五一”紀念活動的有 500 人左右，多數是工人，也有學生和教員。陳獨秀、施存統、陳望道等參加了這次活動，這是中國第一次紀念“五一”。當日，《新青年》、《星期評論》都出專刊。北京長辛店也有活動。

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當時原定有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陳劉大白等參加。沈玄廬拉戴季陶去，戴在會上到時聲明不參加共產黨第一次會因此不歡而散。當時有第三國際代表魏經斯基在上海，主張成立共產黨。後來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無名）五人起草章程綱領十餘條，陳公培抄了一份章程赴法國，施存統我抄了一份赴日本。後來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參加了小組。

當時北方小組有李大釗、鄧中夏、范鴻劼、張國燾；湖南有毛主席、劉少奇、何叔衡、易禮容；湖北有董必武、劉子通、陳潭秋；廣東有譚平山、陳公博。杭州當時還沒有組織，沈玄廬去後，搞了一些活動。法國是陳公培去的有周恩來、陳延年、李維漢等，原來在法國

活動，法國是黨成立初期很重要的地方。

施存統：我於 1920 年 6 月 20 日去東京，與周佛海取得聯繫。周佛海是李達的朋友。至 1921 年 7 月 1 日第一次黨代會時，東京日本小組還只有兩個人，即施存統我和周佛海，他我們二人互推擔任黨代表會的代表，最後由周出席（因為周已多年未回國）。

1921 年 7 月後，東京小組發展至 10 來個人，其中有彭湃同志，還有一個好像叫楊嗣震，其餘的名字已忘。該小組由我負責，小組成員多數是留學預備生，開過二、三次小組會，會議內容已記不清。1921 年底，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開會，反對華盛頓會議，第三國際派張太雷為代表，與東京小組日本同志取得聯繫並派出代表（因當時日蘇沒有邦交，不便派蘇聯人去日本）。該年十二月，我與幾個日本共產黨員一起被捕。當時東京小組與日本共產黨沒有組織上的聯繫，我個人與日本共產黨堺利彥、山川均等有聯繫。1922 年 1 月，我回國，此後東京小組情況不明。

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 1922 年 5 月 1 日召開，毛主席、劉少奇、易禮容都參加了這次會。青年團代表會開過以後，便開勞動大會。蔡和森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口號，為上述會議所採納。蔡和森在黨和團內都相當起作用。

1923 年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合作，當時有許多黨員不同意，後經共產國際的代表說服。

（記錄經施復亮審閱、修改）

第二次談話記錄

——答復幾個有關黨成立時期的歷史問題

(1956 年 12 月)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於 1920 年 6 月，一開始就叫“共產黨”，它的機關刊物也叫《共產黨》。有的地區的共產主義小組，或小組領導的外圍組織，取名“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北京李大釗同志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很有名，但在上海，並沒有用這個名稱。

上海小組成立經過：1920 年 6 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聚集。沈玄廬拉戴季陶去，戴到時聲明不參加共產黨，大家不歡而散，沒有開成會。第二次，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五人，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不久我和陳公培就出國了。我沒有和李達、陳望道等一起討論發起共產黨，可能是我去日本後，陳獨秀又找他們討論組織共產黨（我未參與其事，對此表示保留）。我在日本時，和陳獨秀、李達有聯繫，所以李達回憶中提及我是發起人。陳公培去法國後，可能和他們沒有什麼聯繫，所以他記不起來。

我們五個人起草的是黨綱，不是黨章，內容已記不清，大概提到：用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為革命手段等。那時我們沒有看過蘇共黨章，我們的綱領，只是根據很有限的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擬定出來的，帶有相當濃厚的社會民主黨色彩，有個別同志有幾分無政府主義色彩。

上海小組在陳獨秀去廣州後，由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三人負責。

日本小組成立後，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小組開始只有我和周佛海兩人，後來發展到十餘人。現在想起來的有：彭湃、楊嗣震、林孔昭等人。彭湃等在早稻田大學組織“赤心社”和“CosMo”事，

我不知道。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共產黨指派俞秀松負責組織的，（惲代英、蕭楚女當時都不在上海）。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青年團成立後，曾有一段時間工作停頓。1922年初，我回國後，少共國際派代表來，團的工作又活躍起來。1922年上半年，有團員4000多人，其中2000多人是廣州佛山的工人。凡有黨組織的地方，都有團的組織，如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南京、太原、佛山都有團的組織。1922年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期間，青年團做了下面幾件事：

- 1、召開第一次團代會。
- 2、在孫中山同陳炯明鬥爭中，青年團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主要是宣傳工作）。
- 3、在上海、北京等地，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開會，演講，寫文章，反對“基督教學生同盟”。
- 4、黃愛、龐人銓被軍閥趙恒惕槍殺後，舉行追悼活動。
- 5、反對曹錕賄選。我曾為此被捕，在獄數日，後經李大釗同志設法釋放。
- 6、援助“二七”罷工。
- 7、張國燾在黨內搞小組織，企圖推翻陳獨秀的領導地位，以己代之，後被惲代英張太雷揭發，在黨內開展鬥爭，團內也發動反對張國燾運動。
- 8、1925年“五卅”運動中，團也起了很大作用，發動很多人參加運動。
- 9、1922年上海日華紗廠、內外棉紗廠等發生罷工時，發動廣大的募捐運動。

10、1922 年 9 月舉行第一次國際青年節紀念。

11、1922 年第一次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難。

(記錄經施復亮修改)

第一次訪問記錄稿

施復亮先生訪問記錄 1984.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五四消息傳到杭州，杭州的學生就湧起來了，																			
組成組織學生會， 校 ^{教育} 局為分散學生，提前放假，有的																			
學生不願回去，繼續留 校 ^校 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當時杭州的學生，主要做壁報工作，學生中																			
閱讀救國日報的很多。第一師範是當時浙江文化																			
中心，全校共四百多人，訂購《新青年》一百多份，每期																			
評語四百來份，其他還有《每週評論》。																			
編輯，出兩期，因發表「維新」一文，刊物被 查禁 ^{查禁} 。																			
二期由上海印刷，刊上汪兆銘對照《救國日報》1920.9.																			
刊刊《愛國新報》「回頭看二十二年來的戰」。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稿紙 15×20=300																			

(中間幾頁略去)

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會在1922年5月
1日召開，毛主席、劉少奇、易禮容都參加了這次會。
青年團代表會開過以後，便開勞動大會。蔡和森提
出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口號，為上述會
議所採納。蔡和森在黨和團內部相當起作用。
1923年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合作，當時有許多
黨員不同意，但經共產黨的代表說服。
——以上經施復亮先生閱後修改
王萊林整理

第二次談話記錄稿

施復亮先生第二次談話記錄 1956年12月

——答复几个有关党成立时期的历史問題

上海共产主义小組成立于1920年6月間，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有的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組（或小組领导的外圍組織，取名「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李大釗同志所领导的「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有名，但在上海，並沒有用这个名称。

上海小組成立經過：1920年6月間，陳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独秀家里聚集，^{沈玄盧}拉戴季陶去，戴到時聲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沒有开成会。第二次，陳独秀、^第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統、陳公培五人，开会成立共产党。选举陳独秀为書記。不久我和陳公培就出国了。我沒有和李达、陳望道等一起討論发起共产党，可能是我去日本后，陳独秀又找他們討論組織共产党（我未參與其事，对此表示保留）。我在日本時，和陳独秀、李达有联系，所以李达回忆中提及我是发起人。陳公培去法国后，可能和他們沒有什麼联系，所以^他記不起来。

我們五个人起草的是党綱，不是党章，內容已記不清，大概提到：用劳农專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那時我們沒有看過苏共党章

，我們的綱領，只是根據很有限的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擬訂出來的，
^{相宜}帶有濃厚的社會民主黨色彩，^{有個別同志}也有幾分無政府主義色彩。

上海小組在陳獨秀去廣州後，由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三人負責。

日本小組成立後，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小組開始只有我和周佛海兩人，後來發展到十餘人。現在記得起來的，有：彭湃、楊嗣震、林孔昭等人。彭湃等在早稻田大學組織「赤心社」和「Cos-Mo」事，我不知道。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共產黨派俞秀松負責組織的，（^指憚代英、蕭楚女當時都不在上海）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青年團成立後，曾有一段時間工作停頓。1922年初，我回國後，少共國際派代表來，團的工作又活躍起來。1922年上半年，有團員四千多人，其中二千³人是廣州佛山的工人。凡有黨的組織的地方，都有團的組織，如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南京、太原、佛山都有團的組織。1922年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期間，青年團做了下面幾件事：

1. 召開第一次團代會。
2. 在孫中山同陳炯明鬥爭中，青年團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
3. 在上海、北京等地，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開會，演講、寫文章、反對「基督教學生同盟」。
4. 黃愛、龐人銓被軍閥趙恆惕槍殺後，舉行追悼活動。
5. 反對曹錕賄選。我曾為此被捕，在獄數日，後經李大釗同志設法釋放。

6. 援助二七罷工。

7. 張國燾在黨內搞小組織，企圖推翻陳獨秀的領導地位，以已代

之，后被^{張太雷}張太雷揭發，在黨內開展鬥爭，團內也發動反對張國燾運動。

8. 1925年，「五卅」運動中，團也起了很^大作用，發動很多人參加運動。

9. 1922年上海日華紗廠、內外棉紗廠等處罷工時，發動廣大的募捐運動。

10. 1922年9月舉行第一次國際青年節紀念。

11. 1922年第一次紀念李卜克內西和^{保爾}蘇森堡被難。

——以上經施復亮先生修改

王東梅整理

中共上海小組的建立和它的幾個據點

沈雁冰



沈雁冰(1896 - 1981), 原名沈德鴻 , 筆名茅盾。浙江省桐鄉人 , 1916 年北京大學預科畢業 , 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1920 年任《小說月報》主編 , 與周作人、鄭振鐸、葉聖陶等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 , 在新文學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21 年 2、3 月間加入共產黨上海發起組 , 經常向《共產黨》和《新青年》提供宣傳馬列主義和蘇聯的論著和譯文 , 並以商務印書館工作人員的身份作掩護 , 成為各地共產黨組織的秘密聯絡員。在國共合作時期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黨 , 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 , 推動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和商務印書館職工的罷工鬥爭。北伐戰爭時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和漢口《民國日報》主編。1927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 沈雁冰受通緝隱居上海 , 以茅盾為筆名從事文學創作 , 先後寫出《幻滅》、《動搖》、《追求》三部連續的中篇小說。1928 年夏到日本 , 與共產黨失去了組織聯繫 , 但仍繼續從事革命文化活動。

1930 年參加“左聯”的領導工作，任執行書記。1946 年底訪問蘇聯，歸國後寫有《蘇聯見聞錄》和《雜談蘇聯》。1947 年底去香港任《小說月刊》編委。1949 年 2 月回到北平（今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同年 7 月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嗣後任全國政協第四、五屆副主席。1981 年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他要求中共中央在他逝世後追認他為中共黨員，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黨齡從 1921 年算起。

採訪記錄

（1957 年 4 月）

1917 年，我在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業餘寫些有關新文學的文章，翻譯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這個報的俞頌華及其主編張東蓀，另辦有《解放與改造》雜誌，講社會主義，他們約我投稿，寫各國工運書籍的書評，我曾為《解放與改造》社寫過介紹美國產聯、勞聯情況方面的書評。

當時講社會主義的人很多，大約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後來成立黨組織的陳獨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張東蓀一些人；還有國民黨的戴季陶也講馬克思主義，胡漢民在《建設》雜誌上，也翻譯日本河上肇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三部分人，只有第一種人是真正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系和國民黨，是想借談社會主義拉攏些青年，等到真正行動時，他們就絕口不談，終於離開了。

另外，上海有些無政府主義者發行過幾種刊物，如《勞動月刊》，

還有克魯泡特金著作的小冊子。刊物由民智書局發行，這個書局與國民黨有關係。無政府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約在民國元年間。它對中國青年是有些影響的。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開始時都接觸過無政府主義。1917 - 1918 年間，我也喜歡無政府主義的書，覺得它講的很痛快。抗日戰爭時期，還有人相信無政府主義，對黨不滿。它適合小資產階級的胃口，主張取消一切。

“五四”前，由於我寫些新文學方面的文章，當時在北京的鄭振鐸、王統照等人，認為我是搞新文學的同行，約我發起“文學研究會”。我同意作發起人，但那時候和他們還不認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在上海的只有我一個，其他的在北京。“文學研究會”是在《小說月報》改組的前一年成立，有宣言，主張“為人生而藝術”。後來我編《小說月報》，該報遂成為“文學研究會”的一個活動地盤。

《小說月報》原來屬於“星期六派”，“五四”後，為新文化運動大勢所趨，銷路很小，商務印書館覺得不行，要我來編。我主張不用已經購買來的一箱舊稿，進行改組，經商務印書館同意，我才答應編輯；並引用約請“文學研究會”的分子作骨幹撰稿。至於“文學研究會”內部，分子也是很複雜的。

和《小說月報》同時改組的，有《婦女雜誌》與《東方雜誌》。《婦女雜誌》原來和《小說月報》由一個人編輯，這時候也換了人。《東方雜誌》是政治性比較明顯的刊物，對於這個雜誌，商務印書館不敢改的太狠，只是把原來反對新文化的編輯杜亞泉，換成由錢智修負實際責任。《學生雜誌》當時沒改組，過了一、二年，才由楊賢江主持。那時候，楊還沒有入黨。

*

*

*

*

1920 年，《新青年》雜誌遷到上海，陳獨秀也來了。陳和我本來不認識，但他也來找我，約我給《新青年》寫介紹蘇聯的文章。他給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國際通訊》。這個雜誌是用好幾國文字發行的，內容有蘇聯介紹，國際時事評論等等，它是專門對外宣傳用的。

就在這年夏天，大約 7 月光景，陳獨秀他們要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我記得小組的成員有：陳獨秀、張東蓀、沈玄廬、李達、邵力子、李漢俊、周佛海，還有一些別人。小組開會在陳獨秀家裏。會議不是經常開，主持人多是陳獨秀。開會時，有一個蘇聯人，中國名字叫吳廷芳，很年輕，好象是顧問，他是共產國際派來做聯絡工作的。小組開會的內容：交換別地小組的情況，研究發展組織，吸收新成員，研究開展宣傳工作等。宣傳工作主要是通過《新青年》宣傳自己的主張。起初小組還利用過《時事新報》，後來張東蓀退出小組，研究系的《時事新報》也跟着變了。當時小組還沒有搞工人工作，後來大概是楊明齋到工人中去工作過。那時候，在萍鄉安源，可能已有工人運動的工作了。那是李立三回國以前的事。

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小組沒有黨章，我記得在嘉興南湖開會前一兩個月，陳獨秀叫我翻譯《國際通訊》中很簡單的《俄國共產黨黨章》，作為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參考。那時候，我覺得有些字不好譯，例如“核心”這個名詞，現在對它我們很熟悉了，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什麼字譯得易懂明瞭。我們參加小組，沒有學習黨章，也沒有文字上的手續，只有介紹人。

小組是秘密的。黨成立後，有“社會科學研究會”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

上海小組剛成立時，沈玄廬倒是每次開會都到。大革命（注：《“一大”前後》根據沈雁冰 1980 年修改稿，改為“五卅”）前他退出了，當時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交給邵力子，邵又要我轉給黨中央。

旅歐支部給黨中央的信，多半寄到商務印書館由我轉交，因為印書館可以掩護。

*

*

*

*

黨在上海的幾個據點：

外國語學校，地址在漁陽里，和陳獨秀住的地方相近。外國語學校後來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學校存在的時間很短，記得有楊明齋（華僑）在那裏教俄文。

平民女學，是黨成立後辦的。學生都是要求革命的青年，裏面可能有工人。丁玲、王劍虹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教員都是黨員兼的。平民女學不是正規的學校，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場所，課程方面主要是有關社會科學常識的，我曾在那裏教過英文，學生不感興趣，以後就不去了。學生除了文化課，還有勞動，如學縫紉機。

上海大學，最初大概是江亢虎辦的野雞大學，名叫“南方大學”（注：《“一大”前後》改為“東南高等師範學校”），招生時吹牛說提倡新思潮，各地青年入學後，看看不是那麼一回事，就鬧起風潮來了。當時，學生中的進步分子，（可能有共產黨員和黨聯繫）要求黨把這個大學接收過來，改名“上海大學”，作為黨培養幹部的據點。

那時候，由於國共統戰關係，又為應付外邊，讓外邊的人不至於覺得“上大”太紅，於是把國民黨的于右任抬出來做校長，實際上“上大”是黨的學校。鄧中夏是總務長，管理全校行政；瞿秋白是教務長。大

學設文學、社會科學兩系，此外，還辦了一個附中。學校經費比較困難，一部分是向國民黨募捐的，校舍很簡陋。教員多是黨員，純盡義務；有些課程也找外邊人來教的，如俞平伯教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為了沖淡一下外邊的注意，他的講稿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史》（注：《“一大”前後》改為《中國小說史略》），當時是油印的。“上大”文學系主任是陳望道，社會科學系主任是施存統（注：《“一大”前後》改為瞿秋白兼）。張太雷，蔡和森和我都在“上大”教過書。課程主要的有：社會革命史（講共產主義運動史，蔡和森講），社會科學（講政治經濟學概論），勞動運動史（講各國工人運動），這兩門都是瞿秋白教的。

“上大”學生的來源，一部分是招考的，一部分是黨組織介紹來的（比較少），也有一部分是國民黨介紹來的（這與于右任當校長，和國民黨募捐經費有關係）。後來“上大”學生分化的很厲害，有的甚至很反動，與學生的來源很複雜有關係。“五卅”運動時，“上大”學生在工人中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學校顯得很紅，後來在中國政府統治區呆不下去了，才搬到法租界去。“上大”剛成立時，學生只有 100 多人，這時發展到 200 多人，兩個學系的學生，社會科學系較多，文學系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最多的時候 50 來人，分作兩班，有一班人很少。“上大”分系是準備當正規學校辦的，比平民女學要正規的多了。社會科學系在那時候相當正規，若與現在的大學比起來，當然還很差。

“五卅”運動時，知識分子通過言論，在報上鼓吹宣傳。商務印書館裏有黨小組（以國民黨小組出現，時在國共合作期間）辦的《誠報》（注：《“一大”前後》改為《公理日報》），日出一張，動員工人。“上大”的學生除了組織工人，還去組織愛國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也多是通過“上大”學生、教員搞起來的。

《誠報》（注：《“一大”前後》改為《公理日報》）是商務印書館的

進步知識分子辦的，黨小組只在幕後領導。經費也是商務的進步知識分子及進步的技術工人協助的，讀者對象不僅是工人，還有一般市民。這張報紙只出了不到一個月就停刊了。

(王來棣、單斌記錄，王來棣整理)

附：王來棣、單斌提問：

1、《國際通訊》是否公開銷售，還是作為共產主義小組內部的學習資料。這個刊物大概是什麼時候發行的？到什麼時候止？多久出一期，當時陳獨秀是從哪里得來的？

2、“社會科學研究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有多少成員，其活動怎樣？

3、“馬格斯學說研究社”是不是上海黨小組的外圍組織，都有些什麼人？參加這個社的人一共有多少？它的負責人是誰？1921年4月13日《民國日報·覺悟》所載“馬格斯學說研究社”的章程如下：

一、宗旨：本社專以研究馬格斯的學說為宗旨。

二、入社：不分國別、性別，凡願意研究馬氏學說者，經本社社員一人的介紹，得多數社員之同意，均可為本社社員。

三、方法：暫分左列兩種：

甲、共同研究，由社員預先認定為馬氏學說書籍，分別研究；再于開會時各自發表研究所得的結果及疑惑之點，以便共同討論。

乙、請人演講，隨時敦請對於馬氏學說素有研究的人講演。

四、開會：每禮拜開會一次——暫定禮拜六晚七時。注意，社員如因特別事故不能到會者，務必須先函知書記。

五、會費：每人每月收會費小洋一角，如遇必要時，得臨時徵收特別捐。

六、職員：由全體社員互選一人為書記，以總理社內一切事務，任期以一月為限。

沈雁冰答問：

1、《國際通訊》是公開發售的，英文版名為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德、法文版的名字相同，只是用的是德、法文。何時出版、何時停版，我不知道。陳獨秀從何處得此刊物，我不知道；但我那裏，約自 1921 年後，就經常收到從國外寄來的英、德、法三種文字的該刊，都是轉交“鐘英”的。“鐘英”是當時黨中央的代名。

2、“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立於辦“上大”後，成員無固定，那是作為團結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的一個學術性組織，活動情形我不記得了。

3、（“馬格斯學說研究社”）我不知道這個研究社的情形。

【編者按】

編者和單斌於 1957 年 4 月初採訪沈雁冰先生，同月沈先生對採訪記錄作了修改。1980 年《“一大”前後》編輯部再次把我們的記錄稿送審，請沈先生作第二次修改。因我們沒有見過第二次修改的原稿，所以下面披露的是 1957 年沈先生修改的採訪記錄。

沈雁冰先生談話記錄 1957.4.

一九一七年，我在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業余寫些有關新文學的文章，翻譯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在時事新報附刊學燈上發表。這個報的俞頌華及其主編張東蓀，另辦有「解放與改造」雜誌，講社會主義，他們約我也在這上面投稿，寫各國工運書籍的書評，我曾為「解放與改造」社寫過介紹美國產聯、勞聯情況方面的書評。

當時講社會主義的人很多，大約可分為三種：一是後來成立黨組織的陳獨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張東蓀一些人；還有國民黨的戴季陶也講馬克思主義，胡漢民在「建設」雜誌上，也翻譯日本河上肇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三部分人，只有第一種人真正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系和國民黨，是想借談社會主義拉攏些青年，等到真正行動時，他們就絕口不談，終於離開了。

另外，上海有些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發行過幾種刊物，如勞働月刊；還有克魯泡特金^{著作}的小冊子。刊物由民智書局發行，這個書局與國民黨有關係。無政府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約在民元年間。它對中國青年是有些影響的，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開始時都接觸過無政府主義；¹⁹¹⁷⁻¹⁹¹⁸在五四前一年，~~或在五四時~~，我也喜歡無政府主義的書，覺得它講的很痛快。抗日戰爭時期，還有人相信無政府主義，對黨不滿。它適合小資產階級的胃口，主張取消一切。

五四前，由於我寫些新文學方面的文章，當時在北京的鄭振鐸、王統照等人，認為我是搞新文學的同行，就約我發起「文學研究會」，我同意作發起人，但那時候和他們還不認識。「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在

上海的只有我一个，其他在北京。文学研究会，是在[小說月报]改組的前一年成立，有宣言，主張[为人生而艺术]。后来我編[小說月报]，該报遂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活动地盘。

小說月报，原来屬於[星期六派]，五四后，为新文化运动大势所趋，銷路很小，商务印书館覺得不行，要我來編。我主張不用已經购买的一箱旧稿，进行改組，經商务印书館同意，我才答应編輯；並引用^{經濟} [文学研究会]的分子^{撰稿}作骨干。至於[文学研究会]內部，分子也是很复杂的。

和小說月报同时改組的，有妇女杂志与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原来和小說月报由一个人編輯，这时候也換了人。东方杂志，是政治性比較明显的刊物，對於这个杂志，商务印书館不敢改的太狠，只是把原来^反对新文化的編輯杜亚泉，換成由錢智修实际責任。学生杂志当时沒改組，过了^三年，才由楊賢江主持。那时候，楊还没有入党。



一九二〇年，新青年杂志迁到上海，陈独秀也来了。陈和我本来不認識，但他也來找我，約我給新青年写介紹苏联的文章。他給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国际通訊]。这个杂志是用好几国文字发行的，内容有苏联介紹，国际时事評論等等，它是專門对外宣傳用的。

就在这年夏天，約是七月光景，陈独秀他們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組。我記得小組的成員有：陈独秀、張东蓀、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別的人。小組开会是在陈独秀家里。會議不是經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吳廷芳

，很年輕，好象是顧問，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聯絡工作的。小組開會的內容：交換別地小組的情況，研究發展組織，吸收新成員，研究開展宣傳工作等。宣傳工作主要用「新青年」宣傳自己的主張；起初小組還用過時事新報，後來張東蓀退出小組，研究系的時事新報也跟着變了。

當時小組還沒有搞工人工作，後來大概是楊明齋到工人中去工作過。那時候，^在蕪湖安源^{運動的}可能已有工人工作了。那是李立三回國以前的事。

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總之~~小組也沒有黨章，我記得在嘉興南湖開會前一兩個月，陳獨秀叫我翻譯過「國際通訊」中很簡單的「俄國共產黨黨章」作為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時的參考。那時候，我覺得有些字還不好譯，例如「核心」這個名詞，現在對它我們很熟悉了，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什麼字譯得易懂明了。我們參加小組，沒有學習黨章，也沒有文字上的手續，只有介紹人。

小組是秘密的。黨成立後，有「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立~~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

上海小組剛成立時，沈玄庐倒是每次開會都到，大革命時他退出了，他當時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交給邵力子，邵又要我轉給黨中央。

張頤友寄給黨中央的信，多~~字~~等即請方所~~出~~信由孔建廷，因為印刷所可以掩護。

黨在上海的幾個據點。

外國語學校，~~我不去清楚~~。地址在漁陽里，和陳獨秀住的地方相近。外國語學校後來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學校存在的時間很短，記得有楊明齋等（華僑）在那裡教俄文。

平民女学是党成立后办的。学生都是要求革命的青年，裡面也可能有工人。丁玲、王劍虹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教員都是黨員兼的。平民女学不是正規的学校，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場所。課程主要教点社会科学^{这方面是有用的}。我曾在裡面教过英文，学生听着不感兴趣，以后就不去了。学生除了文化課、还有劳动^学、学縫紉机。

上海大学，最初大概是江亢虎办的野鸡大学，名叫「南方大学」，他招生时吹牛說提倡新思潮；~~各地~~各地青年入学后，看々不是那么一回事，就鬧起风潮来了。当时，学生中的进步分子，^{要求}可能有共产党员和党联系，~~党~~党把这个大学接收过来，改名「上海大学」，作为党培养干部的据点。

那时候，由於国共统战关系，又为应付外边，让外边的人不至於觉得「上大」太紅，於是就把国民党的于右任抬出来做校长，实际上是党的学校，邓中夏是总务长，管理全校行政；瞿秋白是教务长。大学設文学、社会科学两系，此外，还办了一个附中。学校經費比較困难，一部分是向国民党募捐的，校舍很簡陋。教員多是黨員，純尽义务；^{也带课程也}也有找外边人来的，如俞平伯教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为了冲淡一下外边的注意，他的讲稿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史，当时是油印的。上大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社会科学系主任是施存統。張太雷、蔡和森和我都在上大教过书。課程主要的有：社会革命史、共产主义运动史（蔡和森讲），社会学（讲政治经济学概論）、劳动运动史（讲各国工人运动），这两門都是瞿秋白教的。

上大学生的来源，一部分是招考的，一部分是党組織介紹来的（比

較少),也有一部分是国民党介紹采的,(这与于右任当校长,和国民党募捐經費有关系),后来上大学生分化的很厉害,有的甚至很反动,这与学生的来源很复杂是有关系的。[五卅]运动时,上大学生在工人中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学校显得很紅,后来在中国政府統治区待不下去了,才搬到法租界去。上大剛成立时,学生只一百多人,这时发展到二百多人,两个学系的学生,以社会科学系为最多,文学系一般是二三十人,最多的时候有五十来人,分作两班,有一班人很少。上大分系是准备当正规学校办的,比平民女学要正规的多了。社会科学系在那时候相当正规,若与现在的大学比起来,当然还很差。

[五卅]运动时,知識分子通过言論,在报上鼓吹宣傳。商务印书館里,有党小組(以国民党小組出現,时在国共合作期間)办的《成报》,日出一張,动員工人。上大学生除了組織工人,还去組織爱国商人罢市。学生罢課,也多是过上大学生、教員搞起来的。

陳其采 采访记录

誠報是商务印书館
的進步知識分子办的,党
小组以至革命派领导。
知識分子及进步的技術人
指易的,讀者对象不
僅是工人,还有一般市民。

答問(一)：「國際通訊」是公開發售的，華文版名為「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由法文版的名字相同，只是用的量度，法文，何種字板，何時停版，我不知道，隨姓者以何處有此刊物，我不知道，但我那里，自自一六二一年，就經常收到從國外寄來的華文，三種字板的該刊，都是朝文，「陸軍」的，「陸軍」是當時黨中央的代表。

答問(二)：成立於上海，~~成立~~成立無國定，那是作為團結要本進步的知識份子的一個學術性組織，活報情刊我不記得了。

答問(三)：我不知道這十研究社的情刊。

以上係沈雁冰先生答覆因修改
解者

回憶上海建黨和知識界的情況

邵力子



邵力子 (1882 - 1967)，浙江紹興人。1907 年去日本學新聞，與于右任等在日本創辦《神州日報》，鼓吹民主革命。1908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後又參加中國國民黨。1915 年創辦《民國日報》，任主筆達十年之久，宣傳孫中山的政治主張，配合《新青年》提倡新文化。1917 年 11 月 20 日最早在我國報導俄國十月革命消息。1919 年 5 月報導我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呼籲上海各界響應北京學生愛國群眾運動。同年 6 月《民國日報》設副刊《覺悟》，

由邵力子主編。除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宣傳新文化外，還發表大量宣傳社會主義學說、介紹十月革命後蘇聯的制度和政策的文章。1920 年在上海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1 年加入共產黨發起組。1924 年以來，積極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5 年“五卅”運動後，就任黃埔軍校秘書長。1926 年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邵力子以國民黨代表的身份參加，按照中共領導人意見，請他退出共產黨，以純粹國民黨員身份參加會議。於是他於 1926 年 8 月正式

脫離共產黨。1927 年後，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中國公學校長、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和陝西省政府主席等職。“西安事變”後，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駐蘇大使、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從 1937 年到 1949 年，國共兩黨多次舉行有關合作、和平的談判，邵力子都是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為促進兩黨和平相處而努力，有“和平老人”的美稱。1949 年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共雙方代表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簽字，他毅然脫離國民黨政府，留在北平（今北京）。同年被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等職務。1967 年 12 月年高無疾善終於北京。

【編者按】

邵先生的訪談錄，不僅詳細敘述了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情況，談了他個人加入共產黨和退出共產黨的過程；而且分析了當年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的幾種不同態度，以及上海知識界的思想動態。《“一大”前後》刊登這份記錄稿時，刪去了部分我認為很有價值的史料，現按底稿恢復記錄原貌。

第一次訪談記錄

我參加共產黨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共產黨的前身，

共產主義小組發起的經過是這樣的：1920 年上半年，浙江師範學院（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鬧風潮後，一批教員和學生到了上海。其中施存統因寫《非孝》一文被開除，陳望道，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四個教員被解聘，除李以外，都跑到上海，與《民國日報》發生關係，我當時在《民國日報》。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歸國時，帶回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另外，一部分國民黨員，有唯物主義的思想，如戴季陶、沈玄廬。廖仲凱和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很熱心。（他們二人 1920 年時，不在上海。）陳獨秀也曾和國民黨發生過關係，辛亥時曾任安徽省長柏文蔚的秘書。

以上兩部分人，1920 年 5 月間^[1]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研究會的有：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陳獨秀、陳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此外，商務印書館有沈雁冰、楊賢江（編《學生雜誌》），也常常在一起談談，但不參加研究會。

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成員起了一些變化，有的因思想習慣，有的因工作關係，先後退出。戴季陶退出時，說因為有不方便處。沈玄廬好象也退出了，陳望道非正式參加。邵力子以特別的方式參加（不參加小組開會，當時得到組織上的許可），我所以不參加小組開會，一方面是因為忙，白天在復旦大學教書，晚上在報館裏工作，各學校還時常找我演講；另一方面，我當時擔任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並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工作，這些職務，都以國民黨員身分活動為宜。加上那時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經常與我搗亂，使我不便經常參加小組生活。

當時小組的主要工作由陳獨秀、李漢俊二人負責。

[1] 這個時間是記錄者加上去的，邵力子先生沒有加以修改。

1921 年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嘉興南湖開會，我因不能離開《民國日報》，未參加。1924 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會，我也未參加。1925 年孫中山先生臥病北京以至逝世，我沒有去。我始終未離開上海，為了守《民國日報》這個陣地。

那時黨組織給我的任務我都做了，主要是反帝、反宗教。1925 年“五卅”後，我離開上海，因為蔣介石叫我去黃埔軍校，同時我在上海受反動勢力的注意，不能繼續待下去。我到黃埔後，才公開共產黨員身分，參加黨的組織生活。1926 年 8 月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我是國民黨的代表，譚平山是共產黨的代表。國民黨派我去莫斯科大概是蔣介石希望我離開他，因為當時黃埔內部矛盾很大，分兩派：即孫文主義學會（反動）和青年學會（國民黨員參加共產黨的，或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

我們去莫斯科，經上海時，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周恩來等同志開會歡送我出黨，說我多年來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這次到莫斯科去，還是做個純粹的國民黨代表好，我接受這個意見，於 1926 年 8 月正式脫黨。我在莫斯科半年，回國時蔣介石已叛變。

*

*

*

*

1920 年前，上海已經有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以前，已有該書的摘譯。《星期評論》約陳望道譯這書，準備刊登，也說明《星期評論》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那時我用“和文漢讀法”閱讀日文馬克思主義的書籍。1918 年留日歸國學生中，一部分人傾向社會主義（如李達），大部分人有國家主義思想（與以後的國家主義不同），他們辦《救國日報》，這報紙與《民國日報》關係密

切。

當時傾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還沒有組織起來，一方面因怕帝國主義迫害，一方面當時國民黨在上海領導全國學生總會，進行活動。

*

*

*

*

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

一、“上海大學”。1920年上海有一個高等師範學校（野雞學校）鬧風潮，被解散，他們找于右任，我和于右任是好朋友，于右任找我一起，辦“上海大學”。“上海大學”開始很簡陋，但進步分子都集中在這裏，如鄧中夏、惲代英、楊明齋等。于右任的老朋友楊明軒擔任上海大學的總務長。

二、婦女方面有“平民女學”，丁玲、王會悟（李達的夫人）等都是該校學生。

三、青年團，那時叫S.Y.由楊明齋負責。楊明齋本來在俄國做工，十月革命後回國，他當時很活動。後來，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楊賢江等都參加了青年團。杭州師範出來的一些學生，也參加了青年團，記得其中有俞秀松（蔣介石清黨時犧牲的）。那時有一個“外國語學校”。

*

*

*

*

《民國日報》的前身是《民立報》，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民立報》停刊，一部分國民黨員跟孫中山先生去日本，一部分人可以說是

為了生活問題去教書，我即於此時到復旦大學教書，並拉葉楚傖同去復旦。葉楚傖本來和柳亞子一起搞“南社”(主張舊民主革命)，葉是“南社”的健將。1915年袁世凱想做皇帝，孫中山先生回上海，要辦報，於是在1915年年底辦起《民國日報》。由葉楚傖任總編輯，我為經理兼編輯(葉本來是《太平洋報》的，我原是《民立報》的)。《民國日報》初以倒袁為目標。《民國日報》經濟困難，不若當時《申報》、《新聞報》有錢。研究系以上海的《時事新報》和北京的《晨報》為活動中心，《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也登一些新東西，但不是真的新東西，因文化界空虛，也很風行。《民國日報》辦《覺悟》，和《學燈》進行鬥爭，這種論爭對當時青年有相當影響。《覺悟》由我主編，陳望道和劉大白都是我拉到復旦教書的，他們時常在《覺悟》上寫稿，夏丏尊也時常投稿。劉大白和沈定一的白話詩，當時頗受一般讀者歡迎。

《民國日報》後來分化為左、右派，左派有邵力子，陳望道、沈雁冰等，右派有葉楚傖等。葉楚傖和劉大白後來都贊成西山會議派。

後來，我離開《民國日報》，《民國日報》從此變了樣，《覺悟》也變了。

《民國日報》的副刊之一《平民》，專門講合作運動，有進步作用，後來陳果夫兄弟包辦了去。

總起來說《覺悟》所宣傳的，還是舊民主主義的思想，共產主義思想是不夠的。

*

*

*

*

復旦大學師生中，有一部分人有反帝反封建思想。他們在“五四”、“六三”運動中，曾起過作用。記得在“六三”前夕，北京發生逮捕學生

事，我接北京電報，知道發生了事情。當晚等到報館工作結束，來不及回家睡覺，就跑到復旦大學，找幾個教員談了一下，天亮後，打鈴召集學生開會，報告這個消息，學生很轟動，立即分頭到各校報告，當天，各校學生又派代表勸商界罷市、工界罷工。這就是“六三”運動的導火線。

復旦學生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有劉蘆隱（現名劉慎德）。學生會經過“六三”運動，力量大增，在此以前，校方總想解散學生會。

* * * *

孫中山先生對十月革命的態度是很明顯的，十月革命勝利後，他就去電祝賀。那時候，一般國民黨員對十月革命還沒有什麼認識，也有一部分人反對十月革命。這是孫中山先生難得的地方。

孫中山先生“五四”時在上海，對“全國學生總會”起了領導作用，我到各校演講，也是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

國共合作：先是孫中山先生與越飛合作，決定由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先生推動孫的革命計劃，孫中山先生也知道國民黨的人和革命的辦法不行，人的腦子太舊，組織渙散，沒有力量。1921年國民黨準備改組，決定國共合作，但國民黨中一部分頑固的，極力反對，說帝國主義堅決反共，和共產黨合作很危險。他們怕赤化。一般國民黨員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潮流，共產黨有一定的力量可利用。真正認識到共產黨的正確，和國民黨本身的弱點的人是很少的。當時廖仲凱和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很熱心，朱執信在《建設》上發表了不少文章。他倆去世，對國民黨是一種損失。

1922 - 1923 年一年多時間內，在上海環龍路 44 號，有籌備國民黨改組的辦事處，毛主席參加宣傳部工作。在這個辦事處裏，也有國民黨的右派，如葉楚傖等。記得有一次，我和一個叫茅祖權的談國共

合作問題，他就動手打我。

國共合作為一般進步青年所歡迎。有一些國民黨員認為國共合作，兩個黨不應該平等。當時國民黨員中真正對馬克思主義有認識的極少極少。

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以華僑反對為理由。孫中山很堅決，說：你們反對，你們退出去，我一個人也要這樣做。又說：我做共產黨也可以。後來國民黨開除了馮自由和馬素二人。

第二次訪談記錄

1918年，留日學生因山東問題，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歸國，這次運動，對“五四”起了推動作用。留日學生中，有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如李達、李漢俊、黃日葵，都是這時歸國，以後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發起人。黃日葵歸國後，在北大旁聽，是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主要人物之一。

那時候，上海各校都有學生會，其中有積極的，如復旦大學；有不管事的，如教會學校滬江、聖約翰等校的學生會。

留日學生歸國的時候，國民黨可以說沒有什麼力量，有和沒有差不多，只是在學生中稍微有點力量。留日學生的救國運動推動了國民黨。國民黨對他們是積極幫助的，那時候孫中山先生和《民國日報》都很窮（有時甚至排好了版，紙張在那裏還不知道），但仍給留日學生以經濟上的援助，對《救國日報》在印刷上也給以幫助。此外，還幫助他們開會，聯絡各校學生，幫他們辦學校（大夏大學本來是留日學生辦的，辦成後變了質）。那時我在《民國日報》，和留日歸國學生有

很多接觸。留日歸國學生的代表參加全國學生總會，對學生總會起了推動作用。後來留日學生代表分散到各地宣傳：黃日葵、陳啟修（當時叫豹隱）去北京，王兆榮去四川，李漢俊、李達在上海。

* * * *

“五四”時孫中山先生對全國學生總會的領導：據許德珩先生回憶，他在學生總會時，曾經和其他學生一起去見過孫先生四次，孫先生到學生總會作過一次演講。據我的記憶，孫中山先生到學生總會作了幾次講演。

國民黨內部對學生總會的態度是一致的，因為學生總會活動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而未涉及社會革命。我和戴季陶、汪精衛、葉楚傖等也時常到各校演講。

《星期評論》後期，孫中山先生辦民智書局，請一個姓林的當經理，（林運凱是他的同族，也參加民智書局工作），林是胡漢民一派的，胡漢民也宣傳過馬克思主義，在《星期評論》、《建設》上寫過文章。國民黨原想把民智書局當做一個重要的宣傳機構，一面發行孫中山先生的著作和《建設》雜誌，一面宣傳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這個書局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沒有做什麼工作，這是因為：（一）共產主義小組已經宣傳馬克思主義。（二）國民黨膽小，怕出事。（三）戴季陶、胡漢民等向右走。當時青年學生的思想向左轉，而民智書局不能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作用，因此，脫離了群眾。民智書局經濟上較為充裕，華僑捐了不少的錢，它未能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作用，是件很可惜的事。

*

*

*

*

寰球學生會的情況：我也是這個會的會員，但關係不密切。據我所知道，這個會的發起人是李登輝（編者注：這個李登輝與現在臺灣的李登輝不是一個人），福建人，華僑，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受資本主義教育，有愛國民主思想。在抗戰時，也贊成抗日。李登輝回國時，正值中國抵制美貨運動高潮，他也贊成抵制美貨。後經福建商人曾少卿推薦給馬相伯，任復旦大學教務長。以後任該校校長三十年左右。抗戰時，蔣介石想讓他脫離救國會，叫他到南京去，他不願去。他發起寰球學生會是有愛國意義的，他想以此代替青年會的活動。因為青年會不僅帶有宗教色彩，而且和帝國主義有關。寰球學生會是個國際性的組織，有點俱樂部的活動，開會作學術性的演講，其活動辦法仿青年會，只是不帶宗教色彩。他們每年徵收會員、募捐。為了經濟上的□□，也吸收當時政府的官僚參加。它幫助出國學生辦護照，搞旅行，招待從國外回來的學生。寰球學生會不是革命團體，也不是反動的團體。每逢大運動，他們也參加，但不積極。這個會的總幹事朱少屏曾參加過舊民主革命，南社社員，和柳亞子很要好。

*

*

*

*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由三部分人組成：（一）留日學生，李達、李漢俊等，（二）杭州一師的師生，陳望道，施存統等，（三）國民黨中一部分人，戴季陶，沈玄廬，邵力子等。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始時，只是翻譯和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三人寫得較多，後來周佛海也寫一點，他們都

是日本留學生。那時，馬克思主義書籍主要從日本傳過來。除文字工作外，還做一些聯絡同志的事，商務印書館的沈雁冰、楊賢江逐漸靠近馬克思主義，他們所編的《婦女雜誌》和《學生雜誌》也較激進，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有關的。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鬥爭的對象，在上海以《時事新報》及其副刊《學燈》為主，在北京以《晨報》為主。因為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有影響。他們寫文章的人也不少，有張東蓀、張君勱等。

後來，我們一面覺得只做宣傳、研究工作是不夠的，有學習布爾什維克的作風，建立嚴密的組織的必要，同時也看到時機已經成熟，青年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也不少，應該組織起來。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裏，當時有兩種意見：（一）建立嚴密的組織，過組織生活；（二）贊成成立有嚴密組織的團體，但自己不能積極參加組織生活。如陳望道，好靜，喜歡搞研究工作，不習慣於經常過組織生活，所以沒有正式參加。沈玄廬個人英雄主義較強，不大接受領導，（在國民黨時，也不大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領導），沒有參加。其他如沈仲九，思想接近社會主義，也不願過嚴密的組織生活。總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轉變為共產主義小組，是經過一番曲折的過程的。（當時恐怕沒有明確的“共產主義小組”這一名稱）。

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以工人運動為主，但因在這方面無基礎，開始時，給工人演講，聽眾還是很少的，至“五卅”運動時，工運就很蓬勃了。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也時常到學生中演講。至於在商界方面，是通過馬路商界聯合會進行的。我參加馬路商界聯合會，把該會情況向共產主義小組報告。小組討論過商界聯合會的工作，我按小組決定進行工作。

那時候的工人運動，徐梅坤可能知道一些。他那時是印刷工人，

和杭州一師有關，共產主義小組的宣傳品，時常通過他印刷的。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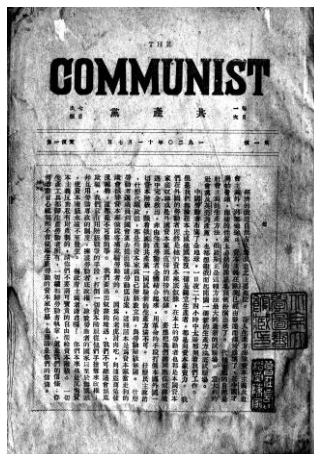
“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者是和無政府主義者在一起工作的，如《星期評論》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也有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因為十月革命後，知識分子嚮往蘇聯，但馬克思主義未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沒有認識。有的甚至以為俄國革命勝利，是虛無黨的功勞，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在破壞舊的方面，起了好作用，在使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面，則起了混淆作用。那時候，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沒有激烈的鬥爭。

在馬克思主義小組裏，沈玄廬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但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主張父子間稱名字，他的兒子和媳婦，就直叫他名字的。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裏，沒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爭論（那時還沒有深入到這一步），所爭論的是是否過嚴密的組織生活的問題。

（記錄經邵力子審閱、修改）

關於“一大”前黨組織的名稱問題

李達



李達主編的《共產黨》月刊

李達(1890 - 1966), 湖南省零陵縣人, 1909 年考入京師優級師範, 1913 年和 1917 年兩次到日本留學。1918 年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參與組織中華留日學生救國團, 回國請願。請願鬥爭的失敗, 促使他決心仿效蘇俄十月革命, 推翻反動政府。從此專心研讀並宣傳馬列主義。1920 年 8 月回國, 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共同組織共產黨發起組, 推動全國各地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 年 11 月黨組織創辦第一個黨

刊《共產黨》月刊，李達任主編。從 1921 年 2 月至 7 月，李達擔任中共上海發起組代理書記，為籌備中共“一大”的召開，付出艱辛的勞動。1921 年 7 月代表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參加中共“一大”，並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主持中共創辦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親自擔任撰稿、組稿等工作，發行《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十五種。同時主持黨創辦的平民女校，培養婦運人才。1923 年因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同陳獨秀髮生激烈爭執，對陳獨秀的專橫跋扈十分不滿，自動脫離中國共產黨。此後他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擔任大學教授，堅持宣傳馬列主義，出版《社會學大綱》等數百萬字著作，被譽為“紅色教授”。1949 年 12 月，重新入黨，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先後擔任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校長。“文革”時期受迫害，被開除黨籍。1966 年含冤去世，1980 年平反，恢復黨籍。

【編者按】

編者于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期間，經范文瀾同志介紹，到賓館拜訪李達同志。李達同志很熱情，同我談了兩次。我當時作了記錄，並經李達同志審閱、修改。遺憾的是這兩份珍貴的訪談記錄不知道被什麼人拿走，至今沒有找到。所以這次編的集子中，沒有李達的訪談錄。

1956 年底我寫成《關於中國無政府主義派的歷史》一文，請李達同志指正。同時向他彙報我採訪建黨歷史時，各人對“一大”前黨組織的名稱說法不一，徵求他的意見。下面這封信就是他針對這兩個問題的答復。

李達給王來棣的信

來棣同志：

十分抱歉，你一月間寄來的信和稿，遲到今天才寫回信，請你原諒。

尊稿“關於中國無政府主義派的歷史”，我當時讀過兩遍，覺得你搜集的資料是那麼豐富，你的分析研究又是那麼全面而正確，我是非常佩服的。我是 1920 年夏天才從國外回到上海的，對於當時無政府主義派的活動，知道得不多。你這篇文章比我當時所目擊的更為詳細。我只是記得，在我黨成立以後，無政府派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少有的，並且當時有些無政府派的青年願意和我們接近。當時有好幾位加入我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人，都是曾經相信過無政府主義的。

你那篇稿子對於中國無政府主義派的歷史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我提不出別的意見來，由於工作的繁忙和身體多病，竟延遲了寫回信的時間，是不應該的。 複致
敬禮。

李達

1957.5.16

我黨是在 1920 年夏天發起的，當時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小組”，我們當時所出的“共產黨月刊”就是證明。或者把“共產主義小組”改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發起組”較為適當。

武 汉 大 学 用 笺

来棣同志：

十分抱歉，你一月间寄来的信和稿，迟到今天才寄回信，请你原谅。

尊稿“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历史”，我当时读过两遍，觉得你搜集的资料是那么丰富，你的分析研究又是那么全面而正确，我是非常佩服的。我是1920年夏天才从国外回到上海的，对于当时无政府主义派的活动，知道得不多，你这篇文章比我当时所目睹的更为详细。我只是记得，在我党成立以后，无政府派批评

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少有的，并且当时有些无政府派的青年愿意和我们接近。当时有几位加入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都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的。

你那篇稿子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历史

史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我提不出別的意見來，
由於工作的繁忙和身體多病，竟延遲了寫回信
的時間，是不應該的。復頌
敬禮。

李 達
1957, 5, 16.

我黨是在1920年夏天發起的，當時黨的名稱
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小組”，我們
當時所出的“共產黨月刊”就是證明。或者把
“共產主義小組”改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
發起組”較為適當。

關於上海建黨、上海大學、 蕭山“農村學校”等情況的回憶

楊之華



楊之華（1900 - 1973），女，浙江蕭山人，瞿秋白夫人。1919 年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1922 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 年進中共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系學習。1924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 年參加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6 年參加中共中央婦委工作，1927 年在黨的“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28 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留在蘇聯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

1930 年回到上海任中央婦委委

員，並在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1934 年，在上海任中央局組織部秘書。1935 年，再次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任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務委員。1941 年回國，途徑新疆時被盛世才逮捕，在獄中堅貞不屈。抗日戰爭勝利後出獄，回延安任中央婦委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局婦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婦聯黨組成員、

國際部部長、副主席，全國總工會黨組成員、女工部部長。1962 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常委等職。“文革”中受迫害，1973 年病逝。

訪談記錄

(1956 年 9 月)

“五四”運動時，我正在杭州女子師範三年級讀書。那時，沈玄廬在上海，時常寄一些進步書刊給我。杭州學生接受新思潮，是“五四”前不久的事情。杭州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有女子師範和男子師範。這兩個學校的學生，家庭經濟較困難，比較其他學校活動得厲害些，但參加者多半是三年級的學生。因為預科一、二年級同學年齡較小，怕事，四年級學生將近畢業，怕丟了文憑，都只有少數人參加。我們在運動中，曾經到拱辰橋茶館中作過演講。男子師範教員中，沈仲九（國文教員）、劉大白、陳望道較進步，女師學校當局則很封建，我們學生來往的信件都受檢查。

“五四”後，女師學生辦一刊物叫《進步》，施存統他們在男師辦刊物叫《非孝》，《非孝》出版時，我們女師同學都看，但我們對施存統的非孝主張，並不贊同。

1919 年年假，我去上海《星期評論》社。這個社當時有：陳望道、李漢俊、沈玄廬、戴季陶、邵力子、劉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寶林（女）等人，施存統也在一起幾個月，他後來去日本了。李漢俊是社的思想領導中心，那時，他和日本、朝鮮的共產黨方面都有聯繫。李漢俊和陳望道整天在社裏的編輯部工作，那個編輯部很像個樣子。

那時有不少外地學生到上海來找《星期評論》的領導人，多半由戴季陶和沈玄廬接見。《星期評論》裏，人人勞動、人人平等。象油印傳單等工作，大家都動手，我也在其中做技術工作。相互間直稱名字，大部分女人剃光頭，丁寶林就剃光頭，象一個尼姑。丁寶林是紹興女師的教員，有學問的。1920年，上海染織廠罷工，《星期評論》社支援罷工，用汽車沿馬路散發傳單七千多份。染織廠、印刷廠工人經常來來往往。

《星期評論》在全國學生群眾中很有影響，學生和工人經常有很多人投稿。1921年被封。《星期評論》被封後，大家也就散了。

《星期評論》社的一部分人，曾和社外的李達等，成立共產主義小組，那時我未參加。大約是在1920年的秋天（或冬天），夜裏有一批人玄廬、秀松等，十餘人從外邊回來。我聽見戴季陶在屋子裏哭，第二天我問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告訴我，昨天在一個地方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戴季陶怕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時就拒絕了。哭的原因一方面發生內心的動搖，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另一方面受不起大家的批評。那時共產主義小組的名稱，大概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還沒有叫“共產黨”。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廬都參加了這個研究會。

1921年《星期評論》被封後，李漢俊曾勸我去蘇聯學習，我到《星期評論》的目的本是為了去蘇聯學習，李漢俊曾對我（有）很多幫助。他帶我去見日本、朝鮮的進步朋友家，他還介紹我到一位俄國朋友那裏學習俄文。而戴季陶勸我去德國，不去俄國。當《星期評論》社被封大家逃走，而我在上海進了一個教會學校，叫“女子青年體育師範”暫作避居，這是基督教在上海吸收內地女青年，進行宗教宣傳活動的學校。我為了在學校進行思想工作，特邀黨派陳望道到這學校教國文，他成了我反對奴化教育的後盾，張曼雲也是與我同班。後來為了反宗

教宣傳活動，我就被開除了。

1921年下半年，沈玄廬叫我到蕭山辦“農村學校”。浙江蕭山的農民運動，就從這個“農村學校”開始。“農村學校”（小學）設在蕭山衙前沈玄廬家，經費也由沈家負擔。教員都是杭州師範出來的進步學生，有宣中華、徐白民、唐公憲和我等（後來宣中華、徐白民都是浙江黨的負責人）。與這個學校有聯繫的，還有一個“繼之小學”，這是一個周姓地主祠堂裏辦的學校，吸收本族子弟上學，在性質上與“農村學校”不同，但繼之的教員中比較進步的，則與“農村學校”的教員很接近。

“農村學校”從1921年創辦，至1923年我離開該校止的情況是這樣的：

“農村學校”只吸收農民子弟入學，學生的書籍、紙張全由校方免費供給。學生一百余人，逐年稍有增加，全校分五班，學校裏講一些工人運動和農民方面的問題。“農村學校”的教員，還經常對農民宣傳減租減息，抗捐抗稅的道理。1922年“五一”節時，農村學校利用民間風俗，給農民發了一種糕，在糕的上面印有口號“五一紀念”等字樣。1922年夏，農村學校發起搞了一個全浙江夏令營（地址借用春輝中學，該中學校長經亨頤，當時思想較進步），集中浙江小學教員一、二百人，宣傳馬克思主義，象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性質的訓練班。到年假時，又辦了一個“小學教員教學研究會”（？），性質與前者相似。

1922年年底，蕭山衙前鄉及其附近的農民，舉行了一次抗捐、抗租示威活動，有一、二千人參加。這次運動，主要是由小學教員領導的。農民領袖李成虎，在運動中被捕，死於獄中，（現在衙前還有他的紀念碑），李死後，我們為他開過追悼會。這事發生後，農民有點害怕，從此我們也只能教我們的書。

浙江成立共產黨的組織，是1924年的事。我記不起在哪一年成

立？1921 至 1923 年間蕭山農村學校和農民抗捐抗稅等活動，並沒有共產黨或青年團的組織在進行領導，但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進行領導。我於 1922 年到上海，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即回蕭山，繼續當教員，沒有在蕭山發展和組織青年團，只是大家在一起活動。在教育界方面宣中華等與我在一起仍有一些活動。

1922 年我在上海時，曾去過“平民女學”一次，看見丁玲穿一件夏布背心，男男女女坐在一起，我有點看不慣，覺得太隨便些。

沈玄廬家裏原有很多土地和房子，他的母親當家，他時常說不向農民收租，說從農民身上得來的錢，應用到農民身上。辛亥革命時，他花了一些錢。以後《星期評論》和“農村學校”，也用了他不少的錢。他是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之一，曾參加過 1925 年的第四次黨代會。有人說他在發起共產主義小組後不久即行退出，不符事實。沈玄廬於 1925 年參加國民黨的西山會議，叛變了黨，1929 年宣中華就是他搞死的。

邵力子退出黨，是我們黨作的決定。因為當時國共合作，國民黨內部分左、中、右三派（汪精衛為左派，蔣介石為中派，戴季陶為右派），當時我黨為團結蔣介石，勸邵力子退出共產黨以達轉變對方的思想。但結果並沒有做到，反被蔣拉邵而離開我們更遠了。

“上海大學”的前身，是個野雞學校，因鬧風潮，為我們黨中央所接收，把全部學生包下來。“上大”在名義是國民黨辦的，所以由于右任擔任校長，各系主任也是各方面的人。這是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但內部思想鬥爭很激烈。這個學校由我黨中央直接領導，邵力子為副校長，鄧中夏主持校務和教務，瞿秋白任社會科學系主任，陳望道任中文系主任，施存統時常去中央聯繫。何世楨（國民黨右派）任英文系主任。

“上海大學”對當時革命運動起了不少作用。1924 年上海“全國學生總會”的負責人：余震鴻、李石勳、何成湘、郭伯和（都已犧牲）等，都是“上大”學生。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的情況也如此，我當時就在這個聯合會擔任主任。（那時各地婦女組織名稱不一，有的叫“婦女解放聯盟”（上海？），有的叫“婦女解放協會”，國民黨也搞了幾個婦女團體，叫“女子參政協會”、“女權同盟會”，政治上與我們又聯合又鬥爭。在工人方面，我們有幾個俱樂部，一個在滬東，一個在小沙渡，還有一個在吳淞。李立三、惲代英、鄧中夏等同志時常去演講。我黨和國民黨左派在上海各學校裏辦“平民夜校”。我在 1926 年進行一次調查，上海有這種“平民夜校”三十六個。我們在“平民夜校”裏，發展黨員，向工人宣傳。1925 年 2 月罷工，就是從“平民夜校”學生中開始瞭解內外棉紗廠內工人的生活 and 鬥爭的情緒和情況。當 2 月×日罷工時我校支部派了鄧中夏、劉□□、楊之華（楊華）等參加做組織工作。那天傍晚在一個廣場開群眾大會，晚上開罷工工人代表會議。當時的領導人是鄧中夏和李立三。《告工人宣言》是立三同志起草的。第二天就組織男女糾察隊了。顧正紅死後，大開追悼會，搭了六個台，都是工人自己上去演講，工人力量很壯大。鄧中夏同志曾為了保護工人和李立三，自己挺身與幾個工人在一起，去當工人請願代表，曾被捕過一個短時期。

“五四”時，瞿秋白到上海活動事，鄭振鐸曾經告訴過我。那時，瞿秋白時常和李大釗同志來往，參加開會，開什麼會則不知道。他到莫斯科去，是否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派他去的，不清楚。但從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去莫斯科的目的是很明顯的。瞿秋白的堂哥哥是個反動政府裏的外交官，他從蘇聯回國後，他的堂哥哥就給他找了一個反動外交官的職位。瞿秋白非常氣憤，第二天便跑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後，

繼續編《新青年》，後中央派他和其他幾個同志一起辦上海大學。1925年雙十節，國民黨右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毆打我黨人員，瞿秋白從此不能公開進行工作，不久“上大”被封。校址又從英界西藏（？）路搬到中國地界閘北去了。但秋白還秘密去“上大”指導黨團的活動。

中共莫斯科支部：一部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莫斯科學習，成立支部。據我所知道，1922年已有莫斯科支部，瞿秋白在1922年時曾任東大助理教授。王若飛、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同志都是莫斯科支部早期的成員。1923年時，支部裏有六十多人。詳細情形可向蕭三同志瞭解。我是1928年才去莫斯科的。

(記錄經楊之華審閱、修改)

2183

楊之華訪談筆記 1956.9.

五四運動時，我^在杭州女子師範三年級讀書。那時，沈玄庐在上海，時常寄一些^{新書}刊給我。杭州學生接受新思潮，是五四前不久的^事。杭州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有女子師範和男子師範。這兩個學校^{受新思潮影響比較早，比別處學校運動早，利於宣傳}的學生，參加者多半是三年級學生。因為一、二年級同學年齡較小，怕事，四年級學生將近畢業，怕丟了文憑，都只有少數人參加。我們在運動中，曾經到拱宸橋茶館中作過演講。^{男學生}女師教員中，沈仲九（國文教員）劉大白較進步，女師學校當局則很封建，我們學生來往的信件都受檢查。

五四後，女師學生辦一刊物叫「進步」（或叫先進），施存統他們在男師辦刊物叫「非孝」，「非孝」出版時，我們女師同學都看，但我們對施存統的非孝主張，並不^{完全}贊同。

一九一九年暑假，我去上海「星期評論」社工作。這個社當時有：陳望道、李漢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劉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寶林（女）等^{社存統也在，於五月他，他來去四五天}。李漢俊是社的思想領導中心，那時，他和

日本、朝鮮的共產黨方面都有聯繫。李漢俊和陳望道整天在社里的編輯部工作，那個編輯部很象個樣子。那時有不少外地學生到上海來找

「星期評論」，多半由戴季陶和沈玄庐接見。「星期評論」里，人人^{我以為其中的人數約有二十人}勞動，人人平等。象油印傳單等工作，大家都動手。相互間直稱名字，^{丁寶林是跟沈玄庐的教員有關係}

有^{大半}的女人剃光頭，丁寶林就剃光頭，象一個尼姑？一九二〇年上海染織廠罷工，「星期評論」社支援罷工，用汽車沿馬路散發傳單七千^{多份}。染織廠印刷廠工人經常來社。

「星期評論」在學生中很有影響，一九二一年被封。「星期評

論和工人經常有人投稿。

論」被封后，大家也就散了。

「星期評論」社的一部分人，^{1920年的}和社外的李達等，成立共产主义小組，那时，我未参加。大約是在秋天（或夏天），我听見戴季陶在屋子里哭，我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們告訴我，昨天成立共产主义小組，戴季陶怕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义，^{當時就拒絕了。戴哭。}退了出來，^{當時哭。}那时共产主义小組的名称，大概是「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没有叫「共产党」。^{的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

我對星期評論的目的有之為了要安碼頭，

一九二一年，星期評論被封后，李漢俊曾邀我參加聯學，戴季陶勸我去德國。后来，我在上海进了一个教会学校，叫「女子青年体育师范」，这是基督教在上海吸收內地女青年，进行宗教宣傳活动的学校。^{因之，他有了反對吸收教育的機會，張學良也}陈望道到这学校教书，我和×××则在这学校当学生。^{是5月}我为逃避了教也许多学生在工作中，^{同月}反宗教宣傳活动，不久，我就被开除了。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沈玄庐叫我到蕭山办农村学校。浙江蕭山的农民运动，就从这个农村学校开始。农村学校（小学）設在蕭山衙前沈玄庐家，經費也由沈家負担。教員都是杭州师范出来的进步学生，有宣中华、徐白民、唐××（后来宣中华、徐白民都是浙江党的負責人）。与这个学校有联系的，还有一个「繼之小学」，这是一个祠堂里办的学校，吸收本族子弟上学，在性質上与农村学校不同，但繼之的教員中比較进步的，則与农村学校的教員很接近。

农村学校从一九二一年創办，至一九二三年我离开該校止的情况

是这样的：

農村學校⁷只吸收農民子弟入學，不收其他家庭成份的學生，學生的書籍，紙張全由校方免費供給。學生一百餘人，逐年稍有增加，全校分五班，學校里講一些工人運動和農民方面的問題。農村學校⁷的教員，還經常對農民宣傳減租減息，抗捐抗稅的道理。一九二二年五一節時，農村學校利用民間風俗，給農民發了一種糕，在糕的上面印有「男丁五-紀念」^{茅子林}。一九二二年夏，農村學校發起搞了一個夏令營（地址借用春輝中學，該中學校長經亨頤，當時思想較進步）。集中浙江小學教員一、二百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有^{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研究會¹的性質。到年假時，又辦了一個小學教員教學研究會⁷，性質與前者相似。

一九二二年^冬底，蕭山衙前鄉及其附近的農民，舉行了一次抗捐、抗租示威活動，有一、二千人參加。這次的運動，主要是由小學教員領導的。農民領袖李成虎，在運動中被捕，死於獄中，（現在衙前還有他的紀念碑）。李死后，我們為他開過追悼會。這事發生後，農民有點害怕，^{從此}我們也只能教我們的書。

浙江成立共產黨的組織，是^{我記不起在那一年}一九二四年的事。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間蕭山農村學校和農民抗捐抗稅等活動，並沒有共產黨或青年團的組織在進行領導，但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進行領導。我於一九二二年到上海，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即回蕭山，^{他係古柏}沒有在蕭山發展和組織青年團，只是大家在一起活動。^{在教員會裏宣傳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時，曾去過平民女學¹一次，看見丁玲穿一件

夏布背心，男男女女坐在一起，我有点看不慣，觉得太随便些。

沈玄庐家里有很多土地和房子，他的母亲当家，他时常說不向农民收租，說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錢，应用到农民身上。辛亥革命时，他花了一些錢，以后，星期評論和农村学校，也用了他不少的錢。他是共产主义小組的发起人之一，曾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第四次党代会，有人說他在发起共产主义小組后不久即行退出，不符事实。沈玄庐于一九二五年^{參加國民黨的西山會議}后，叛變，賣中華就是他搞死的。

邵力子退出党，是我們党作的決定，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內部分左、中、右三派（汪精衛为左派，蔣介石为中派，戴季陶为右派），我党为團結蔣介石，劝邵力子退出共产党^{以達統一的目的}，但邵力子並沒有做到反被蔣介石而高向新派交差了。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个野鸡学校，因鬧風潮，為我們所接收，我們^合把学生包下来。上大在名义是国民党办的，所以由于右任担任校长，各系主任也是各方面的人。这个学校由我党中央直接领导，邵力子^{和張}为付校长，邓中夏主持校务，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施存統时常去中央联系。何北衡（即毛石人）任英文系主任。

上海大学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了不少作用。一九二四年上海全国学生总会的負責人：余震鴻、李石、何春香、文生河（都已牺牲）等，都是上大学生。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情况也如此，我当时就在这个联合会（那时各地妇女組織名称不一，有的叫妇女解放联盟（上海？），有的叫妇女研究协会（ ），国民党也搞

了几个妇女团体，叫^{女工夜校}，在工人方面，我們有两个俱乐部，一个在沪东，一个在小沙渡，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时常去演講。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在上海各学校里办「平民夜校」，我^{也办过两次}在一九二六年調查，上海有这种「平民夜校」三十六个，我們在平民夜校里，发展党员，向工人宣傳，一九二五年二月罢工，就是从平民^{夜校中}开始。顧正紅死后，开追悼会，搭了六个台，都是工人自己办

去演講。 ~~而且~~ 工人力量很壯大。零件更^多時^常為3個較
工人和五三，他^們能^力在^上方^面請^示代表^們通過^一個^新的^期。

五四时，瞿秋白到上海活动事，郑振铎曾经告诉过我。那时，瞿秋白时常和李大钊同志来往，参加开会，开什么会则不知道。他到莫斯科去，是否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他去的，不清楚，但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去莫斯科的目的是很明显的。瞿秋白的堂哥^王是个反动政府里^的外交官，他从苏联回国后，他的堂哥^王就给他找了一个反动外交官^的职位，瞿秋白非常气愤，便跑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先是¹⁹³⁴编辑青年，后中央派他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办上海大学。一九二五年双十节，国民党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殴打我党人员，瞿秋白从此不能公开进行工作，不久，上大被封。杨述又从英京而所改到¹⁹³⁴中用他界间此去了。但秋白因此之上大指寻志国的¹⁹³⁴仇。

中共莫斯科支部：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莫斯科学习，成立支部，据我所知道，一九二二年已有莫斯科支部，瞿秋白在一九二二年时曾任支部助理教授。王若飞、任弼时等同志都是莫斯科支部早期的成员，一九二三年时，支部里有六十多人。详细情形可向萧三同

志了解。我是一九二八年才去莫斯科的。

建黨時期女學生的遭遇和“平民女學”

丁玲



丁玲 (1904-1986)，原名蔣偉，字冰之，別名蔣瑋，丁冰之。湖南臨澧人。五四運動時在桃源第二女子師範讀書，參加當地學生運動。1922 年初到上海，進陳獨秀、李達等共產黨人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後經瞿秋白介紹入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習。1924 年，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1928 年 2 月發表她的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1930 年 5 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 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1932 年 3 月在上海加

入中國共產黨。1933 年 5 月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在南京囚禁三年多。1936 年逃離南京到達陝北。歷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常務理事、《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務。1948 年完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51 年在蘇聯獲得史達林文藝獎金二等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丁玲先後擔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及常務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後改名為文學講習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人民文學》主

編等職務。1955 年她被錯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7 年被錯劃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 年遭受“再批判”，被開除黨籍，送往北大荒“勞動改造”。“文革”期間受迫害被關進京郊秦城監獄五年。1979 年平反，恢復黨籍，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6 年病逝於北京。

採訪記錄

（1956 年 7 月）

“五四”以前，長沙的知識界比較進步，但我所在的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則很落後。這個學校的校長和教員，多半是國會議員，教員也多是舊人物，但學生的出身則較貧苦。“五四”前，校中有一種定期講演會，在班中舉行，作為講話的訓練，沒有什麼內容。至“五四”時，這種講演會，因受《新青年》、《新潮》等的影響，以女子剪髮問題、女子經濟獨立問題、婚姻自由問題等等為內容。教員反對這種演講的內容，高班同學王劍虹就和教員展開爭論，逐條駁斥。我們低班的同學，也前去旁聽，支持王劍虹等的意見。此外王劍虹等還辦了一個民眾夜校，團結活動分子在裏面教書，我曾在裏面教珠算。

我們當時同學們逐漸喜歡談論國事，談起軍閥政府賣國的事就哭。“五四”那天，我們上街遊行，一路哭一路喊，非常激動，嗓子都喊啞了。我們還上街演講，回校後，有七、八十個同學自動剪髮。過幾天，又有數十人剪髮。我們全校一、二百人，在數天之內，就有半數以上剪了頭髮。在這件事上，我們第二女師好像倒是走在長沙各校的前面。

當時我們最苦悶的是出路問題。我們有的同學畢業後，被迫當了軍閥的姨太太。有的軍閥還到我們學校裏來，湖南湘西土匪軍閥大多到各小縣城小學校去“參觀”，看到長得漂亮些的女同學教員，就通知校長，說要她請做媒，實際是去當姨太太，連國會議員的校長都看不下去這種情況。有的較好的校長，就通知這些同學教員逃跑。而我們的同學，畢業後最好的也只能到哪些小學校去教書。大多數還不易找到職業，因那時小學校不發達，小學校一般是男教員多，有的地方還不用女教員。我們為包辦婚姻和女子經濟獨立等問題，時常熱烈的進行討論，因此，很容易接受這方面的新思想。譬如我自己，小時根據外祖父母的遺囑，把我許配給表哥。我和我的母親，都害怕我將來當他家的媳婦。母親希望我讀師範，畢業後當個小學教員，可以少在婆家待着。我自己呢，則希望表哥早點死。雖則，我對表哥本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感。“五四”運動來了，反對包辦婚姻，我覺得很合理。後來，我在母親的幫助下，解除了婚約。那個時候解除婚約是很不容易的事。

桃源女師學校當局是不會訂新雜誌、新報紙給我們看的。我們通過私人朋友，看到《新青年》等新書。那時候，得到一本新書好像得了寶貝，看過之後，立即轉寄給朋友，這樣做在當時已成為一種風氣。

“五四”後，母親送我到長沙上學，接受新思想。我進的是周南女校。學校管理員陶斯詠，當時思想很進步，對我很有些影響，我們的國文教師也較進步，他每天看上海、北京的報紙後，把好的文章加上紅圈，介紹給我們看。那時，我喜歡看白話文小說和新詩，也寫過一些白話詩，記得當時《湘江日報》的付（副）刊，是周南的教員主編的，他們還叫我從作文簿上抄了兩篇白話詩去發表。

我們在當時周南時的同學們，雖則年齡很小，一般在 13~17、18

歲，但記得那時大家很少想個人問題，或者談一些個人幻想，想成什麼專家；而喜歡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這大概是在“五四”運動潮流衝擊下的一種風氣，很有些氣魄。我們周南女校也參加過毛主席領導的驅逐趙恒惕運動。

長沙第一師範是湖南革命運動的領導者，而一師的進步力量，是由毛主席領導的。那時我不認識毛主席，但聽人說：毛潤之是個怪人，意思是個傑出的人。因為我們的國文教師和陶斯詠都是佩服毛主席的，也都認識毛主席。

周南女校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時，曾經有一批先進的學生出國，如蔡大姐等，但後來這個學校出來的學生，參加革命的也不多有一些但不夠多，大概與這個學校是私立中學，費用大，學生出身一般還是比較富裕有關。

周南的校長朱劍凡是個有名的進步的教育家，但有一個時期，大概是受反動勢力的壓迫，在學校裏搞復古停止進步宣傳，解聘進步教員，我為此不滿，跟着一批同學離開了周南。和我同時一道離開周南的，有十多七、八個人，在船山學社地址辦了一個暑期補習班。一師派人來給我們補習功課。毛主席也去過一次。我因事不在，沒有見到。

過了暑假，我們考進岳雲中學。這個學校政治空氣不濃厚，我們不滿意這個學校啃死書，缺乏新鮮空氣。讀了一個學期，也都離開了。

我們離開岳雲，一部分人進了毛主席辦的“自修大學”，其中有的人後來就在那裏入黨了，如楊開慧等。我和王劍虹等六個人則到上海，進“平民女學”。

我們進“平民女學”的情形是這樣的：先是王劍虹到上海，認識見到了陳獨秀、李達、王會悟等人，知道有一個“平民女學”，就回來鼓動我們去上海。那時我們知道陳獨秀、李達都是新人物，是搞社會革

命的。我們也想望社會革命，雖則還不懂得怎樣去革命。我們在去上海前，受到了不少的阻撓。因為“平民女學”和普通學校不同，沒有文憑，將來職業有問題。加上“平民女學”的“平民”兩個字，也很刺目。到上海這個地方去，也成為親戚們反對的理由。那時，教員和親戚們，以為我要進“平民女學”是件很荒唐的事，出來反對。我的母親支持了我的願望。我們於 1922 年春進了“平民女學”。

“平民女學”約從 1921 年十月開辦，1923 年春結束。名義上是陳獨秀負責，實際工作由李達擔任。大概是想通過這學校培養一批女的馬克思主義者。全校分兩班：高級班，相當中學程度，我們湖南去的六個人就在這一班；初級班人數較多，多半是江浙人，文化程度相當小學畢業。這些學生都是思想比較進步，或由進步的親友送她們來此上學的。

給我們上課的教員是盡義務的，陳獨秀給我們講了幾次，高語罕是國語教員，茅盾教英文，陳望道、邵力子也都教過我們。記得我們還上過二次數學課，因不感興趣，也就不繼續上了。我們沒有正規課程，有時好幾天不上課，有時晚上已經就寢，又通知我們起來上課。“平民女學”當時也算是我們黨的一個小小的據點，有人來，就到女學來宣傳。如劉少奇同志從蘇聯回來，給我們上了三次俄文。其他從蘇聯回來的同志，也給我們講課。我們除上課外，還有工作：工人罷工的時候，叫我們到工人中去宣傳，鼓勵他們團結起來，堅持到底。記得有一次浦東紗廠罷工規模較大，女工多，我們去了，但我們說的是湖南話，工人聽不懂。但他們覺得女學生去支援她們，還是有些鼓勵不起什麼作用。此外，我們還帶着竹筒上街募捐支援罷工，那時支援工運的人很少，人家說我們是“革命黨”，我們對這種工作很感興趣。

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那時很會做群眾工作，穿起工人服到工人中

宣傳很有效。她還在 1920（或 1921）- 1922 年間，辦過《婦女聲》小報。王劍虹在上面發表過文章，楊之華、向警予可能也都發表過文章，談婦女問題。王會悟不是共產黨員，但因李達的關係，有時也參加黨的一些會議，她也是“平民女學”的學生。

在女學裏，曾經有兩個同學信仰無政府主義，李達時常批評她們，她們中途就走了。

女學沒有正規的課程，學習比較鬆懈，有的同學因此中途離開。高級班原來有十餘人，後來只剩下我們湖南來的六個人。這六個人中，後來有的去北京，有的考上上海公學，有的談戀愛，只剩下我和王劍虹兩個人。我們二人只得也主張自己自修。1922 年下半年，我們也就不去了。1923 年，李達去湖南自修大學，“平民女學”就關門了。

那時候，我們過的生活是很刻苦的。譬如穿衣服，我們連兩毛錢一尺的布，都捨不得買，只買一毛錢一尺的布。我們坐電車，從來就是坐三等拖車，吃的是清湯掛麵，我們有錢就買書。

我們湖南去的六個人，過的“共產”生活，家裏帶了錢來，大家用。另外還有一些同學，因經濟困難，用半工半讀的辦法，學校裏請了一位裁縫，教她們縫紉。在高級班的時候，施存統和蔡和森曾叫我們參加青年團。我們對青年團瞭解很少，對馬克思主義也不懂得，只有空洞的社會革命思想，又因有些烏托邦思想，覺得不參加組織更自由些，故沒有參加。

那時候，北大有幾個學生，向我和王劍虹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們是些純潔的青年，給我們的印象很好。我們本來就好幻想，故容易接受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不久，我的一個湖南同學介紹我參加無政府黨，我又拉王劍虹參加。參加時沒有任何手續，參加後，開了幾次會：一次是什麼“自由大同黨”開會，通知我們去參加。另一次會約有

二、三十人參加，談談暗殺。還說無政府黨人以戒指上留一個窟窿為標誌。又有一次，在一個相當考究的廳堂裏，很多人聽黃凌霜作報告。黃剛從外國回來，這次會有茶點、有冰淇淋。他們的經費不知從何處來。此外，朝鮮在上海成立的“臨時政府”，他們的“總統”死了，無政府黨通知我和王劍虹跟他們去參加出殯儀式。無政府黨還發給我們一些秘密文件，主要是反對共產黨的，有的用問答的方式，區別無政府黨和共產黨，說共產黨如何如何不好。他們的宣傳品，不外乎三種內容，除反對共產黨外，還宣傳“新村”計劃，和介紹克魯泡特金及其作品等。他們奉師復為無政府黨的祖宗。在他們的宣傳品和集會中，從來不講反帝反封建的事，也不參加罷工運動，只講反對共產黨。這個事實，引起我的懷疑。我過去看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書，看過小說《自由魂》，以為無政府主義也是搞社會革命的。共產黨內的一些同志，我都很熟悉，他們都是認真做革命工作的。現在無政府黨為什麼要反對共產黨呢？同時，參加無政府黨集會的人很複雜，多數是中年人，青年不多，看樣子和軍閥、官僚有勾結，其中也有失業軍人。他們弄些戒指為標記等鬼鬼祟祟的事，更加引起我的疑惑。有一次，我們在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的醫生家裏，聽他們談山東搶案臨城事件，我懷疑他們和這次搶案事件有關。上述情況，使年輕的王劍虹和我很害怕討厭他們，我們意識到無政府黨是個反動的組織，於是堅決不再參加他們的會，以後也就脫離了關係。

那時，無政府黨的負責人大概是黃凌霜，張鐵弦也是比較負責的。

我和王劍虹二人離開平民女學後，思想上很苦悶。後來我們跑到南京，住在學生公寓，整天逛名勝古跡。我倆沒有姓，不穿裙子，不投考學校。人家看我們很怪，要趕我們出去。正在這種遭遇下，我們又來回碰了一些釘子，正在走投無路時，1923年夏天，瞿秋白、施存

統、柯慶施等同志到南京開會，來看我們。瞿秋白同志還向我們談蘇聯的情況，談上海大學的情況。於是，我們又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主要是社會學系，瞿秋白、鄧中夏等同志都是這個系的教員，王明、博古是這系的學生。這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不認識。他們有許多活動，我因不在此系，不清楚。

我和王劍虹入了中國文學系，教員有邵力子（教《易經》）、沈雁冰（講歐洲文學、現代文學概論）、田漢（教詩）、俞平伯（教詞）、陳望道（修辭學）。上課的情形與平民女學相似，不過略有進步。此外，上大有政治學系，學校裏簡直不大理這個系，系主任是一個國民黨員。因為名義上是個大學，不能不多設立幾個系而已，好像是原來的南方大學就有了的。

我在上海大學待了些時候，覺得教員時常缺課，學不到什麼東西。又中途離開上大，到北京，想考北大。又補習了一個時期，但估計考不取，於是就過自由學習生活，有時也去一面做工一面在北大偷聽幾次文學課。

*

*

*

我的母親蔣勝眉（號慕唐），辛亥時和向警予同學，她們同學中有九人，結為九姊妹。我的母親為老大，向警予為老九。她們結姊妹的目的，為團結一起，從事社會活動。

母親這一輩，為爭取入學，都是很困難的。那時候，婦女上學都得坐轎子。她們從學校裏畢業後，向警予在湘西辦學校，我的母親在常德辦學校。向警予（“五四”前）時常到長沙去，在長沙接觸一些新

事物、新思想後，回湘西時，經過常德，便由我母親通知在常德的老同學，集合起來聽向警予介紹長沙的情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的母親很注意時事，向學生宣傳反對戰爭的言論。“五四”時，她也上街演講，講到傷心處，時常落淚。她從來沒有為個人小事流過淚。她在辦學期間，非常關心學生，尤其是女學生，有幾天不來上課，就到她家去訪問，擔心女學生受家庭阻撓不能讀書。

我的母親除辦學校外，還在地方上辦過婦女會，團結一些上層分子。如馮玉祥軍隊裏的軍官的太太，請她們出錢辦學，也辦過一個婦女學校。“五四”時，聽說北京有個工讀互助團，我的母親也辦了一個。實際上是個半工半讀的學校，接收家庭清寒的學生入學。這個學校，在大革命後被封。

我的母親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比我要早，有些關於意識形態的書，她很早就讀過了。

大革命前，常德有青年團組織，母親擔任婦女部長。但她未參加共產黨或青年團。因此，到底是什麼婦女部長，詳細情形，我就不清楚了。

(記錄經丁玲修改)

五四以前，长沙的知識界比較进步，但我所在的桃源第二师范，則很落后。这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員，多半是国會議員，但学生的^{生活}則較貧苦。五四前，校中有一种定期講演^會，在班中举行，作为講話的訓練，没有什么內容，至五四时，这种講演會，因受「新青年」、^{五四}「新潮」等的影响，以女子剪发問題，女子經濟独立問題，婚姻自由問題等^等为內容。教員反对这种演講的內容，高班同学王劍虹等就和教員展开爭論，逐条駁斥，我們低班的学生，也前去旁听，支持王劍虹等的意見。此外王劍虹等还办了一个民众夜校，团結活动分子在里面教书，我曾在里面教珠算。

我們当时^{十分}喜欢談論国事，談起軍閥政府卖国的事就哭。五四那天，我們上街遊行，一路哭一路喊，非常激动，嗓子都喊哑了。我們还上街演講，同校后，有七、八十个同学自动剪发，过几天，又有数十人剪发。我們全校一、二百人，在数天之內，就有半数以上剪了头发，在这件事上，^{第二师范打头阵}我們是走在长沙各校的前面。

当时我們最苦悶的是出路問題。我們有的同学畢業后，被迫当了軍閥的姨太太。有的軍閥还到我們校里来^{參觀}，看到长的漂亮些的女同学，就通知校长，^{請他請安送}需要她当姨太太，連国會議員的校长都看不下^去这种情况，有^{教員}較好的校长，就通知这些同学逃跑，我們为包办婚姻和女子經濟独立等問題，时常热烈的进行討論，因此，很容易接受这方面的新思想。譬如我自己，^少时根据外祖父的遺囑，把我許配給表哥，我和我的母亲，都害怕我将来当他家的媳妇，母亲希望我讀师范，畢業后当个小学教員，可以少在婆家待着。我自己呢，則希望表

教員也少1/10人形

女子

湖南湖南
西工部局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
湖南湖南一解一易易
易易
易易
易易

哥早点死，虽則，我对表哥本人並沒有什么特别的反感。五四运动来了，反对包办婚姻，我觉得很合理。后来，我在母亲的帮助下，解除了婚約。那个时候解除婚約是很不容易的事。

桃源女师学校当局是不会訂新杂志、新报纸給我們看的。我們通过私人朋友，看到「新青年」等新书，那时候，得到一本新书好象得了宝贝，看过之后，立即轉寄給朋友，这样做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

五四后，母亲送我到长沙上学，接受新思想。我进的是周南女校。学校管理^很陶斯詠，当时思想进步，对我很有些影响，我們的国文教师也較进步，他每天看上海、北京的报纸后，把好的文章加上紅圈，介紹給我們看。~~那时，我喜欢看白話文小說，和新詩，也写过一些白話詩，記得当时湘江日报的付刊，是周南的教員主編的，他們还叫我~~
~~在作文簿上抄了兩篇白話詩去发表。~~

^{当时}我們在周南时，^{的18岁}虽則年齡很小，一般在18—17岁，^{18/19/20岁}很少想个人問題，而喜欢談政治問題、社会問題。这大概是在五四运动潮流冲击下的一种风气，很有些气魄。^{周南}我們女校也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驅逐赵恒惕运动。

长沙第一师范是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而一师的进步力量，是由毛主席领导的。那时我不認識毛主席，但听人说：毛潤之是个怪人。^{周南}周南女校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曾經有一批先进的学生出国，如蔡大姐等，但后来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参加革命的^{第一，但不多}也不多，大概与这个学校費用大，学生出身一般比較富裕有关。

周南的校长朱劍凡是个有名的进步的教育家，但有一个时期，大

86年一批的
概是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在学校里^{像她这样}搞复古，解聘进步教员，我为此不满，离开了周南。^{七、八}和我同时离开周南的，有^{七八个}十多人，在船山学社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一师派人来给我们补习功课，毛主席也去过一次。^{我因事不能去，有欠制。}

过了暑假，我们考进嶽云中学，这个学校政治空气不浓厚，我们不满意这个学校^啃死书，缺乏新鲜空气，读了一个学期，也都离开了。

我们离开嶽云，一部分人进了毛主席办的[自修大学]，其中有的人后来就在那里入党了，如^喜楊开慧。我和王劍虹等六个人则到上海进[平民女学]。

我们进[平民女学]的情形是这样的：先是王劍虹到上海，^{欠制/30}認識了陈独秀、李达等人，知道有一个[平民女学]，就回来鼓动我们去上海。那时我们知道陈独秀、李达等都是新人物，是搞社会革命的，我们也想望社会革命，虽则还不懂得怎样去革命。我们在去上海前，受到了不少的阻挠。因为[平民女学]和普通学校不同，没有文凭，将来职业有问题，加上[平民女学]的[平民]两个字，也很刺目，到上海这个地方去，也成为亲戚们反对的理由。那时，教员和亲戚们，以为我要进平民女学是件很荒唐的事，出来反对。我的母亲，支持了我的愿望。我们于1922年春进了[平民女学]。

[平民女学]约从1921年十月开办，1923年春结束。名义上是陈独秀负责，实际工作由李达担任。大概是想通过这所学校培养一批女的马克思主义者。全校分两班：高级班，相当中学程度，我们湖南去的六个人就在这一班；初级班人数较多，多半是江浙人，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毕业。这些学生都是思想比较进步，或由进步的亲友

送她們來此上學的。

給我們上課的教員是盡義務的，陳獨秀給我們講了几次，高語罕是國語教員，^{茅盾}教英文，陳望道、邵力子也都教過我們。記得我們還上過二次數學課，因不感興趣，也就不繼續上了。我們沒有正規課程，有時好几天不上課，有時晚上已經就寢，又通知我們起來上課。

〔平民女學〕當時也算是我們黨的一個小小的據點，有人來，就到女學來宣傳。如劉少奇同志從蘇聯回來，給我們上了三次俄文，其他從蘇聯回來的同志，也給我們講課。我們除上課外，還有工作：工人罷

記者
次補敘
麗新報
模範大
學
學生
們在

工的時候，叫我們到工人中去宣傳，鼓勵他們團結起來，堅持到底，^{但她們是女學生，對她們，也有時給力}但我們說的湖南話，工人听不懂，不起什麼作用；此外，我們還帶着竹筒上街募捐支援罷工，那時支援工運的人很少，人家說我們是〔革命黨〕，我們對這種工作很感興趣。

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那時很會做群眾工作，穿起工人服到工人中宣傳很有效。她還在1920（或1921）—1922年間，辦過〔婦女聲〕小報，王劍虹在上面發表過文章，楊之華、向警予可能也都發表過文章，談婦女問題。王會悟不是共產黨員，但因李達的關係，有時也參加黨的一些會議，她也是〔平民女學〕的學生。

在女學里，曾經有兩個同學，信仰無政府主義，李達時常批評她們，她們中途就走了。

女學沒有正規的課程，學習比較鬆懈，有的同學因此中途離開。高級班原來有十餘人，後來只剩下我們湖南來的六個人，這六個人中，後來有的去北京，有的考上上海公學，有的談戀愛，只剩下我和王

劍虹兩個人。我們二人也自己自修。^{也這了}1923年，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學，^{1922年下半年，我們也決不去了}平民女學就關門了。

那時候，我們過的生活是很刻苦的，譬如穿衣服，我們連兩毛錢一尺的布，都舍不得買，只買一毛錢一尺的布，我們坐電車，從來就是坐三等拖車，吃的是清湯掛面。我們有錢就買書。

我們湖南去的六個人，過的「共產」生活，家里帶了錢來，大家用。另外還有一些同學，因經濟困難，用半工半讀的辦法，學校里請了一位裁縫，教她們縫紉。

在高級班的時候，施存統和蔡和森曾叫我們參加青年團，我們^{對青年團了解很少，對李兄早以（也不信也，只有空口說白話）}國有烏托邦思想，覺得不參加組織更自由些，故沒有參加。_{（4）}

那時候，北大有幾個學生，向我和王劍虹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們是些純潔的青年，給我們的印象很好，我們本來就好幻想，故容易接受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不久，我的一個湖南同學介紹我參加無政府黨，我又拉王劍虹參加。參加時沒有任何手續，參加後，開了几次會：一次是什麼「自由大同黨」開會，通知我們去參加。另一次會約有二、三十人參加，談々暗杀。還說無政府黨人以戒指上留一個窟窿為標誌。又有一次，在一個相當考究的廳堂里，很多人听黃凌霜作報告，黃剛從外國回來，這次會還有茶點、有冰淇淋。他們的經費不知從何處來。此外，朝鮮在上海成立的「臨時政府」，他們的「總統」死了，無政府黨通知我和王劍虹跟他們去參加出殯儀式。無政府黨還發給我們一些秘密文件，主要是反對共產黨的，有的用問答的方式，區別無政府黨和共產黨，說共產黨如何如何不好。他們的宣傳品，不外

乎三種內容，除反對共產黨外，還宣傳「新村」計劃，和介紹克魯泡特金及其作品等。他們奉師復為無政府黨的祖宗。在他們的宣傳品和集會中，從來不講反帝反封建的事，也不參加罷工運動，只講反對共產黨，這個事實，引起我的懷疑。我過去看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書，看過小說自由魂，以為無政府主義也是搞社會革命的，共產黨內的一些同志，我都很熟悉，他們都是認真做革命工作的。現在無政府黨為什麼要反對共產黨呢？同時，參加無政府黨集會的人很複雜，多數是中年人，青年不多，看樣子和軍閥、官僚有勾結，其中也有失業軍人。他們弄些戒指為標記等鬼々祟々的事，更加引起疑惑，有一次，我們在一个相信無政府主義的醫生家里，聽他們談山東搶案^{我的}事，我懷疑他們和這次搶案^{8月14日}有關。上述情況，使年輕的王劍虹和我很害怕，我們意識到無政府黨是個反動的組織，於是堅決不再參加他們的會，以後也就脫離了關係。

那時，無政府黨的負責人大概是黃凌霜，張鈇弦也是比較負責的。

我和王劍虹二人離開平民女學後，思想上很苦悶。後來我們跑到南京，住在學生公寓，整天逛名勝古跡，我倆沒有姓，不穿裙子，不投考學校，人家看我們很怪，要趕我們出去。正在這種遭遇下，瞿秋白、施存統、柯慶施等同志到南京開會，來看我們，瞿秋白同志還向我們談蘇聯的情況，談上海大學的情況。於是，我們又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主要是社會學系，瞿秋白、鄧中夏等同志都是這個系的教員，王明、博古是這系的学生。他們有許多活動，我因不在此系，

（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不知道）

不清楚。

我和王劍虹入了中国文学系，教員有邵力子（教易經）、沈雁冰（講歐洲文学、現代文学概論）田汉（教詩）、俞平伯（教詞）、陈望道（修辭学）、上課的情形与平民女学相似，不过略有进步。此外，上大有政治学系，学校里简直不大理 这个系，系主任是一个国民党員。因为名义上是所大学，不能不多設立几个系。（而已）

我在上海大学待了些时候，觉得教员时常缺课，学不到什么东西，北大又补习了一个时期，但估计考不上，又中途离开上大，到北京，一面做工一面在北大偷听听课。

我的母亲蔣胜眉（号慕唐），辛亥时，和向警予同学，她们同有学九人，結为九姊妹，我的母亲为老大，向警予为老九。她们結姊妹的目的，为团结一起，从事社会活动。

母亲这一輩，为争取入学，都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妇女上学都得坐轿子。她们从学校里毕业后，向警予在湘西办学校，我的母亲在常德办学校。向警予（五四前）时常到长沙去，在长沙接触一些新事物，新思想后，回湘西时，经过常德，便由我母亲通知在常德的老同学，集合起来听向警予介绍长沙的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的母亲很注意时事，向学生宣傳反对战争的言論。五四时，她也上街演講，講到伤心处，时常落淚。——她从来沒有为个人小事流过眼淚。她在办学期間，非常关心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有几天不来上課，她就到她家去訪問，担心女学生受庭家阻撓。

我的母亲除办学校外，还在地方上办过妇女会，团結一些上层分子，如馮玉祥军队里的軍官的太太，請她們出錢办学。也办过一个妇女学校。五四时，听说北京有个工讀互助团，我的母亲也办了一个，实际上是个半工半讀的学校，接收家庭清寒的学生入学。这个学校，在大革命后被封。

我的母亲接触馬克思主义思想比我要早，有些关于意識形态的书，她很早就讀过了。

大革命前，常德有青年团組織，母亲担任妇女部长。但她未参加共产党或青年团。

（詳細情形，我必可查得）。
（因以新底气什应掃出市外）

——以上經丁玲同志修改
珠梅詢問、记录

17 歲少女投身革命的故事

王一知

王一知 (1902 - 1991)，女，湖南省蒼江縣人。14 歲衝破封建家庭的樊籠，隻身赴湖南桃源縣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就讀。1919 年在“五四”運動鼓舞下，投身革命洪流，年僅 17 歲。1921 年師範畢業後，在向警予創辦的淑浦小學任教。1922 年到上海平民女校半工半讀班學習，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5 年，王一知同張太雷在廣州一起工作，共同的信念在對敵鬥爭中萌發真摯的愛情，結婚不久，張太雷同志在廣州起義中英勇犧牲。之後王一知在反革命的腥風血雨之中，繼續堅持革命鬥爭。1937 年，黨委派王一知與龔飲冰從延安來到上海搞地下工作。1949 年上海解放不久，王一知奉命接管吳淞中學，任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在吳淞中學複課、培養人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她鼓勵下，吳淞中學有數以百計的學子投筆從戎，走上革命道路。1950 年後，先後任北京京華中學、101 中學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文革”中深受迫害。1991 年病逝。

採訪記錄

(1956 年 10 月)

“五四”前不久，社會風氣稍開，女子也可以入學了，但她們進學校，並不是都很順利的，有的固然是經家庭同意去的，有的則是經過奮鬥，從家裏逃出來的。我的父親不同意我升學，我於 14 歲那年，逃出家庭，進湖南桃源女子第二師範。

1918 年至 1919 年“五四”前我們在校裏，接觸到一些新思想，開始時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書。後來看了《新青年》、《新潮》等書刊，思想漸漸進步，要求女子獨立，反對男尊女卑的現象。那時，我們不滿現狀，愛國思想很濃厚，看見報紙上有喪權辱國的事，痛哭流涕。在校裏，我有幾個朋友時常在一起，談論起國事就慷慨激昂。

在 1918 年下半年，我們學校裏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幾個想升學的同學，自己請一位教教育的教員補習英文，引起本來教英文的教員的不高興，這個英文教員，是校長的弟弟，因此，校長就向我們大發脾氣，我們認為校長無理，和他大鬧起來。校長為此辭職，為我們補習英文的先生也辭了職。別的同學開始時有的不同情我們。校長要開除我，我聲言校長若開除我，我就打校長。我們又向同學宣傳，認為校長太壓迫我們了，我們應該起來反抗，於是就罷起課來。這次學潮的結果，我們同學沒有被開除，校長仍舊回校，只是那位補習英文的教員辭職走了。

在“五四”前後，我還寫了一篇以《非孝》為題的作文，說明父子之間應該以感情為基礎，反對“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無理壓制，這是一種反對宗法，反對舊禮教的行動，校長為此很生氣，也曾想開除我。

“五四”運動爆發後，我們很快就響應了。我們學校在當地領導遊行，遊行時高呼“收回青島”、“打倒賣國賊”等口號，邊哭邊喊，真是對國家充滿着熱愛！我們還組織十人團，縮衣節食，捐獻救國；要求

商人罷市，到店鋪裏檢查日貨，勸商人不買日貨，邊勸邊哭，有的商人為我們所感動。“五四”對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影響是很大的，在桃源那樣的地方都如此，北京、天津的情況就更激烈了。

“五四”後，我們寫文章說明留着長頭髮沒有用，好多同學剪了頭髮（剪得象現在男人西裝短髮的樣子），剪短髮在現在看起來是件小事，在當時則是經過鬥爭的。社會上和學校當局都反對，說我們象個尼姑，有的家長找到校裏來哭哭鬧鬧，校長怕社會上責備，也氣得哭了。當時女子剪短髮，的確是件受人注目的事，直到 1922 年我們在上海，上街時還有許多小孩跟着看。社會上的老朽罵我們是妖怪，說什麼“天之將亡，必出妖孽”。

當時，我們對社會不滿，憤慨種田的、做工的反而沒有飯吃、沒有衣穿，不滿於女人被男人壓迫的情況。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如何改革社會，如何使國家富強，我們還沒有接觸到革命的思想。我們只有：“好好讀書，為國做事”的志向。覺得《新青年》和《新潮》說得很對，響應做白話文。

當時我們校裏的同學，思想激進的只有十多人，我們鬧罷課、鬧剪髮，別的同学跟着來。在同學和教員中，有保守思想、封建思想的還是不少。

1921 年夏，我畢業於桃源二師，本來準備回家看一看就到北京去升學的，不料在回家途中，衣物鋪蓋都被強盜搶走了，父親不給錢讓我上學，只得找職業。我在向警予同志辦的淑浦縣立完全小學教書，這是個男女同校的小學，男女同校在當時也是件新奇突出的事。我去淑浦小學時，向警予同志剛離開這個學校去法國。我負責的那班，有 11 個學生，其中 10 個女生，一個男生，這個男生非常頑皮，有一次對一個女同學作無聊的動作，這事轟動了社會和全校，甚至發生男女

同校是否合適的問題，發生學校是否繼續辦下去的問題。

我在淑浦半年中，初次看到了共產黨的宣傳品，這是當地一個在北京朝陽大學讀書的學生帶回來的。淑浦是個閉塞的小地方，但在 1921 年下半年就有了黨的宣傳活動，可見當時黨的宣傳工作已相當深入了。這些宣傳品（小冊子）多半是翻譯的，介紹蘇聯的文章，記得其中有一本是《無產者》。我好好地讀了這些小冊子，有不懂的地方，就找這位朝陽大學的學生談談，從此，我對共產主義有了一些認識，但信仰還未肯定。這位朝陽大學的學生除介紹我們看書以外，還公開向我們小學教員宣傳共產主義的道理，（當時統治者還沒有意識到共產主義對他們自己的威脅，所以宣傳共產主義比較自由。記得在馬日事變以前，我們舉行馬克思恩格斯紀念會時，有的軍閥也參加了）。他還說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到俄國去。我們很嚮往俄國，有的教員想到俄國去，帶有“出洋”思想，我則認為：信仰一個主義，是因為這個主義好，而不應該為了出洋。

我在淑浦當了半年教員，每月拿 12 塊錢薪水，除去伙食費 3 塊錢外，剩下的錢，置了一些衣物鋪蓋，得有可能繼續升學。1921 年下半年，朋友王劍虹從上海回來，說上海有“平民女學”，中學畢業想升學的可以去，不收學費，半工半讀，我覺得很好，於 1922 年春去上海，同去的有王劍虹、丁玲等六個人，都是原來桃源女師的學生。

“平民女學”的教員有高語罕（教文學）、陳望道（教美學），此外有沈雁冰、邵力子等，陳獨秀和劉少奇同志也給我們作過演講。我們的學習是很不正規的，除高語罕的文學課外，其餘都是臨時性的演講，主要依靠自學，我們讀《共產主義 ABC》、《兩個策略》等書後，組織討論，少奇同志幫助我們學習，我們有問題就問他。

“平民女學”裏，有兩班工讀的，一班縫紉、一班織襪子，我參加

了縫紉班，有一位裁縫教我們，我做第一件衣服時，因為布很厚，不好縫，做了拆、拆了做，好容易做上了，拿了四毛錢工錢。縫紉班選我管賬，我把班裏的錢管丟了，王劍虹等幫我賠了錢，勸我不要工讀，和她們一起吃、住，從此我退出工讀。和我一起從湖南來的六個同學，只有我沒有家庭經濟上的接濟，其餘五人家裏每月大概給寄來 20 元。

1922 年上海絲廠、紗廠工人罷工，劉少奇同志剛從蘇聯東方大學回國，回國後在上海和湖南的醴陵、萍鄉一帶搞工人運動。他換上工人服，參加上海的工人罷工委員會，領導工運。我們平民女學的學生，也跟着去做支援罷工的工作。我們因為講的湖南話，上海工人聽不懂，所以很少去演講，主要是做下面一些工作：我們打着旗子，上面寫着“支援浦東罷工”數字，手裏抱着竹筒，在馬路上、在“新世界”、“大世界”的門口募捐，這樣做不僅有經濟意義，而且有政治意義。有的人看我們是青年學生，慷慨的給兩毛錢，有的人簡直不理我們，我們很生氣，罵他們。和我們一起做募捐工作的，還有別的學校的學生，人數不多。巡捕捉拿我們，如被捕，要被拘留半天。記得有一次我正在募捐，一個小孩告訴我，巡捕來了，我趕快跳上電車跑了。我們把各地支援罷工的款子，和募捐所得，發給工人，每人發兩角、四角，解決生活問題。此外，我們經常散發傳單和貼標語支援罷工。

大概是 1922 年的下半年，陳獨秀被捕，審判那天，我們發動許多同志、同學去聽審，把旁聽席都坐滿了，審判完了，我們一齊離開旁聽席，向敵人示威，使他們感到陳獨秀是有許多群眾的，這是我黨和英法帝國主義作鬥爭的一種方式。

平民女學是黨有意辦起來，一面培養進步的女青年，一面把這裏當作活動的據點，我們和黨內同志接觸很多，如柯慶施、劉少奇、張太雷等同志時常來校，沈雁冰、邵力子、陳望道當時都是黨員。平民

女學後來擴大為上海大學。

我們從湖南去的六個人，在進平民女學的頭一個半年裏，注意研究共產主義的書，想望共產黨。後來丁玲和王劍虹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在我們朋友中間就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她們認為共產黨搞政治，庸俗，而他們是不要政府的，是高尚的。我們一談到這些問題，就吵起來，很不愉快，甚至傷了感情。我不知道她們是否正式參加過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只知道她們相信無政府主義。

平民女學的校址在漁陽里法國公園後面，弄堂房子，二樓二底，李達住在學校對門，一樓一底，黨內有什麼會，就在李達家裏開。

我於 1922 年下半年入黨，入黨前參加過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黨和團的組織生活內容差不多，主要是討論工作，沒有象現在這樣思想檢討的內容。

(記錄未經王一知審閱)

黨成立時期的工農運動

徐行之



徐行之 (1893 - 1997)，又名徐梅坤。浙江蕭山人。1920 年在浙江印刷公司當印刷工人，組織“浙江印刷工人俱樂部”，出版《曲江工潮》。1920 年底，在家鄉蕭山組織“農民協會”，發動減租運動。1921 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工作，同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 年初經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 5 月，當選為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後任委員長，全面負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黨的工作。6、7 月，在杭州建立黨的組織，成立杭州黨小組，兼任組長。8 月，在紹興開展黨的活動和建黨工作。1923 年 6 月赴廣州出席中共“三大”，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25 年 8 月當選為上海印刷總工會委員長，兼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工農部部長。歷任上海總工會執行委員、組織部部長、副委員長。1927 年參與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受命去浙東等地負責整頓黨的組織。8 月返杭途徑蕭山時被捕，在監禁的 8 年中同黨失去組織關係而脫黨。1935 年 9 月因重病被保釋出獄。此後繼續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政務院監察委員會參事、國務院監察部參事和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981 年 6 月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恢復黨籍。1997 年逝世。

訪問記錄

(1957 年 3 月)

浙江蕭山縣貧苦農民的生活和其他各地農民一樣。我們家鄉在錢塘江沿岸，離蕭山城北八華里，鄉里有一條海塘，塘內是黑土泥，收穫量較低，塘外是沙土泥，多種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人多地少，生產力很低，一般農民很苦。每畝只能收 400 - 500 斤穀子，100 斤籽棉（最好的不過 150 斤，差的只有幾十斤）。大地主都住在縣城裏，地租率很高，農民收穫的 80% 給地主收了去，農民還不上租時，就被送進縣城關起來，直至還了租才放出來，所以每年還租時節（冬至前後），是農民最驚慌的時候，無論男女老少都很害怕。地主收租時坐一隻大船，帶來幾十個幫兇。有些農民把穀子吃掉了，地主就要他將租谷折錢送去。錢那裏來呢？有的農民搞一個“邀（搖）會”，大家湊錢幫助他還租，他的欠債再逐年逐戶償還，利息很高，這些農民勢必長期負債，這是最好的一種情況；有的農民的老婆給地主免費作 5 年或 10 年保姆，藉以代替還租，但這種機會也是很少的；一般的租錢的來源是賣兒賣女。每逢荒年，地主照樣要農民還那麼多的租，農村裏賣兒女的慘劇就更多了。

我父親是個雇工，種一畝多地，他終年勞動，到了冬天，收得四、五百斤穀子。我和弟弟們看見家裏有這麼多穀子，很高興，但是過了

幾天，穀子全給地主拿走了。

記得我七、八歲時，父親病了，請中醫看，化了一塊錢的藥費，家裏沒有錢，向一個富裕中農的親戚同族叔公借。為了借錢，我跑了七次這個親戚家，最後好不容易借到了一塊錢，但還時每月要給二毛錢的利息。這些遭遇使我從小就恨有錢的人、恨地主。

有一次，我們家裏把穀吃了，地主催租，父親沒法，打算把一個 10 來歲的弟弟賣了（賣 10 塊錢），因母親堅決不同意，向舅家借了 10 塊錢，弟弟才免于出賣。

我親眼看見過不少農民賣兒賣女的淒慘情況，心裏非常非常憤怒！

我從 10 歲開始做學徒，給老闆做飯、打水、擦油燈等，受種種剝削、欺凌。因為無法忍受老闆的虐待，換了三次師傅。對於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憤憤不平。辛亥革命時，我剛學徒滿師，覺得鬧革命是出路，幫助革命軍做事，運子彈。辛亥以後，我常常因打抱不平，同人打架，因此，經常被捕。漸漸地，我發生了懷疑，社會這樣黑暗下去怎麼好呢？我個人這樣下去又怎麼辦呢？

“五四”後（1919 年下半年），我看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主張毀工廠、殺廠長，覺得很痛快。我恨透了剝削者、壓迫者，凡是反抗他們的事，我都想幹。但我不知道怎樣去反抗，現在看了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所以很快就接受了。在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書譯成中文的還很少。直至 1922 年時，只有《階級鬥爭》和李達譯的《唯物史觀》等書，我識字不多，很難讀懂這些書。而無政府主義的書，則簡單淺近，這也是它容易被接受的原因。

1920 年，我在浙江印刷公司當印刷工人，組織“浙江印刷工人俱

樂部”，這時，我的思想已從無政府主義轉為工團主義。組織俱樂部的動機很簡單，因為杭州的瓦匠、木匠有魯班會的組織，成衣工有軒轅會組織，“五四”運動時，他們的頭目一邀班請大家都參加遊行，很整齊，而我們印刷工人，雖則有文化水平，但沒有組織，參加遊行零零落落。因此，我們覺得應該組織起來，使行動整齊些。俱樂部組織起來以後，做了下面幾樣工作：（1）請人教書，學文化；（2）出版《曲江工潮》，共出了 20 多期，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工人自己辦的刊物了。編輯是請一個浙江第一師範學生陳樂我擔任的，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直至 1927 年還相信無政府主義）。刊物的文章多半是工人自己寫的，不夠時由陳樂我寫些湊數。刊物的內容很雜，有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有宣傳學文化的，有的主張工人組織起來，同資本家鬥爭有力量，也有提倡女權的文章。我們印刷工人出刊物比較容易，只要買幾張紙，用業餘時間自己印一下就行了。

此外，印刷工人俱樂部還領導過一次罷工，原因是經理的一個在廠裏當小工的親戚，無故打了一個學徒。俱樂部要求這個小工向學徒弟道歉，經理不理，我們又要求開除這個小工，廠方又不理，我們就罷起工來了。罷工堅持了約兩個月。浙江印刷公司本來承印浙江省《政府公報》和法學校、醫學校的講義，罷工後，這些印刷工作都由別的印刷廠承印了，印刷公司的大部分工人，也被介紹到別的印刷廠作工了，只留下少數工人堅持罷工，印刷公司也就關了門。

我在印刷公司工作時，曾去浙江省立貧民習藝工廠參觀，這裏有 200 多個藝徒，他們都是無家可歸的少年，年齡一般在 12 歲到 16 歲之間。他們的工作是：織襪、織毛巾、搖紗、用舊式印刷機印書、釘書等等。照規定，他們每天可以吃兩餐乾飯，一餐稀飯，夜工時加二個銅板點心錢，每月初一、十五下午不做工。但我去參觀時，這些規

定都沒有實踐，藝徒們每天只吃兩餐稀飯，餓得很瘦；夜班不加發銅板；初一、十五兩個半天也不讓休息。他們睡覺的地方，是一個圓臺，睡時頭朝外，腳朝裏，幾十個人擠在一起，情況是很悲慘的。另一方面，工廠的廠長剝削得很厲害，他每年從工廠裏起碼括到 1 萬塊錢到自己的腰包裏。他有兩隻狗，每天吃牛肉、吃飯，比工人的生活好得多。

我在參觀習藝工廠以後，就想設法改善藝徒們的生活。在印刷公司罷工失敗之後，我就改了名字，托人介紹進習藝工廠當藝徒。進廠以後，我先聯繫幾個年齡較大的藝徒，一起商量要求改善生活的事。因為我們的行動受到監視，白天沒法聚在一起，就在半夜裏偷偷起來商量。我們幾個人又分別每人聯繫幾個人，慢慢地把全體藝徒都聯繫起來了。藝徒們由於生活很苦，無家可歸，所以鬥爭很堅決，表示：如果罷工失敗，寧願去討飯。1920 年夏（我進習藝工廠三個月後），藝徒們罷起工來了，並到省議會去請願。我們提的口號是：我們不要象廠長的狗那樣好的生活，我們只要求吃飽。街上的人對我們這種要求，都表示很大的同情。我們所以向省議會請願，是因為貧民習藝工廠是經省議會通過，由省政府撥款辦的。當時，省議會同省政府之間有矛盾，我們利用這種矛盾進行鬥爭，結果獲得了勝利。請願後的第二天，我們的生活就改善了，原來幾項規定，也都一一實現了。

我們非常恨廠長，想暗殺他（準備殺死廠長後，自己去自首）。結果，只殺了廠長的狗，事情就被發覺了，政府因此通緝我。我在藝徒們的幫助下，搭人梯越牆逃走，回到家鄉蕭山。

我回到蕭山後，在鄉里給人家車水、耘田、治苗。在勞動的時候，同農民們談談，說明農民辛苦所得的東西，全叫地主拿走了。在 8、9

月間，組織起一個“農民協會”。起初想用“農會”的名義，因覺得不好聽，我跑到杭州一師找陳樂我商量，決定改稱“蕭山農民協會”。參加農民協會的，北鄉和東鄉共有十幾個村子。當時，組織農民協會只是認為“大家心齊就不怕了，不要緊了”，“我們人多，牢裏關不了這麼多人”。我們有了組織，聲言減租四折，即交租 40%（原來地主收 80%）。地主很害怕，誰也不敢第一個下鄉收租。後來，有一姓高的地主（曾在江西九江當過監察官，他父親是縣商會會長），下鄉收租。我們只給他四折，他不肯，我們想把他打下去，別人就不敢來收租了。大家就把姓高的地主打了一陣，過了兩天，他們派兵來抓我，我就隱蔽起來。後來地主商量，同意六折收租。所以這一年東、北兩鄉農民都以六折交租。

我覺得這件事情搞得不錯，就設法搞點路費在 1921 年 2 月間到上海去了。

1921 年秋天，東鄉（衙前）小學的幾位教員也搞起“農民協會”。這幾位教員在經濟上是靠沈玄廬幫助的。沈玄廬在蕭山派頭可不小，他不僅是個大地主、大紳士，而且是浙江省議員和舊國會議員，農民認為有“三老爺（玄廬）撐腰就不怕了”。所以，參加農會的人很多，北鄉的大半個鄉、東鄉全鄉都參加了。會所設在衙前小學裏，沒掛牌子。協會有章程和宣言，農民以為要了一份宣言，就可以不要還租了，所以來討宣言的人很多，不僅東、北兩鄉的農民，其他各鄉的農民也來要了。1921 年冬初，我又回到了蕭山，這時我已經入團。我不敢在本鄉搞農民運動，跑到東鄉前清鎮南邊的幾個村子去搞。有一次，地主坐船來收租。當地主上岸收租時，農民把地主的大船抬到岸上，放火燒了，我趕到時，船已經燒了。第二天，我和前清鎮的很多農民到

衙前關帝廟開會，到會的四鄉農民約有千餘人，衙前小學教員沒來主持這個會，我就幫助主持，沈玄廬的叔父也在。正在開會時，紹興派來兩連兵，包圍了會場，會外的農民都走散了。一個營長兩個連長帶着幾個兵來到會場，這時，我講完話後，沈玄廬的叔父正在講話。營長問：誰是領頭的？沈說：沒有領頭的。營長問：你為什麼講話呢？沈說：沒有人講，我就講一講。（沈是紳士，很有勢力）。營長又問我是做什麼的？我穿的是農民衣服，我說我是北鄉人，來這兒開會的。旁邊的幾個農民也為我作證明。營長讓我們回去，我就和幾個農民走了。經這一壓迫，農民協會也就解散了。

這一次，捕去兩個人：一個是沈玄廬的叔父，兩三個月以後就放出來了；另一個是李虎成。他家比貧農好一些，比中農差一些。他名義上是農民協會的負責人，實際上並不知道農民協會是怎麼一回事。李後來病死在牢裏。

這一年，蕭山許多鄉都是交了六折的租。

沈玄廬的叔父和李虎成為什麼被捕呢？農民協會並沒有出什麼“大亂子”，這是因為住在紹興蕭山縣城裏的紳士和以沈玄廬系統的鄉下紳士有勢不兩立的矛盾，他們兩派在幾次省議員，國會議員的選舉中，意見很深。城內紳士乘機打擊沈派，縣長、軍官和沈派也有矛盾，所以同城裏的紳士合作。

兩次農民運動比較起來，第一次規模較小，在農民當中引起了小的波動。運動過去以後，我曾找沈玄廬談過一次。沈說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次比較凶，但衙前小學的教員們也沒有做什麼工作，光給農民一張宣言，農民認為有了這張紙就可以不交租了。

沈玄廬是共產黨員，這次農民運動也可以說是與黨指導有關的。

沈玄廬當時是個投機政客，政治手腕很高明。他在舊社會裏沒有

真正的政治地位。他通過陳獨秀的關係，參加了黨，進行種種活動，目的都是為了自己找出路，並不是相信共產主義。後來他叛變了黨，寫了幾次信給蔣介石，蔣不要他，他就跑到國民黨最右派——西山會議派，和李石曾、張靜江等搞在一起，在莫干山開秘密會議，準備推翻蔣介石，抬張靜江出來當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認為沈玄廬同他爭領導權，李、張被沈所利用，故通知何應欽，設法暗殺沈。何應欽命令浙江省軍事廳廳長蔣伯誠，派刺客暗殺了沈。這些情況，我是聽這個刺客說的。那時，我正關在牢裏，反動派造謠說沈玄廬的死，是我們黨為我報復而幹的。沈死後，我的父親也被捕，我的家被搜查了幾次。

*

*

*

*

1921年1、2月間我到上海《民國日報》做工。上海的一些進步工人，聽說我在杭州搞過工人運動，來找我，我因過去幾次罷工都失敗了，有半年多時間，不願參加任何活動，不談工人運動。也就是說，按照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辦法做工運，都沒有做得通，我對自己過去的想法和做法懷疑了。在這半年中，我的思想起了變化。1921年秋，我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我在入團以前，還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

“五四”前至1921年（或1922年），無政府主義者在宣傳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沈仲九、劉大白等，都是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多半是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和教書先生，他們沒有什麼組織，各自為政，寫文章宣傳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在上海各書店出得不少，多半是翻譯法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品。此外，還有幾個刊物。

中學生相信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相當多，共產黨早期黨員中，有許多曾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毛主席也受過這種思想影響。因為當時國家、社會情況很紊亂，簡直悶死人，沒有辦法，人們看了無政府主義宣傳的一套，以為是個出路，所以相信了。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人中沒有做什麼工作。

*

*

*

*

“五四”運動時工人罷工，不是我們搞起來的。在上海，先是學生罷課，要求商人罷市，工人看商人也罷了市，跟着罷工。“五四”時組織起來的工會，老闆、工頭都參加進去，而且一般都是工頭領導的。這些工會在“五四”後都垮了。

1920年時，上海有許多“工會”，實際上沒有群眾，有的是流氓搞的，有的是資本家搞的，他們那時不知道“共產主義”的可怕，有時請陳獨秀們去演講，陳獨秀等也就利用這種機會作宣傳，後來我們黨有了工會之後，他們這些工會有的變成黃色工會，有的同我們做對。

1920年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沒有在工人中做實際工作。陳獨秀等幫助機器工會搞章程是可能的，但這工會也不是群眾組織，沒有進行什麼活動。

1920年的《夥友》可能是上海工商聯誼會的刊物。“五四”後，上海有救國十人團，其中成分很雜，店員、老闆都有，上面有一總的組織，叫“工商聯誼會”，在英租界，領導人童理章，是個流氓，工商聯誼會出版《夥友》，可能邀陳獨秀、陳望道等寫文章，《夥友》有了他們寫文章，地位就抬高了。後來，工商聯誼會發展為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1925 - 1927年時，搞得很好，由王曉籟負責，同我們合作，

能聽我們的話。大革命失敗後，他們就跑過去了，作了蔣介石的走狗。

《勞動界》可能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出的。(沒有聽過《勞動者》這個名字)。《勞動聲》可能是陳公博等在廣州出的。

1921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但工作經驗不多，在工人中沒有做多少工作，在宣傳影響上是好的。

1922年5月，我開始做黨的工作，任上海黨的書記。1922年7、8月間，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被封後，我們組織“江浙留滬工人同鄉會”，以印刷工人為基礎，也吸收別種行業的工人參加，這是我黨在上海正式有群眾工運工作的開始。1922年“五一”勞動節是我們黨搞的，我和沈雁冰及其他同志都參加了，但到的工人只有數百人，這次勞動節紀念會是在北四川路懷仁堂門口廣場上開的。

1923年春，“江浙留滬工人同鄉會”擴大到各工廠中，紡織工廠和商店都有工會小組，因此改名為“上海旅滬工人同鄉會”(去了“江浙”二字仍留“同鄉”二字表示灰色)。印刷工人方面正式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有近千會員，在各報社工作的印刷工人八百多人也正式成立了上海報界人人工會。印刷工人組織得較好，因此，“五卅”運動中，工人出身的工會幹部占多數，這也與印刷工人文化程度較高有關係。

(劉明達、王來棣記錄，劉明達整理，

記錄於1957、1980年兩次經徐行之審閱、修改)

建黨初期上海的工人運動

董鋤平※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

現代史組同志：

“我黨成立前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如何在工人中進行工作，”我知道得很少，現僅提出可能尋覓的線索及盡我所知複答於下：

建黨初期，上海小組搞工運的有李啟漢（在廣東犧牲）等。開始多采一般宣傳。如 1920 年“五一”節，在虹口、四川路一日人學校開紀念會後，執標語進行示威，向天通庵路轉閘北，向北火車站前進。與會的有機器工人、縑絲工人等，學生、教員及從事文化工作的較多，共約千餘人，經警察阻止，未達車站而散。1921 年夏曆正月初一，我們全體上海同志、朝鮮同志約近百數十人，向工人區及全上海市民，分送賀年卡約數萬張，內印賀詞和“為富不仁，……”等歌詞，揭發資本家的剝削，與工人階級革命的道理。有一同志在預定時間內登“大世界”最高一層向下散擲（約定估計在街道散發賀年卡完畢後），一時如紅雪紛飛，“大世界”外馬路上亦遍地都是，人人爭相搶閱。“大世界”

※ 【編者按】（1）董鋤平，湖北人，後改名董冰如。192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後流亡到緬甸，在菲律賓辦報、教書，領導進步師生組織“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2）1956 年 11 月編者以歷史三所現代史組名義寫信向董鋤平先生書面採訪，這是他針對所提問題的答復。

為上海工人最喜的遊樂場所，此外，“新世界”、先施屋頂花園都有散發，在宣傳上起了一定影響。1月15日至21日列寧、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逝世周、5月5日馬克思的誕辰，都開會紀念、作宣傳。與工人直接接觸的活動，如遇工人自發的罷工，我們就前往領導作鬥爭（開始為一般的政治宣傳，喚起階級覺悟），由經濟鬥爭而趨政治鬥爭，要求資方承認工會，或鼓勵其他工人作援助的罷工。當時上海工人生活甚苦，一日不做工，就沒飯吃，尤其是有家庭的，罷工下來，就無法支持。我們就向同情工人的市民、知識分子捐款援助。如浦東日華紗廠罷工下來，丁玲同志等就向群眾募捐，親至浦東散發。此次罷工，鬥爭時間較長，日本資本家極狡猾，收買工人失敗後，假借工人名義用中文發傳單（當時我們每日都散發傳單，依每日情況而作不同的鼓動），分裂工人，欺騙工人，後見滬西日華第一廠工人勢將起而響應，就答應工人增資，組織工會，辦夜校等要求。英美煙草公司浦東廠後亦罷工，也是同樣派同志前往工作。在鬥爭中最易與工人接近，最易找着積極分子、有力分子，發展工會組織。此後就採取辦夜校，辦工人子弟學校，進入工人區，有時還要通過青紅幫關係，拜老頭子（如李啟漢同志就拜×××為老頭子）或通過工頭、包工（在建築工人中）等，與安徽幫、湖北幫等頭腦打交道；並穿上工人服、結十人團，拜十姊妹等。我們當時理論很低，為求工人聽得懂，學上海話，在工人中的宣傳、講話，開頭總是“勞動創造世界”，工人就是天（工人二字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天字。天字，人人都認得，工人一聽到此話，就掌聲雷動，震撼屋瓦）。黨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後，領導了上海郵政總局的罷工，李啟漢同志前往散發傳單，此時書記部出版《勞動週刊》，作對外公開機關，為上海各業工人的總部，黨領導各業工人作鬥爭。相繼而起的，有香港海員的罷工，黨領導上海海員響應，朱寶

庭同志此時與黨發生聯繫。接着向印刷、英法電車公司發動經濟鬥爭。我記得曾進入商務印刷廠（閘北）及商務印書館（棋盤街）作過活動，聯繫人的名字不復記憶，當時商務活動分子，可問勞動部毛齊華同志，可能他能供給一些材料。或問沈雁冰，亦可能知道些許。

上海的工運以至全中國的工運，一開始就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鬥爭。當時鬥爭的對象為南北軍閥封建勢力，中外資本家，尤其是英美日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資本家鬥爭最烈。如日華紗廠的罷工，上海郵政總局的罷工，英美煙草公司的罷工，海員罷工，英法電車公司罷工等等都可說明這一事實。同時還有無政府主義派如譚小岑（現在出版總署）、王光輝不但與我黨爭奪群眾，欺騙工人，騙取錢財，我們在工人中加以揭發。國民黨的林煥建，在廣東（上海）工人方面，也積極活動，進行分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簡又文，也宣傳其基督教社會主義來欺騙工人。資本家走狗童理璋，組織工商聯誼會，在店員中進行活動，反對我黨。所以當時在上海的鬥爭，除與反動軍警，帝國主義及其包探等正面敵人作肉搏，還要與這些牛鬼蛇神□拼。但因工人群眾的覺醒，黨的領導，由 1920 - 23 年，畢竟成為中國工運高漲的時期。

“五四”運動後，我赴上海，其他各地，我並未作過工作，僅就我當時所知從記憶中追述。全部材料都因年代較長，在記憶上會有差錯和不全，只能供作搜集材料的線索的參考。上海方面的材料，可否找上海總工會，全總楊之華、許之楨同志，勞動部毛齊華同志。當時上海的《勞動週刊》，北京的《工人週刊》亦可窺見當時工運大概情況。

專致

敬禮

董鋤平

1956.11.19

中共成立前後在北京工作的回憶*

朱務善



朱務善(1897-1971), 又名朱悟禪 , 曾用名王理堂、王一鳴。湖南省澧縣人。1919 年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 積極參加五四運動, 是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活動分子, 曾任該團總務幹事。他還是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 和鄧中夏等一起積極學習、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1920 年 10 月共產黨北京小組成立, 他是最早的成員之一。1921 年, 由李大釗、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 年任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委執行委員。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 任職於國民黨北京執行部。1925 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畢業後留蘇聯工作。1926 年轉為蘇共黨員, 改名泊·易·歐西皮夫。1927 年 8 月, 受共產國際派遣, 到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學習。1929 年蘇共清黨時, 他應同學要求寫信回國索要中國報紙, 被

* 【編者按】本文是朱務善先生根據我們的採訪記錄重新撰寫的回憶錄。為保存史料, 現把朱老自己撰寫的回憶錄和我們的採訪記錄一併發表。

認為違反蘇共黨紀，受留黨察看一年處分。1937 年 2 月，蘇聯肅反擴大化，朱被冤判入獄 5 年，後又加 3 年，直到 1954 年史達林去世後才平反，恢復名譽並賠償損失，返回莫斯科。1955 年重新加入蘇共為預備黨員，同年回國。1956 年，恢復其 1921 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黨籍，擔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委員。“文革”時遭迫害病倒，1971 年 6 月含恨辭世，終年 75 歲。1978 年恢復名譽。

這篇回憶是由我回答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王來棣等同志所給我一些問題湊合而成的。此稿原由王來棣諸同志根據我的口述而筆記的，後由我又稍加整理修正，但因為時太久，加以我又健忘，故所能記憶的事實中，不完全而且不正確之處，在所難免。希望當時的老同志加以改正和補充。

我幼年時代思想的變遷

自幼我就在本地小學和中學念書（湖南澧縣）。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成績很是優良，同時也念了不少的中國古典，所以中國的舊禮教思想給我在幼年時代以很深的印象。對於一切“越禮犯分”的思想與行動是很難接受的。所以我在小學和中學念書的時候，只知道好好讀書，不問外事。可是在中學畢業的前後（那時我剛十五、六歲），我開始接觸到長沙和京滬等地寄來的報紙、雜誌，才知道除孔孟的思想以外，還流行着各種各樣的新的思想。我記得在中學時最愛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差不多每篇司馬光的資治結論我都能背誦。後來，我見到了梁啟超所著的《新民叢報》及《飲冰室全集》，我更加欣賞。這是我在

幼年時代從中國的舊思想轉變為那時所謂世界體系的新思想的第一步。中學畢業以後，因為家境困難，不能升學，又因父親死亡，生活更加困難，我那時很想外出升學，但家資不夠，我的堂叔是一位鹽商，雖經數次請求，他拒絕對我的任何幫助，因此我在家受了很多艱苦。這一點就說明了我在幼年時代與外界接觸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原因之一。後因我父親的朋友及我的同學集體的幫助，才能積聚少許資金到北京升學。1919年4月，我就到了北京考大學，那時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侵略中國最甚的時代，也就是中國的民眾反抗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開始狂熱發展的時候。“五四”、“六三”運動我自己本人並未參加，但目擊廣大的群眾示威運動，學生的罷課與露天講演，開始激動了我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同情心。本年我同時考取了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及法政專校，因為那時北大號稱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我於是就決定入北大。在北大念書的初年，有三件大事常常湧現在我的腦海裏，即：第一、“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狹義民族運動；第二，反對舊禮教，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派的革新運動；第三，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那時很多先進的青年因為國內及國外革命運動的高漲，都各自尋找解放中國的道路。所以在那個時候，以北京大學學生為首創立了各種各樣的期刊與團體。名目雖異，而其總的目的都是要求用如何的方法能夠解放中國。所以，“五四”、“六三”運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向着“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狹隘愛國主義接近着。因此，在青年運動中，最初沒有很大的分化。與我同時的如鄧中夏、羅章龍、張國燾、何孟雄，黃日葵等等，都是這個時代的出色人物。後來，我受了“到群眾中去”這個口號的影響，以為要挽救中國非得使中國廣大民眾瞭解我們的鬥爭內容不可，所以我就加入了那時北京大學學生所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專門組織

同志進行民眾宣傳的工作。這個團體，當時得到了廣泛青年學生和教員的支持，那時一般出色的青年代表，都曾經積極參加了工作。北京黨團成立以後，工作一天比一天發展起來了。後來我們利用這個機關，作為發展黨團員很好的地方，因為所有一切北大先進青年和社會運動者，都是該團的會員。同時這個機關設有閱報室任人觀覽，並有定期講演，聽眾亦多，所以每天來往的人非常之多。我們黨和團的秘密會議，常在這個機關舉行，也不會惹人注意。中共中央遷到北京時，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等人，常在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內開會。時朱務善、賀昌、阮永釗先後為少共中央委員，也參加過這些會議。講演團的地址，在今馬神廟西口，原址現已拆毀。

從此我就不斷的參加一切社會活動。所以接着“五四”、“六三”運動，直到中國大革命前夕，沒有一次青年運動和社會群眾運動，我沒有參加的。“五四”運動以後，因為在俄國十月革命運動的影響和西歐革命運動的高潮，使得馬克思主義有機會宣傳到中國廣大的青年中。

《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新青年》常登載有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特別是那時候日本的河上肇、高昌素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後來又讀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及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對於我發生了不少的影響。所以在“五四”、“六三”運動以後，中國一般的青年就顯然地劃分為兩派了：一派是李大釗等人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派，一派是胡適所領導的美國式的德謨克拉西派。我就是那時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派之一。最初，我們在北大的工作，就是在群眾中如何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十月革命的意義。（主要是在我們宣傳承認蘇俄的廣大運動中進行的）這就是我從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轉變到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又一步。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組織及其作用

我記得 1921 年初，鄧中夏同志到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找我談話。大意是問我是否贊成馬克思主義學說，及是否同情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我對於他的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時我們認為我們的社會運動應當和我們的工作目的結合起來（時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以前）。有一次，我和鄧中夏到北大圖書館找李大釗同志，共同商議如何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如何在青年的革命隊伍中，加強我們的組織。經過了幾個月的籌備，我們就於 1921 年年底就正式公開地成立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除了我和鄧中夏、羅章龍（現已脫黨）、劉仁靜（後為托派）、高尚德、何孟雄等共產黨員以外，還有很多接近我們的非黨群眾，連現在在臺灣的黃紹谷也在發起人之列。這是一個公開的學術團體，其目的在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接受先進的青年到我們馬克思主義行列之間。這個團體經常的工作分為下列三種形式：第一種是由該研究會籌備了很多中文、英文、日文、德文的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各種著作，以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參考。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分為若干小組，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及蘇俄十月革命的各項問題。第二種形式是定期講演，約請當時名人學者，如李大釗、高一涵、陳啟修等，規定了各項有關馬克思主義學說及世界

* 編者注：據《李大釗傳》（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考證，1918 年冬，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馬爾格斯學說研究會”，不久被反動政府查禁。1920 年 3 月，又發起組織秘密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 年 9 月成立的中共北京小組就是在研究會基礎上成立的。黨成立後，為擴大影響，決定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公開，1921 年 11 月 17 日在《北大日刊》登載啟事，招收會員。到 1922 年初，會員增至 63 人。

政治情形等題目作定期報告。第三種是辯論會，由我們訂出有興趣的學術報告，在青年群眾中作廣大的公開的社會主義宣傳。我記得我們辯論過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參加這個辯論的人很多，包括有好幾個大學的學生和教員，辯論了兩次。聽眾先後達數百人之多。這樣的辯論會，我們常常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名義，約請李大釗同志作評判員。這種辦法當然更有利於我們的宣傳。後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但是在北京大學，而且在北京各高等學校中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一中心。在馬克思學說研究小組中，我們接受了很多很多的先進青年到我們共產黨的行列中。在這個時期內，最意味的現象是胡適派的青年學生，無政府主義者，及少數的落後分子後來成為反革命的，很少很少參加這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工作。他們有時候還譏笑我們“愛好新奇”，不研究中國自己的文化，偏偏搞什麼馬克思、“牛克思”舶來品的學說。因為，在共產黨成立以後，在北京的青年中已經很明顯的起了分化作用，一般比較革命的青年大部分都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其餘的如新潮派的羅家倫、康白情、傅斯年、葉麐這批歐美留學生就變成為所謂歐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派。其它如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那時都保留着個人的行動。他們在言論上和刊物上，有時發表文章和言論反對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在北京沒有強大的組織，在社會上沒有起什麼顯著的作用。

在北京共產黨的組織

就我所能記憶，在 1921 年初，北京還沒有共產黨的正式組織。我記得 1921 年 3 月間，當我們開始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時李大釗同志為圖書館主任）討論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時候，在座的只有李大釗、

張國燾、鄧中夏等七人。在下次開會時，又碰見劉仁靜、江皓、何孟雄、高尚德等。實際上，我們就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那時候，我們一般的認識和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要以馬克思學說為基礎，用革命的手段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為目的。活動開始時，的確有好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如黃凌霜之流反對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後來我們終於戰勝了他們。在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前，我們既沒有書面上的黨綱，也沒有寫成本的黨章。那時候，開始的主要目的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支持蘇俄的十月革命。在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我們在北京才有正式的共產黨組織，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與黨章，便成為每一個黨員行動的綱領。在這個時候，我們與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先後有馬林、威金斯基有密切的關係。北京黨組織討論很多主要問題時，我們常常請他們參加。在此以前，在北京還有國會議員胡鄂公與高等警官學校教員鄭保漢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並出版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雜誌，名稱叫《今日》。這種雜誌出版的頭幾期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學說，在當時看來還不算壞。可是這位胡鄂公先生是一位政客，他一方面參加了曹錕的賄選，成了“豬仔議員”，同時他也想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混進第三國際，企圖作為升官發財的好方法。確實，他們也企圖與第三國際發生關係，和我們的中國共產黨互爭“正統”。胡鄂公的企圖雖然失敗，可是那時共產黨的書記陳獨秀，一再對我們說明，《今日》派對於馬克思主義瞭解不差，應該接受他們參加我們的組織，但同時應當考查胡鄂公是否參加賄選。我們在北京的同志都很知道。胡鄂公是參加曹錕賄選之一，但是我們也把他們放到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之內。說起來倒也好笑，四十多歲的國會議員和高等警官學校教員也能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我們確實調查了胡鄂公參加賄選，我們把他們就從青年團開

除出去了。那時候，北京共產黨員活動的對象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組織工人運動，主要的是北方鐵路工人運動（詳見後），一方面是領導北京的繼“五四”運動而起的廣大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我記得領導工人運動的有：張國燾、鄧中夏、陳為人、鄧培、何孟雄等。領導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有朱務善、黃日葵、劉仁靜、李駿、李國暄等人。所以，在五四運動以後，一切社會政治運動和工人運動是由我們組織的。在我們黨初組織的時候，在我們黨員中不少的常常表現出很幼稚的小資產階級의思想和行動，那時我們很少懂得黨的紀律，一切偏重於感情。我記得鄧中夏和幾位同志在工作上發生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引起對鄧中夏同志個人的不滿，他很生氣、消極，並且要求退黨，他說。“我不對，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時在北京，我們一同邀請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釗同志）家和解。這樣的和解，我記得在守常同志家對好幾個同志舉行了好幾次。現在想來，這種方法雖然很幼稚，但在同志團結上和解釋糾紛卻起了不少的作用。我記得還有一位後來變為托派的劉仁靜，他在我黨組織確實很早，但是他的小資產階級習氣比任何人都要重，常常對組織鬧情緒、不滿。有一次他不願意參加社會運動，堅持要求到工人群眾中工作。後來黨組織同意他去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工作，黨組織替他買好行李和日用東西，他忽然又拒絕不去了。他常常給黨很多麻煩，但是黨沒有一次處分過他，除此以外，在黨建立初年，劉仁靜受了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的影響在黨內即表現出一種最幼稚的左傾“理論”。他主張那時中國共產黨不應當參加國民革命，應當盡全力搞工人運動，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宣傳社會主義革命，他個人是十足的知識分子，但他卻反對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他這種意見不止一次在黨的會議中公開宣傳，不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經守常同志及鮑羅廷（蘇聯派到廣東革命政府的顧問）一再解釋反駁，他那

種不正確的觀點，才慢慢的消滅，未致散播於黨內。我記得某年冬天夜間在北大第三院開黨員大會的時候，鮑羅廷說：你們（指劉仁靜派）反對參加國民黨，主張幹社會主義革命，你們知道不知道幹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在那裏？我們現在在北京首都的交通還是要用人騎在人身上的辦法（指人力車），你們根據什麼談社會主義革命？！守常同志對此也講了話。當時不知道誰發言侮辱了守常同志，使得他立時退出了會場，後經勸解，乃得平息。在北京黨組織成立初年，守常同志是黨組織發起者之一，但是為着工作方便起見，我們沒有把守常同志對社會公開。起初社會上只承認李大釗是一位有名的北大教授，為中國談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但並不知道他是我黨創造人之一。國民黨改組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一天一天的發展壯大起來了，於是談到中國共產黨才有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的稱呼。於是李大釗之為共產黨員乃成為公開的秘密了。自從守常同志參加了莫斯科第三國際代表大會回來之後，其所受印象極為深刻，當他在黨組織作報告的時候，他對於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紀律及在工作中耐苦耐勞的精神，甚為佩服。

1924年黨中央決定組織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地址就設在北京馬神廟北大第二院和北大學生宿舍“西齋”，就是我們大本營所在地。區委第一任書記是由法國回來的趙世炎同志，後來改由李守常同志擔任，彭桂生為秘書，李國暄、朱務善、范鴻劫等人都參加為區委委員。自此以後，守常同志辭去了北大圖書館主任職務，專心致力於革命工作。

自“五四”、“六三”運動以後，因為在西歐革命運動的高漲與國內革命高漲的繼續，北方黨的組織發展很快，在1923年“二七”慘案前夕，在北京的黨員已有數十人，黨員對於黨的瞭解，對於中國當前的任務及黨員對於紀律的提高，遠非在開始時期所可比擬。黨和青年團

的工作都有專人負責。那時從蘇聯、法國回來了一批同志，如趙世炎（擔任黨的工作）、劉伯莊（擔任青年團工作）及陳為人、張××等（在鐵總工作），都是那時在黨內與青年團的負責同志。我對於趙世炎同志，特別有很深的印象。我和他在北方區委同事將近二年，朝夕不離。這是一位很忠實、很明智而又很能幹的領導同志，他能寫文章，英文也懂得不錯，我們和鮑羅廷、威金斯基等開會，常由他或范鴻劼或阮永釗充任翻譯。他對於同志態度很誠實，但在工作中對於同志常常深刻的加以批評，他對於那時張申府、劉清揚和劉仁靜等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浪漫生活深為不滿。他常常強調地對我說，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某種條件下他是積極的，但遇着艱苦困難，則有不少的人首先動搖不定，甚而至於脫黨叛黨。世炎同志在 1925 年末由黨中央調到上海工作，聽說後來為反革命國民黨捕獲，終於英勇的犧牲了。

那時候在北京除去了《工人週刊》、《先驅》、《民報》由共產黨人主辦而外，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機關報，但是我們常常利用其它報紙，作為宣傳機關，如《民報》（日刊）、《新國民雜誌》（月刊），我們也在裏面擔任編輯工作。《民報》是一個很大的報紙，共有三大頁十二版，六版為英文，主編為陳友仁；六版為中文，主編為蕭子昇。黨員如朱務善、李駿和范鴻劼都是編輯，在政治上和學術上我們作了不少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我那時，在《民報》擔任國內新聞兼任編輯經濟副刊。因為我長期登載了列寧所著《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一書，引起了顧孟余的不滿，他後來竟然提議要撤換我的工作，但因為李守常同志的反對未果。這家報館，在名義上是馮玉祥與國民黨合辦的，實際上是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人主持，在政治綱領上，主要是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支持當時的各種社會運動。後

因陳友仁登載了張作霖患梅毒病垂死消息，終於逮捕了陳友仁，而《民報》亦因此封閉了。

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及其活動

青年團的組織，實際上在黨的組織之後。有了黨的組織，鑒於青年運動高漲有組織青年團的必要，才由朱務善等於 1921 年末開始組織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那時一般學生都知道的 S . Y . 開始這個組織只限於北大，後來發展到北京各大學及專門學校。老實說，那時候我們對於 S . Y . 的主要任務及工作方向，還不大清楚。我們只知道 S.Y. 是共產黨的預備學校，而忽視了青年團是共產主義青年本身的組織，除卻政治路線應當聽從共產黨以外，他們也應有自己關於青年本身的單獨工作。我們開始發展青年團活動的時候，在各種群眾場合之下，在各個團體與機關中，不論其年齡大小公開的招收團員，有時候在學校中用 S . Y . 的名義大貼其廣告，招收團員，讓青年們自由報名入團，隨後在 S . Y . 團員中選取其先進優良者加入共產黨。有問題的人要求加入共產黨，我們也先把他在青年團組織中觀察，觀察相當時日，然後決定是否可以加入共產黨。上述“今日”派的胡鄂公、鄭保漢要求加入我黨，我們就這樣辦的，經過相當考察，我們認為他們不夠資格入黨，後來就把他們從 S . Y . 清洗出去了。我們用什麼方法把他們清洗出去的呢，事先通知了一般團員，因為要開除胡鄂公及鄭保漢等人的團籍，我們在支部大會上宣佈了北京青年團組織完全解散，從此他們也就不再為青年團了。這就是那時我們對青年團的看法和青年團本身的工作情形。到 1923 年以後，在北京領導同志對青年團的認識漸漸明確，同時從蘇聯和法國又回來了不少幹部，因為黨和青年團

在北京發展很快，黨區委乃決定黃日葵為北京黨委書記，劉伯莊為青年團書記，專門擔任青年團工作，始確定了團對黨的關係，和青年團工作對象，主要是應當注意關於青年本身利益的活動。在北京青年運動中，青年團的工作發展很快。我們的工作在北京可以說無孔不入，當時的學生運動及一切社會活動，幾乎沒有一處不是由我們領導的。因此，那時絕大多數的先進青年，都為我們所吸收，加入了我們的青年團，後來變成了很忠實的黨員，如雲澤（即烏蘭夫同志）、奎壁、多壽、劉錫五諸同志，都是那時北京青年團的先鋒隊。

應當指出，自從共產黨員及青年團領導了一切青年運動及社會活動，於是這些活動才有他們正確的政治面貌，把“五四”運動時所採用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改變為“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合乎那時所謂國民革命（即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換言之，我們把黨的政治路線與我們的實際活動緊密的聯繫起來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的青年群眾運動和其他一切社會政治活動多半是自發的缺少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這些活動就成為有組織的了。這些組織的社會政治活動開始不久，就碰着了反動資產階級的反對，胡適即為其代表。他那時在北大當教授，擔任英文系主任，不主張大學生作群眾社會活動，他說這是青年自殺政策。他反對我們參加而且組織一切社會活動，提倡所謂讀書運動，不問政治。我們的回答是：你不問政治，政治要問你呢！（李大釗同志當時的名言）。胡適大力反對談馬克思主義，他說談主義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而主張研究問題，把中國應解決的問題仔細研究後，從而一滴一點的去解決。我記得有一次那時尚在紫金城內稱帝的溥儀，由他的外國老師英國人莊士敦的介紹，要召見胡適博士，胡博士當時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見了溥儀如何稱呼他。後來胡博士自己很高興的解決了這

個問題。他根據中華民國成立時與清帝遜位的和約，見溥儀時乃得意的稱之為“皇上”。1924 年段祺瑞為反對孫中山所要求的全國國民會議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聘請胡適博士參加，胡博士為得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機會，興高采烈的參加了善後會議。結果，胡博士在善後會議中坐了長時間的冷板凳，什麼問題也沒解決。後來因為我在北大某次會議場合中譏諷了胡博士很會一滴一點的解決問題，如稱溥儀為“皇上”，在善後會議坐冷板凳等，引起了胡適對我的仇視與謾罵。總之，在緊接“五四”運動而後，胡適馬上就成了宣傳唯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先鋒，反對中國革命的國際帝國主義者的走卒。

北京共產黨成立後的北方工人運動

北京共產黨成立初期，我主要的是擔任一般社會政治活動及學生運動，對於職工運動我個人很少參加。我現在所能回憶的，只是那時候在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中的幾點印象。

在那時候的北京，可以說沒有一個工廠，連一個現代產業工人也找不出來。記得 1921 年及 1922 年間我們想做工人運動，但在北京沒有對象。有幾次我們企圖組織“洋車夫工會”，後來又想組織“印刷工人工會”，但總沒能成功。因為，一則他們（洋車夫）居住散漫，不能團結，二則他們（印刷工人）行會的觀念太深，工頭力量太大，不能插足（如我們在北大要組織北大印刷工人，但因工頭郝興團把持一切，沒有一個工人同意我們的組織）。加之我們那時完全沒有工作經驗，所以在北京就談不上什麼職工運動。

但自 1921 年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到北京以後，我們才開始發展在北方的工人運動，主要的是鐵路工人運動。開始做鐵路工人運動的中心

即在長辛店。在那裏首由鄧中夏及後來叛變的張國燾用北大學生會名義與幾個長辛店工人領袖（實際上是工頭）及少數先進工人談判，先後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勞動補習學校及工人俱樂部，經常在那裏工作的，都是由我們派去的黨員或可靠的非黨員，如吳汝明（後為叛徒）及王錚（北大旁聽生，湖南人）等，都是那時的工運專職人員。除在補習學校有日常的功課外，在工人俱樂部尚有定期講演，我就是長期的擔任定期講演人之一。每星期一次，在俱樂部開講，一般都規定在下午，聽眾滿座，全是工人。講演的內容，通常是關於普通常識，但常常夾雜不少的政治問題，如“什麼叫做政黨，為什麼工人要有自己的政黨？”，“馬克思學說主要的內容和他與工人運動的關係”，“為什麼我們要主張承認蘇聯？”等等。在講演之後，工人聽眾每次都提問題，而且出了講堂也有工人們和我談話的，談得親密起來，有時還有請我到他們家裏去休息的。我那時常利用這些機會和他們接近，宣傳馬克思主義要義及共產黨為什麼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理由。在相當的時間中，我介紹幾位工友入黨，後來成為長辛店鐵路工人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的姓名我記不清了）。我們在長辛店辦理工人俱樂部不久，成效卓著，鐵路工人以加入該俱樂部為榮譽，胸中（前）掛有俱樂部徽章者，常受人尊敬，于此可見工人俱樂部在工人中的信仰了。實際上那時工人俱樂部，就是團結鐵路工人、教育鐵路工人最良好的機會。同時我們那時又有自己的機關報（《工人週刊》）盡力宣傳，所以其他各鐵路總站，如江岸及鄭州等站都效法創辦俱樂部。那時在鐵路工人運動中與我們競爭的，還有所謂交通系的爪牙所創設的工人學校或傳習所，藉以欺騙工人拉攏他們脫離共產黨人的影響。他們在各鐵路工人中（特別是工頭），有相當長的歷史，也有比較堅固的基礎。當梁士詒當國務總理、葉恭綽作交通總長的時候，他們在各鐵路上的活動特別猖狂，

為我們在鐵路工人運動中的主要障礙。(如在長辛店我們設立了勞動補習學校，而他們則設立職工學校相對抗)但是在直奉戰爭之後，張作霖的勢力被逐出關外，吳佩孚當權，聲言“保護勞工”，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去打倒交通系在鐵路工人運動中的欺騙行為。那時在吳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顧問名白堅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學。據守常同志當時對我們說，白堅武曾建議吳佩孚“保護”勞工，吳大帥欣然採納了這個建議。後來白堅武曾向守常同志說，請其介紹共產黨員在鐵路擔任工作。北京黨組織和守常同志一致認為可以利用時機在各鐵路上打下我們工作基礎，於是決定指派了六個黨員同志到京漢、京奉、隴海、津浦各線當秘密檢查員的工作。他們在各鐵路上權威很大。確實，我們在上述各鐵路進行了不少的工作，摧毀了交通系在鐵路工人運動中的一切企圖。但1923年“二七”罷工，很快的就顯露了吳佩孚假仁假義的所謂勞工政策的真面目。應當說明，我們同意接受吳佩孚委託到鐵路上工作，絕非相信吳佩孚的甚麼保護勞工政策，我們一向對鐵路工人沒有說過吳大帥確能保護工人利益的幻想。我還記得緊接着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人之後，我和繆伯英（黨員，女高師學生）以北京學生會代表名義到武漢活動，聲援京漢鐵路工人。我們到達武漢，曾與陳潭秋、李漢俊、夏之栩、楊子烈等人接頭，作了一系列的工作，如招待新聞記者，接見武漢學生代表，慰問江岸被難工人等等。不久因施洋同志被害，武漢情勢緊張，在漢口各地，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加之我在招待新聞記者大會上，和《江聲日報》記者談話時，攻擊了吳佩孚、蕭耀南屠殺工人慘無人道，次日即聞有蕭耀南秘令逮捕北京學生代表的消息。時李守常與李漢俊兩同志在武漢各大學講演唯物史觀，我們當天和守常同志商量，他主張我們離開武漢到長沙作一番宣傳活動，當日我們就到長沙去了。當我和守常同志等談到“二七”慘案

時，守常同志表示非常憤慨，謂吳佩孚與張作霖同為軍閥，孫吳合作雖有初意但終是無希望的事。自此足證在北方黨的組織和守常同志個人那時對吳佩孚並沒有抱着什麼合作希望，更沒有企圖在吳大帥卵翼之下在政治和工人運動上想做出什麼成就，相反的，我們共產黨人在黨的領導之下與直系軍閥作了很艱苦的鬥爭，反對他們。“二七”罷工失敗以後，在北京的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抄，張國燾和他的愛人楊子烈及在長辛店工作的吳汝明等先後被捕。此時，除京漢路工人被鎮壓外，其餘如京綏、京奉、津浦、正太各路工人運動，也被壓迫，不能發展，僅僅保持着消沉狀態而已。可為注意的，就是當時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對於吳佩孚的估計及對於“二七”慘案的教訓，表現着十足的機會主義觀點，他認為吳佩孚是當代進步勢力的代表，說我們應當支持他，不應反對他。他對於孫吳合作抱着極大的希望。所以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失敗以後，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必要揭露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假面具，應當利用他一步一步的發展鐵路工人運動的組織就夠了。就此，足見陳獨秀一貫的機會主義，並非開始於中國大革命時期。

至於農民運動，那時候尚談不到。但自 1924 年起，我們對於在內蒙、熱河一帶的農民武裝秘密結社，已經取得聯繫。北方區委特派韓麟符等擔任其事，後來在革命運動中，這些農民武裝團體，起了不少的作用。

孫中山北上前後與國民會議運動

自 1919 年在列寧同志的主持與指導下組織了共產國際以後，列寧本人及第三國際特別注意中國革命問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有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馬林（後為托派）參加過。按照中國當時經濟發展

的情況，及中國遭受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雙重壓迫的處境與中國共產黨之年幼缺少革命鬥爭經驗各種原因，第三國際很正確的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中國共產黨當前主要任務，認為為使集中中國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員應當個別的全體加入國民黨，但同時又必須保存自己黨的組織與黨的工作的獨立性。站在這個立場上，中國共產黨員就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於 1923 年在孫中山的指導下進行了改組，發表宣言，以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為國民黨主要綱領。這是中國革命往後能蓬勃發展的主要關鍵。可是那時國民黨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買辦、工人、農民、地主、學生等一切集團的聯盟，所以國民黨改組以後，國民黨內部的一切反革命集團（所謂國民黨右派）或明或暗共同起來反對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種現象不能不反映到北京來。國民黨自改組後，於 1924 年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在今東城翠花胡同八號，內分組織、宣傳、婦女、工農、青年各部，李守常、于樹德、丁維汾、王法勤、馬敘倫等，都是當時北京執行部負責者。但是在國民黨分子中，因為各人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所以在北京也存在着各個不同的集團，如丁維汾有他的“國民黨大同盟”組織，其中成分包含很多他的山東同鄉，他們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採取懷疑態度，但不公開反對共產黨，如丁維汾、王樂平（國會議員）、路友于等也常常和我們合作。在學生運動中，有以鄧德高為首的“民治主義同志會”與國民黨右派鄧魯有聯繫，是露骨的反共組織，在學生運動與社會團體活動中，他們專門與共產黨作對。記得在北京國民黨執行部中，共產黨的青年朱務善占了一個職位，那麼民治主義同志會的鄧德高也非要一個職位不可。1923 年在北京學生會中，共產黨員朱務善當選為到廣東請孫中山興師北伐的代表，民治主義同志會也要求派遣他們的會員李某（山西人，高師學生）同去。我們到了廣

州去會見孫中山，在座裏忽然出現了一位北京民治主義同志會的陳某（廣東人，北大學生）。當我同孫先生談話的時候，陳某常用廣東話打斷我們的談話，我雖不懂廣東話，但我也能聽出幾個字音，大概是說我是共產黨員，在北京包辦學生運動，不讓“真正”國民黨員參加……一類的話。孫先生聞之不大爽快，也沒有置答。次日我單獨要求見了孫先生，在三四十分鐘以內，他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幾個問題，特別對於那時國民黨右派反對共產黨這一點，他毫不遲疑的着重聲明：“現在的問題是這樣，誰反對共產黨，他就不是國民黨員。”這幾句話對於我有很大的感動，我認為孫先生確實不愧為當代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

在國民黨改組之後，在廣東先後消滅了商團與陳炯明的反動力量，革命政府的根據地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又因國共合作，民眾運動的高漲，所以那時我們所提出關於國民革命的各項口號，大為全國民眾所歡迎。這種全國革命的新情勢，不能不影響到較為先進的政治領袖，當時如馮玉祥，胡景翼及岳維峻等最高將領也接受了國民黨的政治綱領。孫中山於 1924 年底到達北京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如馮自由、居正等在北京即組織所謂國民黨護黨同盟會，大肆活動，專以反對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為目的，破壞革命統一戰線。但絕大多數的國民黨員及全國民眾，並不因此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所動搖，而且都認為共產黨那時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保護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權，改善工農生活等等要求，國民黨應當全部採納。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召開全國國民會議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號召，已經在 1924 年 10 月北京政變之後，成為迫切的需要了。孫中山北上，主要就是為召開國民會議。可是段祺瑞利用馮玉祥倒戈直系場台，重新在北京執掌政權。他為了對付孫中山的國民會議，乃於 1925 年 2 月召開了所謂善後會議。孫中山那時對新聞記

者說：“善後會議但可代表各方面領袖式之名流、政客、軍閥等少數人之意見，比之由工農商學各團體及全國人民召集之國民會議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因此，北京各報在善後會議開幕之日譏笑百出，謂：“壓座是軍閥代表，配角有官僚黨人，唱的是什麼調？”在善後會議開幕的前夜，每個會員先發 600 元津貼，則謂：“財政整理不可知，會員先得 600 元”等等。最有趣味的是在善後會議中與胡適博士同座的，還有所謂“中國社會黨總理”江亢虎博士。他說他參加善後會議目的在宣傳社會主義。當時北京有某家報紙嘲笑云：“江本非一真正社會主義者，受大執政特達之知，自欣然拜命，有何足怪？！昨江聲明謂本人加入善後會議，純以宣傳主義為目的，並無其他作用參孱其間。在善後會議宣傳社會主義確是奇想！將來 169 個會員苟能稍得些微社會主義之智識，當永拜江之厚賜矣！……”這一類笑話趣聞，不一而足。國民黨腐敗分子以個人名義參加善後會議者，亦不在少數。在這時候，醞釀已久轟動全國之國民會議的運動，早已成熟，在全國各省由中國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先進人士及工農商團體所組成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如雨後春筍到處皆是。在北京方面的國民會議促成會，是我們結合北京一切其它團體包括北京教育會商會和其它工商學術機關在內組織而成，加入者計有 300 多團體，地址在虎坊橋 42 號，內設總務、文書、宣傳、交際等各股分工辦事。朱務善、顧孟余為總務股主任，李一鴻、路友于為文書股，趙士奇、吳時英為宣傳股，楊理恒、胡南湖為交際股，並發行了週刊，定名為《北京國民會議促進會週刊》，寄往各省以資宣傳。同時在北京對當時國民會議運動還存在着其他名義的團體，如國民會議後援會及周長憲等所組織之國民會議協進會，這些團體大都為一般下流政客所利用，為善後會議捧場。此外還有一個與我們對抗設立在江西會館由國民黨右派分子如韋青雲、王文彬、袁世

斌、萬兆芝等所組織之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但後來因為他們力量薄弱，自願的與我們合併了。1925年1月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正式成立以後，因時勢要求，很快就開始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3月1日在北大第三院舉行了開幕禮，並有很多名流學者到會講演。據現在調查所得，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有北京代表朱務善、胡南湖等，北京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石道睿、夏之栩、石道璠、張錫瑗等，天津代表鄧穎超等，上海代表劉清揚等，廣東代表曾醒等，湖北代表劉蔚如等，山東代表王崇五、王樂平等，湖南代表莊兆驥等，江西代表鄧鶴銘等，浙江代表黃文霞等，察哈爾代表恩克巴圖，直隸代表王紹華等，山西代表閻毓珍，河南代表丁升恒等，吉林代表陳作霖等，奉天代表朱霽青等，綏遠代表多壽等，烏伊兩盟代表云敬聖等共80餘人，和來賓及新聞記者共數百人參加，自3月1日成立之日起至4月15日閉會，討論並決定了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總則，國民會議預備會章程，對國民會議關於工農兵商學及各項重大政治問題之建議，與代表大會之宣言等等。在短短的一個半月之內，我們作了很多而且很大的政治宣傳工作，反對善後會議，特別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內，各省代表在北京各處講演，散發傳單，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此時在北京特別提高了他的威信及政治作用。此次在北京的國民會議促成會運動，系與我們黨組織自始至終有密切聯繫的，參加國民會議全國代表中有幾十個是中共黨員，我們在代表大會中組織了黨組，朱務善為黨組書記，共同指導這次運動。我記得廣東海員代表中有蘇兆征同志，他是海員工會最著名的領袖，那時還沒有加入共產黨。他到北京時，我們接到了中共中央同志的指示，爭取蘇兆征同志入黨，不久由朱務善等人介紹，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蘇兆征同志後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以上就我個人回憶所及，可以看出（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二）國民黨改組及國共合作由此而產生革命力量之集中與壯大，（三）工農組織之擴大與全國革命情勢之高漲，就成為 1925 年到 1927 年大革命的先決條件。

附：訪問朱務善原始記錄

（1956 年 6 月）

我在湖南念中學，那時候不懂得什麼，只是埋頭讀書。1919 年 4 月來北京考大學，正值“五四”運動高潮，眼界大開，思想一新。“五四”時，吳虞等反對舊禮教，主張科學，使我非常感動。感到舊書束縛很大。7 月進北大後，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初步認識到救中國不是“反孔”所能解決，當時《少年中國》、《新潮》等雜誌，提倡科學、民主，提倡白話，還在資產階級革命範圍之內，對我很少興趣。我認為最要緊的是向蘇聯學習。蘇聯宣佈放棄不平等條約，對我們思想起了很大的影響。羅章龍、鄧中夏等思想轉變情況大致上與我相似。

當時蘇聯給我們的影響是：（1）紅軍單獨與德國媾和，工農得到解放，中國為什麼不能學習俄國？（2）共產國際宣傳反對殖民主義，列寧很重視東方殖民地的解放，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解放，寫了很多文章，對我國解放運動有很大影響。

1920 年初，以越飛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到中國（談判建立外交事，當時《晨報》等都有登載），共產國際宣傳部代表（可能是馬林），華僑楊明齋（蘇共黨員）都是隨這個代表團到中國來的。代表團招待我們學生和新聞記者開會，我亦被邀。越飛等在會上宣傳蘇聯的社會性

質和外交政策，說明蘇聯為什麼放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等，使我們覺得蘇聯很好，認為應該走蘇聯的路。那時國內開展承認蘇聯運動，我們開會演講，支持蘇聯代表團，這活動對我黨成立起了積極作用。

那時，馬克思主義的書很少。我最早讀的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在當時影響很大，此外還有幾本日文的書。

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不僅是李大釗。早在 1915 - 1916 年，孫文、胡漢民、朱執信、廖仲凱等也談馬克思主義，談階級鬥爭。可看《建設》雜誌。這說明中共的成立不是偶然的。

我進北大後，積極參加學生運動，開始時任學生會評議員（級代表），當時學運還沒有明確的方針，口號是“內除國賊”（指安福系）“外抗強權”（指日本），反對當時的具體的敵人，至於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當作我們的敵人，是認識不夠清楚的。

後來我擔任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的主任。這個團體是“五四”前組織的，從愛國主義思想出發，抱着喚醒民眾、挽救中國的目的。到處演講，演講題目什麼都有，如反對小腳、主張戀愛自由等等。“五四”、“六三”時，這個團體油印了許多宣傳品（小冊子）。“五四”後，燒日貨，在東安市場開國貨商店，經理姓李。國貨商店關門後，商店的雜貨就搬到演講團裏來。我當時住在演講團裏面。1922 年後，我因工作太多，想退出演講團，黨組織不同意。要我繼續留在團內，做宣傳工作，接近團內的積極分子，發展團員。黨的組織有時借用演講團的辦公地點開會。

參加“五四”運動的分子很複雜，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五四”後，起了分化。分為兩派，一派以胡適為首，反對李大釗同志，說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他的下面，有羅家倫、康白情、傅斯年等。他們宣傳資產階級的科學

民主，只談問題，不談主義。他們沒有群眾，後來有的到英國，有的到美國去了。另一派是以李大釗、陳獨秀為首的急進派，繼續“五四”精神，主張馬克思主義。當時無政府主義在學生中宣傳得很厲害，但他們對社會運動沒有起過什麼作用，只有個別人相信他們的主張。他們不參加具體的運動。1920年後反帝反封建運動中，他們沒有參加罷課、罷市等鬥爭。朱謙之是個書呆子，整天在圖書館裏讀書，讀了許多古書，無政府主義方面的文章寫得也不多。有的書上說，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初，黃凌霜等無政府主義者曾經參加，不久即退出。這也是可能的，但他們對共產主義組織沒有絲毫作用，只是翻譯幾本書，寫寫文章而已。1920年蘇聯代表團在北京開座談會，黃凌霜好像參加過，後來退出了。

1918年底1919年初，共產主義分子開始組織活動，當時北方有李大釗，南方有陳獨秀，有“南陳北李”之稱。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開始時有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等，後有鄧中夏、羅章龍和我。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情形是這樣的：1921年3、4月間，鄧中夏到我家，那時我搞學運很積極。我和鄧中夏說當時中國的青年還沒有方向，到處亂碰。這樣下去，撞得頭破血流也無濟於事。我同意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救中國的方法，鄧中夏說準備成立中國共產黨，問我的意見如何。我很贊成，就參加了。那時有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繆伯英、劉仁靜、何孟雄和我等七八個人。

共產主義小組發起組織公開的學術性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那時，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很自由，我們以研究會名義在北大第二理科占了很多房子，北大以外的學生也時常到這裏來開會。共產主義小組通過這個會，宣傳馬克思主義，舉行定期演講。演講者有各種人物，連李石曾都請了。講演題目也各色各樣，主要是由懂得馬克思主

義的人作公開報告，拉人來聽。共產主義小組也通過這個會，爭取好同志、發展黨員。共產主義小組在 1919 年的活動，如此而已。此外沒有做什麼。對於工農運動，認識到應該組織，但還沒有開始。

我們當時沒有綱領，但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相信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即人類社會從沒有階級——>有階級——>無階級。而從階級社會到達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建立青年團。其實青年團只是一個名字，那時黨員就是團員，團員就是黨員。1922 年後，北京各校都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蘇共成立之前，有共產主義小組，小組間互不聯繫，主張不完全一致，而在中國，則都是李大釗一派的人。

和我黨醞釀成立的同時，曾經發生這樣的事：1919 - 1920 年，江亢虎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會，說自己是中國的“代表”，在會上發言，組織“中國社會民主黨”，在北京宣武門外掛了一個牌子，沒有群眾，我和何孟雄把它的招牌偷來了。

還有一個《今日》雜誌（後稱“今日派”）它的負責人胡南湖，是國會議員，和鄺寶漢（高等警官學校教授），以高警校為大本營，在 1920 - 1921 年間，組織“中國共產黨”，和我黨爭正統，要求加入共產國際，但共產國際承認我們是國際的中國支部。《今日》雜誌也宣傳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寫信叫我們北方黨組織和他們聯繫，發展他們入黨。北京黨小組因胡等是國會議員，不便吸收入黨，便讓他們十餘人參加青年團（胡南湖等都是四十多歲的人）。那時我們對青年團認識不足，只把它當作是黨的候補。後來調查得知胡南湖等是曹錕的豬仔議員，曾得賄 4000 多元。那時我們不能公開宣佈開除他們，便宣佈解散青年

團，過了三五天，社會主義青年團開會，便不再通知他們。

黨成立後，組織勞動組合書記部，它的最大功績是組織京漢鐵路工會。北京開始時有羅章龍參加。1921 年長辛店成立工人俱樂部，出版《勞動音》。《勞動音》在工人和學生中公開發行，時間不長，看的人也不多。後來改為《工人週刊》。俱樂部每週舉行講演，我每週去長辛店向工人作演講。當時京漢線其他車站也有與長辛店相似的工人組織。1923 年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

1922 年北京各大學學生中流行一種辯論會。辯論過“社會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辯論會有時是我們的同志為了宣傳，發起舉行的。各校的辯論會差不多都請李大釗同志為評判員。李大釗同志便在總結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說“社會主義遲早總要到中國來的”。

在 1922 - 1923 年間，我們的力量在學校中有很大的發展，中國大學、高等師範、朝陽大學等都有。我們無孔不入，就是當時最落後的“蒙藏學校”，我們也鑽進去了。烏蘭夫就是 1922 (或 1923) 年由我發展入黨的。

1923 年各校學生會幹部，差不多 1/3---2/3 是黨、團員。學運有組織、有領導的進行，與“五四”時自發情況完全不同。那時，沒有一次罷工、罷市、罷課不是黨領導的。

那時候我們看的書有：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馬恩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考茨基《階級鬥爭》，此外有日文的譯著。當時我們學習時間很少，有時請人作報告。軍閥政府對書籍查禁很嚴，從蘇聯回來的人都受到嚴格的搜查。蘇聯帶來一些報刊，有時夾在肥皂中帶回來。

也許是從 1923 (或 1924) 年開始，北京國民黨右派組織“民治主義同志會”(四川人鄧德高為首)，反對中國共產黨，很猖獗。他們仿

照我黨的辦法以北大為中心，在各專門學校發展會員，設立分會，搞學生會和我們競爭。後來他們失敗了，就參加到我們的學生會中來，和我們鬥爭。譬如 1923 年，北京學生推舉二個代表到廣州見孫中山，其中一個是我（我當時是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一個是“民治主義同志會”的代表，可見他們當時在北京有相當的勢力。

1924 年，我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家大事。我黨指示全國各省組織“國民會議促進會”，團結各方面的人士，然後組織“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的國民會議促成會設在北京教育會，我就在會中工作。“民治主義同志會”也搞了一個“全國國民會議促成委員會”設在宣武門外江西會館，同我們爭代表，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他們沒有群眾，後來，我們把他們的招牌打碎了。我們取得勝利。國民會議主要是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國民會議”是很大的運動，鬥爭很激烈，一般書只提了一下。

（王來棣、單斌記錄，王來棣整理）

關於北京建黨和中共“一大”等情況的回憶

劉仁靜



劉仁靜（1902 - 1987）湖北應城人。

1918 年考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1920 年 10 月經鄧中夏、羅章龍介紹加入共產黨北京小組。1921 年 7 月，作為北京小組的代表，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任華俄通訊社翻譯。1922 年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出席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2 年，和鄧中夏創辦《先驅》。1923 年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團中央書記。

1926 年赴莫斯科學習。

大革命失敗後，贊同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分析。1929 年從蘇聯回國途中，私自到土耳其訪問被放逐的托洛茨基，並將托洛茨基為中國革命草擬的綱領帶回國內，加以執行，成為中國託派的重要人物。1929 年 11 月被中共開除出黨。1935 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獄中發表“節制資本芻議”，被託派開除。1937 年出獄後，從事文字工作。全國解放後，改名劉宇。1950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聲明，作檢討。以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人民出版社等單位工作。晚年任國務院參事。1987

年逝世。

訪談記錄

(1957 年 4 月)

一、關於“五四”運動的領導問題

“五四”運動是一次自發的愛國運動。因為巴黎和會要把山東劃歸日本勢力範圍，中國學生從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堅決反對。北京學生在 5 月 3 日晚上開會，情緒非常激昂，主張第二天就進行請願，制止軍閥政府簽訂巴黎和約。但當時並沒有預料到這種行動將會引起全國規模的運動。至於 4 日遊行的具體議程，也沒有誰在事先計劃過。遊行隊伍到東交民巷，以後又去趙家樓、火燒曹汝霖的房子、毆打章宗祥等等行動，都是遊行隊伍出發以後，臨時決定的。

“六三”罷工，同樣沒有預先的計劃。

陳獨秀在“五四”時，無論在名義上、在實際上，都可說是運動的領導人。在運動期中，曾經發生這樣一回事：北大學生被捕後，陳獨秀自己寫傳單，托人印好後，親自到“新世界”樓上散發，當場被警察拘捕。由這一事實，也可看出當時在陳的周圍，還沒有什麼組織，如有，他一定通過組織來做，進行的方法也可以高明一些。

李守常先生是個從國民黨轉變為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他反對辛亥革命後國民黨的軍事活動，主張救國從宣傳新文化入手。“五四”時，他在《新青年》，《每週評論》等進步刊物上發表文章，反對文言文，宣傳新文化。這時候，他還不擅長於實際工作，沒有到下層去組織群

眾。他的影響，主要在北京，對全國的運動，沒有研究。李守常先生同國民雜誌社，新潮社以及少年中國學會有關係，是因為李先生當時是社會上知名之士，這些團體都同新文化運動有關，所以找上李先生。這幾個團體在當時還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

二、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情況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什麼時候組成很難說。1918年時，沒有這種組織。我是1920年冬天參加的。研究會的成員都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以北大學生為主，其他學校有個別進步分子參加。那時，大家正在尋找國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對社會主義還沒有明確的認識。研究會的幾十個會員中，除部分相信馬克思主義以外，有的相信基爾特社會主義，有的相信無政府主義。其實，在當時他們對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也沒有什麼研究，只是從雜誌上看了一些有關宣傳品，認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後看見別的主張更好，有的也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很崇拜自由，以為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紀律、妨礙自由，故退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如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陳德榮，陳友翠等，在研究會裏只參加了一兩次會就退出了。在他們退出研究會之前，研究會裏並沒有發生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爭論。他們退出研究會之後，就去搞他們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了。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沒有會長、幹事等名稱，沒有章程和綱領，也沒有有一定的紀律。開會時，願意來就來，不願意來就不來。發起者是幾個北大學生，其中沒有李守常先生。研究會開會，李先生也不參加，可能在背後指導。研究會開會多在北大第二院的教室，幾十個人在一

起，沒有分組，可以說是半公開的。

研究會的活動：

1. 請人作報告（有時是研究會內部人作報告），介紹馬克思主義，這種會不定期舉行。

2. 1920 至 1921 年間，會員中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何孟雄、包惠僧等，在鐵路工人中辦“工人補習夜校”，這種夜校，長辛店有一個，南口也有一個。此外，同唐山的鐵路工人也有聯繫。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裏並不討論工人運動（1922 年十月革命五周年，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開會，中國代表團中有一工人代表，就是長辛店的工人，姓王）。後來，交通部在鐵路工人中有特派員，通過李守常先生的社會關係，何孟雄和包惠僧也當了特派員，在工人中進行工作。

3. 指導學生聯合會工作，李守常先生同學生中一些進步分子談話以外，還給學生們講演等等。

4. 宣傳工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裏主要討論如何開展宣傳工作。

5. 舉行過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的紀念會，會上請人作報告。

研究會裏，沒有討論過黨綱、黨章。也沒有規定學習內容。

1921 年時，共產國際的刊物《國際通訊》，每週三期，有英、法、德三種文字。

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其他各地馬克思主義小組，除人事上有些聯絡外，沒有工作上的指示關係。記得 1921 年蘇聯召開遠東民族會議時，我曾通知上海、濟南、北京三個小組，選舉出席會議的代表。

1920 年時，北京只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沒有什麼外圍組織。天津覺悟社可以說是它的外圍組織，覺悟社是個進步青年的組織，同情馬克思主義。周總理、鄧穎超都是這個社的社員。

北京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 1922 年 5 月間正式成立的，以學生為主

要工作對象，參加學潮。

三、第一次黨代會的情況

第一次黨代會的人數是 12 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歷史書上說，第一次黨代會有過反對“左”、右兩種傾向的鬥爭，胡華的書說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等等，並無其事。在“一大”上，沒有什麼“左”、右派，也沒有什麼“鬥爭”。就我的情形說，當時還很年輕，對共產主義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統，成為一“派”；另一方面，毛主席在“一大”會上，很少發言，因為他剛離開湖南，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會上，並沒有什麼“鬥爭”。大會關於知識分子的問題，略有爭論。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動搖、不可靠，在吸收他們入黨時，應特別慎重，一般不容許他們入黨。

“一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張國燾有過一些小組織活動，結果他認為應選上的人都被選上了，象李漢俊這樣的人（在《星期評論》寫文章，懂得馬克思主義較多）卻沒有選上。

黨內政治上的分歧，直至 1923 年第三次黨代表會時，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才表現得比較明顯。一方面是陳獨秀，主張一切歸國民黨，國民革命應由國民黨來領導，認為孫中山是天然的國民革命的領袖。另一方面，毛主席主張應該依靠工人、貧農，認為中農和富農是靠不住的，有工農聯盟的思想。但毛主席在會上沒有以自己的意見駁斥陳獨秀的意見，會後曾同我談起上述的主張。陳獨秀的意見在會上占了統治地位。毛主席的意見同陳獨秀的意見間的矛盾，有如蘇聯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對陳獨秀的錯誤思想沒有看得

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損失。

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到中國來，對中國黨的建立，作用較大。他曾參加過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對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還提過意見。他曾到桂林會見了孫中山，因覺得中國共產黨力量太小，主張國共合作，他的這個意見得到了第三國際的同意。國共合作開始提出時，許多共產黨員思想不通，經他說服後，才得實踐。

（1980 年 3 月經劉仁靜審閱、修改）

介紹李大釗、周恩來等人的一些情況

于樹德

于樹德(1894 - 1982) 河北省靜海縣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18 年留學日本，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1 年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和李大釗成為摯友。1922 年，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經李大釗推薦去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大革命時期，在北京、天津參與主持學生運動和國民黨改組工作。1924 年和 1926 年，在國民黨“一大”、“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少數共產黨員之一；歷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常務委員、青年部長，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後，脫離中國共產黨，從事教學和著述工作，是我國最早講授合作社理論的學者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副總幹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副局長，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及第四屆常務委員。1982 年 2 月在北京病逝。

經于樹德修改過的訪談錄

(1956 年 12 月)

我和李大釗同志曾經在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後改為直隸法政學校)同學，1914年畢業。那時候，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畢業後，由湯化龍和孫伯蘭保送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在日本時，可能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接觸了社會主義人士，思想起了變化。1917年他從日本回國後，就超越一般民主主義思想而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了。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給他的影響更大。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他是否組織過共產主義小組，我不知道。但他在1917年曾組織過“少年中國學會”，該會在宣傳新文化，領導“五四”運動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我記得“五四”後，北京學生聯合會曾派代表團到日本宣傳，聯絡日本學生界，對日本學生界頗有影響，代表團中很多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人(該會以後分化得很厲害)。

有一個時期，大約在1920年左右，吳佩孚還駐軍洛陽時，他偽裝進步，接近文化人士，支持工人運動。這和他的一個重要幹部白堅武有關，白也是我們的同學，舊文學很有基礎，在學校與李大釗同志齊名，二人感情也最好，當時思想還進步，(後來當漢奸被打死了)。這時李大釗同志為了推動工人運動的目的，通過白的關係，一度 and 吳佩孚接近。這時李大釗同志大概已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了。

李大釗同志留學日本時，日本的思想界就很進步，就已經有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的著作就很多，帝國大學中就有講共產主義的教授，如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他那時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擔任的功課就是講馬克思主義的學理，講得很深，不易懂。我就是從他那裏知道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那時我還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當時留日學生中，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很少的)。在日本大學圖書館裏，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很多，外面查禁的，學校圖書館裏仍可看到。李大釗同志可

能在日本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他在日本三年，讀了不少的書，寫了不少文章，曾和章士釗一起辦過《甲寅》雜誌。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讀書時，就善於寫文章，其文章渾厚旁礪為全校冠。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李大釗同志寫了一付很長的挽聯，文字和內容都很好。北伐戰爭革命軍到武漢時，大釗同志給閻錫山寫過一封長信，勸他參加北伐，閻錫山後來接受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這封信曾起了很大作用。

1917年，一部分天津的學生，組織了一個“新中學會”，在當時也是一個進步組織。曾經醞釀過和“少年中國學會”合併，後考慮到合併不合適，決定這兩個會成為“友會”。後來多數會友都到日本讀書，“新中學會”也就移到日本東京。“新中學會”提倡科學救國，參加的多數是自由主義者，我也是會員之一。1918年留日學生為反對中日軍事密約，部分人主張歸國活動，“新中學會”當時沒有表示態度，實際不主張回國，主張埋頭讀書，學成救國。

為歸國問題，當時留日學生中意見很分歧。據我所在的京都而論，主張歸國的多半是學政治、經濟、文學的，杜國庠、何公敢是這一派的領袖。反對歸國的多半是學工程、理化、醫學的，領袖是黃國幹和孫孝寬。他們一般不關心政治，同時認為到日本來學習科技，如果沒有學成功就回國，到中國做不了什麼事，所以反對歸國。還有一些留學生，是為“鍍金”求資格來的，他們平日不好好讀書，政治上非常落後，也不贊成歸國。上述兩派爭吵不已，甚至打起架來。我和“新中學會”的會員們則抱中立態度，這種中間派當時人數也不少。

“新中學會”的實際領導人，是高仁山（被張作霖殺害）、童冠賢，有一段時期名義上由我負責。1924年時，他們把“新中學會”改組為費邊主義的“政黨”，我那時已是共產黨員，又參加了國民黨，我就退出

了“新中學會”。“新中學會”一部分人後來由顧孟余介紹參加了國民黨，他們在國民黨內，形成一個小派，稱“新中派”，曾經操縱過國民黨的北京市、天津市、直隸省和察哈爾省的黨部。有一次蔣介石到北方來，他們不去車站歡迎，（蔣介石免了他們的職。童冠賢在解放前曾擔任偽立法院院長，跟李宗仁等搞在一起。）

我是 1921 年由日本回國的，1922 年李大釗同志介紹我參加列寧召開的遠東民族會議。這個會在莫斯科舉行，中國派去的代表有數十人，共產黨、國民黨及其他進步團體都有代表參加，也有以個人名義去的。我是“新中學會”的代表，張國燾是共產黨代表中的負責人，山東的王燼美、鄧恩銘同志也都去了。張秋白是孫中山先生派去代表國民黨的，代表中王樂平（山東）也是國民黨員。本來這次會是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但張國燾以領導者自居，對非黨人士很不客氣，工作方法非常笨拙，造成黨和非黨人士之間很大的隔閡。有一次張國燾審問似的問我們信仰什麼主義，那時大家思想上還比較模糊，說不上信仰什麼主義。他這樣一問，很難叫人答復，引起我們的反感。我故意答稱“信仰無政府主義”，他就說我有反共思想，和我鬧了起來。到莫斯科後，他又數次聲言，不准非黨人員參加會議，製造摩擦。後來我們都參加了會議，並要我作中國經濟的報告。黨員中王燼美、鄧恩銘等同志對張國燾也不滿意。我經這次會後，對蘇聯的革命有所認識，但對中國共產黨因張國燾的關係，還有意見。回國後經過李大釗同志的解釋和介紹，才加入了共產黨。代表國民黨的張秋白，原有反共思想，回國後極端反對國民黨改組。這次會議，列寧因病，未能參加，在病中接見了張國燾，張國燾也沒有向我們傳達。

1922 年我在去蘇聯開會之前，因受十月革命影響，覺得工人是革命的力量，搞工人運動很重要。和幾個傾向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在天

津搞工人運動，從辦工人學校着手。(目的並不明確)我們辦了一個“工餘補習學校”，以恒源紗廠的工人為主要對象，在工餘時間教他們認字，算學。這個學校曾經向直隸省教育廳備過案。教員中，除一個正式的，每月拿二十塊錢的薪水外，其餘都是盡義務的，連伙食費都得自己想辦法。在上課的時候，不談政治問題，課餘有的教員用講故事的方式，向工人宣傳無政府主義。我本來也傾向無政府主義，從蘇聯回來後，覺得蘇聯很好。曾經向學生作過一次報告，頌揚蘇聯，說共產黨好，指出對大規模生產和交通無政府主義行不通。另外幾個傾向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對我的報告非常反感。過了幾天，也向學生作報告，說我受了蘇聯的賄賂，得了多少盧布，後來他們還出了一本小冊子，專門攻擊我。這個學校，因資本家感到對他們不利，要求天津警察局封閉它。1923年，部分教員被捕，學校被查封。

周恩來同志本來是南開中學學生，在校時，是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曾演進步的話劇，中學畢業後由“新中學會”幫助他去日本留學。他到日本後，看了許多進步的雜誌報紙，對日文和課程的學習不熱心，因此沒考入日本師範大學，即回國進南開大學。“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同志組織“覺悟社”，以南開的進步同學為主，也有別的學校的同學參加，這個組織在“五四”運動時的天津很起作用，很活躍。

國共合作前，國民黨和共產黨內部，都有一部分黨員不同意合作。共產黨內如張國燾，不懂得統一戰線政策的好處，同時有宗派思想，反對國共合作，(當時黨內對馬克思主義學習得很少，不像現在這樣有計劃地進行學習)。國民黨方面，反對國共合作的更厲害了。

為了國共合作，黨指令我參加國民黨。我本來加入過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後，就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活動。1923年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合作，因我和國民黨過去有過一段關係，參加國

民黨比較自然，所以叫我參加了。1924 年國民黨改組後，我擔任國民黨第一屆執行委員。

于樹德給歷史三所的信

上月（1956 年 11 月）30 日信悉。上次談話，並無倫次，不怪王、單二同志記不上來，連我自己也不知說了些什麼。現在只就來稿略加添改，勉強成文，不計工拙，聊以應命而已。至所詢問題，據知答復如下：

（1）遠東民族會議，因我不懂俄文，原名為何，我並不知道，當時到會的人都說是遠東民族會議（但據《中國共產黨歷史講授提綱》54 頁稱“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會議”或者是由原俄文名譯成），這次會議不但對中國革命有很大影響，對遠東各國（日本、朝鮮、蒙古、印尼都有代表）都有影響。中國的那些代表，後來很多為革命而犧牲，就是明證。不過如果當時中國黨的領導人得人的話，其影響還要更大。（其影響可參看上引《黨史講授提綱》54 頁。）

（2）施存統（現名施復亮）、周佛海、彭湃等在日本活動情形我不知道，可直接向施存統詢問（施現任勞動部副部長）。

（3）無政府主義者份子複雜，吳稚暉、李石曾、黃凌霜、黃碧魂（女，為陳炯明所殺害）都自稱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活動是多方面的，政治活動、教育工作（勞動大學）、出版工作、反革命活動樣樣都有幹的。

工余補習學校學生人數，多的時候幾十人，少的時候幾個人。

（4）上次介紹的那個黃之彬，我見過他，問他當時留日學生回國風潮，他一點也不記得，不必訪他去了。大方家胡同的包景岐我也見

過她，她病着。關於覺悟社的情形，她介紹當時社員中比較活動的韓恂華（女）同志，她住東單黃獸醫胡同一號。山東民革范予遂先生，曾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對鄧恩銘、王燼美同志當時在山東的活動情形可能知道一部分。

你們如有問題可隨時電約來談。敬禮！

于樹德

1956.12.6.

的1942
于树德同志談話記事表 1956.11
(后设为直隸行政學院)

我和李大釗同志曾經在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同學，那時候，他是個民主主義者，思想還不怎麼進步，辛亥革命時，沒有參加什麼活動。
畢業後，由湯化龍和孫伯蘭保送他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時，可能看了馬克思主義的書，思想起了變化，他從日本回國後，就受一般民主主義思想而有了進步了。
吳有社 1917年五四運動時期，是否組織過共產主義小組，我不知道。但他在1917年曾組織過「少年中國學會」在宣傳新文化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五四後，少年中國學會曾派代表白鶴、段錫朋等到日本宣傳，聯絡日本學生界，對日本學生界頗有影響，代表團中很多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人（該會以後化的很厲害）。
大約在1920年以前，接近文化士。
有一個時期，吳佩孚趨於進步，支持工人運動，這和他的一个重要幹部白堅（？）有關，白是我們同學，當時思想還進步，（後來當漢奸了）。李大釗同志一度與吳佩孚接近，是有目的的。這時李大釗同志大概已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
就進步 就已定

李大釗同志留學日本時，日本的思想界很複雜，有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的著作就很多，帝國大學就有講共產主義的教授，加藤大教授河上肇，他不是共產黨員，但當時曾進馬克思主義的學理，講得很深，不易懂。我就是從他那裡知道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但那時我還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當時留日學生中，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很少的）。在日本大學圖書館里，書很多，外面查禁的，學校圖書館里仍可看到。李大釗同志可能在那裡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他在日本三年，寫了不少文章，曾和章士釗一起辦甲寅雜誌，必定寫了不少文章，甚至評語書。
在日本 讀了不少的書

（李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讀書時，就善於寫文章，在開全校。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李大釗同志寫了一篇很長的視聽，文字和內

容都很好。北伐時，^{新學軍到武漢}大劍同志給閻錫山寫過一封信，勸他參加北伐，^{接受}閻錫山後來在國民革命軍第三路總司令，這封信曾起了很大作用。

1917年，^{一部分}這所大學的學生，組織了一個「新中學會」，曾經^{多數}和「少年中國學會」合併，但考慮到合併不適合，決定這兩個會成為「友會」。後來^{多數}和^{多數}友都到日本讀書，「新中學會」也就移到日本。^{東京}「新中學會」提倡科學，參加的多數是自由主義者，^{救國}（我也是會員之一）。

1918年留日學生為反對中日軍事密約，部分人主張歸國活動，「新中學會」當時沒有表示態度，^{實際不主張回國}主張理頭讀書，學成救國。

為歸國問題，當時留日學生中意見很分歧，據我所在的京都而論，主張歸國的多半是學政治、經濟、文學的，^{何公敢}仕國學派是這一派的領袖。反對歸國的多半是學工程、^{理化}醫學的，^{科學}傾向是實國學派。他們一般不關心政治，同時認為到日本來^{是為了學習}，如果沒有學成功就回國，到中國做不了什麼事，所以反對歸國。還有一些留學生，是為「鍍金」求資格來的，他們平日不好好讀書，政治上非常落後，也不贊成歸國。上述兩派爭吵已，甚至打起架來。我和「新中學會」^{的會員們}則抱中立態度，這種中間派當時人數也不少。

「新中學會」的負責人，^{實際領導}是高仁山、^{（被張作霖殺死）}重光質，^{（有一時期）}名義上由我負責。1923年時，^{他們把新中學會改名為政黨的}他們改名為新中學會，成為「政黨」，把政綱寄給我。

我那時已是共產黨員，又參加了國民黨，不同意「新中學會」改為政黨，向他們表示，^{（新中學會）}假若改為政黨，我就退出。他們當時有反共思想，^{（國民黨）}學會一部分人後來，^{（國民黨）}由顧孟余介紹參加，他們在國民黨內，形成一個小派，稱「新中派」，曾經^{（操縱過）}操縱過國民黨的北京市、天

津市、直隸省^{省部}和察哈爾^{省的黨}兩部~~的~~。有一次蔣介石到北方來，他們不去歡迎，~~蔣介石免了他們的職。章冠賢在解放前曾擔任偽王長海~~，~~對蔣動輒下命令一點不滿意，後來他則跟李~~
 宗仁等痛在一起，~~有的政治主傾向邊疆主義。~~）
 我是1921年回國的，1922年李大釗同志邀我參加遠東^{介紹}民族會議，^{列寧召开的}（~~王~~）这个会在莫斯科舉行，中國派去的代表有^數十八人，共產黨、國民黨及其他進步團體都有代表參加，也有以個人名義去的，我是「新中學會」的代表，張國燾是共產黨代表中的負責人，山東的王燁美、鄧恩銘同志也都去了。張秋白是孫中山先生派去代表國民黨的，代表中^王梁平（山東）也是國民黨員。本來這次會是帶有統一戰綫性質的，但張國燾以領導者自居，對非黨人士很不客氣，^{工作方針非常策略}（~~造成黨和非黨人士之間~~）^{很大}的隔閡。有一次張國燾問似的問我們信仰什麼主義，那時大家思想上還比較模糊，說不上信仰什麼主義，他這樣一問，很難叫人答復，引起我們的反感，我故意答稱「信仰無政府主義」，他就說我有反共思想，和我鬧了起來。到莫斯科後，他又數次聲言，不准非黨人員參加會議，^{（後來我們都參加了全俄黨代表會議，並要我們作中國經濟的報告）}卻^對摩擦石黨員中王燁美、鄧恩銘等同志對張國燾也不滿意。我經這次會後，^{有所認識}覺得蘇聯的革命很好，
 但對中國共產黨因張國燾的關係，^{還有意見}。代表國民黨的張秋白，^{（回國後經過李大釗同志的解釋和介紹才加入了共產黨）}原^有反共思想，後來反對國民黨改組，^{（回國）}可能也同這次張國燾的作風有關，^{極端}這次會議，列寧因病，未能參加，在病中接見了張國燾~~（入）~~，張國燾也沒有向我們傳達。

1922年我在去蘇聯開會之前，因受十月革命影響，覺得^{工人是革命的力量，}工人工人運動很重要，和幾個傾向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在天津搞工人運動，

从办工人学校着手（目的並不明确）我們办了一个「工人補習学校」，以恒源紗厂的工人为主，^{要对象}在工余時間教他們識字，算學。这个学校曾經向直隶省教育厅備案。教員中，除一个正式的，每月拿二十块錢的新水外，其余都是尽义务的，連伙食費都得自己想办法。在上課的時候，不談政治問題，課余有的教員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工人宣傳无政府主义。我本来也傾向无政府主义，从苏联回来后，觉得苏联很好，曾經向学生作过一次报告，頌揚苏联，說共产党好，指出无政府主义行不通。^{对大规模生产和交通}另外几个傾向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对我的报告非常反感，過了几天，也向学生作报告，說我受了苏联的賄賂，^{得了多少虛名}后来他們还出了一本小册子，專門攻击我。这个学校，因資本家感到對他們不利，要求天津警察局封閉它，1923年，部分教員被捕，学校被查封。

周恩来同志本来是南开中学学生，在學時，是文藝活动的積極分子，演进步的戲，中学畢業后去日本留学，^{由新中學會幫助他}沒有錢，由「新中學會」^{和課程的}提供，他到日本后，看了許多进步的雜誌報紙，对日文學習不熱心，^{没人}因此^{大学}沒入日本師範^{五四运动时期}，~~因此没考日本師範~~即回国进南开大学。周恩来同志組織「觉悟社」以^{南开}进步的同學为主，也有別的学校的同学參加，这个組織在五四运动時的天津很起作用，很活躍。

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都有一部分黨員不同意，共产党內如張國燾，不懂得統一戰綫的好處，同時有宗派思想，反对国共合作，（當時党内馬克思主义學習得很少，不像現在这样有計劃的進行學習）。国民党方面，反对国共合作的更厉害了。

为了国共合作，党指令我参加国民党。我本来是同盟会^{加入过}，参加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就没有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23年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因我和国民党过去有过一段关系，参加国民党比较自然，所以^{叫我}参加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我担任国民党第一届执行委员。

1956.11.
——以上记于树德同志市同、修改

王来棣、单文访问
王来棣整理

上月三十日
信委。上次谈话，毫无伦次，不怪王、第二同志记不上来，连我自己也不记得^了些什么。现在只就来稿略加添改，勉强成文，不计工拙，聊以忘命而已。至于询问处，据知答复如下：

① 远东民族会议，因我不懂俄文，原名为何我并不知道，当时到会人都说是远东民族会议（但据“中国共党史”讲称“54年称远东和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会议”或“由陈独秀伏成）。这次会议不但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影响，对远东各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都有代表）都有影响。中国的那些代表，很多不革命而如他就说明。不过如果当时中国党的领导人的话，其影响还要大。（^要会上讲被俄国^要引）

现补施亮

② 施亮在国保局时，我不知，可直接向施亮询问（施亮劳动部副部长）。

③ 无政府主义份子复杂，美雅晖李石雪黄炎霜黄瑞魂（女）都有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政治活动，教育工运（劳动大学），出版工运，反革命活动，样样都有干的。工会补习学校学生人数，多时几十人，少时时候几个人。

④ 上次介绍的那个黄之楷，我见过他，向他当时曾回国回国潮，他一点也不记得，不必说他去了。大子家胡同的景景我也见过她，生病着，关于觉悟社的情形，她介绍与当时社中比较活跃的韩陶华同志。她在东平黄之楷时期同一号。山东师范于遂先生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对邓恩、王德美同志当时在山东的活动情形可他知道一部分。

你们如有问题可随时来电来谈。敬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于树德 1956.12.6.

回憶天津“覺悟社”

鄧穎超



鄧穎超 (1904 - 1992)，女，原籍河南光山，生於廣西南寧。早年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讀書，1919 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並在運動中參與組織覺悟社、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天津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等團體，是天津婦女運動的領導人。1923 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天津團的創始人之一，第二年轉為中共黨員。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 年在國民黨“二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直屬總

支部書記等職。1932 年赴中央革命根據地。1933 年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1934 年參加長征。到陝北後，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央機要科長。抗戰爆發後，任長江局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南方局委員和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統戰工作，發動婦女參加抗戰和民主政治運動，並與各界婦女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搶救戰

地兒童。1938 年當選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參政員。1945 年在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1946 年當選為國際婦女聯合會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名譽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9 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1983 年擔任第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1988 年辭去政協主席職務。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92 年病逝。

【編者按】

這次採訪在中南海西花廳進行。鄧穎超同志指定我們從中南海一個旁門進去，由她的秘書帶領我們到西花廳一個寬大的客廳就座。鄧按照我們事前寄給她的採訪提綱和臨時提的問題，一一作了解答，大約談了一個小時。訪談記錄因整風反右運動，未能送她審查。1980 年《“一大”前後》編輯部把我整理的記錄送鄧穎超同志審閱，她未加任何修改。

鄧的談話有幾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說：“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根據這一論斷，一般史書把當時進步團體中的積極分子稱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包括覺悟社的周恩來和鄧穎超。鄧穎超卻說：那時我們還“不瞭解什麼是馬克思

主義，所以在當時我們還不能稱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二)對蘇俄的認識問題，她說：“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也只聽說蘇聯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嚮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可見當時對蘇俄的宣傳，有很大虛誇的成分。(三)介紹了社會黨的一些情況，這是別的書上很少見的資料。

訪談記錄

(1957年5月)

關於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我談不出很多東西。一則時間距今將近40年了；再則“五四”還處在運動的萌芽前期；“覺悟社”本身存在的時間極短，加上當時我的年紀還小，才十五、六歲，是個娃娃，很幼稚。我現在只能圍繞着“覺悟社”談談。

“五四”時，全國還沒有共產主義的組織，只有進步的組織和團體。天津有“覺悟社”、“生社”兩個團體，北京有“工讀互助團”，湖南有“新民學會”，武漢有“利群書社”。在學生中間，我還沒聽說有以共產主義為名稱的組織，或者以共產主義為信仰的組織。當時只有受十月革命和某些雜誌的影響，從互助出發，建立起來的超過學生會的進行學術研究的追求進步的組織。

“五四”時，我們對各種思潮的內容知道得很少。那時候宣傳共產主義的書不多，統治者的報紙刊物不可能登載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吸收新知識，只能看《新青年》、《少年中國》等雜誌。直到我入黨時，也只讀過《共產黨宣言》，以後讀過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也只聽說蘇聯是沒

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嚮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同情廣大勞苦大眾，厭惡中國社會的黑暗。我們平常交談的範圍很廣，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都接觸到了，但對這些我們都沒有明確的認識，也不瞭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當時我們還不能稱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只能說從那時起我們這些人，要求繼續學習，吸取新知識。黨成立後，我們受黨的宣傳和影響，思想逐漸成熟，終於參加了黨，成為共產主義的戰士。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是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受更先進的知識分子李大釗、毛主席的宣傳以及黨的教育，這三方面因素是相互關聯着的。有這三種因素，“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導人，才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黨成立前，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是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進步的團體，相互影響着，推進着的。黨的成立，也是先有各地小組，通過刊物交往，工作聯繫，才有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五四”運動的領導成員，還不能說就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可以這樣說，“覺悟社”的社員都是當時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其他各地進步團體的情況多半也是這樣。共產黨和青年團建立後，“覺悟社”的絕大部分成員，都分別先後參加了黨和團的組織。這裏應當說明，我們成立“覺悟社”時，並沒意識到是為了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當時也沒有這個要求。我們都是學生會的負責人，有關學生運動的事情，就到學生會討論。（不象現在的黨委、黨組制定工作計劃，再由黨員去貫徹）而有關學習上的問題，我們“覺悟社”的社員就不在學生會討論了。

“覺悟社”的社員中，恩來同志和馬駿同志一樣，是學生會的積極領導者。他主編《學生聯合會日刊》，日出 2 萬份。在當時這是了不起的數字。該報對學生運動起了指導作用。恩來同志除了主編會刊以外，還進行其他活動，他的《警廳拘留記》可作參考。他是“覺悟社”的中

心人物。

談到那時候我們搞愛國運動的情況，真是滿腔熱情，要求洗雪國恥，“奔走呼號，痛哭流涕”，這幾句話形容的很恰當，那時的愛國學生的確是這樣。

“覺悟社”的活動，象《覺悟》所載《三個半月的覺悟社》一文說的那樣，只作過那些事情。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活動以搞學生會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社會活動。因此，你們不能以現在的情況，向我們要當時的材料。當時我們渴望學習新知識，沒有書讀，就請當時的名流象李大釗、陳獨秀、張申府、劉半農等人給我們演講，我們聽信他們的演講，但對各種主義的內容並不清楚。“覺悟社”受的思想影響，與其說接近共產主義，不如說更多地接近無政府主義。但這不是說，當時天津文化界有誰向我們宣傳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接受無政府主義比接受馬克思主義容易，是否與他們的自由主義有關係，請你們研究，我只作為問題提出來。

“覺悟社”沒有頭目制度，沒有正副會長，沒有規章，活動方式比較靈活、輕鬆。我們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鬬代號。記得抓鬬的那天，我們寫了 50 個號碼，放在盤子裏，每人用筷子夾一個作為自己的代號，多餘的是給後來入社的同志準備的。當時我們只有 30 來個人。我抓的是一號，恩來同志是五號。後來恩來同志曾用過“伍豪”，我用“逸豪”作筆名。那時候，恩來在我們中間，年齡比較大，也不過 21 歲，還是個娃娃。

我們用代號，有以下幾種思想情況。主要是有廢除姓氏、割斷歷史的思想；其次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再者還有神秘思想。對於無政府主義，我們並沒有把它搞清楚，至於說，我們以無政府主義作為信仰，根本沒那回事。“覺悟社”的成員，沒有一個人看過一本無政府主義的

書，後來也沒有加入無政府主義行列的。當時我們的思想，還處於啟蒙時期，就是說，還不明確，不肯定，思想還在變動着，發展着。

“覺悟社”吸收成員很嚴，入社者必須有三人介紹，介紹人還必須將請求入會者的優缺點詳加介紹，然後經大家討論批評通過。

那時候，進步知識分子裏有宗派情緒。思想接近的，要求差不多的，脾胃相投的，彼此願意接近；對那些脾胃不投的，瞧人家不起，嫌別人的思想作風不好，拒絕他們參加“覺悟社”。天津“生社”，當時就是在這樣情況下成立的，他們有意識成立起來讓我們看看。“生社”裏面有女師的同學，例如王××等等。這個社成立後，和“覺悟社”應該是姊妹社的關係，但我們反而不樂意。這實際上是宗派情緒的表現。

《覺悟》可能有第二期，我記不清了。《覺悟》發行時，“覺悟社”的大部分社員已離開天津，只剩下一兩個人了，我記得第一期和第二期是一起寄發的，經我的手，多半是贈送的。

*

*

*

*

解答問題：

一、黨成立之初，天津沒有支部。我是天津團的創始人之一，第一批入團，參加天津團成立大會，沒有入團介紹人。一年後，市委通知我轉為黨員。以後我就擔負黨的工作了。

二、“平民學校”是社會黨辦的（該黨是在辛亥革命後，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一支），地址在北京南橫街。我母親在這個學校教書。這個學校的教員都是盡義務的。惟我母親和我由學校供給伙食。社會黨提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黨的重要人物，當時有“南龍北虎”（即

陳翼龍和江亢虎)之稱。“平民學校”的校長是陳翼龍。陳等義務辦學，克勤克儉，收留窮人子弟入學。社會黨以此校為據點，進行反袁。陳還時常到南方活動。民(國)二年，陳被袁世凱逮捕，槍斃在宣武門外。

材料糾正：

朱韻秋在《中國婦女運動的急先鋒鄧穎超》文中寫道：“鄧女士……初進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的時候，因為教務長主張學生讀古文，採用全校會考制，以麻醉學生的思想，束縛學生的行動，她極力反對。會考時同大家交白卷子，作消極的抵抗，教務長慫恿校長以全體解散來恫嚇學生……後她同許多同學被學校開除了，……經過了這次的開除，她受到家長的責罵，便考進了一所教會的學校。”

這個報道不符事實。“五四”運動時，學校阻止我們進行愛國活動，國文教員強迫我們考試，我在作文試卷上斥責學校當局，為什麼不准學生愛國。國文教員很氣憤，問我為啥在考卷上罵人。我否認罵人，並申述青年愛國的理由。學校當局原想借這次事故開除我們這些搞運動的人，結果在學生家長的共同反對下，學校才不敢開除我們。記得關於這件事，我在《女星雙週刊》上發表有文章。這份雜誌可到天津圖書館找找看。

(王來棣、單斌記錄 1980年3月經鄧穎超審閱)

關於天津青年接受馬克思 主義和旅歐支部的回憶

劉清揚



劉清揚(1894 - 1977), 女, 天津人, 回族。1911 年加入同盟會, 1919 年參加五四運動, 發起組織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 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 9 月與周恩來等人組織覺悟社, 參加領導天津的學生運動。1920 年, 赴法勤工儉學, 192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 年底回國, 在廣州、上海、北平組織愛國婦女團體。1924 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協助何香凝工作。大革命失敗後, 退出國民黨。不久, 脫離中國共產黨。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 參加北平婦女救國會和各界救國會, 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1937 年在武漢、重慶任戰地兒童保育會理事、重慶婦女聯誼會常務理事。1944 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任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1949 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等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受迫害，1977年在北京逝世。

關於“五四”前後歷史情況的簡述[※]

(1957 年 1 月)

要回憶“五四”以前的歷史情況，必須要追述到所以發動這樣熱烈的青年愛國運動的思想根源。因此以我為例來說，我的愛國思想，是啟蒙於八國聯軍入侵我國津、京，我曾親自經歷了那種慘遭迫害的情景，雖然當時我還幼小無知。但在我的記憶中，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年齡稍大而開始讀書時，便意識到“國破家亡”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憤怒和仇恨。

庚子年八國聯軍於 6 月 18 日侵入天津。當敵人登城，隨便殺人放火的亡國慘狀，我雖然才年方七歲，但已深刻體會到年長人們的恐慌，愁慘的憂慮。尤其在滿清和英、法、德、俄、日本等八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以後，天津就有了上述等國列強的租界。美國雖然無租界，但後來也有了美國駐軍的兵營。並且拆了城牆，修築馬路之後，比利時和瑞士便相繼投資修建了電車交通和自來水公司。從此開始了帝國主義對天津經濟侵略的日益深入。

我十二歲時，天津才開始有了女校。于當年冬季我才入天津嚴范孫先生在他家中創辦的嚴氏女子小學讀書。當時小學的課本，以及教

※ 【編者按】本文是劉清揚女士根據我們的採訪記錄重新撰寫的回憶錄。

師們的講課，都有朝鮮亡國後慘痛生活的講述。因此啟發了孩子們的愛國思想，因此也就使我深刻地回憶起八國聯軍侵入天津，人民遭難的情況，而激發了參加愛國運動的熱情。由十三歲開始到十七歲止，曾參加天津各界人士所發起的三次國民捐和救國儲金運動。

辛亥革命時，我還在天津女子師範學校讀書。該校校長吳鼎昌是個專制官僚，對學校的教學管理，都令人不滿意，尤其對學生的待遇是不平等的。因我敢於揭發校長的不良現象，因而能團結同學對學校作鬥爭，學校當局對我無可如何。灤州起義的負責領導人，原是我們學校的地理教員白雅雨先生。他當時想到灤州去聯繫發動起義，因為是教書的窮知識分子，無法籌措旅費和活動費。當時因我已經同學崔昭華的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因此白雅雨先生和我商議籌款辦法。我便向我的哥哥劉孟揚宣傳、鼓動他設法幫助。要求他從冬季募捐的救濟貧民的賑濟費中，抽出一部分，協助白先生去灤州活動起義。當時我哥哥是天津《大公報》第二任主任編輯，後來又自己創辦《民興報》，在地方上是有些聲望的。賑濟費是每年冬季都由報館邀請戲劇界組織義演而募捐的。白先生到灤州起義不幸失敗而犧牲了。灤州起義雖然失敗，但因這一距離天子腳下切近的灤州，竟能發動了革命鬥爭，這也就動搖了專制皇帝的封建統治。因而此後不久，武昌起義便繼之而起，從此就推翻了滿清皇朝，而結束了數千年的封建統治。

辛亥革命的結局，就其推翻滿清政權，結束封建統治來說是成功的。但當時孫中山先生，因無足夠的軍事力量，所以要利用袁世凱軍閥的武力而推翻滿清。於是和袁世凱的妥協，便造成了革命的失敗。尤其這一不徹底的革命勝利，所組成的國會議員，當然還都是資產階級的人物才能參加進去。雖然辛亥革命時我國各地不少的婦女都也參加了鬥爭，但在競選國會議員時，並不給婦女以平等應得的權利。為

此當時上海的女子北伐隊的領導人唐群英女士，就和國會議長宋教仁去理論，並憤而動了武。經孫中山先生親自出來調解，才結束了這一糾紛。更在袁世凱的篡奪革命勝利成果的統治之下，當時我們前進的革命青年，當然是憤憤不滿而非常失望。進一步認識到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不是我們理想的目的，因此更使我們尋找前進的道路，逐漸地摸索到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

引導我們要求進步的青年，有了初淺社會主義思想認識的，有以下三種因素：

（一）天津東北城角有一個襪子胡同內，有一家《新春秋》報館，其中有一個編輯名叫華林。他在民國元、二年，常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無政府主義的小品文，對於當時由於政治苦悶而尋找革命出路的青年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他要宣傳無政府主義，當然要責罵當時政府的混亂和無能，不能負起人民所希望的“救國圖存”的責任。於是使我們也就認為，既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又成立了中華民國仍是換湯不換藥的一群官僚。因而使許多尋求自由的青年，認為無政府主義是有道理的。其實華林所宣傳的無政府主義，並無正確的理論內容，而且多是出於個人的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戀愛自由的可笑而幼稚的言論。我還記得有以下的幾句打油詩句，登在報上，使人感到浮淺而無意義：“紗窗對坐，共話情深，吾人處之，其樂何如。”這就是華林所描寫的無政府主義時代的生活。

比較起有力作用的是，在華林的宣傳之後，廣東有劉師復、北京大學有位黃凌霜教授，宣傳了些俄國克魯泡特金著作的無政府主義小冊子，如《麵包與略取》，《八小時工作制》、《同工同酬》等是頗受青年所歡迎的。

（二）當時天津還有姜般若和江亢虎二人，也在宣傳無政府主義

或社會主義。但他們並無中心思想和正確的理論，不過是個人的活動，既無組織，也無群眾，因他常發表些言論，所以青年也都知道他們。如姜般若是天津南開學校的學監，在“五四”時，自己曾以“真社”的名義，出過《新生命》半月刊，內容常登一些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文章。因此引起一位住在天津舊俄租界的一位俄國人名鮑迪威的，訪問了姜般若。此人住在中國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可能是蘇聯派來的地下工作者。但他並不承認是共產黨人，但思想是進步的。後來他又介紹一位名哈德洛夫的，他自承認是俄國革命工作者。姜般若介紹我和他們認識之後，也常相往來，我也介紹周恩來同志和他們見過面。江亢虎和姜般若二人，後來都沒落了，並且作了投降日本的漢奸。

（姜般若等擁護十月革命，贊同五四運動，但在這次運動中，沒有什麼實際行動）。

（三）真正領導我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還是李大釗同志對我們青年的影響最深。自從他由日本學成歸國，便宣傳社會主義，教育青年為愛國救國進行革命鬥爭。並鼓吹亞洲國家聯盟，以防止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對於青年愛國革命思想有很大的啟發。李大釗同志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之後，在北京相繼出版了《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星期評論》、《甲寅雜誌》等進步刊物，這對中國青年接受社會主義思想而逐漸傾向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鬥爭，是起着決定作用的。這也就是在北京大學團結教育了愛國青年，發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

我們天津青年，最早有個很小的社會黨團體的組織，成員有我、崔昭華（女）、南開中學的段茂蘭、男青年會的劉家□等幾個人。同時因北京有位陳翼龍，是竟業中校的校長，他在領導社會黨組織的活動。我們在天津，也是受了他的影響而活動的。我們的行動是每週在宣講

所舉行講演會。宣講所在東、西馬路各有一個。講演的內容，包括各種社會問題、時事、救國道理、以及對現政府（民國政府）的不滿，揭發當時的黑暗等等。民國四年以後，我們曾數次請到李大釗同志演講，有一次在東馬路男青年會，人很擁擠，講的題目大致是鼓吹“亞洲聯盟、抵制歐洲的侵略”。

我們的愛國思想，醞釀到 1917 年，俄國革命成功給我們有很大的啟示，我們肯定了走俄國的道路。俄國放棄在華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當時的影響對中國的愛國人民是很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資本家起來了。大戰後，帝國主義又侵入到中國來。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家是有矛盾的，所以“五四”運動時，他們也參加了反帝鬥爭。

“五四”運動是青年學生、愛國知識分子、城市工人、甚至工商界的資本家和宗教界人士都參加了。包括的各界群眾是相當廣泛的，但惟有鄉村農民，我們未深入動員，便是“五四”運動不夠全面的重大缺點。

“五四”運動，是北京的學生發動起來的，天津的學生立即支持響應。而運動深入的程度，天津要比北京普遍廣泛。因為天津各國租界地，受帝國主義的威脅嚴重，所以天津學生聯合會的宣傳工作既有思想性又做的深入。這也是由於天津“五四”運動領導核心是覺悟社，指導思想是嚮往俄國革命。學生以罷課為武器，抵制日貨是行動。那時候，我們受到很大的迫害，被捕的很多。在 1919 年終之前學校當局受反動官吏指示，打算提前放假，強迫學生離校以制止天津的活動。我們“覺悟社”人決定作最後的鬥爭，動員全體同學出去講演。周恩來同志在平時不出頭，專為編輯天津學生聯合會的報，以及從事思想領導工作，他的聲望在群眾中是很高的。這次他也出來參加，並帶領學生

群眾直到曹銳省長公署請願。在這次請願時，周恩來同志和其他青年婦女領袖等四五個代表都被捕了。由於“覺悟社”有計劃的作了這次最大的群眾性的鬥爭，並決定周恩來也出頭參加被捕，是根據我們的策略而進行的。因為以此聲勢浩大的運動，容易激起全國的同情響應。為使學生運動不致被提前放假的陰謀所分散破壞。為使這一運動擴大影響，所以事前就把我有計劃地藏天主教堂。後來改裝成修道女，乘車到南京、上海去宣傳，發動了響應天津學生的三萬人的運動，聲援並要求釋放天津的學生和各界被捕人士，並呼籲全國學生仍繼續作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和拒絕巴黎和會簽字的鬥爭。因天津的愛國運動，雖前後主要領導者有三千多人，在形勢上是被打擊得沉默下去了。但由最後一次有計劃的鬥爭，而使全國的運動能保持活動下去，直到半年之後。巴黎和會拒絕了簽字，使亡國的“二十一條”不生效力，而天津全體被捕的愛國人士得到釋放，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才勝利的結束。

在“五四”運動結束之後，簡述其情況，是如此的：

1、上海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各地方的學生會組織，還保留了組織機構，和經常的發生聯繫，但原計劃的打算由全國學聯出一個全國性的愛國刊物，一則為鞏固團結青年學生，再則教育和提高全國學生的思想認識，但因人力、財力的困難，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2、全國各界聯合會以及各地方的各界聯合會，已無活動的必要，所有常務負責人，也都各歸原地。以後便停止了活動，而取消了組織聯繫。

3、凡是在“五四”運動中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的青年，都感到自己責任重大，需要加強學習，尋找真理，以充實自己的鬥爭武器。即紛紛組織出國去學習，因為都感到經濟的困難，所以當時的法國留學派，

便發起了勤工儉學的運動。於是北京、天津、湖南、四川、上海、南京等地的青年，即趁機會出國去學習。最多的首先都是到法國，然後另有辦法的少數人，(北大的陳寶鑑後來轉到英國去了，關斌依靠青年會轉到美國去了，轉到法國的如總理和劉清揚，)有的轉到英國和美國，去法國的人，逐漸又轉到德國。其中少數的前進分子，便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後來也有從此去蘇聯的，但並不多。

在“五四”以後去蘇聯留學的辦法，還是很不容易。一則是要錢花的多，再則如無特別的關係，是無法去的。因為當時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無機關保送當然是不能去的。所以當時出國的人，都是去法國留學。

4、最偉大的收穫是在 1920 年秋，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而在 1921 年，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其次是國民黨的工作也活躍了)。所以在“五四”運動後，雖然各界聯合會取消了，學生聯合會工作停頓了，而學生領袖和積極分子都出了國，但並不是把運動消滅了，而正是積極地走向發展的規律，為更進一步的大革命鬥爭，打下有力的基礎，作好有力的準備。

關於“覺悟社”問題的解答

(1957 年 1 月 14 日)

1. 在“五四”運動爆發後，天津的學聯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男女青年，在熱烈英勇的鬥爭中，團結合作的精神，日益親密。因此逐漸把由封建習俗所約束而成立的男女分立的兩個團體的成員，在工作中和學習中，都打破了男女隔閡的封建顧慮，完全成為並肩奮鬥、共同

努力、男女平等的友誼。尤其在“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兩個月中所經歷尖銳鬥爭的考驗，都表現出為熱愛祖國互助合作的大無畏的精神。因而有了比較進一步的瞭解，其中就發現了比較積極的一些男女青年，要求在工作的合作上，和在互助學習上，有更密切組織起一個活動中心力量的必要。在這樣一個動機上，就形成了“覺悟社”小團體的組織。其主要活動內容是約定時間，大家要集中學習當時新思潮和一些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理論問題。正如鄧穎超同志在《“五四”運動的回憶》一文中所寫的，領導學習由周恩來同志負責。同時在這個小組織中，也商談一些關於活動的計劃和策略，因此這個組織，也就起着在運動中的指導作用。組織的性質，比較嚴密，也有一些行動紀律。當然也還不象黨的組織紀律那樣嚴肅，主要是在工作中的鬥爭活動是較有計劃和規律的步調一致性。

2. “覺悟社”的成員，要自覺地要求進步與學習，要自動地過有規律的生活。要有團結合作、英勇不屈的奮鬥精神，但其中並無社長和幹事等職別，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我們在內部建立秘密的暗號代表姓名。如周恩來同志是五號（以抓鬬而定的），所以後來恩來同志在上海作黨的地下工作時，常用“伍豪”的名字發表指示。其中骨幹分子有二十多人，當時社在發展中約有四十多人。因此，在用名號上還有三十六等數字（如《覺悟》文章中的署名便是）。我的號數是二十五，後來我用隱名時，是叫“念五”。我們還有一位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副會長，原名李毅韜，名號是“四三”，後來改名李峙山。馬駿同志在“覺悟社”中並無特別活動，同大家都是一樣的。不過，在過組織生活時，我和馬駿同志因去上海，而較少參加。

“覺悟社”（“覺悟社”在“五四”時，對工人演講，鼓動他們參加愛國運動，反對帝國主義，主張八小時工作制）在1920年1月以後，可以

說已完全處於退守的時期，正如鄧穎超同志在“五四紀念文輯”上所寫的“一部分社員被捕入獄（如周恩來、馬駿、郭隆真等），一部分社員在學校畢業後分散各地，剩下少數人因為環境惡劣不能作什麼活動。”這完全是當時的實在情況，我計算那本《覺悟》刊印的時候，已經是周、馬、郭以及學聯和各界的負責人三十多人都被逮捕了去的時候，所以天津當時的活動，已成沉默的情況，但只有從全國各地發出來營救天津被捕愛國人士的強大呼聲，要求取消“二十一條”的怒吼，仍在熱烈的鬥爭中活動着。當時的我，就為留下來，潛行南下，宣傳天津被壓迫的慘劇，到南京、上海等地，呼籲動員全國各地繼續奮鬥，然後我便被全國學聯決議派到南洋去宣傳國內青年運動的鬥爭，直到巴黎和會中國的代表拒絕簽字，取消“二十一條”；天津全體被捕代表得到釋放出獄（“覺悟社”二十多人的合影照片，正是在這時候攝的），我從海外回國的時候，一部分“覺悟社”的同志們，正在走上赴法勤工儉學的征途。“覺悟社”的組織，也就完全彙集到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去。因此，出版了那一本《覺悟》之後，便不能再出第二本了。很顯然，那一本《覺悟》的內容，多是在 1919 年 8 月前後所集的稿件，在那樣被壓迫的時候，是最後努力刊印的。“覺悟社”社員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過程，無非從閱讀進步的書、報、雜誌等逐漸摸索着，學習着，尋找自己理想的前途，主要是看到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星期評論》等。邀請進步教授如李大釗同志等到天津講演，以及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都是給了那些青年以革命啟蒙的教育。同時，大家也有人很喜歡看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如克魯泡特金的《八小時工作制》、《同工同酬》、《麵包與略取》等。鄧穎超同志說：“大家都還沒有一定的信仰”，也是當時的實情，但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多數是確定了的，只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很模糊。

在“五四”運動中，“覺悟社”對工人的講演動員工作是作了不少的，但雖主張“工讀”學習的精神，事實上因在尖銳鬥爭中，並未實現“工讀”的學習。

3．“五四”前女知識分子反封建的情況，有以下幾種鬥爭方式：

第一類，是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因為不滿意那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後果，而仍在煩悶不滿而尋求出路，這一類人很快便參加了“五四”運動的鬥爭。

第二類，在家庭的壓迫之下，婚姻不自由的，爭取到社會上來找職業，參加社會活動，以爭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權。如未上過學校而讀過詩書的人，便向家庭爭取要到學校求學，以解放自己，走向社會。

第三類，既上過學校，也能在學校教書的，但還要向教育行政或學校當局作鬥爭，因為那時侯的女教員的待遇不但不平等，還有一些清規戒律，限制女教員，如女教員的服裝長短式樣，都有限制。除了作小學教員以外，別的職業不對婦女開放等等，都是在不斷地鬥爭，不斷的改善。並且在剛剛開始走入社會的婦女，一舉一動都會被人注意，稍一不慎，便會受到封建勢力的壓迫或侵襲，而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在這樣情況下，強者便只有鬥爭，而弱者只有忍受和屈服。

4．1919年，留日歸國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密約的鬥爭，在天津當時都是與學生聯合會或各界救國聯合會共同合作奮鬥的。如周恩來同志當時從日本回來，就在學聯會中起很大的領導作用。

5．老西開事件的時候，我還很小，而天津也還沒有多少學校的學生，所以對此事，我不能回憶起當時的實際情況。

6．“五四”時期，天津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江亢虎、姜般若二人的活動，只是出於一知半解，自以為進步號召一些空話，有時也發表點簡短的文件作宣傳，並無正確의思想和理論認識，在社會上只起着聯

繫和鼓動的作用，並無組織，也無力量。同時，還有天津東馬路襪子胡同的《新春秋》報的編輯華林，也在報紙上鼓吹一些似是而非的無政府主義的言論。這對思想的啟蒙，也是有他一定影響的。

旅歐支部的一些補充材料

從湖南去的蔡和森、蔡暢、向警予等同志當時和我們聯繫不多，“工學互助團”和佔領中法大學的鬥爭，都是蔡和森同志等領導的，旅法支部在這次運動中說不上起領導作用。

我們去德國後，旅法支部由任卓宣（葉青）擔任支部書記，任的作風很專制，動輒罵人，張若名因此退出了黨。郭隆真曾被罵得痛哭流涕。

德國支部和朱家驊等有過激烈的鬥爭。我們有計劃的對付他們。（鬥爭的具體內容已忘）。

當時，黨的刊物國內有《嚮導》，蘇聯有《國際通訊》，該刊有英、法、俄幾種文字。

(1) 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去法國的路費很便宜，只籌一兩百塊錢就夠了。到法國上岸後，由李石曾他們辦的組織，負責找工作，解決生活問題。郭隆真、張若名兩人的路費，是從罰天津犯賣劣貨商人的三萬多元罰款中提取了約一千元左右，充作他們的路費、生活費。生活費如不夠，由他們作工自籌。當時這批罰款存在天津商務會長手中。

(2) 當時，女師畢業以後作小學教員是容易的。天津林默清（天津教育界的負責人，我的老師）每星期要給當地的小學女教員講訓一次。內容是三從四德，怎樣走路，穿衣服式樣等等，甚至看戲多了也

受干涉。

(3) 當時出版的進步刊物，在湖南銷的最多，其次是四川。

山東建黨的情況

賈石亭

賈石亭（1900 - 1964），又名賈乃甫，山東省齊河縣人。山東省立商業專科學校畢業，1921年8月，參加濟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2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任濟南團委負責人。同年8月，參加團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轉做黨的工作。1926年被捕後脫黨。曾在齊河縣國民黨縣黨部做事，後在山東省立第二實驗小學等學校教書。1935年第二次被捕。抗日戰爭期間，流落到洛陽、西安。50年代在西安中學任歷史教員，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64年病逝。

賈石亭答覆現代史組的信

（1957年5月4日）※

現代史組諸同志：

來信早收到，因我數月來患右臂麻木疼痛，現在好些了，所以遲

※【編者按】1957年初，編者以歷史三所現代史組的名義備函向賈石亭先生書面採訪。這是賈先生給我們的回信。

至今日才備函作復，請原諒！

自“五四”運動起，山東初期的革命活動情況因年代久了，我記不清楚。我回憶的不但不夠全面，而且難免有不正確的地方。現在在我記憶的基礎上寫在下面：

自“五四”運動起，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各大都市迅速的傳播着，山東尤其是濟南也不例外。王燼美、王翔千等於 1919 年發起了“勵新學會”。這個學會以山東濟南第一師範學生為基礎（那時我還在山東聊城省立二中讀書，所以詳情我不知道）。1920 年我到濟南商專讀書，那時新思想的書籍出現於濟南的漸多，特別是王樂平（山東省議員）在濟南大布政司街設立了一個書社（大概叫“啟明書社”），裏面新思想的書很多。許多青年學生爭往購閱，我也是購閱人之一。在時常購閱的過程中認識了王燼美、鄧恩銘、王翔千等。當時所謂社會主義的書籍很複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固然很多，其他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學說、工團主義、基爾特主義等等都有。後來讀者大部分逐漸成了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這些人在“勵新學會”的基礎上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大概是在 1921 年）。當時人相當多，我記不清了。主要是王燼美、鄧恩銘，其他王翔千、王辯、王純嘏、王志堅、王杲（後來叫王天生，成了叛徒）、王全（即王復元、王杲之弟，後來也成了叛徒）方鴻俊等，我也是會員之一。馬馥塘等也相繼加入了。不久又分化出去一些，如王志堅，聽說他曾一度去當和尚。總之該會的成立給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山東的組織打下了基礎。當時（年月我記不清了）王燼美、王辯、王復元還有國民黨員王樂平去過蘇聯一次。王燼美等回來後山東革命運動就更開展了！王燼美、鄧恩銘早有組織關係。1921 年他們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但在濟南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得比較具體些（編者注：原文如此），大概是在

1922 年(1922 年王燼美介紹我加入 S.Y.時我腦海裏想着 S.Y.才成立), 當時濟南革命的人究竟不多, 黨和團在工作各方面沒有嚴格的劃分, 許多團員在工作中就逐漸參加了黨的組織生活, 學生占多數。除幾個負責專責的人外, 其他也都不是脫產的。自 1922 年起山東共產黨和青年團的組織逐漸擴大了(也有在山東參加的, 也有在外省參加來到山東的), 如馬馥塘、丁君羊、王崇吾、李春榮、朱霄等先後加入了。上級派來山東工作的先後有陳維仁、吳慧銘等。自 1922 年起, 山東革命活動也迅速開展了, 主要是青運和工運。在濟南組織了理髮業工會、金汁工會(挑大糞的勞動者)、山東鐵路工會、紡織工會也先後成立, 對青島等地紗廠罷工起了推動作用。濟南在王翔千、王燼美主持下出版《工人週刊》(在大東報館印刷, 該報館是些政客辦的, 那些官僚政客認不清什麼, 我們利用了這點, 更利用當時方鴻俊、王復元在該報館當排字工人, 就在那裏印刷)。出版後人們就分頭傳播。王翔千背着布包在街頭上傳播得最起勁。當世界基督教大同盟到中國來的時候, 教徒王正廷領着到各大都市宣傳。當他們到了濟南召開各界群眾大會的時候, 濟南革命同志認為他們的行動已越出正常宗教範圍, 明顯的帶着侵略性的行為, 於是成立了濟南“非基督教大同盟”。當他們散發那種迷惑人的、帶有奴性化的、侵略性的宣傳品時, 我們也就夾在人群中散發了揭露他們陰謀的宣傳品。“五四”運動至 1924 年山東革命組織與活動情況就我回憶的就是這些。(在上述這些情況中, 王燼美、鄧恩銘、王翔千占主要地位)。

就我記憶的一些人的個別情況(簡單歷史)再分述於下:

王燼美原名王瑞俊, 山東諸城人。佃農家庭, 濟南一師學生, 參加過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山東的主要領導人, 後來病死。

鄧恩銘, 貴州苗族, 濟南一中學生(參加過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他父親黃某在山東當過多年縣長。但他革命性很強，後來被叛徒王天生所捕，犧牲了。

王翔千，山東諸城人。他是諸城有名的才子，詩詞歌賦都好，並且熱心革命。現在山東省人代會。

王辯是王翔千的女兒，聽馬馥塘說，王辯現名黃秀珍，在北京國立圖書館工作。

王杲後來叫王天生，歷城人。當過鐘錶匠，到法國去當過華工，在大東報館當過校對。參加革命後，作過工運，到過廣州等地參加過會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叛黨求榮，大捕共產黨，聽說他一次捕去鄧恩銘等十餘人。鄧恩銘、朱霄等都犧牲了。聽說王崇吾和丁維芬是親戚，所以沒死，他也捕過馬馥塘。

王復元即王全，和他哥王天生一同叛黨。後來這個叛徒在膠東被人打死了。

丁君羊（丁維芬的侄子），王崇吾都是日照縣人。聽說他二人後來都在蔣政權作了官。

朱霄，大概是肥城人，被王天生所捕犧牲了。

李春榮，是禹城人，濟南正誼中學學生。1926 年被捕犧牲了。

方鴻俊即方□□，山東歷城人。後來在國民黨裏當了小黨官。現在不知怎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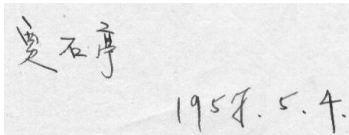
馬馥塘，山東齊河縣人。現在華北電業管理局任副局長。

我（賈石亭），山東齊河人。於 1926 年在濟南被捕，出獄後回家養病，遂與組織無形失了聯繫。1928 年在國民黨齊河縣黨部當了一度國民黨籍的幹部。1935 年在濟南因閱讀進步書籍第二次被捕，此後加入過掛名的反動黨團組織。現在我是一個民盟盟員，在陝西省西安中學任歷史教員。

我所回憶的就是這些，有負同志們收集研究工作的參考之至意。
現在王辯在北京國立圖書館、王翔千在濟南人代會。當初的情況他二人一定知道的很多，可請他二人供給資料，並且可糾正我記憶的錯誤。

此致

敬禮



史序
1958.5.4.

我在濟南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馬馥塘

馬馥塘 (1905 - 1983) 山東齊河人。1920 年在濟南第一中學讀書時，由同鄉賈石亭介紹，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2 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革命戰爭年代，歷任山東八路軍縱隊供給部長、魯中行政公署主任兼支前副司令等職。1945 年當選為山東省出席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濟南市常委。1956 年擔任電力部、水電部等部門領導工作，曾任華北電業管理局副局長。1983 年逝世。

採訪記錄

(1957 年)

“五四”時，我在齊河縣，是高小三年級的學生。我們學校的同學，為響應“五四”運動，向校長下跪要求罷課，罷課後，敲鑼打鼓上街遊行。到街上宣傳，反對賣國賊。以後濟南大學生派代表下鄉，本來在城裏讀書的學生，也有回鄉的，就和我們一起，分路下鄉宣傳。省學聯還佈置組織十人團，我們除在學生中組織十人團以外，還在農民中組織，農民參加的很普遍，(在城市裏，工人商人都組織了十人團)，

大一點的學生，給農民演講，講愛國的道理。這種工作，我們整整搞了一個暑假。1919 年下學期開學，我們離開鄉間，農民中的十人團也就垮了。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有的後來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有的被政客所收買。記得有一次，某學生會長為幫助一個政客競選省議會的會長，還發動許多同學包圍會場。

“五四”後，新思想傳入山東，當時濟南在知識分子中傳播的新雜誌有《新青年》、《曙光》等。

1920 年暑假，我進濟南第一中學讀書，由同鄉賈乃甫（又名賈石亭，商專學生）介紹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一個公開的進步分子的組織，會址設在當時省教育會，門口掛了一個長牌子，上面寫着“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數字，每個會員還有一枚瓷質圓形小徽章，上面有馬克思的像，旁邊寫上研究會的名稱。研究會一起開會的有三、四十人，後來有的逐漸離開。會員大多數是學生，第一師範有四、五個人，第一中學、商專都有學生參加。此外，有一中國文教員王翔千（開始時，研究會裏只有他一個教員），後來教員馬克先也參加了進來。還有一個從法國回來的華工王杲也參加了。（王杲又名王用章、王天生，曾在法國參加共產黨，回國後，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後來參加黨。大革命時叛變，出賣了許多同志）。王翔千和鄧恩銘（當時一中學生）是研究會的負責人。（編者注：1980 年《“一大”前後》編輯部把訪問記錄送馬馥塘審閱後，在研究會負責人王翔千、鄧恩銘後面增加王燼美和賈石亭二人）。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主要是思想工作，會內組織讀書、開報告會，記得曾讀過《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工錢勞動和價值》等書。對一些政治事件，發表宣言和傳單，表示態度。“五一”節時開

紀念會，那次紀念會上，還有一個會外的記者上臺講演，他並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把我們貼在會場四壁的標語“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等聯成一氣念了一遍。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裏沒有討論過黨章。在 1921 年 7 月之前，山東沒有其他“共產主義小組”。黨成立後，研究會中部分會員可能參加了黨，我因年齡很輕，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後，研究會起了分化，有的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有的參加了國民黨。1921 年下半年，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人數不多，王翔千也參加了，那時他已 30 多歲，說自己是“特別團員”。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秘密的，成立會在育英中學開。以後開會，有時在山頭，有時在大明湖的遊艇上。青年團以學校為單位，成立支部，第一中學支部有四、五個團員，其中有工友王復元（後叛變）。團剛成立時，學習過團章，平時學習《嚮導》上的一些文章，組織生活主要討論發展團員事。王用章曾被派去廣州，回濟南後，曾代表勞動組合書記部給我們講話。

後來，有的團員轉為黨員，有的黨員兼做團員。

1922 年，中央派吳慧銘來濟南，被公安局抓去了。

1922 年下半年，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見到了王燼美（在此以前，我不認識他），他在會上用俄文唱國際歌，大概那時他剛從莫斯科回來，關於莫斯科民族會議，沒有聽說宣傳什麼。

1922 或 1923 年，王翔千等辦了一種三日刊，叫《晨鐘報》（版面相當現在《人民日報》的二分之一），可能是黨的刊物，在當時的影響較大，宣傳進步主張，也有國際消息，也刊載小說。這個報紙大約辦了一年。記得有一次，我到晨鐘報館找王翔千，王說黨準備派一些幹部到蘇聯學習，問我去否，我因父親不同意，未去。

那時，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很少，只是嚮往“各盡所能，各取

所需”的理想，覺得很好。我把《共產黨宣言》、《嚮導》等帶回家去，我父親看了，極為稱讚，說馬克思是“聖人”。

（國民黨王樂平等在 1924 年前，辦“齊魯書社”，也買了不少宣傳新文化的書籍，其中有馬克思主義的書。）

在 1923 - 1924 年間，鄉下也有了黨支部，黨員多數是學生，也有農民。黨在農民中宣傳社會主義的理想，說將來土地公有，農民不受欺侮，有事也不打官司了。直至大革命後，山東農民運動才有更大的發展。

當時，軍閥鎮壓共產黨，侮蔑共產黨“共產共妻”，老百姓卻不反對我們。共產黨員能聯繫群眾，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在群眾中有威信。譬如說我們到陌生的地方找黨員，不知道詳細的地址的話，可以同拉洋車的或街頭上泡茶水的拉話，他們提起街坊上有某某先生，為人挺好、老實、肯幫助人，大概就是黨員。我們的同志被軍閥槍殺時，老百姓都惋惜，說他是好人。

1925 年，我在一師（高等專科學校性質）讀書，當時一師黨支部有黨員十來個人，經常討論發展黨組織的問題，對發展對象，反復調查瞭解，多次討論，還要支部書記親自談話，很慎重。

（採訪記錄 1980 年經馬馥塘審閱、修改）

我的父親和山東建黨、建團活動

黃秀珍

黃秀珍（1906—1987），女，原名王辯，山東諸城縣人。1920 年至 1922 年在濟南女子師範上學時，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3 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 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山東省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中共“三大”後加入國民黨，並被推為國民黨山東省委候補委員。她積極組織婦女界的國民議會促成會和濟南婦女學術協進會等進步群眾團體，推動婦女解放運動。1925 年調上海團市委做婦女工作。同年 11 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 年冬回國，任安徽省委宣傳幹事。後被國民黨逮捕，在敵人刑庭上、監獄中都嚴守黨的機密，保護了組織和同志。1930 年夏出獄後找到黨組織，受組織指派到瀋陽、安東、哈爾濱、穆陵等地從事地下工作，先後在滿洲省委文書處、交通站和地下印刷所工作，克服種種困難，出色地完成任務。抗戰爆發後，她根據黨的指示潛回家鄉，秘密組織抗日活動。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大衆日報》編輯，《沂蒙導報》記者，沂中、沂南縣委宣傳部幹事等職，曾在臨沂縣婦聯、山東省婦聯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在山東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工作，1952 年任北京圖書館蘇聯圖書室主任。1978 年離休後，抱病撰寫了 20 余萬字的革命回憶錄。1987 年逝世。

採訪記錄

(1957 年 2 月)

“五四”時，我才高小畢業。我參加了過“五四”的罷課和聯合示威遊行。記得當時大家的情緒都很高，遊行時，商界給學生隊伍準備了許多慰勞品。學生上街演講，反對日本。那天各在商店門口都貼標語一塊長方形白紙，寫明《罷市救亡要求》，標語內容主要有三點：(1) 青島問題不簽字，(2) 懲辦賣國賊，第三條記不清了。這是商界的響應。在這次運動中，工人也罷工了。教會學校如齊魯大學(美國辦的) 也參加了運動，這是因為美日之間有矛盾的緣故。

“五四”時軍閥馬安良鎮壓學生運動很厲害，據李蘭齋說，馬良曾抓了一些學生，威嚇說要槍斃，後來經營救他當場慷慨演說才放出來。李還買麵條和燒餅給學生當午飯吃。

“五四”後，學生組織學生會，宣傳抵制日貨。暑假時還派代表到鄉下宣傳。我的家鄉諸城相州也罷過市，(聽說由我父親王翔千給商界跪求的，) 也來過學生會的代表。

1919 年秋天，新文化運動到了濟南，山東國民黨負責人王樂平，團結青年學生王燼美(原名王瑞俊) 等，在自己家裏搞了一個“齊魯通訊社”，販賣《新青年》等新書，當時很有影響。我的父親王翔千也賣了不少新書，接受了新的思想。1920 年，“齊魯通訊社”改為“齊魯書社”，設立門市部。1919 年下半年，我父親團結一些進步青年，組織“勵新學會”。學會有三十來個會員，王燼美可能是負責人。會員大部分是學生，第一中學工友王復元和他的哥哥王杲也都是會員(他們二人後來都叛變了)。“勵新學會”出版過《勵新》半月刊(或月刊)。後來學

會分化，一部分人參加國民黨，一部分人成為黨的發起人。

王燼美同志當時是濟南第一師範學生，佃農家庭出身。他曾受過克魯泡特金思想影響，信仰無政府主義，後逐漸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王燼美、王翔千、王復元、王杲等在 1920 年夏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一個公開的組織，有幾十人，馬克先也是會員，會址設在省教育會，研究會的成員當時對馬克思主義還是瞭解不大清楚的。研究會曾經開過幾次會。記得有一次在育英中學開紀念十月革命的會（當時王翔千在育英教書），會上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

1921 年，王燼美回到濟南，（他時常外出開會，不常在濟南），時常到我家來。這時黨已有活動。

同年，王翔千在濟南《大東日報》編副刊《勞動週刊》，揭發資本家，鼓動罷工。《大東日報》是政府派張公制辦的，我父親所以在這報上編副刊，是通過這個報的編輯王靜一的關係。王靜一曾辦過《曙光》，自稱進步。

另外以王樂平為中心的“地方派”，有機關報《民主報》，副刊也較進步。以上兩種副刊，都登載一些新文藝作品，批評揭發現實，介紹新事物、新思想。

王燼美、王樂平等，曾經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東方民族大會，回來如何傳達貫徹這次大會精神，我不清楚。

大概是在 1921 - 1923 年間，黨曾派高永清王用章二人團結理髮業領袖高永清，領導理髮工人罷工，組織理髮業聯合會。在 1923 年前，山東除濟南外，各地都有黨的組織。群眾工作逐漸開展，在這時，煤礦工人可能罷過工，鐵路兩旁可能已開展農民運動。

1923 年我父親失業，辦應一小報叫《晨鐘報》的邀請，擔任主編，揭發、暴露、攻擊當時的不合理現象，但缺乏策略。就在這一年，我

由父親介紹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我入團後，鄧中夏、王荷波、李子芬、羅章龍等都曾來過濟南。這時父親的皮包裹，時常裝着黨的文件和《嚮導》等，我有時也拿來看，這些報刊已開始宣傳國共合作。

1924 年，國共合作，山東的共產黨員差不多都參加了國民黨。我們幫助國民黨發展組織，同時吸收國民黨員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入團。這樣，彼此都有了發展，許多工作都是雙方合作搞的。這時期群眾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青年和婦女工作也開展了。國民黨也注意做工人運動，但偏重於拉上層，我們則着重在下層工作。國民黨對國共合作是不夠真誠的。記得有一次，王樂平的女兒找我們的一些青年團員王蘭英去談話，說：許多國民黨員給共產黨拉去了，還說我們應該團結。實際上那時我們她還不知道王蘭英中有許多人已經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 年 1924 年冬，王燼美從北京回來，到山東各地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婦女中也組織了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王因積勞成肺病，夏末秋初就死了。

“五卅”前，青島曾發動了三次罷工運動，規模較大。第三次是在 4 月 29 日，被軍閥張宗昌壓下去了，犧牲了不少人。

(記錄經黃秀珍審閱、修改)

(二) 我當時在巴魯和海上，決定把青島交給日本，

212年

黃秀珍同志回憶

黨成立前後山東地區的一些情況

五四時，我才高小畢業，參加了「五四」的罷課和遊行。^{聯合示威}記得當時

大家的情緒都很高，遊行時，商界給學生隊伍準備了許多慰勞品。學生上街演講，反對日本，在商店門口貼標語，標語內容主要有三點：(1)青島問題不簽字，(2)罷賣國賊，第三條記不清了。在這次運動中，工人也罷工了。教會學校如齊魯大學(美國辦的)也參加了運動，這是因為美日之間有矛盾的緣故。

五四時軍閥馬安鎮壓學生運動很厲害，據李芝齋說，馬安曾抓了一些學生要槍斃，後來經管教才放出來，李還買麵粉和燒餅給學生當午餐吃。

五四後，學生組織學生會，宣傳抵制日貨，暑假時還到鄉下宣傳。

我的家鄉在青島，也罷過市(聽說由我父親王翔宇給商界疏導的)，也來過學生會的代表。

1919年秋天，新文化運動到了濟南，山東國民黨負責人王樂平

變了)。「勵新學會」出版過「勵新」半月刊(或月刊)。後來學會分化，一部分人參加國民黨，一部分人成為黨的發起人。

王姆美同志當時是濟南第一師範學生，佃農家庭出身。他會受過克

王姆美、王樂平等，曾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東方民族大會，回濟南外，各地都有黨的組織。群眾工作逐漸開展，在這時，煤礦工人可能罷過工，鐵路兩旁可能已開展農民運動。

1923年我父親失業，辦一小報，叫「晨鐘報」，揭發、曝露、

的聘請，擔任主編，

攻击当时的不合理现象，但缺乏策略。就在这一年，我由父亲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入团后，邓中夏、王荷波、李子芬、罗章龙等都会来过济南。这时父亲的皮包里，时常装着党的文件，和「响导」等，我有时也拿来看，这些报刊已开始宣传国共合作。

1924年，国共合作，山东的共产党员差不多都参加了国民党。我们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同时吸收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样，彼此都有了发展，许多工作都是双方合作搞的。这时期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年和妇女工作也开展了。国民党也注意做工人运动，但偏重于拉上层，我们则着重在下层工作。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是不够真诚的，记得有一次，记得有一次，王^{的父}樂^{的父}中^{团员王若愚}我^{他还}们^不一^知些^道青^{王生荣}年^{生荣}去^{生荣}谈^{生荣}话^{生荣}说：许多国民党员给共产党拉去了，还说我们应该团结。实际上那时我们^{生荣}中^{生荣}有^{生荣}许^{生荣}多^{生荣}人^{生荣}已^{生荣}经^{生荣}参^{生荣}加^{生荣}了^{生荣}社^{生荣}会^{生荣}主^{生荣}义^{生荣}青^{生荣}年^{生荣}团^{生荣}。

1925年，王若美从北京回来，到山东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妇女中也组织了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王因积劳成肺病，夏末秋初就死了。

五卅前，青^{生荣}島^{生荣}曾^{生荣}发^{生荣}动^{生荣}了^{生荣}三^{生荣}次^{生荣}罢^{生荣}工^{生荣}运^{生荣}动^{生荣}，^{生荣}規^{生荣}模^{生荣}較^{生荣}大^{生荣}，^{生荣}第^{生荣}三^{生荣}次^{生荣}是^{生荣}在^{生荣}四^{生荣}月^{生荣}廿^{生荣}九^{生荣}日^{生荣}，^{生荣}被^{生荣}軍^{生荣}閥^{生荣}压^{生荣}下^{生荣}去^{生荣}了^{生荣}，^{生荣}牺^{生荣}牲^{生荣}了^{生荣}不^{生荣}少^{生荣}人^{生荣}。

以上经黄香珍同志审阅修改
王若美访问记录

武漢建黨前後的情況

吳德峰



吳德峰（1896～1976），曾用名吳士崇、吳鐵錚。湖北保康人。早年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共武漢地委委員兼軍委書記。1925年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工人部長、軍事部長、武漢市黨部執行委員兼武漢市公安局局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任中共鄂南特委書記、湖北省軍事委員會主席、湖北省工農革命軍總司令兼贛西南特委書記、贛北特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中共中

央交通局局長。1932年赴中央蘇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分局局長。後任國家保衛局湘贛省分局局長、紅二方面軍保衛局局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前往西安從事情報工作，1939年底奉命回延安。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敵工部長，鄭州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武漢市委第一副書記、市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文革”中受迫害，1976年病逝。

採訪記錄

(1956 年)

我們黨是由各地馬克思主義小組集合而成的。最近團刊（內部發行的）上發表李達和施復亮的回憶，他們把黨成立前的上海小組說成是黨中央，是不符事實的。當時上海小組對各地小組起了一些指導作用，但不是中央。中央是第一次黨代會後才建立起來的。

“五四”運動時，各地出現了一些學生運動的領袖，他們在報紙上發表意見，互相通信，很自然地結合起來。北京學校較多，成為指導中心。“五四”後，蘇聯派一同志來（名字已記不起），對各地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起了促進作用。當時，學習馬克思主義，資料還很少，主要從蘇聯大使館弄到一些，大家湊幾個錢買點紙，利用學校裏的油印機，油印發到各地。各地又油印擴大宣傳。

武漢“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聽陳潭秋同志說，是“五四”後逐漸形成的，人數不多，中心人物有陳潭秋、惲代英、林育南等同志。董必武同志“五四”時在日本，“五四”後回國，參加小組。施洋同志也參加了小組（他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記得在他犧牲前黨內還曾整過他的思想），小組的其他成員流動性較大，為求方便，分幾個小組分散舉行會議。

“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周圍，有許多小團體如“利群書店”和學生中的“讀書會”、“學會”等等。“利群書店”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資料庫，裏面有許多書，只讓看，不出賣，小組通過它聯繫進步分子。記得我在“五四”後要求進步，但找不到門路，看一些無政府主義的書，被一位朋友知道了，介紹我到“利群書店”去看書，並囑我不要

隨便介紹別人去。“利群書店”先設在青龍巷（在現在武昌區政府的東邊），只有一間門面，規模很小。“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一些討論提綱和內部發行刊物《我們的》，就在這裏油印。黨成立後，給“利群書店”貼補一些錢，書店的規模才擴大一些，搬到察院坡。

“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成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在各學校裏，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團結教育學生，有的組織讀書會，有的組織同鄉會，有的組織學會，並利用學生聯合會進行工作。

小組在工人中的活動，是用在工廠辦識字班的辦法，和工人接近。這種工人識字班辦的很廣泛，連兵工廠都打進去了。主要的有三個工廠，即：武昌的武漢第一紗廠、漢口的英美香煙廠和漢陽的兵工廠（包括煉鐵廠、制槍廠和火藥廠）。其他如裕華紗廠、震寰紗廠、紗麻四廠、南洋煙廠，還有漢口的一個日本人的紗廠以及鐵路工人中，都有這種識字班。另外，小組還從互濟着手，幫助人力車夫成立工會。當時，工人生活很苦，一天工作 12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極少，同時隨時有失業的威脅，我們和他們接觸是非常困難的。當時小組派林育英同志負責第一紗廠的工作，他為了接近工人，曾經在該紗廠附近（巢湖武勝門外）開辦了一個織毛巾的工廠。和林育英同志一起的，還有王尚德同志（後來他是陝西黨的創始人之一），和紗廠工人張金保同志。

小組在農村中的工作，主要是利用暑假學生回鄉的機會，辦農民識字班，開始時規模都不大。

此外，軍閥軍隊裏的兵士，也進行過一些工作，主要是通過茶館，請他們喝茶，談話交朋友。

“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出版兩種刊物：一種是內部發行的，叫《我們的》，用油印。一種是公開發行的，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叫《武漢星期評論》。這個刊物，先由惲代英同志主編，惲去四川後，由黃負生

同志主編，黃死後，《星期評論》停辦一個時期。《武漢星期評論》發行數不多，大約 100 來份，後來發行到 200 份左右。小組搞了一個“湖北人民通訊社”，陳潭秋是社長。開始時買不起油印機，通訊稿用手抄，共一、二十份，主要供給湖北諸報紙，也有寄給上海報紙的。

“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成份並不多，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還很少，記得讀過一本《社會主義史》、一本布哈林的《共產主義 ABC》。小組主要是把大家對舊社會的不滿情緒和愛國熱情組織了起來。

以上是 1921 年黨成立之前的情況。

第一次黨代會後，成立了黨中央。中央設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為書記，張在那時就搞鬼，想抓領導權)，領導職工運動，象現在的總工會。設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 年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青年工作。有人說社會主義青年團曾經一度取消過，據我所知道，並無其事。湖北的勞動組合書記部開始是許白昊同志負責，許在“二七”運動中被捕犧牲，由林育南同志代理，直至 1925 年成立秘密總工會。湖北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書記，開始是惲代英，1925 年時是李子芬(由南京一個學校調去的，後叛變)，1926 年時是黃競(後脫黨)。學生運動經過“二七”運動稍有發展，經過“五卅”運動，大大發展起來。1921 年後，黨在農村中的工作，就不僅是識字班了。這時期的農民運動，一般從算學款着手，打土豪劣紳，也進行反對苛捐雜稅的運動。那時農民運動以江漢道搞得較普遍，江漢道中又以黃岡、咸寧、漢川和黃梅等數縣最好，其他各縣較零星。聶鴻鈞同志去咸寧領導農運，搞得很熱烈，當時有“農王”之稱。

黨的組織情況：1921 年 7 月以後，武漢成立一個支部，包惠僧為

書記，搞得很糟，後來他調到廣州去，許白昊同志為書記，許白昊同志犧牲後，由許之楨同志代理。黨員成份大部分是學生，其次是工人，農民很少。學校裏黨員較多。第一紗廠、英美香煙公司和漢陽兵工廠裏都有黨員。1924年9月，湖北黨代會在長江一隻木船上開了兩天一夜，當時全省有黨員100多人，出席代表會的代表十多人，有：董必武同志、聶鴻鈞同志、許之楨同志和我等。代表會後，成立武漢地方委員會(簡稱“地委”)，漢口和武昌黨員較多，各設一個支部委員會(簡稱“部委”)，各縣也設有部委。地委書記陳潭秋同志。地委下設：(1)國民運動委員會，董必武同志為書記，(2)農民運動委員會，陳蔭林同志(陳潭秋同志的弟弟)為書記，(3)職工運動委員會，周兆秋同志(或是許之楨同志)為書記，(4)青年運動委員會，李子芬為書記，(5)軍事委員會，上面原來派一姓余的來，未到任，由我代理。

1924年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秘密的)成立，它實際上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國民黨省黨部書記是董必武同志，組織部長是陳潭秋同志，宣傳部長是錢亦石，農民部長是陳蔭林同志，工人部長是宣中華同志，婦女部長是袁浦之同志，青年部長是李子芬，軍事部長是我。

國民黨省黨部建立後，大力開展農民運動。先派聶鴻鈞同志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聶回來後，在武漢也辦起農民運動講習所，訓練農運幹部。黨有了這批幹部，以特派員名義派到各地。他們在農村中，一般是先組織國民黨，再組織農會，然後成立共產黨的組織。當時有三個代號：共產黨叫“大學”，青年團叫“中學”，國民黨叫“小學”。

1926年時，國民黨有很大發展。共產黨發展組織很慎重，對於發展對象，總是考察了又考察，全省這時有三、四百人。

1921年 - 1924年間，武漢各學校裏，進步勢力發展很快。在私立學校中，進步的有武漢中學(董必武同志擔任訓導主任)，共進中學(陳

譚秋同志在那裏教過書、林彪同志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崇實中學(我當校長。這個學校招牌很紅，暑假時，黨和團的訓練時常在這裏辦)。公立學校中，進步分子多的，有：第一師範，雖然反動的學生占多數，但進步的也不少，許多人參加了黨和團。進步的學生和反動的學生時常打架。進步分子較多的，還有高師附中(當時有好幾個人到莫斯科去。伍修權同志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高師附小(陳潭秋同志在這裏當過教員，這個學校的主任是個投機分子，我們的活動分子會議，曾借過這裏做會場)。當時最頑固的是女子師範，不讓女學生和外界接觸，平時第二道校門還加鎖(他們有兩道校門)，教員都是有長鬍子的老頭，1923 年夏之栩同志剪短髮被開除。這個學校直至 1925 年才被打垮。此外，教會學校也是很落後的，這些學校學費很貴，每學期需要 200 多元，學生的成份不好，凡進教會學校讀書的，多半想當買辦。1923 年起，我們在每年 12 月 25 日 - 31 日，搞一周“非基督教運動”。這種運動，並沒有嚴密的組織和領導，但影響很大，至 1925 年，所有教會學校的學生，都要求退學，把教會學校都搞垮了。

1924 年後，學生動輒到馬跑廳開大會，警察守住馬跑廳門口，領頭的幾個學生，抬一張桌子在前面，沖進去後，就爬上桌子聚眾演講，演講完了就遊行，警察無可奈何，夾道“保護”，學生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警察笑我們說：“你們拿什麼東西去打倒？”那時，學生有“丘九”之稱，意思是比“丘八”還厲害，教員被稱為“丘四”，比學生還鬧得凶。警察局通緝學生領袖，被通緝的到漢口租界裏待一個星期再出來，也就沒事了。軍閥對學生運動，不敢採取暴力行動，只要學生不出亂子，也就算了。這一方面是因為軍閥怕出事(安徽督軍干涉學生運動，打死了一個學生，引起大風波，該督軍被撤職)；另一方面，學生的愛國活動同他們利害關係還不太尖銳，不像開展工運、

農運，直接挖他們的牆腳。(“二七”以後，他們主要對付工人運動)。在這時期，黨的工作實際上是半公開的。

那時我們還很幼稚，反動派也很幼稚。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警察局隔壁開會，高聲唱國際歌，第二天警察來同我們說：“請你們以後講話聲音放低一點，昨晚你們吵得我們一夜睡不好覺”。可見他們什麼都不懂。

以上是 1921 年到 1926 年夏的情況。

北伐軍到武漢後，開了一次黨代會，地委改為區黨委，彭澤湘同志為書記。1927 年 1、2 月間，成立省委，張太雷同志為書記。大革命失敗，張太雷同志出走，成立長江中央局，羅亦農同志為書記。

大革命時，黨員發展很多。在政府機關裏工作的，有董必武同志，任湖北省工礦廳廳長，我任武漢特別市府委員兼公安局長。這時期湖北群眾運動的負責人是：總工會委員長宣中華同志（全國總工會委員是蘇兆征同志），項英同志也在總工會工作，大革命時任武漢工人糾察隊長。農民協會委員長陸沉（後叛變），青年團書記，先是黃競，後為賀昌，以後又由唐鑑擔任。婦女協會主任是李哲時。

大革命時，黨和團是半公開的。黨辦公的地方，門口掛“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政治部”的牌子，在武昌□□山。總工會設在漢口，農民協會設在武昌三道街一個道台衙門裏面。

(記錄未經吳德峰本人審閱)

武漢黨組織對青年學生的影響

夏之栩

夏之栩 (1906 - 1987), 女, 浙江海寧人。1918 年考入湖北女子師範學校, 在陳潭秋、惲代英、董必武等同志和“利群書社”、《武漢星期評論》的影響下, 接受革命理論。1922 年 5 月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 年 1 月轉為中共黨員。1923 年秋, 由武漢到北京工作。歷任共青團北京地委委員, 共青團北方區委宣傳委員會書記兼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 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幹事等職。1926 年 6 月離京赴滬, 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等職。1929 年, 夏之栩赴蘇聯學習, 1932 年回國後在全總女工部工作。1933 年在上海遭特務綁架, 關押在南京監獄。1945 年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擔任中共武漢市委組織部長、秘書長, 國家輕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副部長等職。夏之栩是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十二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7 年在北京病逝。

經夏之栩修改過的採訪記錄

我於 1918 年進湖北女子師範。當時, 湖北全省只有這樣一個女子師範, 全校分五班, 共約 250 人左右。學校對我們的教育, 完全是舊

的一套，培養我們或者成為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學教員，或者當個賢妻良母。什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都不要我們過問，我們是毫無所知，學校老師也從不談這些問題。我們整日被關在學校裏，幾乎和外界隔絕。連放假回家，都得由家長來接。加上當時社會上非常混亂風氣很封建，軍閥的軍隊又往往在街上隨便調戲青年婦女，我們也不敢隨便上街，只能躲在學校裏。我們在學校裏，讀的是文言駢體文，從來沒有接觸過新文化，因此思想很閉塞。“五四”運動時，我們只知道北京學生鬧學潮，反對日本，抵制日貨。武漢的男學生也有所活動，但我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在這次運動中，我們沒有什麼表示。直至 1921 年，我們才知道“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內容。

“五四”以後，社會風氣開通了一些，軍閥王占元走後，我們女人也可以上街了。加上男學生在“五四”運動中，接受了一些新思想。這些新思想，逐漸影響到我們女校。

1921 年下半年以後，董必武、劉子通、陳潭秋、黃負生等同志先後來到女師（有的是正式教員，有的是來代課的）。他們向我們宣傳革命的道理，告訴我們十月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使我們的思想得到啟蒙。1921 - 1922 年間，通過上述諸老師，我們和董必武同志、惲代英同志、李求實同志等許多領導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同志，以及李漢俊等都有過接觸，但來往不多。我們知道他們都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也知道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但對這個組織的具體活動情況不瞭解。

當時他們辦了一個《武漢星期評論》，是宣傳新文化的刊物，由黃負生同志主編。我看到這個刊物，是在 1921 年和 1922 年間。（我記不清了，可以去問問內務部包惠僧同志）。他們在婦女中的宣傳活動，在學生方面，就是只有女師（當時武漢還有一個女子中學，只有數十人，黨的力量始終沒有打入）。女工方面，曾經向紗廠和煙廠的女工進行過

一些工作。當時林育南、許伯昊、項德隆（項英）、施洋等同志，主要搞工人運動，有的也兼做學生工作。董必武、陳潭秋、劉子通、惲代英等同志都是教員，經常向學生做宣傳工作。李漢俊當時是武昌高師的教授。

惲代英同志還辦了一個“利群書店”，表面上出售一些普通的教育方面的書籍。書店後面有一個屋子，藏放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人們通過青年團或熟人的關係，可以進去看。

劉子通同志等在女師宣傳共產主義，引起社會上舊勢力的反對。頑固派侮蔑他們“仇父非孝、均產共妻”。記得有人寫文章在報紙上罵他們說：“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導，均產共妻之說，信口訾談”。反動勢力就拿這些“理由”打擊新的力量，教員被解聘、被通緝、學生被開除。學校裏的頑固派，以辭職威脅校方，並聯合學生家長，要求解聘劉子通同志。女師校長本來是個調和派舊學派，認為因“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所以才請幾個有新思想講新文學的教員，也算是迎合潮流。他在舊勢力包圍之下，於1922年春，解聘劉子通同志。為這件事，女師學生掀起一次大風潮。原來從劉子通同志等來校以後，把許多新思想帶給我們。我們對於學校裏的頑固派和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已有不滿。現在校方無理解聘劉子通同志，就引起我們很大的憤慨。我們從1922年春開始罷課一直鬧到冬天。結果，劉子通同志被解聘後，還被湖北軍閥當局通緝。

在罷課期間，我們女師的十多個進步同學，組織了一個“婦女讀書會”，自學一些進步書籍（通過陳潭秋等同志，向利群書店借的）。同時，請陳潭秋、黃負生同志和李漢俊等給我們講話，主要講婦女解放問題。他們曾向我們介紹婦女解放的道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當時少數上層婦女所從事的“婦女參政運動”。此外，也講馬克思主義。

這個讀書會只搞了不到半年多，後來我們走了被學校開除，也就無形停頓了。

由於陳潭秋等同志的到來，女師在 1921 年下半年就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1922 年學潮中，青年團聯繫我們一起搞，許多同學加入了青年團，我也是這時加入的。當時入團手續一般是這樣的：先由老團員物色對象，讓他閱讀團章（那時的團章比現在的簡單）。被發展者表示願意參加後，經過一定批准手續，就是團員了。組織生活不常過，因開會不方便，地點難找。有事找支部書記商量，支部書記是劉昌群（中華大學學生，後消極脫黨。抗戰時期，還給我們做了一些掩護工作，已死）。一起過小組生活的有十多個人（當時我們支部共聽說有三十多人，多半是學生）。支部開會多半在劉昌群家，在李漢俊家裏也開過。工人中青年團的情況我不清楚。

和女師學潮同時，武漢外國語專門學校也鬧學潮，鬧得很凶。武漢學聯曾發出號召，要求中等以上各校用罷課來支援女師和外專學生的鬥爭。

此外，我們為要求武昌高師開女禁，也鬧過一陣。後來這個學校就招收女生。

當時武漢學生運動，以中華大學為大本營，外國語專門學校和幾個中學都很活躍。國立武昌高師和文華大學沒有什麼活動，女中一直沒有捲入運動。

1922 年冬，我們五個人因學生運動被開除。此後，團的組織曾派我們到紗廠去幫助做一些工作。不久，爆發“二七”罷工運動。黨和團都忙着搞工運，我們在黨辦的“武漢通訊社”幫助工作，向各報紙發罷工消息的新聞稿（油印的）。“二七”後，我在武漢待不下去了，便跑到北京。23 年秋又隨李漢俊到武漢，一面幫他抄抄講義，一面做青年團

的工作。1924 年，李漢俊被通緝，我和他不得不離開武漢。

當時武漢工運基礎我不清楚，我大略記得當時有鐵路工會，有湖北工團聯合會，人力車工會（ ？ ），基層工會還有些什麼記不得了。

憶“新民學會”、留法勤工儉學 和旅歐“少年共產黨”

蕭 三



蕭三(肖山)(1896 - 1983 年)，湖南湘鄉人。早年就讀於湖南省第一師範，1918 年同毛澤東、蔡和森等創建“新民學會”，並為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撰稿。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0 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 年加入趙世炎等人組織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經阮愛國(胡志明)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不久參加中國共產黨，協助陳喬年、鄧小平等出版油印刊物《少年》。1923 年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4 年回國後任

湖南省團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委員，中共張家口地委書記，團中央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等職。1930 年，作為中國左翼作家常駐代表出席在蘇聯舉行的國際革命作家會議，並主編該會刊物《世界革命文學》的中文版。經中共批准，參加蘇聯共產黨，擔任過兩屆蘇聯作家協會黨委委員。1939 年回國後，在張家口文協、阜平、西柏坡從事文化宣

傳和寫作工作，曾任延安魯迅藝術編譯部主任，陝甘寧邊區和延安文協常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委員，主編《大眾文藝》等雜誌。1945年出席黨的“七大”。1946年任華北文協主任。1949年後歷任文化部對外聯絡事務局局長，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經蕭三修改過的採訪記錄

(1957 年 4 月)

“新民學會”成立會是在 1917 年 10 月 18 日 1918 年 4 月 14 日我記得這是一個星期天 (星期日) 開的 (我還保存有當時的日記，但據推算，這一天是星期四，很怪！)，在湘江對岸蔡和森家，到會的有 13 個人。那時，蔡暢還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蔡暢還不到 20 歲，在周南女校當體操教員，未參加成立會。她和她的母親、姐姐給我們做飯，蔡暢做點心。蔡和森的母親年紀雖大，但很進步。蔡和森在第一師範讀過書，和毛主席同學，他們在校時是好朋友，思想進步，有“蔡毛二怪”之稱。

參加成立會的十多人，主要是毛主席邀請來的。沒有到會的，也算作基本會員。學會的章程，也是他和鄒彝鼎預先擬好了的。經大家討論，學會定名“新民”(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就是說，開始時新民學會不是作為革命運動的核心組織而建立的。會規有“不賭博、不狎妓、不懶惰……”等條文，有尚樸素、主誠實、禁浮華，戒驕躁等精神。選舉學會的負責人(總幹事)時，毛主席很謙虛，不肯擔任總幹事之

職，後被選為副總幹事。

會員中，也自然有唯心主義者，但在要求上進，要求向外發展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所謂“向外發展”，是因為這些會員的年齡大都在 20 歲以上，無錢升學，大家相聚設法上進。恰好這時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以及吳玉章同志等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長沙的許多青年認為這是解決繼續求學的好機會（大一部分有出洋求學，回來升官發財的思想），故很歡迎。毛主席等也贊成乘此機會去法國求學，在湖南發動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勤工儉學是這樣發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梁士詒幹人口買賣的勾當，為法帝國主義招了 15 萬華工去做戰爭勤務。後來，李石曾等覺得學生也可以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就以學者的名義，組織勤工儉學會，他自己也在法國學習過，並和同鄉在巴黎開豆腐公司。

勤工儉學運動對湖南青年是有好處的。在“五四”以前，湖南是個比較閉塞的地方，為了留法勤工儉學，幾百人跑到北京，同北方新文化運動者取得聯繫。毛主席和蔡和森等就曾受李大釗同志的《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的影響。

1919 年初，1918 年夏末，毛主席到了北京。後經天津、濟南、上海等地，三月於 1919 年 4 月回長沙。一面在小學教歷史，以維持生活；一面團結學生界、教育界和新聞界，發動驅逐張敬堯運動，學生組織學生聯合會，出刊物《湘江評論》。那時，毛主席的思想還不那麼馬列主義，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和《民衆的大聯合》等文中，都夾雜有無政府主義及舊民主主義的思想。《湘江評論》被張敬堯禁止，毛主席團結學生界、教育界和新聞界，發動驅逐張敬堯運動，在驅逐運動中和以後的革命運動中，“新民學會”成為湖南革命運動的核心組織。

“五四”時，我因預備留法，在北京學法文。5 月 3 日，北京各校學生在北大三院開會，有人提議遊行示威，張國燾就是提議遊行的一個。第二天，就有五千學生遊行的舉動。

長沙的“五四”運動，是由“新民學會”領導的，長沙工人響應“六三”罷工，也與“新民學會”有關。

湖南黨的基礎是深厚的，在黨成立之前，先進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做工人運動。1920 年，毛主席在銅元局、鉛煉廠、第一紗廠、長株和株萍鐵路……等工人中進行過工作。1921 年“五一”節，毛主席等曾在長沙組織了幾千工人的遊行示威。

1920 年，毛主席從北京回長沙後，恢復學生聯合會的公開活動。同時，從事新聞工作，湖南自治運動，搞省憲法，辦文化書社，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湖南分會（總會在上海，1920 年 5 月成立），組織俄羅斯研究會。1920 年 10 月間，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這個時候，以毛主席為首的先進分子，還出版了許多小冊子：《夥友們》、《工友們》、《農友們》、《一個兵士的生活》等，宣傳社會主義，主張團結起來搞革命。

所有這些活動，可以說為建黨作了準備工作。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後，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入了團，及至黨成立了學會從此逐漸結束。

“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 1919 年底和 1920 年先後到達法國（蔡和森等是 1919 年底去法國的，我是 1920 年夏才到那裏的）。我們到法國後，就同別省的勤工儉學學生發生了聯繫。我們在蒙達尼男子中學補習法文，教員沙卜波是個社會黨人（那時，法國社會黨正同共產黨分家，沙卜波是站在社會黨方面的）。蔡和森很用功，看法文報紙，一個一個字查字典，不久他就能看《共產黨宣言》法文本了，他是我們

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最早的一個。

在留法學生中，本來有“工讀互助團”的組織，團員都是信仰無政府主義，主張“新村”的。後來，我們以“新民學會”會員為核心，把“工讀互助團”改組為“工學世界社”。社員中，主要有兩種思想傾向，一種以蔡和森為代表，他到法國後讀了許多書，信仰馬克思主義；一種是從國內帶去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李維漢（羅邁）、羅學瓚和我當時都主張用無政府主義的辦法救國。1920年7月我們曾開會討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蔡和森把《共產黨宣言》等書中的話一些段落譯成中文，貼在牆上，並作演說，和我們討論。經過這次辯論，我們在認識上雖則未得到統一，但蔡和森的主張占了上風，我們也覺得無政府主義站不住腳。會後不久，也就不知不覺的轉向馬克思主義了。會後，我們分工看報紙，書刊，我分到的是《日報》《時報》——資產階級報紙，蔡和森分到《人道報》（法共機關報）。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們看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蔡和森看了考茨基的書，我看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面讀，一面譯）、《國家與革命》等。無政府主義本來是經不起辯論的，加上我們對它也知道得不多，經過辯論和閱讀馬列主義書籍，無政府主義在我們中也就銷聲匿跡了。

我們在法國作工的，每天做苦工9小時，沒有時間讀書，生活過得很苦，吃麵包沒有菜，用白開水送。為了要求改善生活，爭取中國政府津貼，我們發動了“二·八”運動（1921年2月8日），到中國駐法大使館請願。開始時，徐老，李立三等不贊成我們搞請願，但運動搞開後，留法學生都動起來了。後來，王若飛、趙世炎等到蒙達尼來，和我們聯繫，搞統一戰線，把留學生中許多派別都團結起來。1921年10月，我們要求進里昂中法大學，為吳稚暉等所拒絕。蔡和森帶108104個好漢，強佔里昂中法大學，就在這次運動中，蔡和森等被押送回國。

1922年8月，趙世炎等人在巴黎發起組織“少年共產黨”，趙世炎任書記，曾派我和法國共產黨聯繫（因我講法國話講得多些）。那時，法共是公開的。我被叫到法共殖民地部聯繫，他們把我當安南人，我還不高興呢！我們同法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也有聯繫，法國黨和團的同志都曾給我們作過報告，法共所領導的遊行示威運動和一些會議，也吸收我們參加。在參加這些運動中，我們認識了阮愛國（胡志明主席），他曾來過我們住的地方，因言語的隔閡，同我們筆談。後來，他介紹王若飛、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和我五個人參加法國共產黨，在巴黎十七區過組織生活，交黨費，我還去過區委書記的家。這時，阮愛國常和我們來往。

我們出版刊物《少年》（油印），趙世炎和陳延年兩人是脫產幹部（陳延年負責刻鋼板）。在這個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人都用筆名，趙世炎叫“樂深生”，周總理叫“伍豪”，我叫“埃彌”，李維漢叫“羅邁”。

*

*

*

*

1921年冬，我因在法國生活不下去，跑到德國（德國當時通貨膨脹，生活費低）。任弼時在蘇聯來信告訴我說，蘇聯有東方大學，叫我去。後來，我回到巴黎，參加“少年共產黨”。同法共殖民地部聯繫時，該部部長也同我說，蘇聯有東方大學，勸我們去。我於1922年底經組織同意，一個人去莫斯科。剛巧當時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完畢。陳獨秀、瞿秋白、劉仁靜都在那裏開會。我和陳獨秀等談起了法國留學生的情況，他們主張多來蘇聯，第二年留法學生去蘇聯的就多了。

那時，蘇聯還很困難，我到法俄邊界時，到一個小館子裏吃飯，

吃的黑麵包很硬，用斧子砍開來吃。到莫斯科後，瞿秋白帶我去睡覺，第一個晚上就是蓋幾一張草墊過夜的，第二天才搬進東方大學。

(採訪記錄 1957 年和 1980 年兩次經蕭三本人審閱、修改)

關於上海建黨和旅歐勤工儉學的回憶

陳公培

陳公培（1901 - 1968）湖南長沙人，曾改名無名、吳明。金陵大學肄業。1919 年在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1920 年在上海參加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同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 年在巴黎與國內黨組織保持著聯繫，因參加佔領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被押送回國。1921 年底赴海南，創建瓊海師範學校並任校長，通過教書，聯繫進步學生。1924 年加入黃埔軍校第二期，發起組織“火星社”。兩次參加東征戰爭。北伐戰爭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副主任、武漢工人運動講習所教員。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轉戰廣東潮汕地區，並於此時脫離共產黨。1933 年參加福建事變，代表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後寓居天津、上海等地。1949 年 12 月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一）共產黨發起組的建立

（1956 年 12 月）

“五四”運動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它的外因是：（1）十月革命的影響。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因被封鎖，我們到 1918 年春才知道，當

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糊的，但它對我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2）朝鮮革命，使我們很興奮，我們想朝鮮都能革命，我們難道不能革命？（3）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至於內因，主要是：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就有社會主義的宣傳（如同盟會的《民報》上有關社會主義的文字）。上海作新社出版的《社會主義》、《廣長舌》（幸德秋水著）等書，也是宣傳社會主義的。前一時期，湖南譚嗣同主張個人解放，打破一切，對湖南的青年有很大影響。湖南老同盟會員龍璋（又名彥先、硯仙）譚人鳳都主張耕者有其田；四川有廖平；浙江光復會，在章太炎的影響下，以蔡元培為代表，也有社會主義思想；廣東康有為的《大同書》，也有模糊的社會主義思想。民國初年，江亢虎等搞社會黨（在北京宣武門外），據說李大釗同志也曾參加過。1916年張勳、康有為復辟後，國內思想界反孔的思想高漲起來，而同時有劉師復等宣傳空想社會主義。有這許多原因，青年人受了他的影響就有可能接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十月革命勝利後，思想界就動起來了。

1919年蘇聯鬧饑荒，帝國主義想以賑災名義，刺探蘇聯的內情。中國的熊希齡（進步黨）搞慈善事業，派人去蘇聯，俄文專修館學生彭澤湘（岳漁）就是他們派去，於1920年去蘇聯的，另外也有一些新聞記者也跟着去，如瞿秋白同志也是1920年去的。出國時好像是由《時事新報》交涉辦遣（理），他所著《赤都心史》原來是一個通訊集。

1918年春，《新青年》出版，宣傳新文化。同年冬，有《國民雜誌》，後來又有《新潮》出版，都是在思想上準備了“五四”運動。《新潮》的出版或在“五四”稍後，而《每週評論》或在前些。

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不是直接傳到學生當中去的。事情的發生很複雜，原來美國和日本有矛盾，在巴黎和會上美國反對日本。中國外交失敗，親美派顧維鈞等拍電報給孫寶琦，叫他設法在國內發動一

次反日的民意運動以為外交聲援。孫是個老官僚，沒有辦法，就去找蔡元培。蔡也沒有辦法，和學生領袖商量。學生知道巴黎和會失敗，就開會遊行。當天參加的只有千把人，有的打着校旗，有的拿着紙旗，到東交民巷去示威。東交民巷進不去，又到外交部，再到曹汝霖家。曹家鐵門緊閉，學生站在胡同裏僵持着，用旗杆子挑屋簷上的瓦片，瓦片掉到地上，同學們因在胡同僵持時久氣憤難耐就拿瓦片當武器，敲破當街房屋的玻璃窗。有幾個學生就從窗口爬進去，(劉仁靜就是其中之一)，打開大門放進群眾，人多手雜，就發生了砸傢具打人的事。事情鬧大了，不好搞，學生就組織聯合會來應付。

“五四”後，各地成立學生會，學生中的活動分子湊幾個錢出版許多小刊物，辦了許多《書報流通社》，(三、五十塊錢就可辦起來了)，作為互相聯繫通消息的工具，各地的活動分子，雖然事先互相不認識，通過這種方式，也就聯繫起來，從“五四”到黨成立，出版了不少小刊物，同時也成立以小刊物為中心的小團體，比較著名的有 1919 年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這是一個愛國派，進步文藝青年和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人們所共同組織的。

1919 年冬，北京王光祈等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張申甫、周作人等都是贊助人。發起時，在報紙上徵求團員，施存統等外地青年也趕來參加。參加者有：施存統、傅彬然、王魯彥、章鐵民、張北海(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很反動)，易群先(女的，後來表現不好)、周北棣、何孟雄(後來參加共產黨，在革命運動中犧牲)李樹榮、張樹榮等人，憚代英同志也曾來信說要參加，但不過三、四個月這個團體就解散了。“工讀互助團”曾發展成三個小組，上述一些人是一個小組；另一組是女的，沒有搞好就垮了；還有一組是四川人組織的。此外，法文專修館的學生也組織了一個。師大的前

身北京高等師範也有一個“工學社”性質稍有不同。那時大家的思想還很模糊，多少有些無政府思想氣息。

1920年春，施存統去上海，住在星期評論社裏。不久我因想到法國去，也到了上海。這時陳獨秀在上海。孫中山先生當時也在上海。星期評論社裏，有沈玄廬、李漢俊等。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烏金斯基（中國名字叫伍丁康，據說是共產國際遠東方面的負責人）在上海，他大概找孫中山先生談過話。我在這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評論社碰到他，他和我們一起座談過，參加座談的有他的翻譯楊明齋（山東人）、戴季陶、沈玄廬、陳獨秀、徐謙（徐是臨時碰上的）和我。談蘇聯的情況，（那時我們很想知道蘇聯的情況，極想和蘇聯取得聯繫。）此後，在陳獨秀家裏又座談過一次，共有十個人參加，陳獨秀外，有沈玄廬、劉大白（後來反動）、戴季陶、沈仲九、李漢俊、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和我。戴季陶最投機，兩邊掛着，哭哭啼啼。（李達當時還在日本，陳望道在杭州，都未參加。）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搞了五六條章程，很簡單。第一條好像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會前經過一些解釋，後來大家也都同意了。當晚，施存統去日本（不是會上決定他去的，而是因肺病到日本去療養），由李漢俊、戴季陶把施介紹給宮崎寅藏的兒子宮崎龍介。施在日本作過些串聯工作，李達、周佛海當時都在日本。我不久去法國，法國後來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有很多好同志，但也有少數很壞，如葉青。

這次會後，戴季陶離開了上海，施去日本，我去法國，以後國內情況我也不清楚。

我在法國住了一年，於1921年冬回國。經過廣東時，知道廣東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人數很多，據說有一千多人，先是譚平山、譚植棠負

責。四川上海和北京的組織很脆弱。

1922 年秋，我到海南島，發展了十來個同志，現在記得的有：魯易（湖南常德人，當時在瓊山六師教書），羅漢（後來是托派）和海南島本地人徐成章、徐天炳、王大鵬、嚴風儀，王文明、王乃器（其中好多人為革命犧牲了）。我們通過教書，進行活動。接觸面很狹，做不了多少工作。以後因當地反動勢力的壓迫，仍回大陸。直至 1925 年，國民革命軍到海南，黨的勢力在海南島才紮下了根。

（二）旅法勤工儉學和無政府主義派的活動

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接近群眾，不做群眾工作，就是寫寫文章。吳稚暉等發起搞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結果遠遠出於他們的意外。“五四”運動時，吳稚暉在唐山路礦學校教國文，沒有怎麼出頭。李石曾在北大，翻譯《互助論》，這本書在當時頗有影響。“五四”後，吳稚暉、李石曾等反對玄學，對新文化運動也可算是有一定的意義。所以得到一般青年的信仰。至於他們的政治態度，則是歷來反動的。他們表面上主張“三無”（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實際上有政府、有宗教、有家庭。他們在某一時期不公開搞政治活動，而私下到處拉攏，搞幕後活動。如吳、李一部分無政府派和陳炯明勾結，抵制孫中山（不與孫中山合作），汪精衛則站在孫陳之間。他們都是看那邊有辦法，跟那邊走的。吳稚暉、李石曾在寧漢分裂後，表面上和桂系搞在一起，實際上是替蔣介石做事。

“五四”時搞無政府主義的，有廣東人黃凌霜（抗戰以前，改名黃文山），他是做理論工作的，翻譯過一些克魯泡特金的書，最能寫文章。還有搞世界語的區聲白（廣東人），上海的景梅九（陝西人），都是無

政府主義者。此外陳炯明在漳州，偽裝進步，拉攏無政府主義者兩極等人，出刊物宣傳無政府主義。他們沒有什麼組織，只有人事上的聯繫。後來巴金翻譯的東西很多。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搞什麼暴動，只是介紹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巴枯寧的東西很少。無政府主義主張充分發揮個人主義，反對封建、反對資本主義、對舊社會深惡痛絕，故受到部分青年的歡迎。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於 1918 - 1920 年間，接觸到這方面的書的。我曾通過張北海（他參加工讀互助團，後退出），和黃凌霜、區聲白等見過面，但未深談，他們可能與陳炯明有關，接受陳的接濟。

我參加留法勤工儉學的情形是這樣的：先由戴季陶把我介紹給汪精衛，汪又把我介紹給華法教育會。陳獨秀也為我寫了封介紹信，介紹給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

（陳獨秀在民國二、三年的時候，曾經寫文章主張中日合邦，李大釗同志看了，拍桌大罵。可見他後來叛變革命，是有深遠的根源的。陳獨秀和汪精衛關係很密切。1920 年陳在上海漁陽里的寓所，就是汪精衛的房子，汪還會請陳給自己的兩個兒子教書。抗日戰爭期間，武漢失守之前，陳、汪兩人一唱一和，主張對日妥協）。

1920 年秋我到法國時，剛巧華法教育會派陳延年到碼頭來迎接我們這一批勤工儉學生，當時陳延年、陳喬年兩弟兄，傾向無政府主義，當我出示陳獨秀的介紹信時，他說：“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大概是對陳獨秀在國內籌備組織共產黨一事，表示不滿。

據李立三同志說，1919 年秋冬至 1920 年春間，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勞動學會”組織，成員有：李立三、熊自難、尹寬、鄭超麟（聽說現在替外交部作些實際工作）、熊雄（後在廣東犧牲了）、盛成等，其中許多人後來入黨了，有的犧牲了。

當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有陳延年、陳喬年、徐悲鴻、劉師復的兩個妹妹，即：劉無為、劉抱蜀，還有一個叫獨無的。我曾看過他們的名單。他們在法國，沒有搞什麼活動。

留法勤工儉學生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在巴黎附近蒙得尼，有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李維漢、蕭子璋（即蕭三）、汪澤楷、顏昌頤等十余人，蔡和森當時在蒙德尼中學 college。另一部分在里昂附近的 St.Chamond, St.Etienne, Fesming 三個地方做工，有：李立三、王若飛、趙世炎、羅漢、魯易、葉青（當時叫任卓宣），我也在此地。

1921 年，工人就業發生困難，我們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也發生就業和求學問題。蔡和森同志等領導勤工儉學生要求利用庚子賠款，補助入學，向中國駐法公使陳籙請願。我們在里昂的一批，則認為我們原是以“勤工儉學”之名來的，我們到法國來的目的，也是一方面為了接受新思想，一面想借此機會參加工人運動，所以強調勤工和儉學並行，着重要求就業。覺得蔡和森同志等的意見不易辦得通。後來，我們組織了“勤工儉學會”，並找到了工作，在一個軍火資本家 Creusot 的 Schneider 工廠裏做工。蔡和森同志等則仍在原來的中學。這次運動自二、三月開始，至四、五月間結束。經過這次運動，兩批留學生間有了聯繫和瞭解，趙世炎還曾找蔡和森等談過。

這年九月裏，為爭取進里昂中法大學，又發生了一次運動。當時中法大學主持校務的，是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是副校長、褚民誼、曾仲鳴、李石曾都是管校務的。因此，中法大學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中心），他們不顧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求學要求，另外從國內招了一批學生來，在這批學生還在路上，未到法國的時候，我們得到了這個消息，在蒙德尼和里昂附近的兩批勤工儉學生，在蔡和森等同志領導下，聯合起來，爭取入學，搬進中法大學去住。我們的鬥爭口號

是“爭取教育平等”。他們胡褚曾等人曾請里昂市長社會黨黨員赫里歐到場勸我們離開中法大學。我們表示如果不能進中法大學，則寧願回國。後來李立三、蔡和森、陳毅、郭春濤、陳公培、周鐵岳、劉叔模、顏昌頤、魯易、羅漢、金滿城等一〇八人被送回國。回國後，我負責介紹李立三、蔡和森二同志于黨組織。陳獨秀當時在上海，留蔡和森在中央，李立三去湖南，我去海南島。陳毅同志後來到北京去，不久也在北京入黨。

留法勤工儉學生同吳稚暉等的鬥爭，考驗了無政府主義派，該派平日和我們不作正面鬥爭，這次運動，則使他們起了分化。陳延年、陳喬年等在鬥爭中認識了吳稚暉等的面目，從此脫離了無政府主義派。

在我們去法國之前，法國已有近千華工，這是中國政府對德宣戰後應募去的。（他們是由基督教青年會協助，如翻譯和文娛活動等），我們到法國後，就在這些華工中進行工作。中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運動結合，在國內是“五四”以後的事，在國外開始於此時。

留法勤工儉學生為爭取入學問題進行鬥爭的時候，國內已經正式成立共產黨，黨組織曾把《共產黨》雜誌寄給我。我回國後，繼續留在法國的同志，組織旅歐支部。參加者有：陳延年、陳喬年、向警予、李維漢、蔡暢、李富春、王若飛、聶榮臻、蕭子璋、歐陽欽、劉伯堅、熊雄、穆青、張申府、張伯簡、袁文慶、劉清揚、郭隆真等。旅歐支部，包括法國和德國兩部分，德國部分有的是從法國去的。德國部分有：熊銳、廖煥星、張伯鈞、李季、徐冰。朱德同志去得較晚，周總理也去過德國。（為里昂中法大學問題鬥爭時，周總理不在法國）。

*

*

*

*

1922 年我們在海南島，通過教書進行工作。在嘉積工業學校、瓊山師範、第六中學和瓊山中學等處，都有我們的同志。那時我們沒有嚴格的組織生活，有時大家在一起討論討論《嚮導》上的文章。吸收同志也沒有經過什麼手續，所以還不能稱為“黨員”，我們和中央有通信聯繫，中央給我們的指示也不很具體。

*

*

*

*

國家主義派問題：

1915 年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留日學生回國，辦了一個《救國日報》，曾琦就是這個報的記者。“五四”時，李大釗同志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曾琦也是發起人之一。後來，曾琦、李璜等都去法國。在他們去法國之後，國內的少年中國學會，起了分化，（開始是因為一部分人要求在會章中加入反宗教一條，田漢等不同意，引起爭論）。曾琦等在法國，看見留法學生中社會主義派勢力強大，後來還組織共產黨，他們就眼紅了，也組織起來。開始時，都是四川人，力量很薄弱。（當時曾琦在法國替國內某報館搞通信工作，李璜在法國讀書）。我在法國時，曾和曾琦等住在一個旅館裏，經常有接觸，還沒有發生政治上的衝突。我們當時沒有把他們當作鬥爭對象，他們則怕我們在群眾中批判國家主義，所以經雙方協商，訂過“互不侵犯”的“君子協定”。後來他們回國辦《醒獅報》，和共產黨爭群眾，那時黨主張：國共合作、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他們則標榜“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內不妥協，外不親善”，對內含糊混沌，對外反對國際主義，和我們針鋒相對，後來還和孫傳芳勾結在一起，反對革命。

（記錄經陳公培審閱、修改）

陳伯吹先生訪問紀錄 1956.12.

五四運動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它的外因是：(1)十月革命的影響；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因被封鎖，我們到1918年春才知道，當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糊的，但它對我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2)朝鮮革命，使我們很興奮，我們想，朝鮮都能革命，我們難道不能革命？(3)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至於內因，主要是：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就有社會主義的宣傳（如同盟會的「民報」）。我十五歲時，看過上海「作新社」的「社會主義」「廣長舌」（辛德秋水著）等書，也傳播社會主義的。那時，湖南譚嗣同主張個人解放，打破一切，對湖南的青年有很大影響。湖南老同盟會員羅璋（又名廖先、倪仙）、譚人鳳都主張耕者有其田；四川有廖平，浙江光復會，在章太炎的影響下，以蔡元培為代表，也有社會主義思想；廣東康有為的大同書，也有模糊的社會主義思想。北京晨報（主編蔣殿俊又名伯英，四川人），那時也是進步的。民國初年，江亢虎搞社會黨，（在北京宣武門外），李大釗同志也曾參加過。可見當時社會主義是吸引人的。許多青年受了它的影響。十月革命勝利後，思想界就動起來了。1919年蘇聯鬧飢荒，帝國主義想以賑災名義，刺探蘇聯的軍情。中國的熊希齡（進步黨）搞慈善事業，派人去蘇聯，在文專修館學生彭澤湘（岳漁）就是他們派去，於1920年去蘇聯的，另外也有一些新聞記者也跟着去，如羅秋白同志，也是1920年去的。出國時好像由中國報館介紹，也所著書即《共產主義之實現》。1918年春，「新青年」出版，宣傳新文化，同年冬，有「國民雜誌」，後來又有「新潮」出版，都是在思想上準備了五四運動。

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不是直接傳到學生當中去的。事情的发生

新青年出版在「五四」前，由周作人編輯在青島。

思想界動起來，而同時有劉師得字立倫等，熱心社會主義。

很複雜，原來美國和日本有矛盾，在巴黎和會上美國反對日本，中國外交失敗，親美派顧維鈞拍電報給孫寶琦，叫他在國內發動一天運動，孫是個老官僚，沒有辦法，就去找蔡元培，蔡也沒有辦法，和學生領袖商量，學生知道巴黎和會失敗，就開會遊行，當天參加的只有千把人，有的打着改旗，有的拿着紙旗，到東交民巷去示威，東交民巷進不去，又到外交部，再曹汝霖家，曹家鐵門緊閉，學生等着沒事做，用旗桿子挑屋簷上的瓦片，瓦片掉到地上，他們就拿瓦片當武器，敲破玻璃窗，有幾個學生從窗口爬進去，（劉仁靜就是其中之一），打開大門，讓學生進去，事情鬧大了，不好搞，學生就組織聯合會來应付。

五四後，各地成立學聯，學生中的活動分子自己辦幾個錢出版「青年」，（三五十塊錢就可辦起來了），作為互相聯系傳遞信息的工具，各地的活動分子，雖則不認識，通過這種方式，聯系起來，從五四到黨成立，出版了不少小刊物，同時也成立以各種物為中心的小團體，比如著名的有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這是一個愛國志士組織，進修各種科學和社會知識的，1919年冬，北京王光祈等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陳独秀、張中甫、周作人等都是贊助人。發起時，在報紙上征求團員，施存統等外地青年，也趕來參加。參加者有：施存統、傅彬然、王魯彥、章欽民、張北海（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很反動），易群先（女的，後來表現不好）、周北棣、何孟雄（後來參加共產黨，在革運中犧牲）和朱樹棠（朱樹棠是朱樹棠的兒子），傅彬然也參加，但不久這個團體就解散了。「工讀互助團」後來發展成三個小組，上述一些人是一個小組，另一組是女的，沒有搞好就垮了，還有一組是四川人組織的。此外，法文專修館的學生也組織了一個，鄭君有一個「工學社」性質差不多。那

大家
 時我們的思想還很模糊。多^些有些^些政府員和^些黨員。
 1920年^春，施存統去上海，住在星期評論社里。不久我因想到
 法國去，也到上海³。這時，陳獨秀也在上海。孫中山先生^(當時在上海)的星期評
 論社里，有沈玄廬、李漢俊、~~邵力子~~^{邵力子}等。³時第三國際的代表烏金
 斯基（中國名字叫伍丁康，據說是共產國際遠東方面的負責人）在上
 海，他大概找孫中山先生談過話。我在这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
 評論社碰到他，他和我^們一起座談過，參加座談的有他的翻譯~~某某~~^(楊明曉)
 北洋大學的學生^們，戴季陶、沈玄廬、陳獨秀、徐~~謙~~^(徐是臨時碰上的)
 和我。談蘇聯的情況，（那時我們很想知道蘇聯的情況），並和
 我們取得聯繫。^些有一天，在陳獨秀家^裡談，共有十個人參加，陳獨秀^外
 有^些、沈玄廬、劉大白（後來反動）、戴季陶、沈仲九、李漢俊、施存統、
 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和我。戴季陶最投機，兩邊掛着啼啼哭哭。
 （李達當時還在日本，陳望道在杭州，都未參加），這次會是192
 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搞了五六條章程，很簡單，
 第一條好像是~~無產階級專政~~^(所)，會^{經過一些}，後來大家也都
 同意了。當晚，施存統去日本，（不是會上決定他去的，而是因肺病
 到日本去治療），由李漢俊、戴季陶把施介紹給宮崎實藏的儿子宮崎
 龍介。^(你這些事所工作)施在日本發展組織，李達、周佛海當時都在日本。我不久去法
 國，法國後來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有很多好同志，~~也~~^但也有少
 數很壞，如葉青。
 這次會後，戴季陶、沈玄廬都^{自願回上海}跑了。施去日本，我去法國，以後^二
 情況我也不清楚。

我在法国住了一年，于1921年^(冬)回国。經過广东時，知道广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很多，据说有一千多人，先是譚平山負責。
^(上海和北京)组织的組織很脆弱。^(李桂棠)

1922年秋，我到海南島，发展了十来个^{同志}，現在記得的有：
：魯易（湖南常德人，當時在琼山六師教书），罗漢（后来是托派），
梁炳區（~~現在还在广东~~）和海南島本地人徐成章、徐天炳、王大鵬、^{王文如}严鳳儀，（其中好多人为革命牺牲了）。我們通過教书，进行活动。接觸面很狹，做不了多少工作。^{1925年}有的因当地反动势力的压迫，仍回大陸，直至北伐時，国民革命軍到海南，党的势力在海南島才扎了根。

——以上经陈公培先生审阅修改

王秉璋整理

陳伯煥先生談話記錄

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接近群眾，不做群眾工作，就是寫文章。吳稚暉等發起搞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結果遠不如他們的意外。五四運動時，吳稚暉在唐山鐵路學校教國文，沒有什麼出頭。李石曾在北大，翻譯互助論，這本書在當時頗有影響。五四後，吳稚暉、李石曾等反對玄學，對新文化運動也可稱是^{積極}有^效的。所以得到一般青年的信仰。至於他們的政治態度，則是歷來反動的。他們表面上主張「三无」（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實際上有政府、有宗教、有家庭。他們不^必開搞政治活動，而私下到處拉攏，搞幕後活動。如吳^{（一部分去時）}和陳炯明勾結，抵制孫中山，（不與孫中山合作），汪精衛則站在孫陳之間。他們都是看那邊有辦法，跟那邊走的。吳稚暉在寧漢分裂後，表面上和桂系搞在一起，實際上又替蔣介石做事。

五四時搞無政府主義的，有廣東人黃凌霜（抗戰以前，改名黃文山），他是做理論工作的，翻譯過一些克魯泡特金的書，最能寫文章。還有搞世界語的區鵬白，（廣東人），上海的景梅九，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此外陳炯明在漳州，偽裝進步，拉攏無政府主義者，兩極等人，出刊物宣傳無政府主義。他們沒有什麼組織，只有人事上的聯繫。後來巴金翻譯的東西很多。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搞什麼暴動，只是介紹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巴枯寧的東西很少。無政府主義主張充分發揮個人主義，反對封建、反對資本主義、對舊社會深惡痛絕，故受到部分青年的歡迎。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於1918—1920年間，接觸到這方面的書的。我曾通過張北海（他參加過工讀互助團，

當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有陳延年、陳喬年、徐悲鴻、劉師復的兩個妹妹，即：劉無為、劉抱蜀、還有一個叫獨無的。我曾看過他們的名單。他們在法國，沒有什麼活動。

留法勤工儉學生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在巴黎附近蒙得尼，有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李維漢、蕭子璋（即蕭三）、汪澤楷、顏昌頤、顏昌頤等十余人，蔡和森當時在蒙得尼中學 College。另一部分在里昂附近的 St. Chamond, St. Etienne, Fermeig 三个地方做工，有：李立三、王若水、趙世炎、~~蕭子璋~~、罗汉、魯易、葉青（當時叫任卓宣），我也在此地。

1921年，工人就業發生困難，我們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也發生就業和求學問題。蔡和森同志等領導勤工儉學生要求利用庚子賠款，補助入學，向中國駐法公使陳嘉謨請願。我們在里昂的一批，則認為我們原是以「勤工儉學」之名來的，我們到法國來的目的，也是一方面為了接受新思想，一面想借此機會參加工人運動，所以強調勤工和儉學並行，着重要求就業。覺得蔡和森同志等的意見不易辦得通。後來，我們組織了「勤工儉學會」，並找到了工作，在一個軍火資本家 Creusot 的 Schneider 工廠里做工。蔡和森同志等則仍在原來的中學。這次運動自二三月開始，至四五月間結束。經過這次運動，兩批留學生間有了聯系和了解，趙世炎還曾找蔡和森等談過。

這年九月里，為爭取進里昂中法大學，又發生了一次運動。當時中法大學主持校務的，是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是付校長、褚民誼、曾仲鳴、李石曾都是管校務的。因此，中法大學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中心），他們不顧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求學要求，另外從國內招了一批學生來，在這批學生還在路上，未到法國的時候，我們得到了這個消息，在蒙得尼和里昂附近的兩批勤工儉學生，在蔡和森等同

志領導下，聯合起來，爭取入學搬進中法大學去住。我們的鬥爭口號是「爭取教育平等」。他們曾通過里昂市長社會黨黨員赫里歐勸我們離開中法大學。我們表示如果不能進中法大學，則不^(寧死)回國。後來李立三、蔡和森、陳毅、郭春濤、陳公培、周鉄岳、劉叔模、顧昌^(顧昌顯)、魯易、羅漢、金滿城等一〇八人被送回國。回國後，我負責介紹李立三、蔡和森^(蔡和森)同志^(打)入黨。陳独秀當時在上海，分配我們工作，蔡和森^(上)留中央，李立三去湖南，我去濟南島。陳毅同志後來到北京去，不久也在北京入黨。

留法勤工儉學生^(留)和吳稚暉等的鬥爭，放寬了無政府主義派，該派平日和我們不作正面鬥爭，這次運動，則使他們起了分化。陳延年、陳喬年等在鬥爭中認識了吳稚暉的面目，從此脫離了無政府主義派。

^(這秀)在我們去法國之前，法國已有近千華工，這是中國政府對德宣戰後派去的。^(電告教)（他們是^(協助)青年會^(如請譯和文談活法等)的），我們到法國後，就在這些華工中進行工作。中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運動結合，在國內是五四以後的事，在國外開始於此時。

留法勤工儉學生為爭取入學問題進行鬥爭的時候，國內已經正式成立共產黨，黨組織曾把「共產黨」雜誌寄給我。我回國後，繼續留在法國的同志，組織旅歐支部。參加者有：陳延年、陳喬年、向警予、李維漢、蔡暢、李富春、王若^(若)、聶^(聶)、蕭子^(蕭)、歐陽欽、劉伯堅、熊雄、穆青、張申府、張伯簡、袁文慶等。旅歐支部，包括法國和德國兩部分，德國部分有的是從法國去的。德國部分有：熊銳、廖煥星、張伯鈞、李季、徐水。朱德同志去得較晚，周總理也去過德國。國共合作，（內除軍閥、外抗強權。他們標榜「內不妥協，外不親善」）

（對內）

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對外）

反

對革命。

回憶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和四川建黨經過

吳玉章



吳玉章 (1878 - 1966)，原名吳永珊，字樹人，四川榮縣人。1903 年留學日本。1905 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1912 年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1913 年冬到法國，入巴黎法科大學。1915 年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1925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 年 1 月參加國民黨“二大”，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7 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1928 年至 1937 年，被派往蘇聯、法國和西歐工作，參加共產國際第

七次代表大會。1938 年回國後，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華北大學校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教育工會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等職。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和第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1966 年在北京逝世。

經吳玉章修改過的訪談錄

李石曾於 1900 年（時）代在法國留學，學化學，把中國的黃豆進行化學分析，創辦豆腐公司（約在 1903 - 1904 年開辦），法文叫□□□。1906 年發行無政府主義雜誌《新世紀》。當時吳稚暉在英國，也搞無政府主義。新世紀社除出版《新世紀》外，又出版《世界》、《六十名人傳》，（名人傳中除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等外，還有馬克思、恩格斯，還有達爾文等）。

無政府主義有二派：①巴枯寧，主張暗殺，搞恐怖活動，說政府都是壞的，1870 年，曾有莎菲亞刺俄皇事。列寧的哥哥為參加這件刺殺事件而犧牲，但列寧不贊成這種謀刺個別統治者的活動。馬克思怕巴枯寧借第一國際的名義進行活動，解散第一國際，以免為他利用。

②克魯泡特金，主張互助、講教育，自稱“科學的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對立。李石曾即宣傳克魯泡特金的主張者。《民報》章太炎反對無政府主義。

那時，日本有張繼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後因革命失敗，跑到英國和吳稚暉在一起。

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宮崎寅藏（筆名白浪滔天），曾經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過很多幫助，同盟會有的秘密會議，就在他家裏開。我們搞炸彈是從他們那裏學來的。他和孫中山還曾幫助菲律賓獨立運動，運動失敗，寫《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1905 年俄國革命失敗，許多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跑到日本也曾接受宮崎的幫助。日本無政府主義勢力較廣，如山川均、片山潛、大山鬱夫等，過去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同盟會中也有不少人搞無政府主義。

以前搞世界語的，差不多都是無政府主義者。

蔡元培當時在德國留學。

李石曾的父親李鴻藻，是清朝宰相，同治皇帝的師傅，地位很高。同治臨終時，召他去說死後要立恭親王溥倫繼承他，同治的皇后知道了，西太后便叫李鴻藻去，把同治的遺詔撕掉，立光緒。這樣，西太后則仍是皇太后。李石曾是李鴻藻的小兒子，李石曾的哥哥也做大官，曾叫李石曾回國做官。李石曾說，你做你的官，我開我的豆腐公司，我賣我的豆腐。因此，當時一些人認為李石曾很進步，實際上，他開的豆腐公司，翰林嚴修（李鴻藻的學生）幫他在河北省（當時叫直隸省）公款中搞會捐了三十多萬兩銀子。

李石曾搞無政府主義，有影響，我就是受他的影響中的一個。

辛亥革命中，李石曾起了破壞幫助袁世凱的作用。1910年，汪精衛、黃復生炸攝政王被捕。武漢起義後，汪被放出來，和李石曾等一起組織“京津同盟會”。當時正值南北議和未達協議，孫中山在南方成立臨時政府推孫中山為總統，李石曾和徐世昌等大官僚有聯繫，主張請袁世凱出來執政。袁出來後，一面壓迫滿清政府，一面壓迫革命來奪取政權，革命者都反對袁世凱出來。汪精衛特別跑去南京找孫中山，要孫中山把總統位置讓給袁世凱。孫中山起初不同意，汪很混蛋，狂妄地諷刺孫中山，說孫捨不得總統的位置。孫中山不好意思，怕國家前途因他一個人受影響。加上帝國主義的威脅，袁世凱有段祺瑞、徐世昌、馮國璋等軍隊為後盾；另一方面，革命本身很軟弱，許多人主張議和，革命的政權終於落到袁世凱之手。

還有一個朱芾煌，日本留學生，同盟會會員。他在武昌起義後回國，跑到袁世凱家裏去作說客，勸袁世凱出來，保證叫他作總統。袁表面上不同意，實際上是講價錢。當時英國也壓迫滿清政府退位，讓袁出來。最後，和談成功，袁世凱當上了總統。

吳玉章老當時在南京總統府當秘書，知道袁世凱當總統的事，很

非常生氣，遂於 1912 年 4 月間離寧去京。發誓不做官。

1912 年 4 月吳老到北京後，李石曾等就拉吳老一起組織“留法儉學會”，過去留法每年要花一兩千元以上，用儉學辦法每年這樣只花一兩三四百元。

全國南北議和成功，但四川仍有兩個政府，即重慶軍政府（革命的），和成都諮議局允昌衡的政府的四川軍政府彼此對立。袁世凱想統一四川，派朱芾煌去，並要吳老同去，事先未征得吳老同意，消息就在“京津同盟會”的機關報《民意》北京的報紙上登出來了，吳老不願去，經大家說服才去，經大家勸說，為了慰問和調解爭執，吳老才答應去。他們拉吳老去，因為吳老在四川同盟會裏和同鄉中有聲望。

吳老到四川後，合併了成渝兩個政府，並在成都成立四川留法儉學會，第一批留法的有十餘人，其中有：何魯、有熊克武的弟弟、余際唐的兒侄子，張烈五的兒子。

1913 年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吳老去法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法國招華工，於是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時在 1915 年。這個辦法是以半工半讀求學。1916 年，成立華法教育會。原準備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重慶五地各辦中法大學一所，後來只有在北京的辦成了。吳老後來在四川 1925 年大革命時在重慶辦起一個中法大學附屬中學，培養了不少革命幹部。

1912 年南北議和成時，李石曾是和北方代表唐紹儀、汪精衛等同船南下，在輪船上發起“六不會”，即不做官、不作議員、不納妾、不嫖、不賭、不吸鴉片煙。蔡元培、汪精衛、李石曾等又加不飲酒、不吃肉，為“八不會”。許多進步青年，很受這個會的影響，但李石曾、汪精衛等，所講不作官，只是不作小官作大官。

劉師復是廣東人，和他的兩個妹妹，都搞無政府主義，在菲律賓

和南洋華僑中很有影響，他們做了一些實際工作。在廣東等處出刊物。劉的信徒中，有區聲白、梁冰玄（1919 - 1920 在上海辦《勞動音》）、佩剛（1917 年吳老在北京辦留法儉學會時，佩剛在上海附近昆山辦“新村”），等，北大有黃凌霜。最壞的一點是他們反對共產黨。劉師復他們搞過一些活動，主要想搞“新村”。1908 年時在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夫婦，他們的文學很好，後來同端方搞在一起，也以後又贊成袁世凱作皇帝。“五四”運動時和以後，黃凌霜在北大，恐怕沒起什麼作用，常和共產黨作鬥爭。這些都表明他們的反動性。

“五四”後，一部分在外地讀書的學生和部分留學生回四川，四川空氣為之一變。1921 年四川川東道尹的秘書陳愚生是北大學生，通過道尹請鄧中夏、惲代英、高語罕同志等到重慶講演。後惲代英留同志又來川，在楊森辦的瀘州師範教書。我在成都高師任校長時，叫請惲代英同志去任教，很受學生歡迎。惲同志在四川也去，惲在高師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王右木也是團員。後王去上海，尚未回川。我因年齡過大不能加入。因此我們于 1922 年成立“中國青年共產黨”，有二十餘人，有楊闇公（1927 年犧牲），童庸生（高師學生），傅雙無（後叛變）等。傅辦《赤心評論》作為黨的刊物。1924 年，軍閥政府要捉我，我於 1925 年遂離開四川去北京，1925 年我到北京，知道已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就由趙世炎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去信四川取消解散“中國青年共產黨”，請他們個別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有些人傅雙無等不贊成，認為即合併也須有條件，要集體加入。我堅決反對這個意見。他們的個人主義、投機分子的反動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吳老辦公室給歷史三所的復信

（1956 年 7 月）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第三所：

現將吳老對您所詢問題告訴如下：

一、1920 年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出版《勞動音》的問題，吳老說：“1920 年北京出版的《勞動音》我不知道，因為當時我不在北京。上海梁冰玄出版的《勞動音》我是知道的。他們鼓吹無政府主義，也不反對共產主義。這兩個刊物之間有無關係，我不知道。

二、張秀熟說《赤心評論》是傅雙無獨樹一幟所辦的刊物，何其芳同志所著《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說《赤心評論》是“中國青年共產黨”發行的一種刊物。不知哪一稿（說）為是？吳老說“後說為是，因為張當時在南充教書，不在成都，不知有‘中國青年共產黨’的組織。”

此致

敬禮

注：記錄上是吳老改的。

吳老辦公室

吳玉章回憶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

時代

和四川達達信通

李石曾於1900年在法國留學，學化學，把中國的黃豆^行進^創化學分析，開豆腐公司，（約在1903或1904年開辦），法文叫Casso-Sojaire。1906年發行無政府主義雜誌新世紀。當時，吳稚暉在英國，也搞無政府主義。新世紀社除出版新世紀外，又出版「世界」、「六十名人傳」，（名人傳中除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特等外，還有馬克思、恩格斯、還有達爾文等）。

無政府主義有二派：①巴枯寧，主張暗殺，搞恐怖活動，說政府都是壞的，1870年，曾有莎菲亞刺俄皇事，列寧的哥哥^哥也參加這件刺殺案件^而犧牲，但列寧不贊成這種^{計劃}刺殺統治者的活動。馬克思怕巴枯寧借第一國際的名義進行活動，解散第一國際，以免為他利用。

②克魯泡特金，主張互助、講教育，自稱「科學的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對立。李石曾即宣傳克魯泡特金的主張者。「民權」章太炎反對無政府主義。

那時，日本有張繼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後因革命失敗，跑到英國和吳稚暉在一起。

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宮崎寅藏（筆名白浪滔天），曾經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過很多幫助，同盟會有的秘密會議，就在他家裏開。我們搞炸彈是從他們那裏學來的。他和孫中山還會幫助菲律賓獨立運動，運動失敗，寫「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許多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跑到日本也會接受宮崎的幫助。日本無政府主義勢力較廣，如山川均、片山潛、大山郁夫等，過去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同盟會中，也有不少人搞無政府主義

以前搞世界語的，差不多都是無政府主義者。

蔡元培當時在德國留學。

李石曾的父親李鴻藻，是清朝宰相，同治皇帝的師傅，地位很高，同治臨終時，召他去，說死後要立恭親王溥倫繼承他，同治的皇后知道了，西太后便叫李鴻藻去，把同治的遺詔撕掉^兒，立光緒，這樣，西太后則仍是皇太后。李石曾是李鴻藻的小兒子，李石曾的哥哥也做大官，曾叫李石曾回國做官，李石曾說，你做你的官，我升我的豆腐公司。因此，當時一些人認為李石曾進步，實際上，他開的豆腐公司，翰林嚴修（李鴻藻的學生）^{幫他在河北有（當時叫直隸省）公款中}籌了三十多萬兩銀子去用。^{就是受他的影響的一個}李石曾搞無政府主義，有影響，我即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中，李石曾起了^{幫助袁世凱的}破壞作用。1910年，汪精衛、黃復生炸攝政王，被捕，武漢起義後，汪被放出來，和李石曾等一起組織「京津同盟會」。當時正值南北議和，未達協議，^{推孫中山為總統}孫中山在南方成立臨時政府，李石曾和徐世昌等大官僚有聯繫，主張袁世凱出來，^{清 執政}袁世凱^{來奪取政權}出來，汪一面壓迫^{南京}清政府，一面壓迫革命，革命者都反對袁世凱出來，汪精衛特別跑去找孫中山，要孫中山把總統位置讓給袁世凱，孫中山^{狂喜地}初起不同意，汪很^{混蛋}，諷刺孫中山，說孫舍不得總統的位置，孫中山不好意思，怕國家前途因他一個人受影響。加上帝國主義的威脅，袁世凱有段祺瑞、^{連國璋}徐世昌等軍隊為後盾，另一方面，革命本身很軟弱，許多人主張和議，革命的政權終於落到袁世凱之手。

還有一個朱芾煌，日本留學生，同盟會會員，他在武昌起義後，

同國跑到袁世凱家里去作說客，勸袁世凱出來，保證叫他作總統，袁表面上不同意，實際上是講價錢。當時英國也壓迫清政府退位，讓袁出來，最後，和談成功，袁世凱當了總統。

吳老當時在南京，總統府秘書，知道袁世凱當總統的事，^{對於}非常生氣，^他遂於1912年四月間離寧去京。

1912年吳老到北京後，李石曾等就拉吳老一起組織「留法僑學會」，過去留法要花^{每年}一萬千元，^{以上}，^{用便學辦法}這樣只花三四百元。

全國南北議和成功，但四川仍有兩個政府，即重慶軍政府（革命的四川軍政府）和成都諮議局尤昌衡的政府。袁世凱想統一四川，派朱芾焜去，並要吳老同去，事先未征得吳老同意，消息就在「^{北京的報紙}京津同盟會」的民聲上登出來了，吳老不願去，經大家說^{為了對白和調解爭執}才去，他們拉吳老去，因為吳老在四川同盟會里有聲望。^{和同鄉中}

吳老到四川後，合併了兩個政府，成立四川留法僑學會，第一批留法的有十餘人，其中有：何魯、有熊克武的弟弟、余際唐^如的兒子，^{反對袁世凱的}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吳老去法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法國招華工，於是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時在1915年。半工半讀。1916年，成立華法教育會。原準備在北京、上海、廣州

、武漢、重慶五地各辦中法大學一所，後來只有北京的辦成了。吳老後來在四川^{中法大學附屬}也辦起一個中學，培養了不少革命幹部。

1912年南北議和時，李石曾^和汪精衛等同船南下，在輪船上發起六不會，即不做官、不作議員、不納妾、不賭、不吸鴉片煙。^{不嫖}

蔡元培、汪精衛、李石曾等又加不飲酒、不吃肉，為八不。許多進步青年，受這^個會的影響，但~~汪精衛~~汪精衛等，所講不作官，只是不作小官作大官。

劉師復是廣東人，和他的兩個妹妹，都搞無政府主義，在華僑中很有影響，他們做了一些實際工作。在廣東出刊物。此外，^和無政府主義中，有區聲白、梁冰玄（1919—1920在上海辦“勞動音”），佩剛（^和1917年與老在北京辦留法食學會時，佩剛在上海附近崑山辦新村）北大有黃凌霜。最壞的一點是他們反對共產黨。^和劉師復他們^和過^些活動，^{1908年時}主要想搞^些。在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後來同端方^和搞在一起，也贊成袁世凱作皇帝。五四運動時，黃凌霜在北大，^和起^些作用。常和共產黨作^些鬥爭。這些都表明他們的反動性。

* * *

五四後，一部分在外地讀書的學生和部分留學生回四川，四川空氣為之一變。^{1921年}四川道尹的秘書陳愚生，是北大学生，通過道尹，請鄧中夏、^和譚代英、^和高語罕等到重慶講演，後譚代英^和去，^和在楊森辦的瀘州師範^和。我在成都高師任校長，^和譚代英也去，^和在^和組織青年團，^和我因年過三十不能加入。因此，^和右木也是團員。後王去上海，尚未回川。我們於1922年成立“中國

青年共產黨”，^和二十餘人，有楊闇公（1927年犧牲），童庸生（高師學生），^和傅双无（後叛變），^和傅办“赤心評論”。^和1924年，軍閥政府要捉我，我于1925年離四川，^和去北京，知道已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去信四川取銷“中國青年共產黨”

請他^和個別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有些人^和不贊成，認為即合併也須有條件，^和集體加入。我堅決反對這個意見，他們^和不主義。投机分子的反動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以上往英電章以知事同修改，王來標記錄

中国人民大学公笈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现将吴老对所詢問題告訴如下。

一、一九二〇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劳动音”的问题，吴老說：一九二〇年北京出版的“劳动音”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北京。上随梁冰玄出版的“劳动音”我是知道的，他们鼓吹非政府主义，也不反对共产主义。这两个刊物之间有无关系，我不知道。

二、肖秀燕說“革命评论”是傅双无独树一幟所办的刊物，何其芳同志所著“王章同志革命故事”“革命评论”是“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的一种刊物。不知那一种是？吴老說：片說为是，因为张当时在南交教士，不在成都，不知有“中国青年共产党”的组织。

此致

敬此
這就時是吳老以的！

吳老中全

吳玉章

3月28日

1922-1925 年海南島的革命運動

馮白駒



馮白駒（1903 - 1973）海南瓊山人。1919 年春考入瓊山中學，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為該校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之一。1925 年夏考進上海大夏大學，1926 年春回到海南島，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受黨組織的派遣組建中共瓊山縣委，任書記。第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任瓊崖討逆革命軍第六路軍黨代表、中共澄邁縣委書記、瓊崖特委書記等職。抗日戰爭時期，瓊崖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廣東省民衆抗日自衛團第 14 區獨立

隊”，馮白駒任獨立總隊總隊長兼政治委員。後歷任瓊崖東北區抗日民主政府主席、瓊崖軍事委員會主席、瓊崖抗日獨立縱隊司令員兼政委。1945 年瓊崖東北區抗日民主政府改為瓊崖民主政府，馮繼任主席。1947 年 5 月任中共瓊崖區黨委書記，奉中央軍委命令將瓊崖抗日遊擊獨立縱隊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任司令員兼政委。1950 年接應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頓陸，解放海南島。歷任中共海南島區委員會

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東省副省長、浙江省副省長等職。“文革”中遭迫害，1972年5月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到北京治病。1973年病逝於北京，1983年平反。

中共廣東省委馮書記辦公室來信

歷史研究第三所：

你們兩次給馮白駒書記的信和附來的記錄稿均收到了。因查對材料及出外開會，拖了很久才覆你們，請原諒。

原記錄稿經馮書記審閱，並找了當時海南的一些同志，如陳繼虞的愛人，進行了訪問。經他們回憶：這些材料，大致就是這樣，其中應修改的，已在原稿上作了修改。其中陳繼虞烈士的死難日期還不十分可靠。不過這待以後再考查了。

你們來信所問關於海南的報刊，請你們直接與海南區黨委宣傳部連（聯）系借閱即可。

譚天度同志不在中央統戰部工作，他在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工作。請你直接與他連（聯）系。

以上連同原記錄一併退你們，請查收，如尚有不明之處，請再函示。

致

敬禮

馮辦秘書 郭曉東

1957年3月22日

經馮白駒修改過的訪談記錄

(1956 年 10 月 2 日)

海南島有共產黨的組織，是 1925 年年底的事。在此以前，有個別黨員從大陸來海南活動：

1922 年—1923 年，有共產黨員徐成章（又名徐天忠，曾經是省港罷工糾察隊的領導人）和徐天民（後來是馬來亞共產黨中央主席）兄弟二人，回到海南，組織“海南土戲改良社”，聯繫進步分子，對海南的土戲作了很大改造，出版了不少有革命內容的戲本，做了不少宣傳工作。他們還在家鄉瓊山縣的鄉村活動，秘密組織“革命同志會”等團體，把不少進步分子團結起來。團結的對象，多半是中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在各市鎮進行革命宣傳，他們的宣傳曾經對我發生過很深的影響。

另外，1922 年下半年至 1924 年，海南爆發了一次農民運動。以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為口號。從陵水發動，向北發展，佔領了陵水、萬寧、樂會、瓊東、定安、文昌、澄邁等七縣（海南島共有十三縣，上述七縣是比較繁榮的）。領導者陳繼虞，是個中學生，曾受孫中山的思想影響，可能和孫中山派有些聯繫。運動爆發的原因是：（1）統治海南島的軍閥鄧本殷，對老百姓壓迫得很厲害，苛捐雜稅很多，加上土匪到處殺人（陵水、瓊東、定安、萬寧三縣土匪特別多，有的每股多至二、三百人，屬於慣匪），農民受到很大迫害，普遍的對軍閥政府不滿；（2）陳繼虞在陵水組織農民武裝，佔領陵水城。本來分佈在各地的受共產黨員徐成章等影響的知識分子，也紛紛把周圍的農民武裝起來，響應陳繼虞的起義。所以起義軍很快就佔領了七個縣。武裝

隊伍在攻打陵水時才二、三百人，不久便發展到三千多人。農民武裝，以陳繼虞為總司令統領，下面分幾路，據我所知道，有東路司令和西路司令，我的家鄉瓊山，就駐有東路軍隊。起義的農民，絕大多數是漢族，陵水縣有部分黎民參加。

這次起義，是由一部分受共產黨影響和一部分受孫中山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在起義軍中，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徐成章沒有參加這次起義，可能當時已回大陸），也沒有國民黨的組織。起義農民中，有些是“三點會”的成員，但“三點會”在起義中也沒有起作用，起義以後，也沒有什麼發展。

起義軍還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他們在佔領縣城以後，就委派縣長，被委派任陵水縣縣長的馮熙周（曾經做過孫中山的秘書），曾叫我到縣政府做事，要我交五十塊錢（那時到縣政府做事，看職位的高低，給不同數目的錢，作為起義的軍費用），我當時才十多歲，還在小學讀書，因父親反對未去。起義軍所到之處，除委派縣長，建立政權外，殺了不少土豪劣紳，減輕了一些捐稅。

起義軍從攻下陵水到佔領七個縣，是革命運動的高漲時期。至1923年底，攻打海口和府城（瓊山縣城）時，為反動軍隊所反攻，起義軍節節敗退，後來退到山裏，不久被消滅。領袖陳繼虞用手榴彈自殺在敵人迫近時埋地雷，因不慎失手，地雷走火爆炸，被炸傷，幾天後不治身死。

農民起義失敗後，（可能是1924年），有共產黨員羅漢同志從大陸來，在海口的瓊海中學教書，做宣傳革命的工作。他在馬路上演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對軍閥政府不滿，和宣傳革命道理。我當時在海口學生聯合會工作，（我當時是瓊山中學學生）在我們開大會時，他也來演講。

*

*

*

*

學生運動方面：1923 年春夏間，成立“瓊崖學生聯合會”于海口，嘉積（瓊樂縣城）和文昌、澄邁都有分會。學生運動主要也就在這幾個縣。在“五四”運動前後，特別是在 1923—1924 年，學生為反對日本“二十一條”，掀起愛國運動，海口市所有的學校（瓊山、瓊崖、瓊海三個中學和瓊山師範，也有小學）都參加了，我們遊行示威，燒日貨、抓了不少奸商。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名字已記不起），後來是共產黨員，當時是否共產黨員不知道。那時候，每個學校裏，也有學生聯合會，除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外，還反對老八股，我們學校裏趕掉了一個老八股。

當時學生中沒有別的小團體。

*

*

*

*

1925 年 11 月，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師張發奎部隊到了海南島，推翻了軍閥政府。第十二軍師黨代表王文明同志，在海南發展共產黨組織，在 1926 年春（或 1925 年底）成立地委，（王文明同志任地委書記）。我於 1926 年春由上海回到海南時，海南的工、農、知識分子運動已轟轟烈烈展開，各種組織也都已建立起來。

海南島很早就有國民黨的組織，各縣都有；不做什麼工作，是空招牌。那時，孫中山的力量達不到海南，海南的國民黨是鄧本殷的爪牙，他們反對革命，反對農民起義。1925 年王文明同志到海南後，一部分國民黨起了變化，多數名義上是改組了，實質上還是老的一批人，仍是反對革命。這一點，從“四一二”事變後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

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用牋

歷史研究第三份：

你兩次給馮白駒的信和附帶的信件都收到了。

因查材料且外出開會，拖了很人才來信，此原稿。

原稿你往馮書記處內，并找當時海防的一些
同志，了解建黨的要求。此外，並訪問^{（從前回國）}這些材料，大致決定
這樣，其中應修改的，已在原稿上作了修改。其中附建黨烈士
名單，唯日期還不太可靠。不這這稿以後再查了。

你信中所問關於海防的附刊，此信的直接由
海防區黨委研究，是像借印即可。

譚天榮同志不在中央信託部工作，他在中央交委秘書處統
戰工作。此信直接向他查詢。

以上還向原稿第一份這信，此查收，如有有不
妥，再修正。 謹

蘇文彬

馮白駒 郭曉東 3月20日

的每股多至二三百人，屬於慣匪），農民受到很大迫害，普遍的對軍閥政府不滿；②陳繼虞在陵水組織農民武裝，佔領陵水城。本來分布在各地的受共產黨員徐成章等影響的知識分子，也紛紛把周圍的農民

武装起来，响應陳繼虞的起义。所以起义軍很快就佔領了七个縣。武装队伍在攻打陵水時才二三百人，不久便发展到三千多人。農民武装，以陳繼虞為總司令，^{沈錦}下面分几路，据我所知道，有東路司令和西路司令，^{沈錦}我的家鄉琼山，就駐有東路軍隊。起义的農民，絕大多數是漢族，陵水縣有部分黎民參加。

这次起义，是由一部分受共产党影响和一部分受孫中山思想影响的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在起义軍中，沒有共产党的組織（徐成章沒有參加这次起义，可能當時已回大陸），也沒有国民党的組織。起义農民中，有些是「三點會」的成員，但「三點會」在起义中也沒有起作用，起义以後，也沒有什麼發展。

起义軍還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他們在佔領縣城以後，就委派縣長，被委派任陵水縣縣長的馮熙周（曾經做過孫中山的秘書），曾叫我到縣政府做事，要我交五十塊錢，（那時到縣政府做事，看職位的高低，給不同數目的錢，作為起义的軍費），我當時才十多歲，還在小學讀書，因父親反對未去。起义軍所到之處，除委派縣長，建立政權外，殺了不少土豪劣紳，減輕了一些捐稅。

起义軍从攻下陵水到佔領七个縣，是革命運動的高漲時期，至一九二三年底，^{和徐成章（孫中山秘書）}攻打海口時，為反动軍隊所反攻，起义軍節節敗退，^{有的人還時時地帶回小槍小炮，但都因火藥不足，炸藥不夠，}後來退到山里，不久被消滅，領袖陳繼虞^{沈錦}用于彈自盡。^{沈錦，於一九二四年秋。}

農民起义失敗後，（可能是一九二四年），有共产党员羅漢同志从大陸，他們反對革命，反對農民起义。一九二五年王文明同志到海南後，演講：一部分国民党起了變化，多數名義上是改組了，實質上還是老的一批人，仍是反對革命。這一點，从「四一二」事變後的事實，^{當時的事實}看得更

出。



王東棟

回憶湖南衡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情況

曾希聖



曾希聖（1904 - 1968），湖南資興人。1922 年在湖南衡州第三師範讀書時，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 年春參加中國國民黨，同年秋入黃埔軍校，1926 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團指導員等職。同年冬赴蘇聯學習。1927 年回國，在漢口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在武漢、河南、山東等地從事地下工作和兵運活動。1930 年任長江局軍委秘書長，1931 年冬進入中央蘇區，在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任偵察科科長。抗戰爆發後，任中央軍委第二局

局長，1941 - 1945 年任新四軍第七師政治委員，皖江區黨委書記。抗戰勝利後，任華東野戰軍縱隊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國民黨統治區工作部部長，第二野戰軍副參謀長，豫西軍區司令員，皖北區黨委書記，1951 年後歷任安徽省委書記、安徽省軍區政治委員，第一書記，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華東局第二書記，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1956 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文革”中受迫害，1968 年 7 月

15 日逝世於北京。

採訪記錄

(1956 年 10 月 2 日)

“五四”時，我在湖南衡州第三師範讀書，湖南的學生運動，主要是在長沙。一般都是長沙先發動，其他地方跟着來。衡州有十多個中學，“五四”時發動了一次向唐生智請願的運動，(唐生智當時在趙恒惕下面當第四混成旅旅長)，參加請願的達一二萬人，唐生智出來對我們說：你們安心讀書，國家大事由我們負責等等，我們聽了覺得滿意，就回去了。

1919 - 1920 年，《新思潮》(?)、《新青年》等雜誌，在我們學校裏起了很大影響。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學校裏幾個先進的同學：賀恕 (後來在第六軍)、蔣先雲 (後犧牲)、唐鑑 (1928 年任湖北省青年團書記時犧牲) 等組織了一個“新社”，這是一個革命群眾團體，它的成員後來大都參加了青年團。我們學校大概在 1921 年 7 月前就有團的組織，我是 1922 年 8 月入團的。我只記得，當時入團是很嚴格的，入團宣誓誓詞中有幾分封建氣味，說：若不遵守團的章程，除受團的紀律處分外，還要“五雷劈身”。

1922 年，我入團前不久，毛澤東同志到我們學校裏來講演，(大概是進步同學請他來的)。後來，惲代英同志由校方聘請來校授課，他到校上了幾次課，作了幾次講演，因與校長關係處得不好，呆了兩個星期就走了。他們二人對我們學校起了很大影響，青年團的情況也隨之起了變化。

毛澤東同志和惲代英同志來校之後，我們學校裏的革命運動，就高漲起來了。當時學生運動可分：(1) 愛國運動，全體同學參加，連那些舊教員也不反對；(2) 伙食問題，可團結落後同學，90%的人參加；(3) 趕反動教員和壞教員，反對保守，要求聘請新教員，約有 30% - 40% 或 50% 人參加。(所謂新教員，是指會講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新從大學裏出來的自然科學教員)。

從“五四”至“五卅”幾年之內，我們學校的學生，斷斷續續的搞反日運動，抵制日貨，組織流動宣傳隊，到鋪子裏宣傳，燒日貨，搞得商人看見學生就害怕。幾年中這些活動有時熱烈些，有時冷淡些。

青年團除了注意領導上述這些運動以外，還注意學習進步書籍(沒有明確指出學習馬列主義)。我們學校裏，進步書刊很多，《湘江評論》也有。

1922 年時，我們級裏共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團員七八人，後來有幾個同志在革命中犧牲了，有些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之後，消極不問政治，回鄉當教員了。

1923 年，黨派張秋人同志到我校來領導團的工作。張秋人同志很活躍，和愛活動的和進步的學生合得來，時常在一起玩耍，吃花生米，但接近群眾的面不夠廣。他領導團的工作，每天晚上要團員開會、彙報、研究哪些教員教得好，哪些教員教得不好，接近的同學有什麼情況等等。並且規定，三次不出席開會，就開除團籍。這樣，使我們很為難。去呢，沒有什麼話可說，不去呢，要開除團籍。過於頻繁的組織生活影響了功課，使一部分用功讀書、準備升學的同志，感到矛盾，怕開會。至於團外的同學，用功讀書的看不慣我們，原來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也不敢來參加，其結果，使團的組織突出、孤立，有脫離群眾的傾向。反對青年團的學生，借此諷刺我們。

1923 年秋，青年團領導趕校長劉志遠的風潮，運動進行了兩三個月，是當時衡州學生運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運動的發生是因為劉志遠的思想保守，聘請的教員很老朽。我們希望聘請一些有新思想的教員。風潮發動以後不久，校長還未趕走，團的領導就宣佈擁護一個數學教員屈子健當校長，屈是一個投機分子，品質很不好，因此，引起一部分同學的動搖，像我自己，本來是主張趕校長的，但是覺得趕掉一個壞的，換來一個更壞的，當然不好，就採取中立態度。同我抱同樣態度的，還有張經武、張際春等，共不到 100 人。我們全校有 500 多學生，本來反對趕校長的不到半數，後來因為領導運動的作法上有些毛病，加上運動的時間拖長了，一些本來主張趕校長的，逐漸退了出來，使運動的威力薄弱了，結果運動失敗，50 多個同學被開除（其中 1/3 是團員），使團的力量受到很大損失，從此第三師範的學生運動轉入低潮，直至北伐時才又高漲起來。

這次運動失敗的原因，一方面是團的組織平時脫離群眾，張秋人同志在群眾中威信也不夠（他是英文教員，但英文和中文的水平都不高）團組織希望把屈子健抬出來，利用他請好教員，但這意圖沒有向一般團員和群眾交代清楚，事先也沒有在團內徵求意見，因此造成團內思想不統一，一部分人採取中立態度，分散力量。團外群眾既然不瞭解我們的意圖，那些用功讀書的，本來是希望有好教員的，但看罷課時間拖長了，讀不成書，也就不願意了。至於家裏有錢的學生，讀書本來就不在乎，教員好不好也無所謂，都對運動抱觀望態度或反對態度。另一方面，校長為人有些舊道德，在學生中有一定的基礎，加上校裏有不少與校長同鄉（耒陽）的教員和學生，他們的思想很落後，拉同鄉、親戚關係，為校長捧場，（當時還有的學生，為爭取到第三師範的附屬小學當教員，可拿比較高的薪水，而向教員送禮，其落後可

想而知。)

我在運動中，因不瞭解領導意圖，採取中立態度，是不對的。團因此對我不滿，至我畢業時，連證明信也不給我。我直到 1927 年才入黨，也是這個緣故。

在趕校長的風潮以後，校內也時常有小風潮，主要是團領導的。但它的規模，都沒有超過趕校長這次。

衡州共有 10 多個中學，以第三師範最為活躍，女三師當時還沒有團的組織，也沒有大的活動。

(記錄未經曾希聖本人審閱)

後 記

——關於“走俄國人的路”的思考

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當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孫中山為之奮鬥的，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國的道路；一是俄國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那麼，中國人最終為什麼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呢？

中共“一大”前入黨的 50 多位黨員，都出生於清朝末年，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除少數象陳公博、周佛海之流投機者外，大都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有着強烈的救亡圖存的責任感，迫切要求改變現狀。他們曾經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寄以極大的希望，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很快落入袁世凱之手，西方列強支持袁世凱篡位和借手北洋軍閥進一步掠奪中國的事實，以及 1919 年巴黎和會作出犧牲中國主權的錯誤決定，激起中國人對西方列強更加強烈的不滿，從而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產生懷疑。孫中山為挽救民主共和制的努力一次次遭到失敗後，象林伯渠這樣長期追隨孫中山的老同盟會員也發出“出路在哪里”的問題。正當愛國志士尋找拯救祖國出路的時候，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1920 年 4 月中國報刊衝破北洋政府的封鎖，披露了《蘇俄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皇政府同清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蘇俄後來並未實現諾言），《宣言》得到中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稱讚蘇俄此舉體現了“剷

除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精神”，“是謀人類全體幸福的精神”，認為他們奉行的“主義是合乎正義、合乎真理的。”《蘇俄對華宣言》在中國發表的同時，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代表先後到達中國，他們為蘇俄爭取同盟者，力促中國早日成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在北京、上海等地召開座談會，宣傳十月革命，美化蘇俄的政治制度及其對內對外政策。使人感覺到蘇俄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按照蘇俄革命的模式，世界大同很快就能實現。這種宣傳鼓動，對剛剛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左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他們很快把來自北方的客人引為同志，並接受他們的建議和幫助，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走上學習“俄國人的道路”。

當時的中國左派知識分子是怎樣認識“俄國人的道路”的？應該承認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思想基礎是很薄弱的，包括李大釗、李達等被公認為理論水平最高的領導人，也都是十月革命後才開始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的。他們對蘇俄的實際情況知之不多，對中國的社會性質也缺乏正確的認識。至於一般黨員的馬列主義水平就更膚淺了。他們大多是帶着愛國主義熱情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憧憬參加共產黨的。如鄧穎超說：“五四”時，我們“真是滿腔熱情，要求洗雪國恥，‘奔走呼號，痛哭流涕’，這幾句話形容得很恰當”。“那時候宣傳共產主義的書不多，……，直到我入黨時，也只讀過《共產黨宣言》，以後讀過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 ABC》、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也只聽說蘇聯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嚮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同情廣大勞苦大眾，厭惡中國社會的黑暗。”馬馥塘說：“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很少，只是嚮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

從《共產黨》(1920年11月創刊)宣傳的內容和“一大”通過的《中

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看，中國共產黨人主要向俄國人學習：(1) 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2) 以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3) “採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4) “廢除資本私有制”；(5) 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

中共發起組一成立，就十分重視學習、宣傳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列寧的建黨理論，批判社會上流行的各種不符合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1920 年 9 月他們把《新青年》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11 月創辦《共產黨》月刊。各地許多宣傳啟蒙思想的報刊也從提倡人權、民主轉而頌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當選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書記的陳獨秀率先發表文章，用剛剛學來的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來根本否定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否定他自己曾經竭力倡導的人權和民主。1915 年 9 月，陳獨秀在他自己創辦的《青年》(後改名《新青年》) 發刊詞中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到 1919 年 1 月，他把人權概念提升為民主，稱之為“德先生”，並稱科學為“賽先生”，以氣吞山河之聲振臂高呼：“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由此把 1915 年開始的民主啟蒙運動推向高潮。可是僅僅過了一年，由於追隨俄國人的道路，陳獨秀親手把自己所創導的啟蒙運動扼殺了。他於 1920 年 9 月在《新青年》上發表《談政治》一文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同年 11 月他又在《共產黨》創刊號上發表《第一號短言》說：“什麼民主政治，什麼代議政治，都是些

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12 月他發表《民主黨與共產黨》一文說：“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是他們“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與之相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也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專有物，統統加以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和鐵的紀律——要求人人充當共產黨黨魁的“馴服工具”。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1920 年 11 月制訂的《中國共產黨宣言》說：無產階級在以暴力奪得政權後，必須“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餘勢力作戰”，俄羅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是為了“保衛自己，抵抗國內外的仇敵。”^[1]實際情況遠非如此。1916 年列寧在論述無產階級專政時說：“專政就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整個社會實行統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2]這裏說的“一部分人”是指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專政的對象不僅是中共宣言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剩餘勢力”和“國內外的仇敵”，而是“整個社會”。1918 年，列寧就“直接暴力統治”作進一步解釋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3]就是說，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權力，對整個社會進行暴力統治。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蘇俄政府於 1917 年 12 月（在十月革命後不到兩個月）宣佈成立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1918 年 9 月 5 日頒佈《關於紅色恐怖的法令》，從此開始了一個長達數十年的史無前例的恐怖時代。他們不但槍殺了十月革命前的政府官員、軍官、地主、富農、企業主本人及其家屬，而且對大批

[1] 《“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2]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 23 卷第 64 頁。

[3]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28 卷第 218 頁。

與列寧、斯大林持不同政見的布爾什維克和知識分子進行鎮壓。1918 年 5 月（“紅色恐怖”正式開始前）革命法庭就已授權對不肯向征糧隊交出糧食的人判處死刑^[4]。有關上述血淋淋的事實，包括陳獨秀、李達等中共創始人在內的中共黨員在建黨時全不知曉。多數黨員是在沒有弄懂無產階級專政精神實質的情況下走上俄國人的路的。

1918 年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由被剝削勞動群眾——也是經過個別的人——來實現的”^[5]（這裏將《列寧全集》中的着重點改為黑體字）。列寧十分強調“無條件服從統一意志”，他說：“怎樣才能保證意志有最嚴格的統一呢？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6]這一個人當然是指布爾什維克黨的黨魁。按照上述觀點，拋棄了民主、人權理念的陳獨秀在籌組共產黨的 1921 年 5 月就公開主張造成“‘開明專制’之局面”。^[7] 1921 年 7 月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後，在黨內實行家長式的專制統治，要求以他的意志統一全黨，使一些共同建黨的同志無法容忍而宣佈退黨。林伯渠說：“陳獨秀在黨內，象家長，開會時他一個人講一通就完了，不讓別人發表意見”。更不應該的是他很不尊重其他同志，每逢意見分歧，動輒拍桌子、砸茶碗，嚴重傷害別人的自尊心。1922~1923 年間，陳望道、李漢俊、李達等退黨，就是因為不滿陳獨秀的獨裁專制。陳望道說：“只要陳獨秀當領導，我吃不消他的家長主

^[4]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暮靄》，轉引自述弢《神話的破滅》，《隨筆》，2007 年第 3 期。

^[5]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 27 卷第 246~247 頁。

^[6]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 27 卷第 246~247 頁。

^[7] 獨秀《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新青年》9 卷 1 期。

義，我還是在外邊為黨做點事情好。」^[8]

黨內的個人專政，到了 1943 年成為合法的制度。那年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主席，並明文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更有甚者，1945 年“七大”通過新黨章，把“毛澤東思想”定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為以後的造神運動作了鋪墊。但毛澤東並不感到滿足，1950 年擬定五一節口號時，他竟加上一條“毛主席萬歲！”1958 年他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還洋洋得意地說自己坑的儒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並且咬牙切齒地咒罵：“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9]（為揭露毛澤東蔑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現把毛澤東 1926 年 3 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拙文《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作為附錄收入本書）。毛澤東不僅敵視知識分子，還仇視一切與他稍有不同意見的戰友，包括中共的創始人。在本書 26 位受訪者中，就有李達、馮白駒、朱務善、曾希聖、吳德峰、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劉清揚等在“反右”、“文革”中被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遭受殘酷的批鬥，有的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平反昭雪。如果他們地下有知，不知道對當年選擇“走俄國人的路”作何感想？

承襲毛澤東衣鉢的鄧小平，80 年代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自封為

^[8] 鄧明以《陳望道傳》，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

《李達自傳》（節錄），《黨史研究資料》第 2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宋鏡明《李達傳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王會悟《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李文斌《夏衍訪談錄》，《中國電影週報》1991 年 10 月 10 日。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7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

“第二代核心”。1987 年他罷黜了“反自由化”不力的總書記胡耀邦，接任的趙紫陽在就職時就提議：我們遇到困難時，還要向小平同志請教，小平同志認為需要，他有權作出決定。這一建議成為（1987 年）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於是重演了清皇太后那拉氏垂簾聽政的鬧劇。

第一個從“走俄國人的道路”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噩夢中驚醒過來的，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旗手陳獨秀。1936 年身處國民黨監獄的陳獨秀，在獲悉斯大林借肅反之名，搞莫斯科大審判，鎮壓異見分子的信息後，以“孔甲”為筆名，在《火花》雜誌上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更正包括他自己 1920 年 9 月以來關於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的錯誤觀點。他說：“人們對民主主義，自來有不少的誤解”，“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他認為“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化之一種動力”，完成民主任務“並不限定是哪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並不是拋棄民主主義，而是擴大民主主義”，“不要把民主主義的要求當作僅僅是推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10]據濮清泉回憶，陳在獄中與濮等人議論時說：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是賤視民主”，變成了“官僚國家”，不應再稱為“工人國家”。^[11]1937 年 10 月陳獨秀出獄後一個多月，就以他自己的真實姓名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孔子與中國》一文，重新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反對法西斯逆流。他說：“科學

^[10] 陳獨秀《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火花》第 3 卷第 1 期，1936 年 10 月出版。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468~469 頁。

^[11]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 71 輯。轉引自《陳獨秀年譜》第 469 頁。

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歷史的大流，終於是沿着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如果我們不甘永遠落後，便不應該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時逆流，大開其倒車。”^[12]陳獨秀晚年貧病交困，去世前兩年的 1940 年 7 月，他寫信批評連根（托派組織成員）說：“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上之真實價值（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當着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 13 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 700 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統治的蘇聯”^[13]。同年 9 月，陳獨秀給西流（托派組織成員）的信說：“我根據蘇俄 20 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一）我認為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二）我認為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三）我認為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名詞，有它的具體內容，資產階

[12] 《陳獨秀文章選編》（下），三聯書店 1984 年 6 月版，第 532、534 頁。

[13] 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 年版，497~498 頁。

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他還給英美民主制與俄德意法西斯制列了對照表：

他還問：“每個康民尼斯特（共產主義者）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14] 由此可見，當時陳獨秀的反思十分深刻。

(甲) 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乙) 俄德意的法西斯制 (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 議會選舉由各黨 (政府反對黨也在內) 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須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一) 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 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	(二) 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 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三) 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 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四) 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 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五) 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不過他仍然沒有擺脫階級鬥爭的思想框框，把民主貼上階級標籤，稱為“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只要認真考查從古代希臘以來的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瞭解到，民主沒有階級性。早

^[14] 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502~503、506~507頁。

在 2,300 多年以前，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已指出：“人類在本性上是一種政治動物。”^[15] 嚮往自由、平等、民主，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編 者

^[15] 亞裏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 7 頁。

附錄 A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中國革命互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就因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運動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這個革命不失敗的。我們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真正的敵人。要分辨那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大略人數，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無論哪一個國內，都有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五等人。拿農村來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雇農是無產階級。拿都市說：大銀行家大商業家大工業家是大資產階級，錢莊主中等商人小工廠主是中產階級，小商人手工業主是小資產階級，店員小販手工業工人是半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苦力是無產階級。五種人各有不同經濟地位，各有不同的階級性。因此對於現代的革命，乃發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對革命守中立，參加革命和為革命主力軍的種種不同的態度。

我們試看中國社會各階級是怎麼樣。

第一，大資產階級。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發展必須附屬於帝國主義。如買辦階級——與外資有密切關係之銀行家（如陸宗輿、陳廉伯等）商業家（如唐紹儀、何東等）工業家（如張謇、盛恩頤等）大地主（如張作霖、陳恭受等）官僚（如孫寶琦、顏惠慶等）軍閥（如張作霖、曹錕等）。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萬，即四萬萬人中四百分之一，其政治主張之代表為國家主義。

第二，中產階級。如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因在經濟落後的中國，本國資本銀行工商業的發展尚限在中產階級地位。所謂銀行業乃指小銀行及錢莊，工業乃指小規模工廠，商業乃指國貨商。凡是大規模銀行工商業幾乎無不與外國資本有關係，只能算入買辦階級內。）

小地主許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個階級的欲望為欲達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發展。這個階級對於民族革命乃具着矛盾的態度。即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因現在的革命運動，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及存在感覺着威脅，又懷疑革命。這個階級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其政治主張的代表為國民黨右派——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

的國家。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態度。

他們反對以階級爭鬥說解釋民生主義，反對國民黨聯俄及容納共產派份子。但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不行的。因為現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的兩大勢力作最後爭鬥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兩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在西洋如所謂第二國際等類，在中國如所謂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等類，必須趕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本階級利益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個幻想。他們現在雖然還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們現在雖然還不是我們正面的敵人，但到他們感覺工農階級的威脅日甚時，即是為了工農階級的利益迫他們讓步稍多時（如農村中的減租運動，都市中的罷工運動）他們或他們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右翼）一定會站入帝國主義一邊，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正面的敵人。本來買辦階級與非買辦階級，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劃分清楚。以商業論，固然許多商人是洋貨商土貨商劃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門內，是一部分擺設着土貨，一部分又擺設着洋貨，而且即令是純粹土貨商人，亦許他與買辦階級的工商業家銀行家有許多經濟的關係。以知識階級論，小地主子弟若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它的生活若已經與教會洋氣或買辦階級發生密切關係，這種人固然是靠不住；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資格在國外專門學校大學校讀書，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國

留學生的薰陶，而且他們在生活上亦許與教會買辦階級發生若干間接的關係：他們仍然不免會些半身土氣半身洋氣的腳色。在這類人並不是純民族的資產階級性質，可以叫他們做“半民族資產階級”。這種人乃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只要國民革命的爭鬥加緊，這種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國主義軍閥的隊伍裏和買辦階級做很好的夥伴。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此派在某種時候，（如抵制外貨潮流高漲時）頗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虛的“和平”觀念極不易打破，而且對於所謂“赤化”時時懷着恐慌，故其對於革命極易妥協，不能久持。故中國的中產階級，無論右翼，左翼，都包含許多危險成份，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餘的階級忠實地做革命事業，除開少數歷史和環境都有特別情況的人。中產階級的數量，在全國內至多每百個人裏頭有一個（百分之一），即四百萬人。

第三，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資產階級的人數，單是自耕農，就有一萬萬至一萬（萬）二千萬。小商人，手工業主，知識階級，大概自二千萬至三千萬。合計達一萬（萬）五千萬。這個階級雖同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仍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還有餘剩，用以造成所謂資本的初步積累。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那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着一尺長涎水，對於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這種人膽極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與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但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大概不及小資產階級全數百分

之十，約一千五百萬，乃小資產階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給，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這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而因為近年帝國主義軍閥大中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使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感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從前相等的勞力，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即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他們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來頭那麼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占小資產階級的一半（百分之五十）即七千五百萬。第三部分是每年要虧本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本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的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的要虧本了。他們每逢年終結帳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從前過着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着淒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為他們有一個從前與現在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頗有推進革命的力量。其人數占小資產階級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萬——一個不小的群眾，乃小資產階級的左翼。以上說小資產階級的三部分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到戰時即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們從五卅運動和兩年來各地農民運動的經驗看來，這個斷定是不錯的。

第四，半無產階級。此處所謂半無產階級乃包含：

（一）半自耕農；（二）半益農；（三）貧農；（四）手工業工人；

(五)店員;(六)小販之六種。半自耕農的數目，在中國農民中大概占五千萬，半益農貧農大概各占六千萬，三種共計一萬(萬)七千萬，乃農村中一個極大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這三種農民雖同屬半無產階級，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在半自耕農，其生活苦於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作工或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較之自耕農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優於半益農。因半益農無土地，每年耕種只得收穫之一半；半自耕農則租於別人的部分雖只收穫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卻可全獲，故半自耕農之革命性優於自耕農而不及半益農。半益農與貧農都是鄉村的佃農，同受地主的剝削，然經濟地位頗有分別。半益農無土地，然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及相當數目之流動資本。此種農人，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種雜糧，撈魚蝦，飼鷄豕，勉強維持其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貧農。貧農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流動的資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斗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乃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手工業工人所以稱為半無產階級，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種自由職業，其經濟地位略與農業中半益農相當。因家庭負擔之重，工資與生活物價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和失業的恐慌，與半益農亦大致相同。店員乃中小商人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事畜的費用，物價年年增漲，而新例加薪往往須數年一更，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與貧農手工業工人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小販不論是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夠，其地位

與貧農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手工業工人人數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萬人，店員大概有五百萬，小販大概有一百萬，合起半自耕農，半益農，佃農人數，半無產階級人數共計約二萬萬，占全人口之一半。

第五，無產階級。其種類及人數如下：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 都市苦力——約三百萬 農業無產階級——約二千萬 遊民無產階級——約二千萬 共約四千五百萬。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產業工人（工業無產階級）不多。二百萬產業工人之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而大多數在外資產業之下。故工業無產階級雖不多，卻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開灤及焦作煤礦罷工，沙面罷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之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的“有組織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工具，剩下兩隻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着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鬥。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及人力車夫占大多數，糞夫清道夫等都屬於這一類。他們除一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與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組織的集中及在生產力上的重要。中國尚少新式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業無產階級，乃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而言。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流動資本，故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乃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與貧農處於同一要緊的地位。遊民無產階級為失了土地的農民與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其人數在二千萬以上，乃國內兵爭匪禍的根源。此遊民無產階級中最多者

為匪，其次為兵，次為乞丐，次為盜賊與娼妓。他們乃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做了他們政治和經濟爭鬥的互助機關。處置這一批人乃中國最大最難的問題。中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貧乏，另一個是失業，故若解決了失業問題，就算是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半。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總上所述，列表如下：

階 級		人 數	對於革命的態度
大資產階級		一百萬	極端反革命
中產階級		四百萬	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小 資 產 階 級	富裕部分—右翼	一千五百萬	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
	自足部分—中央	七千五百萬	平時中立，戰時參加。
	不足部分—左翼	六千萬	歡迎
	共一萬萬五千萬		
半 無 產	半自耕農	五千萬	參加
	半益農	六千萬	積極參加
	貧農	六千萬	勇敢參加

階級	手工業工人	二千四百萬	同半益農
	店員	五百萬	同半益農
	小販	一百萬	同貧農
	共二萬萬		
無產階級	工業無產階級	二百萬	主力軍
	都市苦力	三百萬	次於工業無產階級的主力軍
	農業無產階級	二千萬	勇敢奮鬥
	遊民無產階級	二千萬	可引為革命的力量
	共四千五百萬		

誰是敵人誰是友？我們現在可以答覆了。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反動派知識階級即所謂中國大資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我們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

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團結起來！

(刊於 1926 年 3 月廣州出版的《中國青年》第 116、117 期)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

王來棣

(一) 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2002 年 12 月，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發生在 1957 年 7 月 7 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是毛澤東“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時，他在上海接見 30 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也在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1]如所周知，魯迅是毛澤東最讚賞的知識分子，曾被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現在卻翻了臉，竟公然把魯迅也當“右派”那樣的敵人。

這件事是一年前魯迅之子周海嬰首先公開披露的。他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 1957 年毛澤東與羅稷南這段對話，卻招來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質疑和批駁。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周海嬰本人思想有問題。正當周海嬰陷

入圍攻之際，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上述文章，並提供了當時刊載着新華社的報導和會場全景照片的報紙，可謂證據鑿鑿。為避免蹈周海嬰的覆轍，黃宗英還鄭重其事地向律師諮詢。黃文不但為周海嬰解了圍，更重要的是她證實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史實，揭露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魯迅生前替共產黨說過不少好話，從未向它“猖狂進攻”，為什麼要“關在牢裏”呢？只是因為他手裏有一支筆，要寫；只是因為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使毛澤東感到是一種威脅。對付的辦法就是他 1949 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對敵人要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據黃宗英回憶，當時羅稷南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宗英感到毛在“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嚇得手心冒汗”。

其實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並非從此時開始，早在 1925 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

（二）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 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51 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自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定為開卷篇。該文原載 1925 年 12 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 年 2 月和 3 月《中國農民》和《中國青年》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2]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了單行本。現在我找到上述三種刊物所載的三篇《階級分析》，它們在文字上作過一些

改動，但所有觀點都沒有改變，而在收入《毛選》時，篇幅刪去將近一半。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評論的文字，《毛選》版卻全部刪去；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也全刪去。因此，《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

《階級分析》發表于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3]毛澤東這篇《階級分析》同時在三個刊物上發表，並在兩地發行單行本，影響極大，致使 1926 年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不滿和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4]

《階級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澤東，特別是他的知識分子觀的重要資料，可惜至今未見有任何介紹和評論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階級分析》1925 年版的原文公之於衆，並與 1951 年《毛選》版進行比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進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選》的《階級分析》一文是根據 1926 年 3 月出版的《中國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國青年》所載的該文作為原文。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一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毛選》版把第一類的階級屬性從“大資產階級”改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刪去了上述“反動派知識階級……”這 120 多字。文章結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動知識界”取代原來的“反動派知識階級”，範圍似乎縮小了，但“反動知識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並未交代；這頂“反動”帽子，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知識界的頭上。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原文結束語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最後原文還說：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

《毛選》版這一部分主要改動的地方是明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反反復復的分

析、評論，全部刪去。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毛選》版對小資產階級這部分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改動，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為小資產階級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類“半無產階級”和第五類“無產階級”，原文都未涉及知識分子。《毛選》版改動不多，最重要改動的地方是：原文把工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都說成“是我們的朋友”；《毛選》版則改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綜上所述，被《毛選》刪改的《階級分析》原文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原文雖然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把它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平列，同稱為“我們的朋友”，這有悖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基本原理：工業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在此文發表前 11 個月的 1925 年 1 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特別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作出決議。這一問題，1951 年的《毛選》已作了改正。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毛選》只是把它掩蓋起來，這就是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選》中雖然刪去了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依然如故。

（三）毛澤東為何敵視知識分子？

毛澤東為什麼會如此仇恨知識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歸結為：青年時代不順心的經歷和無產階級專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澤東青少年時就狂妄自大，霸氣十足。早在 1910 年，17 歲的毛澤東應湘鄉縣高等小學入學考試時，曾在以《言志》為題的作文中，寫了一首詠蛙詩：

“獨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為踞），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那個蟲兒敢作聲。”^[5]

就暴露了他唯我獨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時代的經歷並不如意。1918 年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只有 8 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難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傷害，直到 1936 年他還告訴美國記者斯諾：“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6]自視甚高的毛澤東，把這種遭遇視為奇恥大辱，屈辱感又轉化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五四後他接受了與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思考，不願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從；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關心國家命運；對國家大事好發議

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評頭品足。他們不願做馴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的公民。毛澤東自然無法容忍這些不聽話的人。1942 年通過整風運動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開始滿足他當皇帝的願望。最明顯的是 1945 年發表的舊詞作《沁園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漢武”。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 1958 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自誇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遠比秦始皇高超。

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靜、呂留良文字獄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簡單消滅肉體的“坑儒”，變成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由群眾來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態勢。這種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第一次發生於 1942 年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黨內領導地位而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奪取全國政權後不到兩年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這類運動，幾乎每年一次，甚至兩次。如：1951 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52 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 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 年批判胡適思想，1955 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反運動，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已是“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隨後又有“拔白旗”運動。1966 年開始歷時十年的對文化進行“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徹底毀滅文化的民族大災難，毛澤東鄙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達到了荒唐的瘋狂程度。下面對這些運動擇要作些評述。

（四）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1931 年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國內政治形勢

發生變化。1935 年，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調整與各階級的關係，改善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的支持。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共產黨對進步知識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

毛澤東對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喜憂參半，存有戒心。1942 年，毛澤東為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整風於 1942 年 2 月開始，一些知識分子不知就裏，積極響應號召，天真地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不料犯了禁忌，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和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歷來人們把發生這兩件事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康生，直到 2002 年 12 月出版的《百年潮》發表《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紀略》，仍沿此說。事實上，康生只是從犯，主謀是毛澤東，是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實味是 1937 年到延安的中共黨員，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1942 年 3 月他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幹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並在牆報《矢與的》上鼓動群眾向“大人物”提意見。王實味對共產黨權威的挑戰，引起毛澤東惱怒。據當時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回憶：毛澤東深夜去看《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隨之轉為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級為政治問題，最後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等罪名，由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為毛澤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實味後，毛澤東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10]，並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雙方都派遣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號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眾揭發檢舉。於是從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掀起“搶救運動”高潮。知識分子成為“搶救”的重點。運動通過大小批鬥會，誘供逼供，關禁閉，用酷刑，在極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檢舉出大量“特務”。毛澤東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講話》說：中央黨校挖出特務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計還不止此數。而行政學院，他認為，“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12]據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稱：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中，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只有20人沒有被“搶救”。^[13]許多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外來幹部，大多是經過共產黨地下組織介紹來的，這些地下組織因此被打成特務組織，如甘肅、陝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會被認為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14]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運動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據當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1945年3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報告《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

稱：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 1935 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東的外來的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搶得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 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南翔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眾鬥爭的方式進行“普遍肅反”。^[15]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 80% 的知識分子上臺‘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16] 象李銳、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中共黨員，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1943 年底，中共中央鑒於各單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無法開展正常工作，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實味卻於 1947 年被處決，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也沒有平反。不少人的歷史問題當時沒有作結論，成為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批鬥對象。

據親歷延安“搶救運動”的溫濟澤、韋君宜等回憶，“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以後，毛澤東為挽回影響，曾多次在群眾集會上賠禮道歉，為搶救運動的錯誤承擔責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對這次運動始終沒有認真總結，吸取教訓。相反地，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卻“留中不發”，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況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才從蔣南翔的遺稿中獲悉。^[18]

對王實味的冤案，毛澤東始終不承認自己搞錯了，1962 年還毫無根據地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當時

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直到1982年共產黨為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平了反。1991年，在溫濟澤等大力推動下，蒙冤將近50年的王實味才獲平反昭雪。

（五）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中共奪取政權前夕，毛澤東於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附屬物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主要打擊對象。但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遠比消滅地主資本家複雜，何況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識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對知識分子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着重點顯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據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經驗，用群眾性的批判運動來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於1951年5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黃宗英的丈夫趙丹演武訓，黃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師。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同時也有人認為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學“不足為訓”。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學術性爭論變成一場政治批判運動，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

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社論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批評 43 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 48 名作者，充分發洩了毛澤東的惱怒。

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訓家鄉進行所謂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 7 月 23—28 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利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等等。

毛澤東為什麼要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 年 1 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20] 原來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復辟勢力，當然要把他們打倒在地。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這場批判運動。被社論點名的 48 人，以及影片編導、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進行檢討，接受批判。各報刊發表批判和檢討文章數百篇。不但影片《武訓傳》從此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創辦的“武訓學校”一律更改校名，有關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拆除。推崇過武訓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武訓傳》批判硝煙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1]接着，《人民日報》出現通欄標題：“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專科學校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不久，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運動的目的是清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劃清敵我界限。當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發表文章咒罵自己。如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羅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游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但他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

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進行揭露批判，稍有辯解，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辱罵。為了“過關”，他們不得不顛倒是非地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上世紀 30 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卻被迫檢討說：“我于 1920 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美國參加過一個時期軍事科學研究，為抗日戰爭服務，卻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24]

經過上述“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但他們的人格卻遭到嚴重侮辱，知識分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視為反動。加上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號令全國知識分子學習蘇聯，在中蘇兩國官方意識形態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實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產生出上乘的精神產品。

（七）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組成部分，文藝界於 1951 年 11 月開始整風。胡風的文藝思想成為整風的靶子。胡風是黨外進步作家，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就與魯迅合作同國民黨文化“圍剿”

作過鬥爭。因他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 1942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左，被視為“異己”，屢遭批判。胡風為了批駁對方，說明自己的文藝思想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的觀點，在一些朋友幫助下，寫成長達 30 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於 1954 年 7 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風的 30 萬言書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表面尊重，骨子裏卻大相徑庭，引起毛澤東極大憤怒。1955 年春，胡風與朋友之間來往的信件被其中一個“朋友”告密，落入毛澤東之手。信中有對毛不敬的語言和對文藝界現狀不滿的牢騷，毛澤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人民日報》於 1955 年 5-6 月分三批發表這些信件，並加上標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親自為之寫“序言”和“按語”，毫無根據地捏造罪名說，“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說他們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5]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胡風夫婦于 1955 年 5 月 17 日被捕，其他“胡風分子”也陸續入獄。凡是與“胡風分子”有過來往，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無一例外地受到群眾性揭發批判、停職審查，或剝奪人身自由的“隔離審查”。據 1980 年司法部門所作胡風一案復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涉及 2100 人，逮捕 92 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 78 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 23 人。（據知情者稱“真實數字遠不止此”）。^[26]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歷盡摧殘。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才開始復查。1980 年司法部門復查結論稱：“胡風

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27]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在坐牢 25 年以後才得以無罪釋放。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平反通知書中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文藝活動仍存在不少不實之詞，經過三次長達 8 年時間，才從政治上到文藝思想上予以徹底平反。這已經是他蒙冤 33 年以後，胡風去世也已 3 年了。

繼反胡風運動以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交代揭發出來有某些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成為肅反對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訓傳》批判、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運動在性質上升級了。前者雖然態度粗暴，亂扣“反動”帽子，畢竟在思想批判範圍之內，批判對象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胡風運動則把持不同文藝觀點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革命，送進了監獄。從此，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程度進入一個新階段，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帽子。

（八）使民族走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6 年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平靜和舒暢的一年。1 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

2 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個人崇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

形態基礎受到了動搖。為挽救極權統治危局，毛澤東提出緩和矛盾的“十大關係”和博得知識分子歡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他一年後把它美稱為“引蛇出洞”的“陽謀”，實際上是無比陰險惡毒的陰謀。1957年1月，他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時，他還洩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28]原來，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爭鳴”；“百花齊放”，不過是香花與毒草之間的“齊放”。而毒草必須被剷除，被統治者只能作馴服的奴隸！

為了使他設計的圈套具有誘人的光彩，一個月後（2月27日），毛澤東拋出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5個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作了根本性改動），用“人民內部”的美名來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拋出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

意見。為鼓吹“鳴放”，毛澤東從 3 月 6 日到 20 日這 15 天內，在北京、上海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 9 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 90% 對雙百方針有抵觸。4 月下旬，開始了所謂“整風鳴放”，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4 月 30 日，毛澤東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裏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 天后，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經過連續幾年的思想批判運動以後，知識分子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只因毛澤東反復動員，各單位領導人奉命熱忱相邀，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為毛澤東的“誠意”所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使 1957 年 5 月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

5 月 10 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並說：“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29] 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當他聽到統戰部長李維漢彙報時，覺得一年來不斷進行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已經可以考慮收網了。5 月 15 日，他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 4 個月前向高級幹部交的底也向一般黨內幹部吹吹風。他把鳴放中表示“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人，統稱為“右派”，“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這是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30]

在毛澤東親手策劃和總書記鄧小平賣力執行下，6月8日終於開始收網，全國開展所謂反右派鬥爭，把鳴放中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己作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四類之外，又加了第五類右派分子。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人，占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500萬的11%。他們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分還被關進監獄。此外，在反右運動中，小學教師和農村區鄉幹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計人數達50萬；但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就改戴壞分子或地主這類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還要慘。反右運動後期，在右派之外又劃了一大批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數估計在50萬以上。總之，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中有30%左右成為專政對象和異己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民族大災難。

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災難，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和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1958年，毛澤東為他自己精心策劃的“陽謀”取得“輝煌戰果”沖昏了頭腦，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誇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並說，對資產階級還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澤東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說過：“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1]如今，他連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為一個沒有人性、沒有良心的比秦始皇還要暴戾的暴君。在視良心如敝屣的騙子和暴君的威懾下，造謠、告密成為時尚，出賣靈魂的咬人、整人者官運亨通。中國進入一個恐懼與謊言相

交織的時代。

在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以後，毛澤東的權力欲大大膨脹，1958 年春在反右運動尚處於收尾階段時，就發動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的所謂“大躍進”。大躍進從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煉鋼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衛星田”。毛澤東再一次為他的“勝利”所陶醉，提出今後農田只需要三分之一種糧食，以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同時提出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夢。結果適得其反，全民大煉鋼鐵，造成全國森林遭到毀滅性砍伐和廢鐵渣如山；農業放衛星的謊言造成餓殍遍野，從 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間，餓死 4000 萬人，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大災難。這是反右運動所施展的欺騙與鎮壓兩種手法的必然惡果。

（九）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以“大躍進”的美名，製造了 4000 萬冤魂的空前大饑荒，由於已喪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無自疚自責之心，反而把這場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災難歸咎於“自然災害”。事實上，這三年中國氣候屬於正常，並無大旱大澇。1962 年 1 月，被毛澤東封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澤東，當時不露聲色。8 個月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發動一場批判“翻案風”運動，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隨後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直指劉少奇。

由於毛澤東已於 1959 年宣佈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並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為誅滅劉少奇，毛澤東採取雙重大包抄策略。他盤算着，要打倒劉少奇，必須先打垮由劉少奇掌握的整個共產黨組織和除軍隊以外的整個國家機器；而要實現這一步，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意識形態鬥爭入手，先向知識和文化領域開刀。知識分子就成為劉少奇的殉葬品。

經過多年精心策劃，毛澤東于 1966 年 5 月宣佈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只說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第二個文件，8 月 8 日拋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才點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又再次提出，要對“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進行批判。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毛澤東一年後把它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2]

為了對所有知識文化領域實行絕對專制的“全面專政”，毛澤東鼓動年幼無知的中學生起來“造反”，開展所謂“破四舊”運動，意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於是書籍被燒，文物被毀，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以至遭毒打、殺戮。知識分子成為革命對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 8 類革命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於是，知識

成為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時髦的口號。這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洩。

毛澤東為誅滅劉少奇而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毀滅知識和文化，還要通過鎮壓和欺騙手法製造一場尊他為神的造神運動。通過他長期豢養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澤東被說成是“心中的紅太陽”，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人人都必須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請示、晚彙報”；人人都必須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隨時隨地集體跳“忠字舞”。這場荒唐的弄神裝鬼的滑稽劇，不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澤東自己深為陶醉。他在臨死前還得意地把“文革”和 1949 年的革命並列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毛澤東死後一個月，這場歷時 10 年又 4 個月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浩劫也就壽終正寢。不過，毛澤東的陰魂依然未散，謊言和鬼話依然大有市場，“毛澤東思想”依然被奉為指導思想。

2003 年 5 月於北京中關村

【注釋】

- [1] 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文匯讀書週報》，2002 年 12 月 6 日。
- [2] 198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注釋稱：“本文原載於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 1925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 4 期，以後又在 1926 年 3 月廣州出版的《中國青年》第 116、117 期上發表。”現在我除找到上述兩種雜誌外，又找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 1926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中國農民》月刊

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99頁。當時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 [4] 《現代評論》發表張奚若《中國今日所謂知識階級》（1927年1月），宇文《打倒知識階級》（1927年2月），《一般》雜誌發表心如《“打倒知識階級”口號中所認識的》（1927年9月）等等。
- [5] 邵燕祥《“詠蛙”詩的故事》，見《夜讀劄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據邵文介紹，這首詩最早見諸文字的是1988年4月10日《中國青年報·星期日》所載《毛澤東〈詠蛙〉詩》一文，署名張湘藩。同一家報紙在那年5月22日刊出黃飛英寫的《〈詠蛙〉詩的作者是誰》，指出此詩出於清末湖北名士鄭正鵠之手。原詩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蔭；

明春我不先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

少年毛澤東借鄭詩略改數字，應付入學考試，並受到校長的誇獎。

- [6] 愛德格·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第127頁。
- [7] 參見謝蒼霖、萬芳珍：《三千年文禍》，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頁。
- [8] 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同上書，第105、108頁。李維漢：《回憶與思考》（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頁。
- [9] 同注釋[8]。
- [10] 參見《毛澤東年譜》（中），第388頁。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頁。

-
- [11]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第 37 輯，第 208 頁、217 頁、210 頁。
- [12] 《毛主席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的講話》，1943 年 8 月 8 日，轉引自《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53 頁。
- [13] 同注釋[11]。
- [14] 同注釋[11]。
- [15] 文聿：《中國“左”禍》，新華出版社，1993 年，第 130、140、143、149 頁。
- [16]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25 頁。
- [17]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第 37 輯，第 229 頁。溫濟澤：《延安的搶救運動》，《文匯讀書週報》1999 年 7 月 24 日。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年，第 19 頁。
- [1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年，第 20 頁。
- [19] 《毛澤東著作選》（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36 頁。
- [20]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33 頁。
- [21] 同注釋[20]。
- [2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4 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第 526、620、627 頁。
- [23] 《光明日報》1952 年 8 月 13 日，轉引自丁抒《陽謀》，九十年代雜誌社，1993 年，第 46-47 頁。
- [24] 《光明日報》1952 年 4 月 8 日，轉引自丁抒《陽謀》，九十年代雜誌社，1993 年，第 47 頁。

-
- [25]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61、163 頁。
- [26]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的一生》，《胡風，死人復活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第 63 頁。
- [27] 轉引自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 年，第 3 頁。
- [28]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33-350 頁。
- [29] 羅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 年 7 月 15 日的發言。見謝泳編：《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第 311-312 頁。
- [30]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24-425 頁。
- [31]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827 頁。
- [32]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1967 年 11 月 6 日。